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丁龙嘉 听雨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主要人物简历

赵健民（1912- ），山东冠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组组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第十届中央副主席。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阴谋诡计。“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相勾结，直接参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5年12月16日病死。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其罪行被揭露。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武装叛乱、反革命诬告陷害等罪行，因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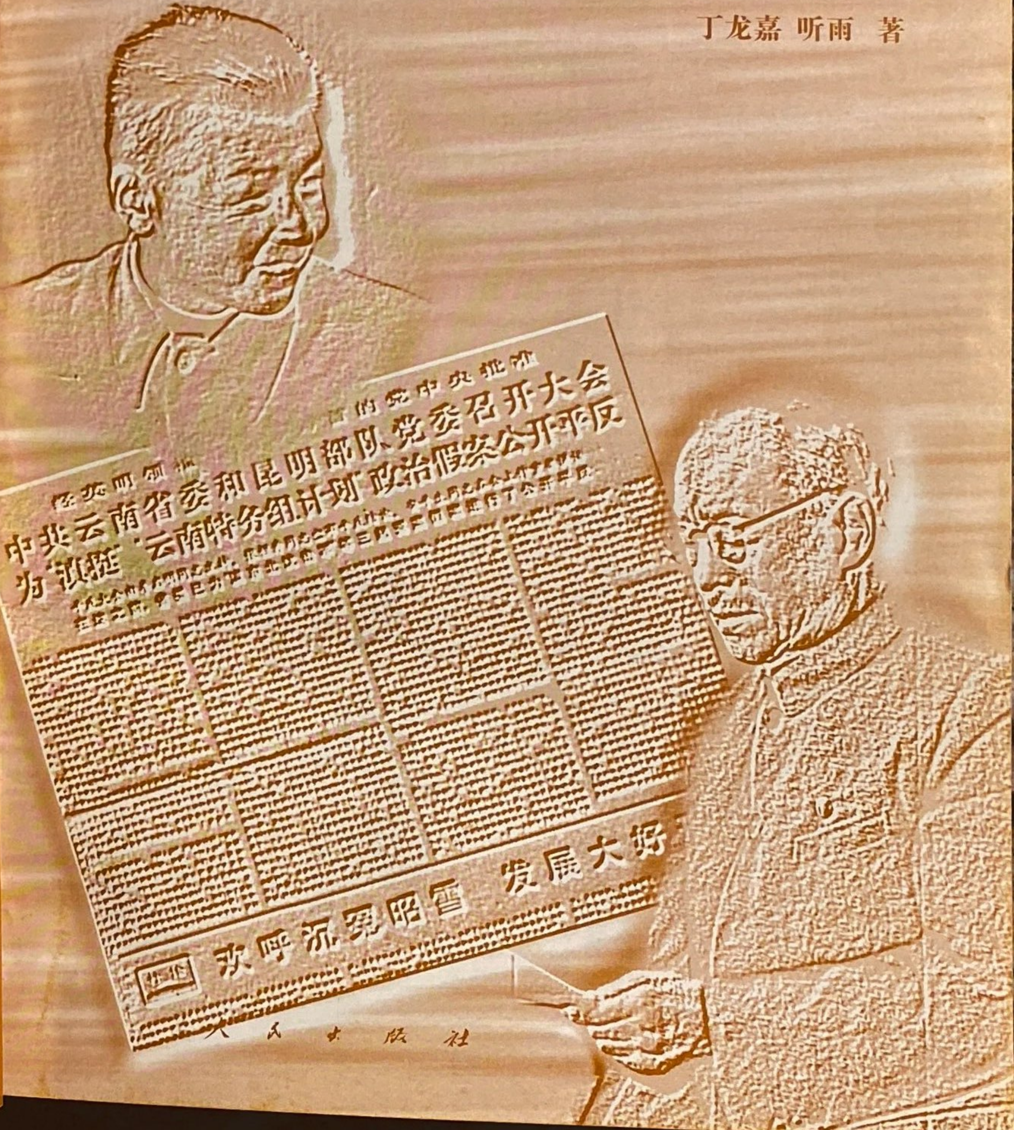
DS
778.7
.T56
1999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恩格斯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丁龙嘉 听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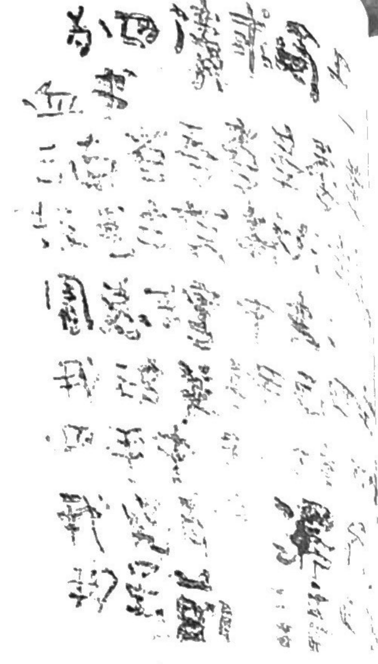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康生与趙健民冤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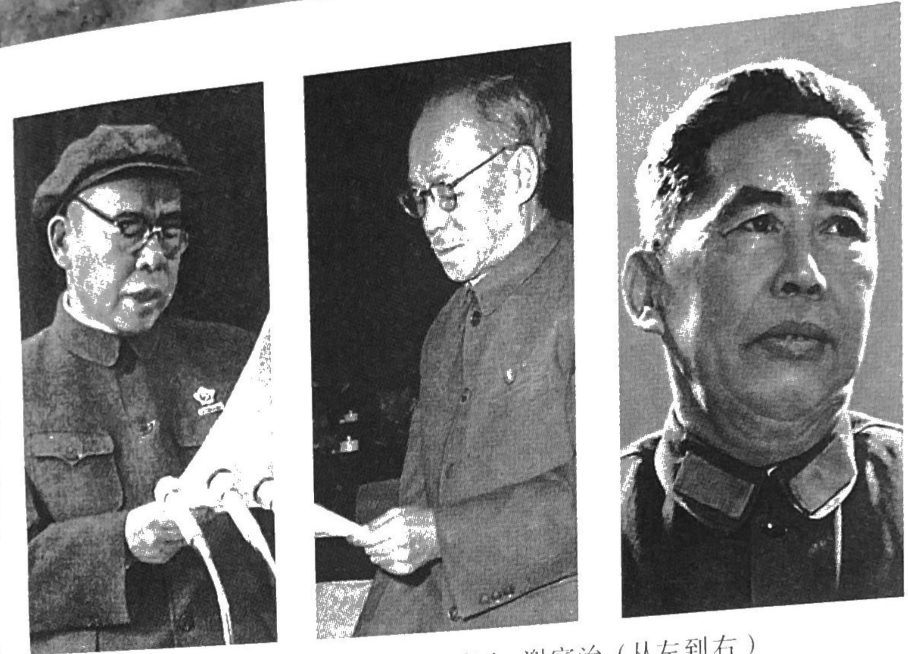
薄一波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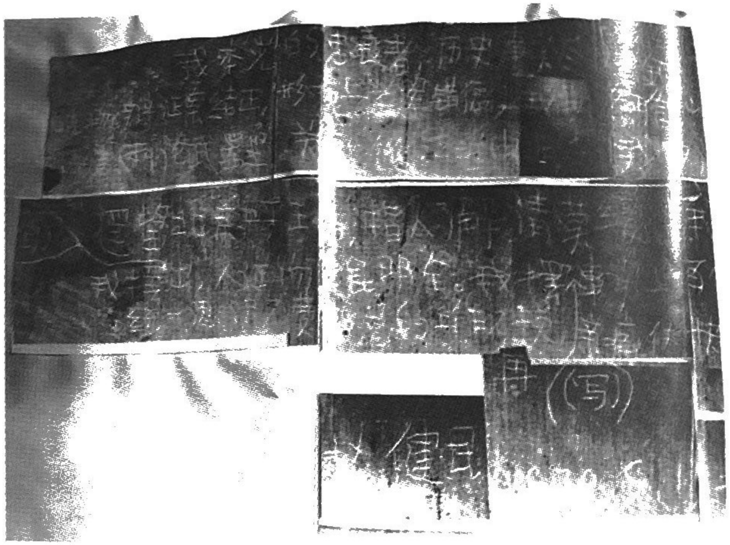
“文革”前夕的赵健民



1971 年 11 月 日，赵健民在狱中给中央写的血书



“文化大革命”中的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从左到右）



1970 年 9 月，云南省第三监狱连续对赵健民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图为赵健民 9 月 15 日用铁钉在牢房墙壁上刻的记录审讯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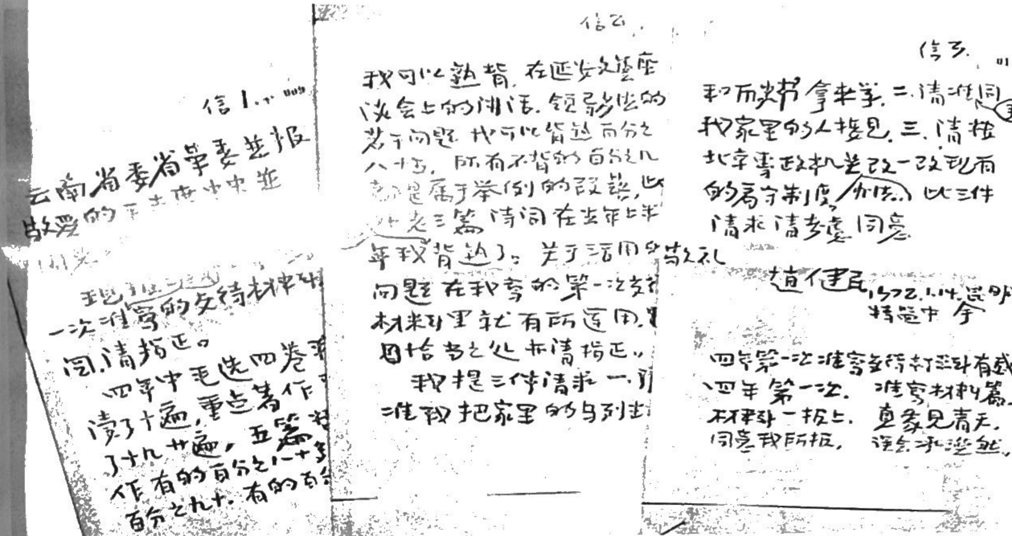
1967 年，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在北京一次群众大会上



“划线站队”运动中，某县批斗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的情景



线站队”运动中的 1969 年
月 5 日，一位学生正在遭受残酷的



信1

云南省委省革委并报
敬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
[illegible]
一次准写的交待材料中
同志指正。
四卷毛选四卷我
读了十遍，重点著作
了十几廿遍，五篇
作有的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有的百分

信二

我可以熟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总的若干问题，我可以背达百分之八十五，所有不背的百分之几也是属于举例的段落，此外老三篇诗词在去年上半年我背过了。关于活用的散礼问题在我写的第一次交待材料里就有所运用，因恰当之处请指正。
我提三件请求，一是准我把家里的马列书

信三

和历史书拿来学。二、请准把家里的人接见。三、请按北京專政机关一段现有的看守制度办法，此三件请求请考虑同意。
赵健民 1972.1.14 昆明特监中
四年第一次准写交待材料有感
四年第一次，准写材料篇。
材料一投上，真象见青天。
同意我所拟，谨念毛泽东。

1972 年 1 月 14 日，赵健民在狱中得到许可开始写申诉书。申诉书长达 18 万言，图为申诉书的开头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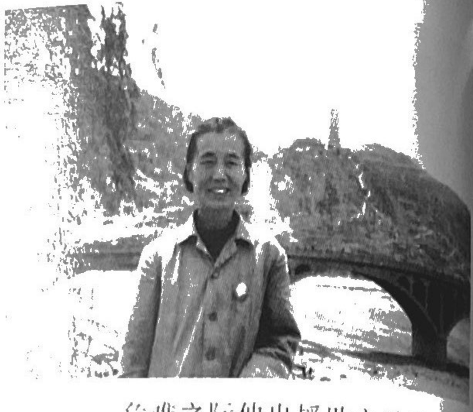
“划线站队”运动中，云南大学批斗会的一幕



1978 年春，当赵健民（右三）离滇赴京时，上万名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



为正义挺身相助的北京卫戍区某部战士齐运岭



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的北京宣武医院儿科主任李同





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的北京市长途电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姬玉兰

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的赵健民原秘书屠荣举及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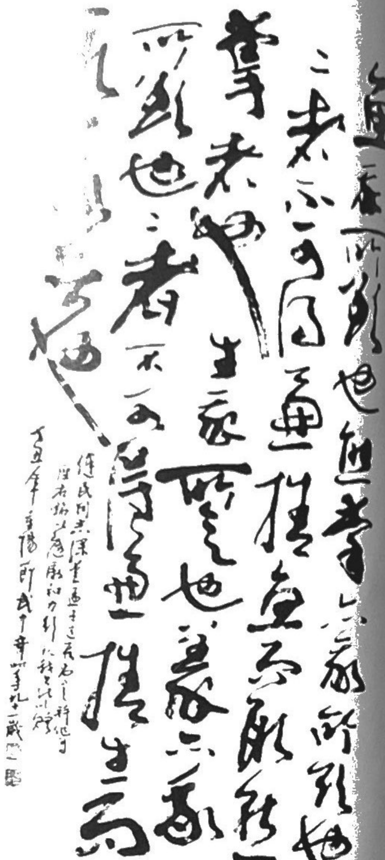
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左二）。图为赵健民（左一）、本书作者丁龙嘉（左三）拜访杨得志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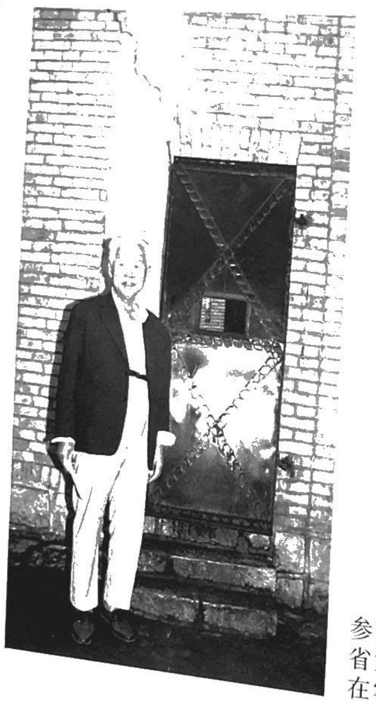
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姚仲明（左二）。因为“文革”后赵健民（左四）拜访姚仲明时合影



1989年，赵健民参观关押过他的云南省第二监狱



1997年重阳节，91岁的武中奇将孟子的一段名言书赠给赵健民



1989年，赵健民参观关押过他的云南省第二监狱。这是他在牢房门口的留影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赵健民冤案”的文件(摘录) ……………… (1)

序　一 ……………… 张铚秀(5)

序　二 ……………… 廖盖隆(9)

第一章　当“宣判”到来的时候 ……………… (1)

1968年8月，云南又一次“改朝换代”——最高司令部“宣判”阎红彦、赵健民政治“死刑”——面对着黑白颠倒的“宣判”

第二章　“文革”初期的有限抵制 ……………… (5)

《五一六通知》与批判《滇云漫谭》、《四月提纲》——春城骤起“八二三风暴”、“九一四风云”——云南省委在炮轰中摇摇欲坠——“共产党员旗帜鲜明，我反对笼统炮轰！”

第三章　第一位被揪斗游街的云南省委负责人 ……………… (16)

大乱的冬季——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被揪

斗游街——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被逼身亡——周恩来的关注——中央来电

第四章　人民大会堂，面见康生进忠言……………………（25）

云南省委在夺权中瘫痪了——应召进京——面见康生进忠言——与“二月逆流”一脉相承

第五章　搏斗于险风恶浪之中……………………………（38）

大联合：联而不合；三结合：勉强凑合；大批判：火上浇油——云南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陷入派性——“四二六”事件开武斗先例——北教场大规模武斗再起——风雨满春城——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宣传大联合——康生京中施毒计——申明一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反对武斗——陷害，正暗中迫近——“八派”亮出了“打倒赵健民”的旗帜——进见谢富治、王力——武斗升级，“八派”、“炮派”决一死战——北京的关注——陷害，又上一个新台阶——忧心如焚，痛切建议——武斗，在高压下暂时沉寂

第六章　京西宾馆，义正辞严驳康生……………………（55）

春城，再次爆发大规模“抢”枪、武斗——北京，又一个战场——千里之外制止武斗——“八派”掀起“打赵（健民）保周（兴）”高潮——一场面对面的诬陷与反诬陷斗争——“对赵健民监护审查！”一辆吉普车消失在夜色中

第七章　夫人杨瑞波风雪出京城…………………………（67）

度秒如年——朦胧中的回忆——深夜中，被逐出京西宾馆——风雪中，彻里彻外地凉了——杨得志夫妇一片真情——杨庄煎熬

第八章　惊心动魄的“滇西挺进纵队”假案……………（75）

下关市“一五”流血事件——工八团的荣耀与悲哀——西进救围——撤出下关——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武装“围剿”——捏造·夸大·陷害——康生、江青的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

第九章　京西半壁店，初期监禁的日子里………………（88）

不合实际的愿望——第一封申诉信——一位正义的战士：齐运岭——家书抵万金——熬煎中苦读《毛选》——第二封申诉信——赤胆忠心致书毛泽东——不予转交的第三封申诉信——语重心长告妻儿——齐运岭义送书信

第十章　交通干校，漫长的六百三十四天…………………（100）

转监——突如其来的搜查——齐运岭大祸临头——一份温情——十年后的平反——监护中的反思之一：党和国家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监护中的反思之二：中国急需“民主”与“法制”——监护中的反思之三：中国必须改善现行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把选举公仆的权利交给人民群众——挨打——石灰块写成的《一年有感》——祭母

第十一章　被捕，秦城监狱二十日………………………（123）

给毛泽东的报告信、《怒火鸣》、《进一步支援缅甸革命运动的建议》，三者化为碎片——《感事报康老、谢

副总理》：直刺康生——夜入秦城——天上移监

第十二章　大迫害到来前的紧锣密鼓……（133）

康生说，赵健民“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谭甫仁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遭受诬陷，由赵健民进到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极“左”的估计：云南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康生要求云南：把里里外外搞清楚——林彪、黄永胜指示谭甫仁：到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划线站队”与“清理阶级队伍”的巧妙融合——大迫害锋芒所指：“炮派”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鲁瑞林在北京“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团中开创了大迫害的先例

第十三章　大迫害……（149）

云南省革委第七次全会，掀起了大迫害的狂潮——追查子虚乌有的“滇西挺进纵队”分子——“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假案——“文山州‘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政治冤案——“‘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反革命组织”政治冤案——“‘摧资兵团’反动组织”政治冤案——迫害重要干部的“云南省省级机关学习班”——迫害公、检、法干部的“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玉溪地区的“划线站队”——昆明市、保山和德宏地区、红河州、云南大学、昆明铁路局的“划线站队”——巧家县的“划线站队”——江川县“农革军”假案——新平县“特务组”假案——“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冤案

第十四章　建立“政治边防”中的大迫害……（197）

“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又出“左”招：建立“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黄永胜传达林彪的指示：要搞政治边防——建立“政治边防”：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人成为“敌人”——进行“二次土改”：七千六百零五户贫下中农升为地主、富农，三万零六百二十户遭抄家

第十五章　云南特监中的抗争……（206）

从北京回昆明——云南省第三监狱，非人的折磨——一上血书——惨无人性的审讯——斗争：第一次绝食——转入云南省第二监狱——斗争：第二次绝食——再上血书——斗争：第三次绝食——一千二百七十页、十八万言：巨篇申诉书

第十六章　青史不容污……（222）

历史的追忆——远离故乡，寻找中国共产党——《乡村教育与中华民族解放》的演说与加入共青团——中共山东党组织遭受特大破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独立组成中共济南市委和山东省工委——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中共北方局——新省委的组织部长——起草《为抗日救国，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宣言》——危险时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被捕——酷刑面前，坚强不屈——攻心面前，义正辞严——死神面前，舌战韩复榘——狱中党支部书记——公正的历史结论——无耻的陷害

第十七章　家庭,在风雨中飘摇 ……………………………………… (251)

杨瑞波失去自由——与孤独、寂寞相伴的二十余天——难以承受的劳动改造和审讯——三次惨不忍睹的批斗——三次毫无人性的游街——下马村学习班:历尽了肉体与精神折磨——破碎的家庭:遭受"囚禁"的赵小松,回到千里之外老家的赵小桐,玩了个花招才回到老家的赵小楠——贫困与迫害交加之下的日子——在侮辱与打骂中求生的小赵杨——杨瑞波病倒了又站起来——好人马正弟——"不斗争是不行啊!"

第十八章　穿透乌云的一线阳光 ……………………………………… (272)

寻找赵健民的下落——难以统计次数的上访——阳光微露——五年来的第一次见面——"离婚吧。如果我能活着出去,咱们再复婚。"思考了许久的这句话,赵健民始终未能说出口——周恩来指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陈锡联打招呼:不解决"划线站队"的问题,你们的工作就被动——周兴耍了个两面手法——第一次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夭折了

第十九章　栽赃、陷害的《审查结论》 ………………………………… (282)

"批林批孔"运动骤起,形势发生逆转——三上血书——陷赵健民于死地的《审查结论》——无中生有的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囹圄中嘱妻子儿女:学习,学习,再学习——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第二十章　历尽磨难的上访 ……………………………………… (292)

不远数千里赴京上访——姚仲明出上策——屠荣举倾力相助——姬玉兰探索走王海容这条线——还是李同、朱礼泉,将情况直送邓小平——重于千金的一百五十元

第二十一章　乍暖又寒 ……………………………………………… (302)

197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邓小平的声音:赵健民同志的身体怎样?——解除专案审查,发给生活费——丁诗纯的象牙筷子——结束二千八百零九个昼夜的关押——又起一片乌云——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再次受挫

第二十二章　正义的裁判 …………………………………………… (308)

"四五"运动带来了希望——粉碎"四人帮"后云南的巨变——一天三个文件,三起冤假案获得平反——1978年9月8日:云南历史上有意义的一天——二百五十万人的平反大会——第111号文件中了"妖"——历史,还赵健民以清白、光荣——历史,将制造冤假错案的罪人押上审判台——审查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三百六十七人、立案审查十七万五千九百七十四人、打逼死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九人的罕见冤案,给世人留下了什么?

第二十三章　劫难过后 ……………………………………………… (340)

上万春城人民自发为赵健民送行——率先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关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腐败——被迫害者与迫害者一次面对面的反思——恪守人生格言：舍生取义

后　记……………………………………………………（347）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赵健民冤案”的文件　（摘录）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①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捏造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康生、谢富治不准赵健民申辩，由谢富治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四千余人②被迫害致死。

——摘自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大量冤案，在全国范围内

① 原文如此。职务准确名称为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委第一书记）。——作者

② 最初统计数字。实为一万七千余人。——作者

煽动“打砸抢”，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一九六八年，康生、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冤案。……

——摘自 1981 年 1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林彪、“四人帮”对赵健民同志的关押审查，完全是他们为了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制造的一个假案。他们强加于赵健民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统统推倒，给予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摘自中共云南省委文件（云发〔1978〕111 号）

原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点名诬陷为“叛徒”，搞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投进监狱长期关押。1978 年，云南省委已做出平反结论，业经中央同意，现通报如下：

赵健民同志的历史问题，1957 年中央组织部审查结论认为：“赵健民同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仍维持这一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赵健民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诬陷，投进监狱关押审查近八年之久，云南有的报纸、文件、刊物等对他进行造谣诬蔑；在关押期间对赵健民同志实行法西斯专政，使他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折磨。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并同康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林彪、“四人帮”强加于赵健民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经统统推倒，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特此通报。

——摘自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8 年 5 月 6 日《关于赵健民同志平反的通报》

序　一

那场给党、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了，但是许多事情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平反“赵健民冤案”，就是其中的一件。

“文革”中期，我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山东的追随者，颠倒黑白地批判了袁升平同志和我。面对再次出现的社会动乱，我不禁忧心如焚。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被委以重任，实际上主持中央和军委的日常工作。这时，我似乎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于是，就致信小平同志，要求换一个工作环境。9月间，接到调令，去云南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就这样，离开了战斗、工作、生活三十年的山东。到云南不久，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垮台了。1977年2月，中央改组了云南省党、政领导班子，任命我为省委副书记(后为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分工我负责揭批查运动和政法工作，后又要我分管党群口并兼任组织部长。这一时期，我把主要精力用在清查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及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上。

云南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十年中，各种冤假错案如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与赵健民同志相联系的一批案子。当时，我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错了的就要改，公开批判的就要公开平反。因为只有

这样，才能恢复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威信；才能团结前进。在来云南之前，我虽在山东多年，而赵健民同志在50年代担任过山东省长，但彼此并不熟悉。只是听说，赵健民同志不同意将向明、王少庸等同志定为反党集团，“大跃进”中不相信聊城等地区能亩产万斤粮，因而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销了省长的职务。还听说，赵健民同志不但不同意省委（实际上是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而且还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省党代会上据理进行了反驳；他这种不畏高压、勇于抗争的举动，得到了山东的大多数干部的暗中拥护，认为是给被压制被批判的干部出了气。

我接手云南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后，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赵健民同志一案的要害是他刚正不阿，直率地批评“文革”中的“左”倾错误，而遭到康生及其追随者的诬陷。对康生等人的迫害，赵健民同志据实予以了批驳，被关押后一直进行抗争。对他这种坚贞不屈的英勇行为，我是赞许和钦佩的，当时就认为这个案子应该平反。要平反，并非没有阻力。有的人曾用威胁的口吻告诫我：“赵健民的案子是康老定的，不能动。”我当即回答：“不管是谁定的，都要实事求是。”1978年夏天，这起审查一百三十八万多人、打死逼死一万七千多人的“赵健民冤案”，经中央批准得到了彻底平反。

这一特大冤案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解剖这一冤案，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的问世，应该受到欢迎。

作者告诉我，书中不仅要再现冤案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结局的全过程，而且要剖析冤案出现的原因。我认为这个指导思想是

十分可贵的。作者强调，这部书不是“纪实文学”，而是力求写成一部信史；书中可能有个别史实因考辨不够而与事实有些出入，但绝没有任何故意编造或虚构的成分，并表示竭诚欢迎读者就史实、观点进行指正。我觉得作者的学风是严谨的，这也正是“文革”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亿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而且也对后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每一位严肃的共产党人，都应正视“文革”，重视“文革”史的研究。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 让我们认真研究“文革”史，从中汲取教训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张铚秀

1997年9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序　二

丁龙嘉和听雨合著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这本书，是很有可读性和教育意义的。它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它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是名符其实的真实纪录，是当之无愧的一部信史。

正如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张铚秀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赵健民"这一特大冤案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解剖这一冤案，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革"十年浩劫中许多冤案中的一个实例。正如张铚秀所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亿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而且也对后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每一位严肃的共产党人，都应正视'文革'，重视'文革'史的研究。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让我们认真研究'文革'史，从中汲取教训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过去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思想政治影响远未肃清。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光荣伟大的民族，又是在国内长期遭受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和摧残，一百多年来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的

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反抗，就会被这些内外压迫者、奴役者施以酷刑拷打或像割草一样杀死。反过来说，被压迫者、被奴役者，在对压迫者、奴役者的斗争中，甚至在人民内部的斗争中，也使用非人性的手段，即采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手段。这就成为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沉重的负担。我们个别的或者少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幸也背上了这种沉重的历史包袱。

因此，卓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曾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采用肉刑。”他在 1948 年 1 月 12 日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说：“乱打人乱杀人和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任弼时在这个讲话中还指出：“应该区别对待地主富农。对地主原则上只应该是在经济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扫地出门，以致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对人数达到三千万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不仅不应该乱打乱杀，而且在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以后，还应该分给一份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使他们改造成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益的力量。”

毛泽东对任弼时上述这篇理论结合实际、很有说服力的讲话非常赞许，将它稍加修改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从而使当时全国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以前，任弼时在 1944 年 11 月 4 日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到要记取党的历史教训，不要乱打人乱杀人。他

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上述任弼时这篇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全党贯彻执行的在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使用肉刑的，是坚决保障人权的。凡是乱打人乱杀人和使用肉刑，都是不能容许的，都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纪党法的。凡是这样做的，都不是真的好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是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信誉和形象。对这种行为，任何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都有权批评、检举、揭发、监督，以维护党的信誉和形象。这就是说，我们要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行为，要坚决保障人权、废除肉刑，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如果以为对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和敌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而他们又再不反抗、不捣乱、不破坏的条件下，也要使用肉刑和乱打乱杀，而不保障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对待战争中的俘虏，我们历来都实行宽待政策，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搜他们的腰包，不没收他们的财物一样。

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这部纪录、分析这一特大冤案的书中，制造冤案的奸徒是恶名昭著的康生。康生(1898—1975)，是山东诸城人，原名张宗可，又名赵容。1992 年 12 月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第 1900 页记载，他的为人是“一贯以极‘左’的面目搞阴谋诡计，‘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勾结，直接参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5 年 12 月 16 日病死”。1976 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康生的罪行被揭露。1980

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武装叛乱、反革命诬告陷害等罪行，因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历史的事实证明，康生是一个钻进党内猎取重大权势地位的阴谋家，他曾取得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显赫权势地位，自以为人莫予毒。他绝对想不到，他的严重罪行，即使在死后也还被揭露出来，并被开除党籍，落了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与康生勾结起来制造"赵健民冤案"的是当时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当康生宣布他凭四十多年革命的"敏感"断定赵健民是一个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的叛徒时，谢富治就立即宣布拘留审查赵健民，让他预先召来的武装人员即刻将赵健民抓走。谢富治(1906—1972)，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在历史上曾有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但他同康生一样，是一个钻进党内谋取权势地位的阴谋家。据前述《中国人名大辞典》第2064页记载，他除取得了上将军衔外，1965年还取得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权势地位。他的政治真面目，在"文革"中才暴露。他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死后的1980年，罪行被揭露，并被开除党籍。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也是因为已死，才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在康生伙同谢富治所制造的"赵健民冤案"中，有一百三十八万多人被审查(其中的大多数人遭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和折磨)，一万七千多人被打死逼死。这是多么惊人、多么严重的罪行！

至于受到康生迫害的赵健民，却同康生相反，是一位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不惜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且胸怀天下，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的人。据上述《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512页记载，赵健民(1912—)，是山东冠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9年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营长，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军长兼政委。参加了陇海、淮海、渡江、解放西南等多次大战役。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正部级顾问组组长。他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健民所以从主持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全面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职位上辞退下来，改任顾问组长，是他自己出于全局考虑而主动要求这样做的。当时，党中央决定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号召老同志主动退居二线，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担任一线主要职务，并帮助年轻同志做好工作。赵健民是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这一根本问题出发作出辞退决定的。

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期间的1991年11月27日，赵健民在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就"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东欧、苏联都变了，出乎意料，我想不到"。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能够成功？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联系我们党的情况指出，"胡耀邦同志曾讲三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没实现；赵紫阳同志搞的廉政建设座谈纪要，没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做到不出大的失误，下力量解决党风好转、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认识到当前党和国家的腐败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问题是

我党和国家的心腹之患，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也免不了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道路，在反‘和平演变’上打败仗”。

赵健民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反腐败必须抓落实。他提出了落实反腐败的四点具体措施：第一，中央要认识到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要紧紧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支持有关部门碰硬；第二，要发动群众，以整风精神解决腐败问题；第三，要解决好党的领导体制中的某些问题，要进一步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而不是陷入具体事务中；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克服腐败现象。

赵健民的这个讲话，当时就得到了刘澜涛、王任重、汪道涵等老同志的称赞，认为讲得好。

199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赵健民应邀参加了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并作了发言。会后，《中共党史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全文刊登了这个发言。在发言中，赵健民强调指出，中共八大有三条经验教训特别值得借鉴，这就是，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第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加强党的建设。

在讲到最后一条时，赵健民说：“党的建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党的建设搞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搞好。应当看到，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极大地危害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八大反复强调党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那就要丧失民心，导致亡党。腐败不除掉，说代表人民是自欺欺人。反腐倡廉，是一项综合工程，要从多方面努力。但加强群众监督，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

在发言的结尾，赵健民说：“在纪念八大召开四十周年之际，我

坚信，我们的党一定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依靠工人、农民、广大人民，清除一切大小上下的贪污腐败分子，做到一切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综观赵健民自1981年退出第一线以来的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注的主要是三个问题：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腐败。而这三个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张铚秀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还告诉我们，赵健民在50年代担任山东省省长时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坦率直言的好党员，他曾表示不同意将向明、王少庸定为反党集团；在“大跃进”中他不相信聊城等地区能亩产万斤粮，因而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销省长的职务。赵健民不但不同意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强加给他的这些罪名，而且还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省党代表会上据理进行了反驳。在“文革”中，当康生依仗权势，无理地说他根据革命四十多年的“敏感”断定赵健民是个叛徒，对党有刻骨的仇恨时，赵健民同样地敢于蔑视和否认。尽管康生事先就同谢富治勾结好，当康生诬蔑赵时，谢富治即将赵拘捕审查，但赵在监狱中始终没有屈服，勇敢地进行抗争。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赵健民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坚持真理者必将胜利；践踏真理的恶人，如康生、谢富治之流，一定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廖盖隆

1998年7月20日

第　一　章

当“宣判”到来的时候

1968 年 8 月，云南又一次“改朝换代”——最高司令部“宣判”阎红彦、赵健民政治“死刑”——面对着黑白颠倒的“宣判”

湘西的夏日，六点多钟，天本已大明，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乌云，将大地紧紧笼罩起来，使世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沉、暗淡。

湘黔线上，由北京开往昆明的 61 次特别快车，像坠入云雾中失去了方向的一条墨绿色的蟒蛇，在山川间扭曲盘旋着。

车厢内，充满着燥热、郁闷、压抑的气氛，没有一点清晨的快感。刚刚醒来的人们，似乎还迷恋着那梦幻的世界，昏昏然。

六时三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列车，人们一下子精神起来，将全部精力都聚集在车厢的那只喇叭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了。从大乱走向大治的中国人民，将从这个节目中得到最新最重要的信息。这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

新华社昆明 14 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无

须知，这是中国当时最有权威的两家报纸的社论；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宣判”。

然而，杨瑞波毕竟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女性。她把涌入眼眶的泪水强逼了回去，迅速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内心深处却不断地呼喊着：“健民，你在哪儿啊！”

此时此刻，在首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监护所的第8号室，一位身高一米八的五十多岁的大汉，像一尊钢铁浇注的塑像，伫立在门旁，正倾听着远处高音喇叭传出的同一个消息。

他，就是赵健民。

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似乎显得很平静，可他内心感情的波涛，正汹涌澎湃。“文化大革命”运动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他的面前。

这一天，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第 二 章

“文革”初期的有限抵制

《五一六通知》与批判《滇云漫谭》、《四月提纲》——春城骤起“八二三风暴”、“九一四风云”——云南省委在炮轰中摇摇欲坠——“共产党员旗帜鲜明，我反对笼统炮轰！”

历史学家们把 1965 年 11 月 10 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称做为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时，赵健民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为云南省委第三把手。第一把手是阎红彦，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也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阎红彦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5 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陕西清涧起义，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二把手是周兴，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秦基伟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 年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周兴、秦基伟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笔者不了解赵健民当时看了姚文之后有何感想。也许，“《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赵健民还不曾听到，还没有

洞察姚文元的险恶用心。但是，当他读了 1966 年 5 月 11 日全国各报纸奉命不得错一字转载，否则唯总编辑是问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后，一定会明白斗争之锋芒所向。尤其是文中的这段话，必能深深地触动他：“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因为，1959 年他在山东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时，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帽子，撤了职，直至 1962 年才得以平反；在庐山会议后期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目睹了党内这场“阶级斗争”，对于彭德怀的刚直不阿，由衷敬佩，对于党内一些人不顾事实地向彭德怀泼污水，甚为反感，认为是“摧残党的战斗力”！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因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所以，云南省就没有人能知道会议情况。

5 月 24 日，云南省委接到了 5 月 16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中下面这段惊心动魄的话，在省委每位负责人心中引起震撼：“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发出的警告，促使他们的神经紧张起来：“……绝大多数党委对

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不过，他们尚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北京刮起了风，五百里滇池就掀起了浪。红色的五月，随着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围攻，一场揪“三家村”、“四家店”的政治大迫害迅速波及全国各地。《五一六通知》下达后，这场风波更是风急浪涌。在云南，省委揪出了“三家村”的“云南分店”。事情是这样的：1962 年春节，邓拓到云南，《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陪同他游览。不久，《云南日报》发表了邓拓在云南的几首诗作。1962 年 7 月至 10 月，《云南日报》开辟了《滇云漫谭》杂文专栏，登载立意新颖、文风活泼的杂文，受到读者欢迎。杂文的作者是《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和副总编辑周钟德、夏雨。这年 10 月，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撰写的《奉告读者》文中，称赞了《滇云漫谭》专栏。所以，《滇云漫谭》及其作者在云南被首先押上审判台，是必然的。5 月中旬，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紧步围剿“三家村”的后尘，积极准备批判《滇云漫谭》。5 月 26 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云南日报》问题，“一致”认为《滇云漫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应在报纸上公开批判。5 月 30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复同意认定李孟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省委立即决定，公开批判李孟北。6 月 6 日，《云南日报》用一个版面刊登工农兵来信，批判李孟北。这是那个年代一种常见的方式。6 月 7 日，《云南日报》发表了署名陈岩的文章《从反党分子手中夺回阵地——必须批判〈滇云漫谭〉》，公布了《〈滇云漫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材料。6 月 8 日，《云南日报》在“横扫思想文化阵地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栏标题下，以一个整版面批判《滇云漫谭》，将其扣上了与“三家村”遥相呼应、直接配合，向党进攻等置人于死地的罪名；指责李孟北等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在云南开设的分店。围剿

开展起来了，李孟北陷入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境地。6月22日，云南省委决定成立《云南日报》新的编委会，实质上是夺了报社的权。揪出了李孟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云南省委就可以稳住阵脚了吗？

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1966年上半年的大批判攻势，是按照既定的方向，步步深入的。姚文元批判吴晗，是为了再批判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为首的“三家村”，而批判“三家村”，则是为了打掉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下一步的目标将是谁，一般人则不得而知。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们才看清原来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的烈火刚刚点燃之时，云南省委只把李孟北押上“审判台”，这远远跟不上形势，必须深挖李孟北的“后台”。于是，阎红彦采取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常用的“舍车马，保将帅”的策略，抛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高治国。

师出要有名。揪出高治国，主要是从宣传部根据他的观点起草的《关于学术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也称《四月提纲》入手的。中央批《二月提纲》，云南省委批《四月提纲》，真可谓无独有偶。1966年2月，当云南省委收到中央下发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后，时任省委“文革”小组组长的高治国，在指导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坚持“坚决贯彻‘放’的方针”，“不要去找小吴晗”。无疑，这与《二月提纲》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是属于《五一六通知》所批判的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列的，所以，被打倒，实属必然。5月下旬，高治国被免除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职务，受到批判。7月2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高治国的“错误”性质。7月4日至6日，省委连续召开三天半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高治国。因为高的“态度恶劣”，会议决定7日休会，要求高“认

真考虑”。作为与会内的配合，省委在会外发动云南大学等高等学校和省委一些部门，贴出了揭发批判高治国的数以万计的大字报。在会内，高治国陷入了唇枪舌剑之中；在会外，高治国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6日夜间，高治国以吞吃大量安眠药相抗争。今天，可能有人会问，这种形式的抗争是一种最佳选择吗？这需要讨论。可笔者认为，事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人的胆识和勇气。高治国进行抗争后，省委采用“新账”和“老账”一起算的传统做法，给高拼凑了诸多“反动”事实：因为他任过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就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因为他担任过省委书记、常委、宣传部长、代理秘书长，就说是“政治野心大，手伸得长”；因为他分管文教工作，就说是“在教育系统招降纳叛，培植私人势力，捞取政治资本，到处扩大黑线，企图进一步篡夺党的领导”；因为他组织、宣传、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就说是“披着毛泽东思想外衣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他坚持了与《二月提纲》相同的观点，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观点，就说是“极力抗拒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读者，若有不理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的，读到这里，一定可以理解了。根据上述“罪恶”，高治国被定性为“一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省委决定撤销高的一切职务，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同时成立专案小组，彻底清查其罪行。省委给高定了十分严厉的罪名，并布置切断省委与高的联系，不准“追无底洞”。但这能阻挡得住涌向省委的“文革”浪潮吗？

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的两个多月中，“文化大革命”运动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毛泽东认为主要来自处于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为了排除阻力，造成“天下大乱”，毛泽东匆忙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在8月1日至12日的全会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是，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6月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大字报还联系到1962年、1964年党中央工作方针上的分歧，告诉人们，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从而揭开了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为有十六条之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确认了“左”倾指导思想。全会调整了党中央领导机构，为贯彻“左”倾错误方针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赵健民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

8月12日全会刚闭幕，13日至17日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对于“文化大革命”思想不通的问题。8月18日，经毛泽东提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出人意外地穿上绿军装，戴上“红卫兵”的红袖章，首次检阅了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林彪用他那尖厉的声音，作了以“打倒”为特色的讲话。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发展起来，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炮打中央党政部门和各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的浪潮迭起。云南省委，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8月23日，正当阎红彦主持省委工作会议，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昆明学生掀起了所谓“八二三风暴”。风暴的急先锋是昆明农林学院。8月22日夜里，被北京如火如荼的造反形势搅得坐立不安的昆明农林学院部分学生，兵分三路杀出了学校。他们抬着毛泽东语录牌、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质问省委的大字报，四处串联，发誓要“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阎王殿(指以

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砸个稀巴烂”！平静的春城之夜，动荡起来了！

杀向省委的一路，要求阎红彦接见，周兴接见了他们。红卫兵们质问省委：“阎红彦从北京开会回来，为什么不讲北京造反派的革命经验？”“8月18日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为什么没有云南的代表参加？”“阎红彦为什么封锁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直纠缠至23日夜间两点。

这天夜里是阴雨天。另外两路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到民族学院、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进行串联，发动造反，得到了众多学生的响应和支持，直至23日凌晨五点才返校。

8月23日这一天，先后有九批大专院校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共五千多人进入省委大院“炮轰”、“火烧”，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正在主持省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阎红彦，接见了学生，耐心地回答了问题。他说：“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以8月23日为起点，“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造反之火点燃起来了，并且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对于“炮轰省委”这一举省注目的问题，省委的态度是怎样的呢？8月25日，在大中学校“文革”负责人会议上，阎红彦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跟党中央、毛主席，是跟得紧的。”在不久后的另一次会议上，赵健民说：“对炮轰应有阶级分析。说炮轰是给省委提意见，我赞成；说炮轰是打倒，我反对。”赵健民不怕引火烧身，鲜明地表示赞成正确的批评，赞成有秩序；反对打倒，反对动乱。

8月里，从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来到昆明，同以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为首的炮轰派红卫兵联合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冲击力量。这时，与炮轰派观点相反的学生（主要是中学生，还有部分机关干部）提出了“保卫省委”的口号。8月25日，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显然，保卫派是受到省委暗中支持的。9月12日，在昆明第八中学红卫兵的倡议下，成立了“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省、市和昆明地区领导到会祝贺。这个组织的观点是属于保卫派的。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公开对立起来了。

9月14日上午，在南下串联红卫兵的支持下，由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学生发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他们成立伊始，就把批判《云南日报》作为第一次革命行动。当日下午，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串联了昆明、北京、长沙、南京的四十一所大专院校一千一百多人，来到《云南日报》社批判已发表的三篇社论。红卫兵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红卫兵高诵着最高指示，齐声高呼“批判《云南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火烧省市委”，“《云南日报》立即停刊”。红卫兵指责《云南日报》：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只字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违背《十六条》的精神。

下面是报社人员同红卫兵的一段对话。

报社人员问：“你们来干什么？”

红卫兵答：“我们是来批判《云南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是来消毒的。你们放毒，压制群众运动。”

报社人员说：“要提意见，要批判，你们派代表来。”

红卫兵答：“我国七亿人个个都是批判家，我们来这里的一千多人都是批判家，派谁来当代表？”

报社人员说：“如果影响了明天出报，全省两千万人民不答应。”

红卫兵答：“《云南日报》放毒，七亿人民不答应。”

“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进军”《云南日报》社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然而，“九一四风云”却标志着这一派组织的崛起。此时，先前刮起“八二三风暴”的一派群众组织指责“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不够革命，还称“云南头号走资派阎红彦为同志”，又不提“打倒”。他们宣扬“八二三是首创”，“九一四是继续”，决不允许“九一四鱼目混珠”。两支造反队伍出现了矛盾。

“八二三风暴”、“九一四风云”之后，10月里，从北京发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波，进一步加剧了云南省局势的动荡。《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指示的观点这样鲜明，使一切人都不能不表明态度。10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接见云南大学师生时说，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无异于告诉师生，可以踢开云南省委的领导。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康生点名指责阎红彦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消息迅速传到昆明，阎红彦的处境更为困难。

11月3日，昆明的红卫兵造反派响应中央的号召，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在市中心的检阅台，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并责令阎红彦到会作检查。这次大会，为举省所关注，阎红彦的态度，更为各级领导人所注目。会上，阎红彦作了对

“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检讨。就在这次大会上，赵健民顶撞了造反派，留下了“不良”印象。11月5日，省委在昆明翠湖宾馆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红卫兵造反派大闹翠湖宾馆，强烈要求阎红彦亲自接见，与会全体人员到场。很明显，造反派要向全省的主要当权派显示权威。接见时，造反派振臂高呼“炮轰云南省委”等口号，而在场的赵健民拒不举手，亦不张嘴。这一抗议举动，立即受到造反派的严厉质问，赵健民凛然回答：“共产党员旗帜鲜明，我反对笼统炮轰！”这样公开地抵制，对赵健民个人来说是危险的，可他没有想到自己。

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高潮之际，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热情接待了进京告状的昆明部分红卫兵，并安排住进中南海这一“神圣”的地方。这再一次向云南全省显示，中央不信任云南省委，炮轰云南省委、批判云南省委是正确的。

昆明，造反之火愈燃愈烈，局势一乱再乱。12月14日，又发生了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派强行封闭《云南日报》事件。这一天，造反派召开“纪念‘九一四’三周月大会”，批判云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为“九一四革命行动”平反。造反派还要求《云南日报》报道大会实况，但遭到拒绝，于是，会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云南日报》社，当场强行封闭了地方版编辑部、采访部，责令每天只出《新闻电讯》，传达中央指示，报道国内外消息。省委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在报社造反派的协助下，致使《云南日报》1966年12月15日至1967年1月13日停刊。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节节推进，工人不断“杀”出工厂，登上政治舞台；干部陆续“冲”出机关，走上社会。更有甚者，省委、省人委机关也“后院起火”。面对着动乱日甚的局势，省委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阎红彦对各级领导人叹道：“这时候，只有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在混乱之中，“首都专揪叛徒联合战斗兵团”的南下红卫兵，与云南省级机关的一些干部联合在一起，秘密搞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以及阎红彦、赵健民的所谓“叛徒”材料。他们要把阎红彦、赵健民推上“审判台”。

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第三章

第一位被揪斗游街的云南省委负责人

大乱的冬季——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被揪斗游街——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被逼身亡——周恩来的关注——中央来电

1966年底的大乱，是毛泽东所期望的。12月，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表达了这个思想。

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①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162～164页。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

元旦社论，极大地鼓舞了昆明的造反派。1月2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造反组织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对云南省委的"造反攻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造反派决定1月4日傍晚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等省委领导到会接受批判。去，还是不去？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进行研究。阎红彦发言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赵健民表示："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多数人同意赵的意见，不能去。会议还考虑，有一部分工人、学生反对以这种大会的方式批斗省委，如果省委领导去参加，很可能发生武斗。为避免发生问题，省委派人与"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头头黄兆其联系，劝告他们不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如果坚持要开，省委领导将不参加。这时候，劝说是不会发生效果的，大会按时召开了。

火药味十足的批判大会一直开到夜间十点，可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一个也没有到会。造反派们似乎感到受了侮辱，下决心要揪出阎红彦。当时有人说，阎红彦可能躲在昆明军区内，于是黄兆

DANIEL LIBRARY, THE CITADEL

其就趁机煽动说:“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在昆明军区内。”本来就已经激愤了的造反者,一发而不可收拾。造反队伍高呼着“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向昆明军区开去。

为了保卫军区大院,赤手空拳的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组成了层层人墙。按照惯例,冲击军事机关是违犯法律的。可狂热的造反派冲破了战士们的防守人墙,进入了军区大院。阎红彦听到造反派冲击军区大院的消息后,立即表示出去向造反派讲明道理,说服他们撤离,但省委领导人都不同意。这时,阎红彦由于长时间受批斗,头发昏,血压高,心脏颤抖,身体状况不佳。为避免造反派纠缠,在大家的劝告下,他住到了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第二天,秦基伟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红彦和省委其他领导人都不在军区内,要他们撤走。可造反派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竟发动财贸职工把小吃部搬进了军区大院营业,准备安营扎寨。第三天,周兴又出面做造反派的工作。他说,只要撤离军区大院,阎红彦就可以出来接见。造反派是不见阎红彦不撤离,双方未达成协议。这天上午,赵健民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部分常委会议。会议进行中,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赵健民表示:“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其他省委书记、常委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留下来抵挡着。造反派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迎了下去。他告诉造反派:“我是赵健民。阎红彦同志不在这里。”造反派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造反派逼问赵健民:“阎红彦到哪里去了?”

赵健民答:“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但不能告诉你们。”

造反派说:“你既然知道就带我们去抓他。”

赵健民答:“这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商量、谈判,定几条,

之后,约个时间、地点,阎红彦和你们见面。”

造反派问:“哪几条?”

赵健民答:“第一条,你们的人撤出昆明军区大院;第二条,阎红彦同志来后不进行人身污辱,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几条,我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造反派们吼叫:“不行!”

在造反派眼中,赵健民似乎成了“人质”。他们强迫赵站在宣传车顶上,在众人面前质问赵健民。

造反派用广播喇叭宣布:“赵健民被我们抓来了!”接着,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抓”赵健民的经过。似乎打了一个大胜仗。

赵健民听到“抓”字后十分反感,立即反驳说:“你们说是抓我,我不同意,我不是反革命。你们用‘抓’这个词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也不是被你们抓来的。你们真是抓了我,是要作检查的。”赵在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维护法律的尊严。可此时的造反派已是“无法无天”了。赵健民的话只能刺痛造反派。

造反派不断地高呼着“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这有点韵味的口号,赵健民既不跟随着呼喊,又不举手。造反派立即责问:“你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赵平静地回答:“我不同意打倒阎红彦。反革命才要打倒,可阎红彦不是反革命。”赵企图用逻辑的力量制服造反派。接着又说:“炮轰阎红彦,炮轰省委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的,我表示欢迎。”又给了造反派一个回旋的余地。

造反派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断然拒绝,赵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到军区来。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阎红彦来,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要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这是在昆明,在云南,第一次喊出

“打倒赵健民”的口号。也许在那种混乱的状态中，赵健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这是造反派对他批判的升级。因为在那时，“打倒某某”，还不是可轻易喊的。

赵健民的“顽固”态度激怒了造反派。黄兆其用高音喇叭煽动：“赵健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我们，怎么办？”“戴高帽游街！”部分造反派起哄呼喊着。于是，八个彪形大汉登上了汽车，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卡到赵健民头上。赵怒发冲冠，厉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此时此刻，在造反派眼里，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什么共产党员，什么省委书记，什么中央候补委员，统统不在话下。这种认识，是来自《五一六通知》中传达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赵健民气愤地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你们。”这是对造反派的蔑视，这是对造反派的挑战！当然，也招来了造反派对他加倍的惩罚。

载着戴着高帽子的赵健民的汽车，开出了军区大院，驶向昆明街头。不甘屈辱的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先后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押解赵的造反派一看他不“老实”，就用手死死卡住他的脖子，不让乱动。赵健民气喘吁吁地喊道：“反革命！”“你敢骂红卫兵？”造反派一边虚张声势地说，一边稍稍松了卡在他脖子上的手。

从下午二点十五分驶出的游街汽车，到五点三十分才回到军区大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的赵健民，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身体。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把赵健民抢出，送到了昆明军区第四十三医院。经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骨折。造反派得到了消息，要求亲自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

赵健民被游街、骨折的消息，传到回避在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

地小麦峪的阎红彦耳中时，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共产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他立即以省委的名义向造反派头头黄兆其等提出书面抗议，并于当夜把抗议书送到仍麇集在昆明军区大院中的造反派手中。同时，将这一严重情况，上报中央，下通地、州、市委。

有恃无恐的造反派，并没有把抗议书放在眼里。第二天，即1月7日早晨，又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他们要对阎红彦穷追不舍。直到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力雄亲自出面，以三十八年党龄、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内，造反派才离去。

1月7日这一天，昆明街头出现了大字报和口头等形式的大辩论，辩论的中心内容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游街”。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七万多人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表示反对冲击军事机关。“人民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这天傍晚，昆明军区接到叶剑英打来的电话：阎红彦同志在什么地方？他身边有些什么人？安全不安全？你们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要说服造反派，不要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北京上层有了反响。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反响。

1月8日午夜一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打到小麦峪。另一方面的反响来了。电话耳机里响起浓重难懂的福建话，恰巧汪东兴正在陈伯达处，就由汪东兴充当了临时翻译。“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陈伯达的话越说越尖刻，“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在“四面楚歌”的危急情况下，阎红彦听了陈伯达的这些话，顿

时怒火胸中烧。他激动地顶上了陈伯达：“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说完之后，又把阎红彦的愤怒之词告诉了江青。江青在电话中，只讲态度，不讲道理，以势压阎红彦。

此时，阎红彦再也无法入眠。他愤怒之极。不一会儿，他找出了一片卫生纸，提笔写下了一行字：“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阎红彦留。”腾波，即王腾波，阎红彦的夫人。显然，这是一封留给亲属的遗书。写完遗书后，他吃下了一瓶眠尔通，一瓶降压灵，就安静地躺到了床上。

1月8日早六点。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造反派乘数辆汽车来到了小麦峪抓阎红彦。阎的秘书急急忙忙跑去报告阎：“快起快起！”但没有应声。开灯一看，人已经咽气，用手一摸，身体冰凉。

阎红彦走了。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给政治局常委看的《要事简报》上，可被陈伯达以算不上是“要事”为由，把这一消息删掉。

在陈伯达看来，死掉一位省委书记算不得“要事”，可在云南，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省委书记处就阎红彦之死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闻讯后悲愤地说：“他们（指造反派）只能将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我宁可个人牺牲，也要和他们斗到底！”又哀伤地说：“红彦同志，你怎么这样想不开，走这一条路。”有的单位，自发地为阎红彦开了追悼会。造反派——“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指挥部”也紧急行动起来。1月9日，他们在检阅台召开了十万人的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的情况，并要求派代表赴京，向中央汇报。阎红彦死后，云南全省“群龙无首”，混乱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1月9日深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询问了情况，并同意由“大联合指挥部”、昆明和云南省两级军区、省委三方派代表进京汇报。

阎红彦的冤案，直到大动乱的年代结束后才得以平反。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6月10日，阎红彦的哥哥阎玉珊从老家陕西省子长县来到昆明。在昆明期间，他三次去省军管会了解弟弟的死因，要求把骨灰接回家乡去，但均被以“叛党自杀”为由加以拒绝。6月24日，阎红彦家的保姆邓子英给阎玉珊买了回西安的火车票并送他上了火车。可从此阎玉珊便下落不明。十余年后阎红彦得到了平反，但阎玉珊在哪里？！

在北京，周恩来三次详细听取了“大联合指挥部”代表的汇报，又单独听取了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等领导干部的汇报。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造反派发去了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

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我们热切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厉，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这份电报，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电报不仅仅是发给"大联合指挥部"，而是发给全昆明地区的人民。第二，电报中说，中共中央规定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是时隔仅数日的1月21日，毛泽东就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电报上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队"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第三，电报中没有提到阎红彦之死，也没有说阎的自杀是叛党。当然，电报的核心是呼吁造反派离开昆明军区大院。

1月13日深夜，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撤了出来。自此，云南混乱的形势进一步发展起来。

第　四　章

人民大会堂，面见康生进忠言

云南省委在夺权中瘫痪了——应召进京——面见康生进忠言——与"二月逆流"一脉相承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夺权的阶段。

夺权，始于上海的"一月风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告接管了《文汇报》。第二天，即1月5日，《解放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也如法炮制，夺了报社的权。这一天，"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新生"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上海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从而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1月8日，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指出，"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

民书》,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同一天,“上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紧急通告》,强烈反对当时盛行的挥霍国家财产、乱加工资、滥发补贴、强占公房等“经济主义”的表现。反对“经济主义”的歪风是对的,但《紧急通告》却倒打一耙,诬称上海市“经济主义”之风始于江青,而《紧急通告》却倒打一耙,诬称上海市委在被打倒之际大搞经济主义,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月10日,毛泽东对《紧急通告》批示“很好”,要中央发贺电。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造反派发去贺电。贺电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署名是毛泽东加上的。由此开始,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是经毛泽东审定的。这是首次号召全国全面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惊中外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称: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这篇社论,向全国全世界表明: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夺权斗争席卷全国;

造反派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而这两个概念又没有确切的含义,其实际上只能是各级领导都被认为是走资派和顽固分子,统统被夺权;

夺权是一场阶级斗争,方式是激烈的,斗争将是你死我活的。

外界剧烈变化的形势,使躺在病床上的赵健民寝食不安。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坚决要求出院。尽管秦基伟亲自派参谋长前来劝说,赵健民还是拄着双拐,戴着牵引,携着钢丝床,回到了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此时,一座办公楼,空荡荡的,四处贴满了造反的大字报。赵健民望着面前的这一切,一股难以言状的感情涌上心头。

阎红彦死后,被造反派称之为“云南的大党阀”、“阎老二”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首要目标。1月16日,造反派成立了“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7日晚,召开了十万人的“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时隔五天,又召开了“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没有提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因这一“原则”分歧,昆明地区的造反派正式分裂了。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成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后来人们称之为“炮派”;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等

组成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后来人们称之为“八二三派”。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示范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夺权的浪潮迅速推进到边陲省份云南。所谓“大联合夺权”，指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所以，从一开始各派群众组织就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都自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理应夺权；都排斥对方，并欲摧垮之，以至演出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活剧。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两派大范围、大规模动用武力抢权，陷入了“内战”的境地。1月26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夺了省人委及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人马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同日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两大派组织重复夺省委的权，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伴随着愈来愈浓的夜色，两派之间“谁是真革命派”的大辩论也愈辩愈烈。

夺权！夺权！！夺权！！！在夺权声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了，云南全省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了。各级“走资派”在夺权中被斗争，被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体罚。戴高帽游街还算得上是较文明的，更严厉的是披麻衣、戴白袖套、染黑脸，沿街示众。解放十八年之后的云南大地，“旧”的政权在不情愿中塌台了，而“新”的政权在纷争中难产。社会，处在动乱之中。

然而，社会的管理不允许出现长时间的真空，现代社会尤其如此。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选代表赴京。抵京后，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接见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搞“三结合”，要他们一边工

作，一边做自我批评；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来帮助、推动实行大联合、“三结合”；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你们要搞归口联合。赵健民等来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面对着造反派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夺权导致社会动乱而忧心如焚的赵健民，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目的，在京期间主动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

2月28日晚饭后，康生、关锋到了京西宾馆。赵健民因外出，未能见面。当赵健民回到京西宾馆得知后，立即给康生处去了电话。康生处的一位姓张的秘书将赵健民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南侧的西会议室。张秘书告诉赵健民，康生正在接见西安来京的造反派，请赵等候。赵健民一个人在会议室中静静地等候着。安静的环境使他得以集中精力思考着要汇报的问题。当汇报方案逐渐形成后，赵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1967年2月份即将成为历史。会议室内暖气有点过热，赵健民感到头有些发昏，不知不觉地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笔者不知道昏睡中的赵健民是否做过梦，是好梦还是恶梦。然而，这来临的3月的第一天，迎接他的将是厄运。

3月1日午夜一时许，精神抖擞的康生来到了会议室。醒来的赵健民赶忙汇报问题。开始谈话的节奏较慢。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夜餐，康生边吃边听，赵健民也一块吃起夜餐，边吃边汇报。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端坐在旁边，认真地做记录。赵健民在扼要地介绍了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如阎红彦之死、两派对立夺权等之后，集中地谈了三点意见。

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康生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是的。”

赵健民话锋一转："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指示。"

赵健民停顿了片刻又慢慢地说："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现在还在向造反派讲，可是没有人听。像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中的问题呀，还是理论不联系实际？"

康生注意听着赵健民后面这句话。

赵健民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想不通。"

赵健民恳切地说："对于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示，中央现在应该三令五申。"

在赵健民看来，他的这一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的，是正确的。几天之前，当他看到2月3日毛泽东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内容时，异常兴奋。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但赵健民没有仔细品味毛泽东同时讲的另一段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

在柔和的灯光下，赵健民继续反映着第二点意见。"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召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

团参加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据我个人了解，山东、云南两省党代会开得就很少。这样，领导干部很难得到党员、群众的监督，所以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书记就下不了台。""今后省、县和基层应多开党代会，使领导干部经常受到监督。平日多发扬小民主，就不会积那么多意见，这样大民主一来，领导干部就不会下不了台。"

赵健民看康生没有什么异常反响，接着谈了第三点意见。

"前几天，我在昆明看到一份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其中，中央接待站的同志说'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康老，这代表中央的意见吗？"

"代表。"康生应着。

"现在可不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个观点，中央只有三令五申，才能较好地贯彻。"

赵健民谈完了意见，感到浑身上下如释重负。这时，他不自主地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夜间两点多了。

康生吃完夜餐后，似无睡意，他精神抖擞地问赵健民："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并不理解的赵健民按照《十六条》空空洞洞地讲了自己的认识。

康生眨着眼睛说："你那是一般性的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康生呷了一口茶，按照他的逻辑阐述了起来："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跑到刚刚解放了的天津，鼓吹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有这样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还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1936年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从监狱中出来做我们的干部。现在查明，他们出狱时都发表了反共宣

言，他们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不是过去那样一般的运动，过去的运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刘少奇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六十一人的问题。”

很明显，康生这后面的一段话同毛泽东 2 月 3 日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接着，康生像是反驳又像是开导似地说：“开不开党代会，这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对于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康生只是“要支持大联合”等一般性地讲了几句。

此时，赵健民注意到康生已没有多少话要讲了，时间也快五点钟，就起身告辞说：“请康老休息吧。康老，要注意保重身体。”

康生不阴不阳地答应着：“好，好。”

接见结束了。当赵健民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阵刺骨的寒风吹来，不禁浑身一颤。

赵健民哪里知道，就在他同康生谈话之时，中共高层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较量的一方，后来被另一方诬称为“二月逆流”。而赵健民谈话的观点，同搞“二月逆流”的人的观点是那么相似。这就为他不久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这是一次“不该”有的会见。

1966 年底、1967 年初的动乱和夺权，激起了中共高层部分人的强烈不满和异议。这些人起而抗争，他们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会议上，一是 1967 年 1 月 19 日和 20 日的军委碰头会，二是 2 月 11 日和 16 日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上：(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不应该都被打倒；(三)要不要

稳定军队。

1967 年 1 月，中央军委碰头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陈伯达、江青在会上要求军队立即开展“四大”，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叶群在会上点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肖华的家被抄后，陈伯达、江青、叶群继续纠缠肖华问题。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陈伯达、江青的意见，认为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应开展“四大”，并对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表示强烈愤慨。叶剑英盛怒之下，拍了桌子，造成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后来，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

2 月间，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对“文革”发表了措词强烈的批评：

> 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等人同陈伯达、江青等的斗争，在 2 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达到了高峰。

2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会间，叶剑英质问陈伯达：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

"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这时，康生不阴不阳地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叶剑英再次质问陈伯达：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次会议，就在争论中结束了。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又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原订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讨论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和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当谭震林与张春桥在怀仁堂门口相遇时，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陈丕显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由于夺权而受到强烈冲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张春桥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走进会议室后，谭震林接着在门口时说的话大发雷霆：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

说到激愤处，谭震林拿起文件，穿上衣服，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余秋里拍着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李先念说：从《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那么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你一句，我一句，对"文革"的批评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周恩来宣布散会。

这两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核对了会议发言，王力记下了要点，然后向江青一条一条地做了汇报。江青立即报告毛泽东，要毛泽东当晚接见张、姚、王。晚十时左右，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了张、姚、王，张春桥按照核对的要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6日碰头会的第二天，余怒未消的谭震林又致信林彪，说："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林彪在谭震林的信上附上一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除康生之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没有出席。会上，毛泽东盛

怒，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九十五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又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最后，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起而退场。

会议上，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2月28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批判进行抗争的老同志。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在会上围攻批斗老同志。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已经证明，“二月逆流”，非逆流也，而是在历史长河的方向发生逆转时的正流。

赵健民与所谓搞“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并没有联系，但他同这

些老同志的观点一脉相承。赵健民哪里想到，当他向康生坦陈自己意见的时候，康生等“文革”大员们正在全力围攻所谓搞“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更没有想到，康生已经注意了他谈话的观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他步步逼来！

第　五　章

搏斗于险风恶浪之中

大联合：联而不合；三结合：勉强凑合；大批判：火上浇油——云南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陷入派性——“四二六”事件开武斗先例——北教场大规模武斗再起——风雨满春城——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宣传大联合——康生京中施毒计——申明一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反对武斗——陷害，正暗中迫近——“八派”亮出了“打倒赵健民”的旗帜——进见谢富治、王力——武斗升级，“八派”、“炮派”决一死战——北京的关注——陷害，又上一个新台阶——忧心如焚，痛切建议——武斗，在高压下暂时沉寂

毛泽东为了顺利夺权，祭起了两大法宝，一曰“大联合”，二曰“三结合”。为了防止保守派夺权、假夺权、权力重新回到“走资派”手中，毛泽东在“大联合”前面加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七个字，在“三结合”的前面加上了“革命”两个字。

当时，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一“最高指示”的

指导下，在林彪“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一“次高指示”的诱引下，全国各地各派组织，都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左派”；都斥责对方是“保守派”，是“右派”，而且双方这种争斗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大联合”谈何容易。即使是迫于压力在表面上联合起来的，也是联而不合，内争不止。对立的双方，由于认识分歧、主张差异、利益得失，相互之间对立情绪日益严重，甚至结下了血海深仇。

“三结合”，即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的结合。可是，谁是革命干部的代表？谁又不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应该结合谁？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在这一问题上，群众组织之间观点对立，军队代表也有自己的看法。哪一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哪一派又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哪一派的代表进入权力机构？也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干部对各派群众组织有自己的看法，军队代表也有自己的倾向性。军队代表之间，对于哪派是左派，哪个干部是革命的，也存有分歧，甚至严重的分歧。在这种背景下，“三结合”实在不易。有的结合起来，也是“三凑合”。

“大联合”、“三结合”不能顺利地实现，毛泽东只好依靠军队，对一些省、市、自治区实行军事管制；对一些省、市、自治区，指定以军队干部为主的由若干人员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来实施对社会的临时管理。

1967年二三月间，全面夺权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决定以“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就是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公开提出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这篇长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自此，以批判“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内容的“革命大批

判”席卷神州。然而，这种“大批判”，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打棍子、扣帽子，是政治围攻，是极“左”思潮的泛滥。它不但不能促进“大联合”和“三结合”，反而使群众组织把他们之间的派别斗争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加剧派别争斗。

3月间，由北京归来的云南两大派组织的代表，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实行“大联合”，成立了“归口大联合服务站”。但这个联合是违心的，是暂时的。这一月，中央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局势，决定对云南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任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子明、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任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为委员。这时，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已死；司令员秦基伟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被接到北京以治病为名保护起来，但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

三四月间，省军管会的负责人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在打倒刘少奇，认清“文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清“文革”的“主流和支流”等重大问题上统一军队高级干部的思想。3月9日，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5月和1967年2月同外宾谈话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中心思想是：“文革”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3月9、10两日，陈伯达、康生在会上讲话。他们从历史到现实，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污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并传达了毛泽东批判《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意见。康生首次批判了所谓“唯生产力论”。3月20日，林彪在会议上发表了极“左”的讲话，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著名论点，号召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它十一级

十二级的台风”。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结束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派”的态度日渐明朗化。支持“八派”，就是压制“炮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陷进了“支派”的泥潭中去。受到军管会支持的“八派”，本已膨胀的派性越发膨胀起来。他们从一派的利益出发，排挤、压制“炮派”，攻击持不同观点者。

4月18日下午，“八派”的昆明市公安局“八八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刘殷农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昆明市公安局八八战斗队向混入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荣昌宣战》，另一张是《揪出丁荣昌的后台》。丁荣昌，是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这时正在昆明市公安局“支左”。在这两张大字报的刺激下，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炮派”则起来反对将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张贴街头，并把这一意见反映给省军管会。两派的矛盾激化了。

随着“八派”、“炮派”矛盾的激化，1967年4月26日，两大派发生了第一次武斗。后来人们称为“四二六”武斗事件。

4月26日，“炮派”在市内检阅台召开了名为“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大会举行前，邀请昆明地区各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安排“八派”的代表上主席台、发言。“八派”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他们认为，“炮派”的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是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冲击会场。中午时分，“八派”负责人黄兆其、杨树先前去省军管会汇报情况。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听完汇报后表示：“‘炮派’在检阅台开会是错误的，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一位省军管会联络员当场怂恿说：“‘炮派’的‘四二六’大会是制造分裂、收买保守组织的大会，不能让大会开成。”作为军管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本应制止“八派”冲击会场，可非但不予制止，反而支持。晚八点十五分，“八派”以宣传车、载人大卡车为先导，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直向会场冲去。大会被迫中断，数万人在广场上和狭窄的东风路上展开了

武斗。混战中，“炮派”负责人被绑架，许多人被打伤。“炮派”退出了会场，点燃起火炬举行了抗议“八派”冲击会场的大游行。“八派”沿途对游行队伍进行堵截。

“四二六”武斗事件，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自此之后，云南全省武斗不断，连连升级，使社会陷入了动乱、恐怖之中。

5月28日、29日，昆明又发生了北教场大规模武斗事件。

5月26日，昆明机床厂“炮派”观点的群众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成立组织“五一兵团”，邀请同派观点的军医学校“联指”宣传队前来演出。军医学校的“八派”组织“红总”闻讯后，尾随“联指”到了机床厂，并同机床厂的同派观点的“‘一一·八’战斗兵团”联合起来，筹划冲击演出会场。当演出《火炬赞歌》时，“‘一一·八’战斗兵团”放开高音喇叭干扰，呼喊：“联匪滚出去！”“保皇兵滚他妈的蛋！”“红总”的人员也配合起哄：“鬼火舞！鬼火舞！”火炬，是“炮派”的标志。《火炬赞歌》，是歌颂本派的。“八派”的标志是葵花。“‘一一·八’战斗兵团”和“红总”边哄闹边拥上舞台殴打演员，会场大乱，演出被迫停止。当“联指”的演出队退出会场上车回校时，“红总”已在厂门口用三辆大卡车横拦公路，设下路障。“红总”人员围着“联指”演出队进行谩骂、挑衅，有的还放了演出队乘坐的汽车的车胎气。“联指”演出队进退无路，整整被围困了一夜。

第二天，即27日，上午两派陆续调人员聚集在昆明机床厂，准备武斗。省军管会闻讯后，派人到现场做工作。“八派”的人员撤离，“联指”演出队返回学校。

机床厂事件，激起“联指”群众的愤怒。他们于28日下午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大会邀请昆明步兵学校的同派观点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校外的地方“八派”组织配合校内“红总”冲进会场，殴打发言人。大会被迫转移到直供部礼堂

继续进行。“八派”人员不罢休，跟到直供部礼堂继续挑衅。“联指”用长凳顶住礼堂大门，他们就扔石头、砖头，砸玻璃窗，双方攻守激烈。地方的“八派”集合了约三万多人，在黄兆其的指挥下，将礼堂团团困住，包围了一个通宵。

29日清晨，“八派”向“联指”发起攻击，一些人登上礼堂顶揭开瓦片，往里面撒石灰，投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撞门。礼堂大门终于被撞开了，“八派”人员蜂拥而入。“联指”寡不敌众，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抓到“八派”大本营昆明工学院关押起来，有的家也被抄了。武斗发生后，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三百多人赶到现场，隔离了前来增援的“炮派”人员。“炮派”增援队伍抓了前去军医学校的“八派”负责人刘殷农等人，形势更为紧张。这时，军管会负责人到现场进行调解，要求双方撤离现场，放回被抓人员。经做工作，双方武斗人员散离，武斗平息。因军医学校设在昆明北教场，所以这次武斗又称为北教场武斗。

武斗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结。这次武斗，“炮派”组织被冲，多人被打伤抓走，吃了亏，满肚子的怒气未消。于是，在29日下午集队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炮派”群众的静坐，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结束。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十分关注昆明发生的大规模武斗，29日晚给昆明军区党委发去电报，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昆明地区的两大派武斗，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要求保持部队的稳定。

北教场武斗后，“八派”的涂晓雷在黄兆其授意下，毫无根据地编写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文章，在昆明及外地广泛张贴、散发。7月，黄

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又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文章，用完全捏造的材料诬陷张力雄、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5月29日晚举行军事政变，夺取省军管会的权。黄兆其、涂晓雷的文章，使本已动荡不已的昆明，更是满城风雨。显而易见，黄、涂的舆论宣传，离间了两级军区的关系，打击了云南省军区持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压制了“炮派”群众。

赵健民从北京返回后不久，省军管会就正式成立，他出任省军管会工交办公室副主任。工交办改为工交组后，又任副组长。

赵健民面对着动乱的局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极力促进两派实行“大联合”。他认为，“大联合”可以结束动乱的局势。他到处宣传这样的观点：不论是“八派”，还是“炮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联合起来，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吃掉另一方。他苦口婆心地做两派负责人的工作。4月的一天，赵健民同“八派”负责人施志汝交换意见时，努力说服施志汝，对“炮派”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实行“大联合”。施说：“我们同‘炮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赵说：“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你们‘八派’有几万人，‘炮派’也有几万人，这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学生和工人，怎么能说两派是敌我矛盾呢?!”施思索了片刻又说：“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赵说：“你们两大派都是几万人，当然难免混入少数的坏人。从这种情况说两种矛盾混在一起，我同意。但必须进一步说明，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只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才可能较好地解决少数坏人的问题。”施志汝由衷地点了点头。

4月上、中旬，赵健民眼看着“八派”、“炮派”联合不起来，而且矛盾不断激化，真是忧心如焚。他多次给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的秘书和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去电话，要求面谈，但均无回音。

一次，他与省军管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某某联系，要求面谈，但此人只是虚与委蛇。一心为了工作的赵健民哪里知道，这两人均已得到了康生的指示。

康生自3月1日同赵健民谈话之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赵健民“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赵健民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那里挂上了号。当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时，康生亲自找到他专门谈赵健民问题。康生说：2月底，赵健民在北京开会时提出要找我谈话，我安排了时间。赵健民在谈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整老干部。康生特意指出：刘少奇出国访问路过昆明时，同赵健民谈过准备召开党的九大问题。对赵健民这个人，要有所警惕。康生在打倒刘少奇的浪潮正汹涌澎湃之时，指控赵健民与刘少奇有阴谋联系，不可谓不狠毒！

康生还嫌不够，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指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张某某说：赵健民2月底找过我一次。他在谈话中讲了一些极为错误的言论。我对赵健民的讲话很气愤，已当面批评了他。你回去要把赵健民的这些错误转告云南的负责同志。康生还弦外有音地说：赵健民的这些思想不知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很值得注意。

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回到昆明后，将康生关于赵健民问题的谈话精神进行了扩散。4月下旬的一天，他对原省监委副书记周某说：“康老同赵健民谈话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当周某回答不知道时，他将赵健民找康生谈话和康生对赵健民的批评详细地讲了一遍。显然，这样扩散，是要陷赵健民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4月23日，省军管会通知赵健民前去座谈。同去的还有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三个人的发言总计不过三十分钟。这只是走过场而已。

赵健民眼看着两派矛盾不断激化，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十分焦

急。

当北教场大规模武斗发生后，赵健民深感问题严重，觉得自己身为高级干部、共产党员，需要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立即连续写出了三张大字报，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号召两大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立即停止武斗”，“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在赵健民对云南不断加剧的动乱忧心如焚之际，从暗中袭来的迫害正迅速逼近他。

6月初，原省监委副书记周某来到赵健民家里，对赵说：“听说康老批评了你，你的态度很不好。”赵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态度不能说极好，也是很好。”周说：“你还是虚心一点吧！”赵严肃地回答：“一个党员给上级提了意见，就要批评，那还有什么民主。”周反唇相讥：“你的意见是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违背的。”赵强硬地回敬了一句：“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周某从赵健民家中出来后，立即将与赵谈话的情况透露给省委机关的造反派。

这时，康生对赵健民的批评、指责以及赵健民的强硬态度，在云南逐渐由上层扩散到下层。陷赵健民于灾难中的毒网正在步步收紧。

6月的一天，云南省军管会某些负责人根据康生的旨意，搞出了一份机密材料《赵健民近况》，在军管会常委中传阅。通篇材料采用了歪曲、捏造的手法。材料中说，赵健民“说‘八派’不好”，“讲云南的走资派就是李成芳和秦基伟两人”。事实是，5月间，省军管会的几名工作人员(原省委组织部留下的待分配的大学生)到赵健民处闲聊，谈到“八派”和“炮派”中的两个小组织闹矛盾，一个组织抓了另一个组织的人，另一个组织就抄这个组织的办公室时，赵健民说：“‘炮派’不对，不应该抓人；‘八派’也不对，不应该抄家，激化矛盾。”其中的一个人将赵健民的谈话整理成材料送给军管会。军管会某些人在编写的《赵健民近况》第一期中，采用掐头去尾的方法称：“赵健民说‘八派’不好。”在《赵健民近况》第二期中捏造

说：“赵健民讲云南的走资派就是李成芳和秦基伟两人。”实际上，赵健民同秦基伟关系一直很好，平日稍有闲暇，即在一起对弈；赵健民与李成芳也没有矛盾，只是对“文革”的看法有分歧。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军管会中有的人暗中将属于机密性质的《赵健民近况》捅给了“八派”负责人黄兆其等。

炮制《赵健民近况》，并把它捅给“八派”群众组织，其用心是不良的。

当时，“八派”在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正踌躇满志，要压倒对立面。他们将“撼山易，撼八二三难”的大标语贴遍昆明城。当他们看到“赵健民说八二三派不好”时，会产生多么强烈的仇恨心啊！当他们知道赵健民说支持自己一派的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是走资派时，怎么能够容忍啊！

《赵健民近况》将赵健民置于“八派”的对立面。这样，反赵健民的力量，是上有康生，下有“八派”，中间有省军管会某些负责人。赵健民是插翅也难逃了。

6月6日，黄兆其操纵的“照妖镜战斗队”，广泛散发传单，诬陷赵健民是“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

6月18日、19日，“八派”在检阅台召开大会，万人振臂高呼“打倒赵健民！”

同月，安矩祥等按照康生和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的授意，派人外出调查所谓“赵健民的历史问题”。在外调人员会议上，安矩祥说：“赵健民历史上被捕过。你们外调的任务是调查赵健民被捕叛变的问题。”

1967年的中国，正盛行一股“揪叛徒”之风。本来，在敌人严密统治下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是一种常见的事。而被捕与叛变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有叛变行为的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也搞清楚了。隐藏下来的叛徒，是极少数。可在“文革”

中，将被捕与叛变二者之间划了等号，将“叛徒”变为整老干部的一个法宝。

“文革”开始不久的1966年8月，康生将1936年中共中央批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一事重新提了出来，进行鼓噪、陷害。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份文件中还引用了毛泽东1967年1月31日在谭震林关于农口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上的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① 康生，在“六十一人案件”上，表现十分卑劣、无耻。他要人对张闻天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遭到张闻天的坚决拒绝。张闻天也因此被囚禁五百二十三天。康生又以“中央委员”的官位为诱饵，要安子文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安子文宁可坐牢也不写假证明。

云南的“八派”要从赵健民的历史上打开缺口，以“叛徒”罪名从根本上打倒赵健民。

进入6月以后，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由口诛笔伐、拳脚相加逐步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进行你死我活的枪战了。此时，是名符其实的大乱。

云南的大乱，已经超出了毛泽东所设想的大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6月底，毛泽东委派谢富治、王力等人前去昆明解决问

---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26页。

题。谢富治、王力等在昆明分别听取了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八派”、“炮派”两大派群众组织以及部分领导干部的意见。

7月1日，谢富治约赵健民前去谈话。谈话主要是在谢、赵之间进行，王力偶尔也插上几句。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担任记录。赵健民扼要地介绍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了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支持“八派”、压制“炮派”，造成两大派矛盾激化的事实；提出了自己对实行“大联合”、坚决制止武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听后，表示已经知道了这些情况，要求赵健民进一步做两级军区和两大派组织的工作。赵健民答应尽最大努力做工作。

谢富治在昆明期间，先后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上、接见昆明市革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多次讲话。他说：“所谓云南的问题，主要就是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内部的关系，两大派的关系问题。”“问题出在以亲疏‘支左’。”“错误在于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大多数。”“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负领导责任。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作自我批评。”

谢富治没能扭转云南的局面，他也无法扭转云南的局面。就在他前脚离开昆明，后脚就发生了离奇而严重的武斗事件。7月13日，在省军管会负责人主持下，“八派”和“炮派”的双方主要负责人举行了谈判，谈判地点设在军管会办公楼会议室。这时，“八派”的一个下属组织同“炮派”的一个下属组织发生了武斗，“八派”下属组织在混战中吃了亏。于是，“八派”组织的一部分人就直冲进了军管会办公楼会议室，对“炮派”负责人大打出手。“炮派”主要负责人被打成特重伤，其他的负责人，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被打成轻伤。

7月17日，谢富治、王力在武昌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云南及贵州、四川省和武汉问题。8月10日，中央召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任命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力雄为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康主持军管会工作。摆在陈康面前的这个乱摊子，实在够他应付。

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七二〇"事件前后，毛泽东看到一些部队支持所谓"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①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说："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提倡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江青从支持"左派"的立场出发肯定了"文攻武卫"。可是，全国各地争斗的每一派都自封为"左派"，甚至"响当当的左派"，这样，江青的讲话能不使本已激烈的武斗进一步加剧吗？毛泽东的指示，江青的讲话，使全国各地的武斗更上一层楼。7、8、9三个月，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失控的三个月。

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指示，很快传到了云南的上层。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迅速传遍了云南各派群众组织。云南两大派的"抢"枪和武斗，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在昆明，两大派以地域为界，划分为"八管区"和"炮管区"。各自占领制高点，制定战略计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66页。

划，研究战术，决心决一死战。整个昆明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各派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都有计划、有组织地主动出击，"拔'钉子'"，夺据点，武斗此起彼伏。哪里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哪里的武斗就正酣。武斗时，"八派"播放着本派战歌"葵花向太阳，战士向着党"，"炮派"放送着本派战歌"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各派坚守自己阵地时，就播放毛泽东诗词歌曲《井冈山》；进攻对方据点时，就发出"最后通牒"；自己的人员被对方捉走、打伤时，就发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请看两大派主要的"抢"枪、武斗事件：

"八派""抢"枪：

8月23日，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

8月26日，在内应下，"抢"了省体委国防俱乐部的枪。

8月底9月初，又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

"炮派""抢"枪：

8月24日，到云南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8月27日，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8月28日、29日，在三五六厂下属组织的配合下，"抢"三五六厂枪三百一十三支、子弹十三万五千发。

29日这一天，周恩来就"抢"三五六厂武器一事批复陈康：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意昆明军区派部队保护和进行劝说。如劝说无效，即抓其头头。

两派的重要武斗：

8月1日，昆明海口二九八厂两派组织武斗，死三人，伤十数人。

8月24日，"八派"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发生昆明市两

大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九人，伤数十人。

8月27日，三五六厂两派组织武斗，死二十人，伤二百三十人。

8月31日，"炮派"攻占省博物馆，双方死八人，伤十人。

9月3日、7日，昆明电机厂两派组织各自在两大派的组织、支持下武斗，死六十八人，伤数十人。

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密切关注着云南的"抢"枪和武斗。8月26日，发电给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并告"八二三"和"炮兵团"两派群众组织：

> 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炮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夺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
>
> (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
>
> (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
> (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
>
> (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协商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如石沉大海。

7、8、9三个月，"八派"在加紧"抢"枪和武斗时，也加紧了对赵健民的迫害。

8月21日，黄兆其指挥的"专揪叛徒战斗队"大量散发了《叛徒赵健民的自白》、《赵健民和黎玉两个大叛徒是怎样互相勾结

的》、《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这一月，由省军管会出具介绍信，安矩祥二次派人去山东查阅敌伪档案，收集所谓赵健民"叛徒问题"的材料。9月，安矩祥等人分四批，先后去北京向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递送赵健民"问题"的材料。"八派"打倒赵健民的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要被打倒的赵健民，很少顾及自己的险恶处境。他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抢"枪、武斗；看到全社会停工、停产、停课，群众的粮、油、菜、煤、肉供应艰难；听到春城的老百姓苦苦哀求"八爷爷、炮奶奶，你们不要再打了"的呼声，心中十分不安。他要尽自己所能，制止武斗。他多次同"炮派"负责人交谈，千方百计地劝阻、制止"炮派"进行武斗。此时，他只能对"炮派"这一派做工作。

8月28日，赵健民亲自到昆明军区，向主持军管会工作的陈康提出了制止武斗的建议。他说：现在，深受武斗之害的是昆明广大人民群众。两派组织的绝大多数群众和革命干部都是反对武斗的。真正要搞武斗的是少数坏人。所以，制止武斗是可能的。省军管会应当找两大派负责人谈判制止武斗问题，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贯彻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提出两大派都不要搞武斗。当下属组织发生武斗时，两大派都不要派人前去增援，由军管会前去制止。赵健民还根据昆明的地形，向陈康提出：昆明市有几个重要的路口，如街西的车家壁，马街东医学院西的三岔路口，西站，东站，市北黑龙潭地区的供销合作学校处的路口等。请军管会在这些重要路口各驻上一个连。当有较多车辆和行人通过时就进行检查，若发现枪支弹药等武斗用具立即加以没收。赵健民说：这样，就可以在广大群众、干部的拥护下，制止较大规模的武斗，减少局部的武斗，再配合其他工作，使两大派逐渐走上大联合的道路。陈康听后，觉得这些建议可行，但表示，军区内、军管会内有些人不听自己的话，还需要做工作。

9月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严禁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严禁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严禁军队中任何单位不经中央批准而把上述物品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毛泽东要解决抢枪问题了。

赵健民看到《九五命令》后，乘机积极做“炮派”几个负责人李毅、方向东、沈参雄的工作，反复阐述中央命令的意义，希望他们不要做历史罪人，支持他们参与两大派交武器的谈判。

9月10日，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八派”和“炮派”达成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9月22日，两派又达成了《关于停火交枪的补充协议》和《关于严禁打、砸、抢、抄、抓和立即释放被抓人员的协议》。

然而，《协议》是在高压之下被迫签定的。太深的积怨，靠一纸《协议》能解决问题吗？

第　六　章

京西宾馆，义正辞严驳康生

春城，再次爆发大规模“抢”枪、武斗——北京，又一个战场——千里之外制止武斗——“八派”掀起“打赵（健民）保周（兴）”高潮——一场面对面的诬陷与反诬陷斗争——“对赵健民监护审查！”一辆吉普车消失在夜色中

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九一〇协议》签定后，云南两大派之间出现了暂短的沉寂。不久，再次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抢”枪和武斗事件。

“八派”“抢”枪：

12月初，第三次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校的班用机枪、连用机枪和五六式冲锋枪数百支。

12月下旬，第四次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校的部分枪支、弹药。

12月24日，第五次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校的子弹。

“八派”前后五次向步校“抢”枪，据“借条”记载共有：

五六式冲锋枪二百零三支；

五六式半自动枪四百八十七支；

五六式班用机枪一百二十七支；

五三式马枪九十四支；

苏式三〇步马枪一百四十五支；

五八式连用机枪五支；

五四式手枪一百三十三支；

杂式手枪一支；

信号枪十五支。

10月25日，第二次在内应下于省体委国防俱乐部“抢”枪。

“八派”前后两次在省体委国防俱乐部“抢”走各类枪一千多支、子弹一百多万发。

12月底，开远的下属组织“一三〇”将“抢”第十三军的部分武器运送到昆明，计有九二步兵炮二门、炮弹二百发，高射机枪一挺，子弹数万发。

“炮派”“抢”枪：

12月4日，第二次到云南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12月21日，第三次到云南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12月5日，第二次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12月14日，在海口三五六厂下属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枪二千零二支，子弹一百八十四万发。

12月19日，在海口三五六厂下属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汽车拖挂二联高射机枪二挺，五六式机枪七十一挺，五八式重机枪七挺，子弹二万五千余发。

两派武斗：

11月22日，昆明市粮食局第一直属库两派发生武斗，当场死一人，一人重伤后死亡。

12月10日，“八派”攻打昆明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死一人，损

失四十二万四千余元。

12月13日，“八派”攻击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厂的“炮派”，死十七人，伤四人。

12月18日，“八派”人员击毙出国援越抗美部队战士周继强。

12月19日，“炮派”攻打东风大楼。

12月22日，“八派”攻打预制管厂，死十四人。

12月22日，“八派”进攻驻元宝山的“炮派”，死十五人。

12月23日，“炮派”进攻云南省建筑安装公司的“八派”。

12月27日，“八派”在小麦峪设伏，击毙过路群众十人，伤一人。

12月27日至29日，“八派”攻打云南砖瓦厂，死二十一人，伤多人。

12月27日至29日，“炮派”组织大兵团作战，攻打云南汽车修配厂群众组织“一一·三〇”。这是昆明地区两大派组织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武斗，双方动用了新式武器，枪战激烈。共死亡六十六人，伤数百人。

在昆明地区之外，全省各地都发生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

1967年9月时，作为云南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的陈康，已无力控制局面，也无力统一军管会内部的意见，很难行使领导权。下旬，他给北京周恩来办公室去电话，要求去京汇报。在没有得到周恩来批准的情况下，他就到了北京。陈康走后的一天，其夫人见到赵健民说：“陈康已去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您是否也去北京汇报一下。”赵健民觉得很有必要让中央详细了解云南的情况，于是就匆忙收拾了点洗漱品、几件随身的衣服，赶到了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

这时，云南在北京的，既有军队负责人，又有两大派的代表人

物，还有原来的地方领导干部。云南的“文化大革命”，分成了两
战场，一个是云南本省，真枪实弹；一个是北京，唇枪舌剑。两个
场，紧密联系，南北呼应。

从昆明不断传来的大规模武斗的消息，使赵健民坐卧不安
他提起笔来，分别给陈伯达、康生写了一封信。信送出后，不知为
什么，一点回音也没有。他又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地劝阻“炮派”
武斗。10月下旬的一天，赵健民给住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的工役
制部队工人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工役第八团的负责人贾玉玺通电
话，劝说他们不要参加武斗。赵健民要他们“注意与云南当地的工
人、农民联合。支边工人如果不与本地工人、农民联合，那会处处
有困难的”。赵健民告诉他们，“不要抢枪”，“不要参加武斗”。“如
果碰到人家进攻，要尽量避免真打。可以喊口号‘工人不打工人’
‘学生不打工人’。如果还不行，就退避三舍，从大门外退到大门
内，从街上退到院子里，从院子里退到房屋中。总之，要尽量避免
武斗”。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赵健民同原省人委的“炮派”观点
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司以恭通电话。当他得知司以恭没有参加武斗
而受到压力时，鼓励说：“有压力，要顶住。”12 月底，“八派”攻打
“炮派”组织东郊砖瓦厂，“炮派”即调集大队人马攻打云南汽车修
配厂“八派”组织“一一·三〇”。当消息传到了京西宾馆时，赵健民
感到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立即向陈康建议说：“这还行吗?! 把周
总理的指示印上几万份，用直升飞机撒给广大群众。广大群众知
道了，就会按周总理的指示办。看那些搞武斗的人还搞武斗不!”
在这前不久，“炮派”包围了东川铜矿，周恩来得知后，严厉地指出
“东川铜矿设备遭到破坏，‘炮派’要负完全责任。”当陈康的秘书说
“不能用直升飞机。徐州的部队用直升飞机撒传单受了批评”时，
赵健民说：“那就想别的办法吧。总之，要把总理的指示迅速传达
给广大群众。”

为了制止武斗，赵健民是尽了力的。然而，他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赵健民离开昆明后，“八派”对他的迫害急剧升级。

10月 19 日，安矩祥等给康生写信并送去材料。信中说：“送上关于请求彻底追查赵健民历史上被捕自首叛变问题的报告及附件各一份，请予批示。”省军管会某些负责人在同意安矩祥等人继续调查赵健民历史问题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的报告中说：“据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告，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曾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山东被捕。据初步调查，有自首叛变嫌疑。为了确实弄清赵的问题，要求到山东等地查阅敌伪档案，同时要求查阅赵在山东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及其他文书档案。经我们研究，认为赵健民的这段历史问题急需查清落实，同意查阅。妥否，请批示。”这份报告，明明白白表示，在诬陷赵健民为叛徒的问题上，云南省军管会的某些负责人完全同“八派”站在了一起。

安矩祥等人在送给康生的材料中，还有这样一份《关于原云南省委书记处成员的情况简报》。《简报》将每一位书记都污蔑了一遍。在当时看来，真是一个黑司令部。在今天看来，“左”得令人吃惊。《简报》认定：“阎红彦是叛徒，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孙雨亭是阎红彦、于一川的死党，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刘明辉是一个政治堕落、生活腐朽糜烂的蜕化变质分子；高治国是阎红彦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接班人，高治国按照彭真的反革命‘二月提纲’抛出了反革命‘四月提纲’，破坏文化大革命。”《简报》给赵健民的定性，是“变质分子，并有严重叛徒嫌疑”。

安矩祥等人在北京受到了康生联络员的接见。这位联络员派头十足地对安矩祥说，“你们送来的信收到了，首长们也看过了”。当安矩祥等汇报说：“我们的方针是打赵（健民）保周（兴）”，这位联

络员立即表示：“我们与你们的看法差不多。”

“圣旨”已领，安矩祥兴高采烈、风尘仆仆地赶回昆明，向“八派”负责人黄兆其等汇报。“八派”立即决定，成立“打倒赵健民作战联合指挥部”。“打赵作战”出现了高潮。

中国有一句俗话“破鼓乱人捶”。就在这时，省委原办公厅主任等人起草了一份打倒赵健民的声明，在领导干部中发动签名。签名者可谓踊跃，原省长也签了名。不久，“八派”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打赵大会，这位原省委办公厅主任代表原省长等一批干部，“庄严”地宣读了《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会前会后，铅印的《联合声明》，在昆明，在云南，广为散发。

11月18日，安矩祥等人再次给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关于赵健民问题的报告》的材料。材料对赵健民的诬陷又升了级：“赵健民历史上是个叛变分子，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关头，均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

在北京，又传出了康生联络员的“指示”：“据材料，赵健民确是一个叛徒”，“赵健民的这次表现，是全国少有的”。

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不立即打倒怎么得了！

这一天正一步步逼近。

陈康、张力雄离开云南到北京后，省军管会中的某些人一面大张旗鼓地支持“八派”、压制“炮派”；一面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不实的材料，将矛头指向赵健民、陈康、张力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及第十三军、十四军领导人会议。会议中，根据片面的、虚假的材料，对陈康、张力雄进行了批评。陈康虽然进行了辩解，也没有能改变中央文革小组的偏见。

周恩来也出席了会议，他指出：说“十三军、十四军是薄一波的

余毒”是错误的。同时要求军队：消除派性，不介入地方群众组织，不与地方群众组织串联，干部家属不参加地方群众组织①。

1968年1月21日夜间，当钟表的时针接近十二点时，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重要会议在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开始了。这时，虽然室外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但室内十分闷热。在场的人，个个神情紧张、不安、呆滞。云南参加会议的是昆明、云南省两级军区及第十三、十四军在京负责干部。赵健民也接到通知出席了会议。主席台上坐着康生、谢富治等中央大员们。

会议一开始，盛气凌人的康生叫身旁的谢富治发言。

谢富治的开场白，杀气腾腾。

“云南最近几个月的形势很不好，武斗升级，中央很不满意。根据军管会报来的情况，‘炮派’最猖狂。”

康生紧接着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1、2日从昆明出发，4日到达禄丰，还带有一千四百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总军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横冲直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

谢富治插上话：“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打了一平浪，把煤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在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一百多人。还要继续向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第二，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说服他

①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213页。

一个小小的云南省委书记，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膨胀到叫你三更死你不敢五更活的康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康生压住心中的怒火，摆出一副政治家的风度说：“赵健民，让你来反映情况的？我听说赵健民来了很吃惊。”“你不要骗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抗日战争以地下党工作期间，你是什么时候与北方局接上关系的？”

“1935年12月与直南特委联系上的，直南特委与北方局有系。1936年4月下旬，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到山东，正式恢复了北方局的关系。”

康生紧接着问：“你什么时候被韩复榘逮捕的？什么时候的？”康生问前一句是虚，问这一句才是实。

“1936年9月，被一个充当捕共队队员的莱芜的叛徒方逮捕的。1937年10月，从监狱中出来的。”

这时，康生挥手朝桌上一拍，说：

“我说，你是叛徒。”

“康老，你说话要慎重。我不仅不是叛徒，而且是以个人生保卫党的机体没有受损失。”赵健民斩钉截铁地否认。

“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叛徒。”怒不可遏的康生号叫道。

“你说几遍，我也不是叛徒。因为事实不是。当时山东有五多名党、团员都是我领导的，我被捕后，党的机构没有受到任何坏，北方局派来的黎玉同志还在外面照常工作。”赵健民义正辞地反驳。

康生武断地说：

“你是被叛徒出卖的，又顺利地从监狱中出来了嘛！”他想以一点证明赵健民是叛徒。

“那是根据当时的条件。”赵健民明白康生的用意。

“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

“是不是叛徒，要凭事实。康老，您怎么能凭个人敏感就定我为叛徒呢？”

康生见没有镇住赵健民，顺势改变策略说：

“你说你不是叛徒，那就再写个条子。”

赵健民又在纸上写道：“我在1936年9月被敌人逮捕，以生命保护了山东党组织的机体没有受损失。我以党籍作保证。我的被捕，是经过审查的，是绝没有问题的。请中央再次审查。”写好后，将纸条递给康生。

康生看了看纸条说：

“你以党籍作保证？”

这时，昆明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接过话头说：“现在中央说你是叛徒，还拿什么党籍作保证。”显然，这话是讥讽。

可是，赵健民却认真而严肃地说：“那我就再加上一句：我愿接受国法的制裁。”边说着边在纸条上加上了这句话。

康生接过纸条，用冷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后说：

“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搞乱，把边疆搞乱。你就是这个心。”

“去年我接见你时，你半天一个字、半天一个字地说话，你是费了心思的。你提的意见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

“我向你反映意见，怎么成了反中央反毛主席？”赵健民对康生的话感到吃惊，又说：“当时你左边有位军人作记录嘛！你把记录调出来看看，我的意见是不是反中央反毛主席的。”

“是有记录，必要时可以公布。”康生煞有介事地说，“哪有像你这样给中央提意见的？！你提议召开党的九大，目的就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这些乌龟王八蛋再选进中央来，让他们重新掌权。”康生继续说，“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再看看你的行动，就是适应他们的计划。”

"康老，你的话越说越使我感到离奇了。我克服各种干扰为工作，怎么能是适应特务计划呢！请您举出事实来！"淫威之下，赵健民，不甘屈服，据理申辩。

康生被气得脸色铁青，胡子一翘一翘地说：

"我接触这么多走资派、特务、叛徒，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你还要求审查吗？"

"我要求。"铁骨铮铮的赵健民，虽然看穿了康生要逮捕自己的阴谋，还是毅然地答道。

这时，康生向谢富治一使眼色，谢富治立即宣布：

"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执行！"

从屏风后面立刻走出两个荷枪实弹的军人，赵健民跟着他们走出了会议室。诡计多端、阴险狠毒的康生，早就设下"伏兵"，准备逮捕赵健民。

赵健民来到院子，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时，已经是1968年1月22日凌晨，北京的气温在零下十几度。他要求回住室取件御寒的衣服，遭到押解人的拒绝。

寒气中，赵健民被押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瞬间，吉普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第 七 章

夫人杨瑞波风雪出京城

度秒如年——朦胧中的回忆——深夜中，被逐出京西宾馆——风雪中，彻里彻外地凉了——杨得志夫妇一片真情——杨庄煎熬

夜，虽然已经很深了，但京西宾馆第七层楼的一间客房的窗户，依然透出暗淡的灯光。

室内，赵健民的夫人杨瑞波显得忐忑不安，一会儿在沙发上倚一倚，一会儿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一会儿在床前瞅瞅正熟睡的小女儿。她似乎预感到，一场大的灾难就要来临。

她不时地抬起手腕，看着手表。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移动着的秒针，使她感到时间过得太慢了。

她再一次倚在沙发上。强烈的睡意不断地袭来，不一会儿，进入了半睡似醒的状态，一桩桩往事历历出现在眼前。

三十九年前的1929年1月24日，鲁西南单县杨庄村的一座破旧的茅草屋中，传出了一连串婴儿的啼哭声。杨瑞波来到了这个滴水成冰的世界。她的童年，是在贫穷、饥饿、寒冷中度过的。单县，是共产党创建的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她从懂事起，就同革命、抗日、共产党结上了缘，盼望着有一天能加入这个为老百

姓办好事的党。1945年8月，在人们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锣鼓声中，十六岁的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凭借着优势的兵力和装备，采用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他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山海关以内的共产党军队，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

战争一开始，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以主要的铁路干线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并歼灭解放军主力，或将黄河以南解放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然后聚歼解放军于华北地区。

南跨黄河和陇海铁路汴徐段的冀鲁豫解放区，是联接山东、华中、中原解放区的枢纽，是蒋介石向北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是解放军向南防御的主要战场之一。杨瑞波家乡所在的湖西地区，位于冀鲁豫边区南部，紧靠陇海铁路，成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同国民党军队鏖战的重要战场。战争开始不久，冀鲁豫区党委为了湖西地区妇女、儿童的安全，将妇女、儿童等转移到黄河以北的鲁西北地区。杨瑞波也随队来到了阳谷县这个武松打虎的地方。她的工作单位是湖西地区妇女训练队，整天在阳谷农村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土改、参军、支前等群众工作。

1947年5月，杨瑞波同赵健民结为终身伴侣。这时的赵健民，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自内战爆发后，他一直战斗在自卫的前线上。1946年9月，区党委对分工他同区党委书记张玺、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在黄河以南领导反蒋自卫战争。国、共双方在黄河以南地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

婚礼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新郎穿的依然是一套旧军装，新娘穿的仍然是平时穿的一套衣服，一双新鞋还是朋友送的；新房设在一个农户的房子里，床上铺的全是平常用的薄被褥。整个婚

礼活动，就是一顿饭，区党委、军区负责人与新郎、新娘共同吃的一顿便餐。新婚夫妇在一起总共不到一星期，新郎就回到了硝烟弥漫的黄河南，新娘也回到了妇训队。

不久的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鲁西南战役。赵健民率领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刘、邓大军转战鲁西南。激烈、残酷、紧急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二十八天，蒋军损兵折将达五六万人。8月15日，刘、邓挥戈南下，千里挺进大别山。此后，蒋军卷土重来，黄河南的局势再度恶化。就在这时，赵健民受命担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沉重的担子，繁忙的工作，使他没有时间照看新婚的妻子。有时候到黄河北开会，也只能匆匆见上一面。1948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进行了大规模整党运动，赵健民从黄河南来到了黄河北参加整党，这时才有机会经常与妻子见面。第一批整党结束后，3月初，赵健民又返回了前线。11月6日，赵健民率领冀鲁豫军区部队十二个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大战。夫妻再一次见面，已是1949年1月中旬了。在刚刚解放的菏泽城，赵健民见到的已不只是妻子一人，还有一个已出生三个多月的小宝宝。三十七岁的赵健民，抱着第一次见面的儿子，欣喜、激动之余也有不少感慨。夫妻二人商量给儿子取名赵小松。

迅速发展的战争进程，要求军队将领不能有半点儿女情长。2月，夫妻、父子团聚仅数日的赵健民，又返回部队，参加全军统一整编。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赵健民任第十七军政治委员，军长是王秉璋。赵健民的上级——第五兵团司令员是杨勇，政委是苏振华。初编成的第二野战军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有第十至第十八等九个军。谢富治任第三兵团政治委员，李成芳任第十四军军长，秦基伟任第十五军军长。部队整编后，赵健民立即投入了整训工作。4月21日晚，赵

健民同王秉璋率领第十七军参加了渡江作战。部队英勇顽强，有敌无我、有进无退，顺利突破了蒋军江防阵地，挺进江南。尔后，势如破竹，直捣浙赣线。8月，赵健民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他率领第十七军西出贵州，克贵阳，占遵义，再入云南，在解放大西南的道路上奋勇前进。1949年11月，赵健民兼任贵阳市军管会副主任。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赵健民出任交通部部长。这时，赵健民才有时间顾及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儿。3月，他派警卫员将杨瑞波和儿子接到了山城重庆。

从1947年5月结婚，到1950年3月，杨瑞波同丈夫一起生活总共不到40个昼夜。真是相亲不相见，天南海北各一方。

杨瑞波来到重庆不久，分配到西南财经委员会机要处工作。这时夫妻二人依然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她住在单位分给的一间地下室里，赵健民住在交通部，只有星期天，他们才能相逢。后来家住到飞来寺，这里有两栋小楼，赵健民夫妇与刘星夫妇共住一个楼，万里与刘代峰共住另一个楼。虽然安了家，杨瑞波还是很少同丈夫在一起。在财委工作了一年多后，就申请进入西南速成中学读书，补习文化。她志愿当一名工程师，建设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上学要住校。当时纪律很严，杨瑞波只能在星期六下午乘轮船回家，星期日下午再返回学校。临近期终考试时，一连几个星期才回家一趟。

1952年底，赵健民调到北京，出任国家铁道部副部长。这时，杨瑞波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老二、老三还是男孩，分别取名赵小桐、赵小楠。杨瑞波想把仅仅半岁的小楠留在身边照顾。为了让妻子安心读书，赵健民还是将三个孩子和两个保姆带到北京。这样，杨瑞波只能在寒、暑假去北京与丈夫、儿子团聚。1954年8月，杨瑞波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全家又可在每个星期天欢聚了。但时隔仅半年，赵健民调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杨瑞波只

身一人在石油学院学习到1955年8月，才转学到山东工学院。虽然一家人又生活在一起了，但杨瑞波依旧是住校。由于专业不对口，学习格外紧张、艰苦。1959年，杨瑞波终于学成毕业，然而这时赵健民却被错误地戴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帽子，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党委第二书记、副厂长。结婚已十二载的夫妻，虽然第一次长期共同生活，但杨瑞波却要与丈夫共同承担起巨大的政治压力。

1962年10月，赵健民获得平反，奉调到云南工作。不久，举家从黄海之滨迁到了云贵高原，杨瑞波被安排在昆明冶金机械厂。“文革”开始不久，杨瑞波就被扣上了“保皇狗”的帽子。当1967年1月6日赵健民被揪斗游街后，杨瑞波在工厂里的处境就急剧恶化了。一天下午，工厂里的造反派把她从家里拉到厂内，硬硬地架上大卡车，让她站在车厢中垫的半米多厚的木板上。卡车开出了工厂，驶向市中心。造反派要对杨瑞波进行人格和肉体的摧残——游街。车子开到市中心，围观的群众数以万计。造反派为了凌辱杨瑞波，也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选了两个女将强迫杨瑞波戴高帽子。愤怒的杨瑞波左推右挡，奋力反抗，接连撕破了好几顶。这还得了！两个彪形大汉立即冲了上来，一左一右抓住杨瑞波，就往头上扣高帽子。杨瑞波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使尽全身的气力用脚蹬。在大庭广众之下，造反派始终没能把高帽子戴上。大卡车徐徐地开着，人们望着车上昂头挺胸、前额上渗着鲜血的杨瑞波，有的狂呼，有的默然，有的流出了同情的泪水，有的则攥紧了拳头。夜间一点多钟，大卡车才转回厂里。这一场六个多小时的“阶级”斗争，谁是胜利者？是造反派，还是杨瑞波？

1967年6月，“八派”树起打倒赵健民的旗帜之后，杨瑞波的处境就更为凄惨。8月，她已经不能在工厂里呆了，只好离开了厂子。1968年1月上旬，身在北京的赵健民把有家不能归、有单位

不能去的杨瑞波和小女儿接到了北京。当深夜十一点多钟杨瑞波和小女儿来到京西宾馆传达室时，恰巧碰上“八派”一部分人在屋里吵着要揪赵健民。杨瑞波还没有来得及回避就被认了出来。造反派喜出望外，抓不到赵健民，就抓他老婆，立即一拥而上。抱着孩子的杨瑞波拼力反抗。恼羞成怒的造反派竟丧尽了天良，从杨瑞波怀中抢走了小赵杨。可怜的孩子大声哭喊着：“妈妈，我要妈妈！”两只小胳膊扑向杨瑞波。狠心的造反派朝扑打着的小赵杨的脚上使劲地捏了几下，孩子的哭喊声更为凄厉。心撕肺裂的杨瑞波一边反抗着一边高喊：“不要怕，妈妈在这里！”正在这时，京西宾馆内冲出十几个解放军战士，将杨瑞波和小赵杨接了进去。就这样，杨瑞波母女住进了京西宾馆。

杨瑞波母女仅住了两日，赵健民就与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王秉璋及夫人史导联系，让杨瑞波母女到他们家暂住几日，然后回山东单县娘家。

1月21日，赵健民买了张第二天早上五点去山东的火车票，又把杨瑞波母女接到了京西宾馆，准备送母女二人去山东。这天晚上，赵健民临去开会前还提醒妻子说：“早早休息，别耽误了明天早上的火车。”杨瑞波望着匆忙离开房间的丈夫，轻声答道：“马上就睡。”

……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杨瑞波惊醒。她赶忙走到门旁，刚一开门，四五位军人就闯了进来。一位年纪较大的军人命令杨瑞波：

“立即离开京西宾馆！”

“等健民回来就走。”已意识到出了事的杨瑞波回答说。

“他回不来了！”

“健民拿着火车票，把火车票给我，天一亮就走。”杨瑞波争辩

说：“深更半夜让我们母女到哪里去。”

年纪较大的军人不容分说地厉声道：

“不行！马上走。”

“到哪里去？”杨瑞波动了气。

“原来住哪里就去哪里。”

“我不认识路。”

“那你怎么去的？”

“这里的汽车送我去的。”

一个军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原来送杨瑞波去王秉璋家的汽车就开了来。

这时，年纪较大的军人指着室内的一个提包问：

“这是谁的？”

“是我的，也是他的。我们两口子不分你我。”盛怒的杨瑞波冲口而出。

“不准拿提包！”年纪较大的军人显示了自己的威严。

这下子可害苦了杨瑞波，她只好用大衣裹上孩子，进了汽车。到了王秉璋家，已是夜间三四点钟了。

钱放在提包里，粮票放在提包里，随身用品也放在提包里，怎么办？杨瑞波无奈，只好请求王秉璋的夫人用军用电话机联系要回，但拨了多次电话也无济于事。杨瑞波向王秉璋的夫人借了100元钱，买了张去济南的火车票，怀着无法形容的心情，离开了北京。

夜间十一点多钟，火车驶进济南站。一出火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浑沌的世界：呼号的东北风，夹着雪片，在天地间滚动着，滚动着。杨瑞波紧紧地抱着孩子，在半尺多厚的雪中，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她想到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家暂住一天。走了片刻，孩子冻得哇哇直哭，杨瑞波也浑身发抖。在这个世界里，她似

乎从里到外都凉透了。

恰在这时，碰到了路边的一个军队招待所。杨瑞波走了进去，她求值班人员同杨司令家中联系。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军用汽车。

杨瑞波坐在车上，反复琢磨，怎样向杨司令员讲呢？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他，还是瞒着他？最后决定瞒着他，稍住即走。因为杨瑞波知道，杨得志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能连累他。

下了车，杨得志和夫人沈昌军十分热情地把杨瑞波母女迎进了屋子。沈昌军抱过孩子，轻轻地哄着，炊事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杨瑞波母女在杨得志家中住了两天，就提出要回单县老家。杨得志和夫人一再挽留，当看到实在留不住时，诚恳地拿出了钱和粮票。杨瑞波在杨得志和夫人的一片真情面前，感动得热泪在眼眶中直打转。她决心快走，不能牵连好人杨司令。

谁知，杨瑞波前脚刚走，后脚北京的电话就打到了杨得志处。

1968年1月27日，杨瑞波回到了娘家单县杨庄。在这个偏僻的村子里，她就像躺在火热的锅上，一顿一顿吃不下饭，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本已憔悴的脸面，又一天一天消瘦下去。她，不时仰天长问：健民，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　八　章

惊心动魄的“滇西挺进纵队”假案

下关市“一五”流血事件——工八团的荣耀与悲哀——西进救围——撤出下关——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武装“围剿”——捏造·夸大·陷害——康生、江青的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

1968年1月，动乱中的云南，某些人正在编织着一桩令人震惊的政治陷害案。编织者的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陷害赵健民及陈康、张力雄等人，打击“炮派”。

新的一年之初，大理地区的“八派”与“炮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连续发生武斗事件，且都有伤亡。

1月5日，下关市“八派”的“四二〇”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持“炮派”观点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致使七人死亡，其中一人被残忍地用炸药捆在腰部炸死。事件发生后，引起工八团部分住在昆明西山云南省委党校等待退役回山东的人员的关切。经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与工役制部队五个团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李国贞带领七十七人前往下关，把留在那里的工八团六百余人全部接回昆明，退役回山东。他们下定决心，决不能让一个人丢在云南。

工八团是当时云南工役制工程部队的五个团之一。工役制工

程部队成立于1964年。

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马多克斯”号侵入北部湾，越南进行了自卫反击。8月5日，美国借口两艘军舰前一天再次在北部湾遭到越南鱼雷艇的攻击，突然出动大批飞机，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电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总参谋长文进勇，建议“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表示了对越南人民的坚决声援。8月7日至11日的五天中，中国各地二千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痛斥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罪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与越南接壤的云南，成为援助越南的前哨阵地。为了有效地援助越南，云南省委向国务院建议，在省内修建国防公路，使南、北、东、西成网状。周恩来批准了这一计划。鉴于云南省劳动力缺乏，阎红彦提出从山东、河南两省征调一部分人，组成工役制工程部队，担负国防公路的修筑任务，也得到国务院同意。云南同山东、河南就此签订了合同，其中规定：工役制工人完成任务后仍回山东、河南。山东、河南十分重视工役制工人的征调工作，均按征兵标准放宽了三岁年龄征调，配备的干部也都是优秀的。两省共征调了一万七千人，组成了五个团。其中，山东组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团。这是一支素质较好的队伍。1964年下半年，当这批精壮的小伙子开到云南时，省委领导十分高兴，设想在完成任务后留下这批工人。经征求山东、河南两省同意，决定：完成任务后，按“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办理。当时，省委分工赵健民负责援越工作，所以工役制工程部队即归赵健民领导。当赵健民同省

长周兴、副省长史怀璧向工役制工人宣布这一决定时，各团工人都一致表示拥护。在此后艰苦的开山筑路中，工人们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吃大苦耐大劳的作风，工效很高，获得了各方面的赞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役制工人也卷入了进去，并且大部分持“炮派”观点。1967年，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出于派性，认为工役制工人留在云南问题很多，就以军管会的名义致电国务院：“工役制工人留下问题很多，还是按合同规定，由哪里来回哪里去。”国务院批示同意。这样，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就不顾山东、河南劳动力富余而需要输出劳动力，云南劳动力缺乏而需要引进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更改了三省决定的“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将一万七千名精壮青年一律遣送回山东、河南。这一改变，势必引起愿意留在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人的强烈反对。1967年8月29日，部分工人找到赵健民，纷纷进行质问。赵健民认为应该向省军管会和中央反映实际情况。就向主持军管会工作的陈康讲述了工役制工人的情况，陈康明确表示同意“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10月，赵健民在北京专门向交通部反映了工役制工人的情况。交通部确定派人前去昆明征求工人意见，然后再报国务院决定。同时，赵健民向副总理李富春写了专题报告。显然，围绕工役制工人问题的不同意见同派性斗争混在一起，斗争复杂化了。“八派”和支持“八派”的省军管会负责人把赵健民、陈康以及张力雄、王银山诬蔑为工役制工人的后台。

工八团一行七十七人，从1968年1月10日离开昆明西进，13日到达下关，历时四天，途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没有发生武斗事件和打砸抢等越轨行为。这时的下关，空气甚为紧张，武斗正处在一触即发的境地。“八派”已建立了统一的武斗指挥机构“八二三滇西联络站”，“炮派”也组织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两派都在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

武斗。1月16日，“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攻击，17日就把“八
派”赶出下关。这次武斗，双方死亡一百零四人，其中“八派”七
七人，“炮派”二十七人。在武斗中，李国贞任副总指挥，工八团
三百多人参加。

1月21日，工八团在下关的全部人员离开下关去昆明。
时，他们谁也不曾料到，这支为支援云南边疆建设应征而来的
是贫下中农子弟组成的队伍，正被诬陷为“滇西挺进纵队土匪
装”，从此开始遭受到灾难性的政治迫害。

1月19日，当地驻军的有关领导人从派性出发，向昆明军
党委报告了所谓“滇西挺进纵队”问题，其中称：

>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当地“炮派”个别坏人干的），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这样，一个完整的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假案就此形成。

在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对这一报告，未经核实，就上报中共中央。1月21日，康生、谢富治接见在京的昆明军区领导干部时说：“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他们的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1月22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22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某部相遇。但部队没能堵住，工八团人员冲开部队，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23日，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对工八团进行包围，同时，向军队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处理昆明“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通知。25日，在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报告。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这时，“炮派”的要求已无济于事了。谢富治批评部队没有堵住工八团是“右倾、怕死”，指示鲁瑞林负责处理“滇挺”问题。

25日，云南省军管会向全省发出了通告。通告全文如下：

最 高 指 示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协议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分人组成“滇西挺进纵队”，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来自各方面的多次劝告，于元月一、二日，全副武装，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向滇西挺进，煽动当地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配合他们的行动，仅仅十八天时间，先后攻打了一平浪、楚雄、下关等重要城镇，抢夺国防仓库，破坏滇西工业生产，打死打伤许多革命群众，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们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动。

“滇西挺进纵队”的行动，是受了走资派的操纵的，是混进他们组织里的极少数坏人从中挑动的，这个组织里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

为了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副统帅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立即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地、积极地、广泛地宣传毛泽东

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坚决规劝和制止“滇西挺进纵队”的错误行动。

我们希望他们：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交出指挥武斗的坏头头，坚决与走资派和坏头头划清界线，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能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们一定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把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和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和没有参加武斗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其他没有参加武斗的工役制工程团区别开来；

要把“炮兵团”派“滇西挺进纵队”和“炮兵团”派其他组织及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26日上午，鲁瑞林等从北京飞赶昆明。当天下午，即召开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反革命‘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

26日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下的工八团人员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27日下午六点十分，队攻占了甘海资煤矿。这时，才宣读了云南省军管会的《通令》，《通令》全文如下：

最 高 指 示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一个接着一个成立，出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云南同全国一样，也是一片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努力学习和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但是，就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出现了所谓“滇西挺进纵队”。

“滇西挺进纵队”自一月一、二日以来，在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少数坏人的挑动、操纵下，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是把枪口对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革命群众。“滇西挺进纵队”在滇西大搞武斗，破坏生产，抢夺国防仓库，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这是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保证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根据中央指示，特发布如下通告：

一、“滇西挺进纵队”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你们必须立即猛醒，赶快觉悟，同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少数坏头头，划清界线，反戈一击，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了。

二、“滇西挺进纵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

三、立即撤出矿区，迅速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和斗批改。

四、所有人员不能以任何借口破坏煤矿；矿区的一切设施和国家财产，必须予以保护。

五、矿区炮派革命群众，要积极协助军管会贯彻上述各条。

以上各条，希望你们立即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据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负责人 1968 年 12 月 28 日在各工宣队汇报工作会上讲，这个《通令》是他起草的。“写了送中央看后，说不行，我说转去重写，中央首长说就在这里写，一个小时写好，后来逼了三个小时才写出来。”写出后送中央，中央加上了“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武装围剿结束后，又挨户搜捕，将 100 多名“俘虏”捆绑着集中到中心食堂关押起来。“围剿”中，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丧生；工八团四百八十人被捉。然而，他们的罪名全都是别有用心编造出来的。

文件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事实是，工八团的人员从来没有使用过“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名称。至今，除军队的文件外，找不到使用这个名称的任何依据。“滇西挺进纵队”的名称，竟是捏造出来的！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事实是，工八团部分人员是元月十日下午从昆明出发，十三日夜间三时

到达下关。为什么把出发的时间前提八九天？目的是要同枪杀省煤炭管理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的时间吻合起来，嫁祸于工八团。郭顺兴是 1 月 3 日在禄丰被纠缠他的人枪走火打死的，与工八团毫不相干。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事实是，工八团部分人员所经路线是：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下关，没有经过禄丰。为什么编造出经过禄丰？因为郭顺兴是在禄丰被枪杀的。只有说经过了禄丰，才能将郭顺兴之死安在工八团头上。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一路攻占了“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事实是，工八团部分人员从昆明到下关，一路没有攻占过任何城镇，也没有破坏沿途的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更没有打伤过群众。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事实是，郭顺兴被害的时间、地点都与工八团风马牛不相及。真是赤裸裸的陷害！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事实是，早在 1967 年 12 月上旬，下关的“八派”和“炮派”就开始抢枪。1968 年 1 月 14 日，下关的“炮派”到军用仓库去抢枪，原在下关的工八团人员和从昆明刚来到下关的工八团的二十多人也参加了这次抢枪。2 月 11 日和 12 日，住在下关的工八团人员到下关的通讯枢纽部去抢枪，抢去了二支步枪、一箱手榴弹，后经过做工作，又将枪支和手榴弹如数归还，而且没有影响通讯工作，更无破坏通讯设备。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

同志”。事实是，和修华不是在抢救受伤群众中遇害的，而是被
关总站第一车队驾驶员谢福有杀害的，与工八团没有关系。的
曾为另一位解放军战士陶兴同与和修华先后召开过追悼会，但
不仅仍活在人世间，而且还被提拔为干部，1978年转业到宜良
拉机修配厂任副厂长。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攻打“八派”和其他革命群众，“仅
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
有的甚至公开枪毙”。事实是，工八团七十七人在从昆明到下关
中，并没有参与武斗，到达下关后，确曾与原在下关的工八团人
参加了“一·一六”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八派”死亡七十七人，“
派”死亡二十七人。哪里打死二百多人，又哪里抓扣一千多人？

捏造，无中生有的捏造！
夸大，漫无边际的夸大！
陷害，千方百计的陷害！
真是惊心而动魄！

工八团被围歼后的第九天，鲁瑞林等得意扬扬地去京汇报
汇报会上，闻知打死“滇挺”二百多人的谢富治，有所惊悸地说：“
央没叫你们开枪，没有授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
人？这件事对外不要讲了。”鲁瑞林汇报时，公开诬陷赵健民是“
挺的幕后策划者”，“陈康、张力雄、王银山也参与了幕后策划”。
中央军委派去云南的联络员罗元发插话制止他时，他竟说，“赵
民是叛徒，是三反分子，已很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和他混在一
起”。诽谤、攻击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

1968年2月13日，云南两大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
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

的协议》。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即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于当晚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人员。接见中，康生、江青肆无忌惮地进行法西斯式的诬陷。江青首先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接着煞有介事地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办法，要剿匪了。”康生说：“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平浪。”就这样，工八团被定为名闻全国的“反革命匪帮”。康生、江青同时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

第九章

京西半壁店，初期监禁的日子里

不合实际的愿望——第一封申诉信——一位正义的战士：齐运岭——家书抵万金——熬煎中苦读《毛选》——第二封申诉信——赤胆忠心致书毛泽东——不予转交的第三封申诉信——语重心长告妻儿——齐运岭义送书信

吉普车在透骨的寒气中驶进了一个神秘的院落，停在一排平房前。车门打开了，赵健民在两名军人的押解下，下了车，走进靠西头的一间。

这间屋有十几平方米，门向南开，西面和北面是墙，东面是临时用木板隔开的。屋子当中，有个火炉，炉火正不阴不阳地吐着红舌头。一会儿，一位军官模样的人送来一件大衣，然后"呼"地关上了门。顿时，屋里一片寂静。赵健民抬起手腕，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已是夜间三点多钟了。

这时的赵健民，也许是同康生、谢富治斗争得太激烈，也许是太冤枉，还没有从京西宾馆会议室那个氛围中摆脱出来。他在屋内迅速地挪动着脚步，一口接一口地吹着气。

清晨，看管的战士换了班。刚上岗的这位战士，按规定在屋内

观察了一番，见赵健民正大口地吹着气，心中纳闷起来：这个人与别人怎么不一样，是不是受了太多的冤枉？他从直感中觉得赵健民可能是个好人。

开早饭的时间到了，这位战士端着饭进了屋。半个小时后，赵健民还是不停地吹着气，饭少了一点点。这位战士寻思：吃这么少，又只吹气，能不能出人命？按规定，"犯人"有新情况，看守人员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报告后，"犯人"就要接受更加严厉的看管。这位战士没有马上报告，而是决定找机会问一问这个"犯人"。

赵健民关押后的第三天，即 1968 年 1 月 25 日，监护管理人员把赵健民在京西宾馆的《毛泽东选集》等书籍和衣物送来了。赵健民一看，夫人杨瑞波装衣物的提包也拿了来。他急速地打开提包，发现二百元钱和一百五十斤粮票全在里面，不禁暗暗叫苦："瑞波、小女，你们怎么吃饭，怎么生活啊！"他要求监护管理人员立即将提包转交给杨瑞波，但被拒绝。赵健民仰望着屋顶，长叹一声："瑞波，苦了你们母女俩了！"

赵健民被关押后，就明白这是处心积虑地迫害自己，于是，决心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他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是不会冤枉自己的，半年，至多七八个月，就可以恢复自由。1 月 26 日，赵健民向监护管理人员要来了笔、墨、纸，开始给中央写申诉信。

写，不停地写，满腔忿情地写，写了自己的历史，又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他用一条一条的事实批驳了康生对自己的诬陷，又以毛泽东的语录作为驳斥康生的理论依据。赵健民毕竟是有党内斗争的经验。他明白，康生之所以一句话就可以扼杀自己的政治生命，是因为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是谁授予的？当然是毛泽东。批驳康生，投鼠要忌器，要以毛泽东正确的话做武器。

赵健民整整写了两天，1 月 28 日早饭后八点四十分，将"呈谢

副总理并报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并中央并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并康老并中央文革"的申诉信交给了看管的负责人。通篇申诉信表明:自己没有任何重大错误,关押审查是不妥的。

申诉信送上去了。赵健民在监护室中急切地盼望着反响。然而,更使他焦急的是,不知妻子、小女儿在哪里,不知三个儿子的处境如何。

被监护期间不允许同外界通信,赵健民日思夜念着自己的亲人。1月30日,是1968年春节,这一天,赵健民在日记① 中写到:"监护、囹圄中过春节,不知瑞波、小女在哪里,小松、小桐、小楠有何人照顾。"无限的情思,使他难以忍受,他强制自己"不想他们了",告诫自己"应有信心"。

一天,又轮到那位善于思考问题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战士值班。这位战士瞅了瞅外面没有人,就鼓起勇气问赵健民:"你是哪个省的?"赵健民望着这张稚气而又纯朴的面孔,诚恳地回答:"我是云南的。""你不要怕,没有别人。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赵健民微微一笑:"我决不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这位战士似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和职务。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助,我可以帮你办。"赵健民感到这是一位可信赖的战士,就诉说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叫赵健民,山东省冠县人;在云南工作,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妻子是山东省单县人。他又告诉这位战士,自己是怎样被押到这里来的。从这位战士的口中,赵健民得知,这是北京西半壁店卫戍区的一个单位,专门负责看管大"走资派"、"叛徒"、"特务"。这排平房东头第一号关着刘澜涛,往西依次是第二号习仲勋,第三号王任重,第

① 1月26日,赵健民为写申诉书而要来了笔、墨、纸后,就利用这些文具、纸张写日记。

四号就是自己,与王任重为邻。也知道,这位战士叫齐运岭,安徽省砀山县人,农民出身,1965年底参军。赵健民告诉齐运岭,眼下自己最放心不下的是妻子和小女儿,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回到了山东省单县。齐运岭同情地说:"你写个信,我给寄去。"赵健民匆匆地写了封短信,交给齐运岭。齐运岭到邮局,将信偷偷地发到单县终兴公社杨庄大队赵健民的岳父家。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问,这位战士与赵健民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冒这个险?须知,世上总有正义在。齐运岭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他富有正义感,又善于思考。笔者曾专门去安徽省砀山县采访过他,不巧没能见面,就给他留下一封信。后来,收到了齐运岭的回信。透过这封文法不太通顺、不时出现错别字的信,看到了一颗纯洁、正直的心。他在信中写道:

> 我是1965年底当兵的,在那时作为当兵,我是很高兴的。心中想,当兵能到北京,也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能在毛主席身边,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所以我抱着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忠心,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到北京后我们在军委总后勤部训练三个月,也就是1966年3月份分配,我当时留在总后勤部警卫连,在永定路5号院。……在六七月份,北京的报纸就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味道,批判这个和那个。我作为一个当兵的,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青年,开始感到很好玩,看见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接见多少次,我也参加了几次。但看一看中国出了那么些大干部反党反毛主席,我心中就怀疑。想到这些老干部在战争年代什么都不怕,为了人民为了党,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一边,现在生活好了,他们有了名、利,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要

说有个别的，我还相信，可为什么这么多？当时我就这样看和这样想。中国能到什么地步？军区和省的干部都打倒了，今后怎么办？但作为一个小兵，这样考虑问题也没有用。可是，心中老是想。就是这样抱着很多思想，我们的部队编到北京卫戍区一师五团，住在北京半壁店。到了半壁店，就是学习、训练。这个时间可能是1967年五六月份，……过了10月1日，我们半壁店当时住着几个连队，有的连队接受了新的任务，就是看管老干部。我见了那些老干部，心中就不是滋味，产生同情感。没过多长时间，我们也接受了同样的任务。……一天，领导要我们把最西头的房子打扫一下，这时已是下午六点多了。

……

家信寄出后，赵健民日日夜夜企盼着回音。当日(2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不知何时能邮到？"2月18日，又在日记中写到："瑞波、小女，小松、小桐、小楠，……望断南飞雁。"回信终于来了。当赵健民从齐运岭手中接过来信时，这位曾南征北战、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硬汉子，双手微微地颤抖着，眼圈湿润了。他迅速拆开，一口气读完。看后，立即给妻子复信一封。

瑞波：

信收阅，知你在杨庄，很高兴。当我看到把你的东西送我这里来了，我想你身上带的钱、粮票少了，……我就是担心你与小妮怎么办呀。现知道你安然到家了，我就放心了。

……

我是很有信心的，一定要与恶势力斗争到底，一定要

斗争到最后胜利。

……

在煎熬中，赵健民一边等待着中央对自己申诉书的反响，一边读起了《毛泽东选集》。请看几天的日记：

1月30日

……今日阅完《论持久战》，前阅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2月5日

今日一天阅完《实践论》、《矛盾论》(精读)。

2月6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全部精读完一遍。

2月8日

今日阅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三篇文章均好，阅后很有心得。

2月12日

晚七时三十五分阅完《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已全部阅完。其最末一页为744页。

2月14日

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55页，阅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文章对主观主义批判得好。很有感！有信心。

2月18日

晚七时五十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精读完。……

2月23日

阅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了。无限感慨。

2月25日

晚八时二十分，精读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到此以后，以1月时间把《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一篇不隔地全部精读一遍，是一大收获。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赵健民的申诉信，就像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反响。表面上平静下来的赵健民，内心中却是波涛翻滚，他盼望着中央的回音，他也相信中央一定会有回音。2月4日，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回音。这天，赵健民在日记中写到："春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过去了，从明日起是下一个星期，所写的信应有所反映吧，专案组应有所表示吧。静候真理、实践的发展。"2月9日，又过了五天，还是没有回音。赵健民又在日记中写道："天无绝人之路。真理，定能得到革命者的拥护；定能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护；定能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任何恶势力也会冲破的，一定会得到胜利的。"第二天，再在日记中写道："去信，这星期无反应，看下星期吧！已来了二十天啦，专案组也应有所表示吧。"时间又过去了十天，到了2月21日，这时赵健民已被关押了整整一个月。这天，他在日记中重重地写下了两句话："到此已一个月整了，未见任何询问者。"焦急与无奈两种心情跃然纸上。2月26日，赵健民在日记中借毛泽东的两句话激励自己，坚定斗争信心："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支持者原来的态度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2月27日，苦熬中的赵健民开始书写第二封申诉信。他相信中央，对中央充满着希望。然而，这种希望是否会化为泡影，赵健

民没有朝这方面去想。

27日、28日、29日、3月1日，四天中，赵健民很少吃饭，也很少睡觉，一门心思地写啊，写啊，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写了一遍。他要告诉中央，自己绝没有挑动武斗、搞乱边疆。3月1日下午五时，将同样内容的三份申诉信交给了监护管理人员，转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并中央"，"总理、伯达、江青"，"康老、谢副总理"。当晚，赵健民在日记中写到："坚持真理，不怕任何惊涛骇浪。"

在这前后，赵健民给住京的徐运北、周力群各写了一封信，请齐运岭秘密地送去。信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自己的历史和在"文革"中的表现。徐运北是赵健民的同乡，1934年经赵健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国家第二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周力群，清华大学女学生，"文革"初期南下云南串联。赵健民欲通过徐运北、周力群二人，将事实真相告诉曾一起革命和工作的老干部以及群众组织。

3月2日，赵健民精神亢奋。他决心抗争到底，休息一天，明天再写第三封申诉信，向中央报告自己的历史。在这天的日记中，赵健民自喻为"寒梅"，表明"寒梅岂怕风雪压"；坚信自己一定会讨回清白，认为"有太阳，风雪是短暂的"。赵健民的"太阳"，是指毛泽东？（当时，举国上下都称毛泽东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还是指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广大人民群众？笔者无法猜测。

从3月3日起，赵健民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之中。三十多年前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的革命斗争，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当回忆到艰苦、激烈的斗争时，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那低沉、激愤的声音，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监护室中，回荡着，回荡着。

3月13日晚九时许，赵健民抄完最后一封信，站立起来，舒展

了一下腰肢、胳膊，似乎感到全身轻松了一些。然后，在屋内来回地踱着步，陷入了沉思。几分钟后，他重新坐下，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下去。几行苍劲有力的字清晰地跃然纸上。

敬爱的毛主席：

我已被康老监护审查。康老指定我是叛徒，我历史上是没有问题的，被国民党逮捕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因为康老是文革小组顾问，我同他的认识不一致，我要求主席派人来彻底调查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

赵健民

赵健民渴望着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那里讨个说法。

但是，不知为什么，“风向”发生了变化。第二天早晨，赵健民对监护管理他的人说，“有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的信，请给呈上”。这人拿起来看了看后说，“等一等来拿”。一直等到十时，才来了一个人告诉赵健民，“现在不能给转信”。赵健民问：“那么，什么时候能转？”来人回答说：“将来是不是给转，再说。”赵健民争辩说：“我有给主席写信的权利，请您反映一下。”来人边答应“可以”，边转身走了。赵健民感到茫茫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到：“哎，真不知为什么不给转信！”

一连三天，既不见监护管理人员，也没有回音。3月18日上午近十一时，一个监护管理人员来到赵健民处，拿走了所有的信，并说立即转送。但刚露出一线晴空的天气霎时又布满了乌云，下午五时十分，一个身穿绿色军装的军官模样的人又把信退了回来。赵健民反复地问他：“这是为什么？”那军官呆板的脸上没一丝表情，嘴里蹦出的只是一句话：“暂时不转，将来再说。”陡转的形势，

使赵健民更加愤慨。在3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信不准上，怒火高万丈！”同时，又写下了一首诗：

献身革命三六年①，
忠心耿耿任劳怨。
今日身陷囹圄中，
豆萁要把豆粒煎。

赵健民似乎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将三封信抄了一遍，托齐运岭偷偷地寄给妻子，同时给妻子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附信一封。这封信语重而心长。

瑞波并告小松、小桐、小楠、赵杨：

我的情形，你们看了我报上边的三封信就可以知道了。我估计短期一二个月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到今天还没问一次，半年左右解决的可能性大。但思想上应作长期打算，一年、二年、三年……有了长期打算和安排，就不被动。我应这样，你们也应这样。

在革命在工作在学习在生活都要小心，处人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小心，时时注意一小撮走资派及其追随者造谣、诬蔑、攻击以至进行陷害，……

小心是小心，但不被恶势力所吓倒。要斗争要生活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如瑞波被迫害，小松就带领小桐、小楠、赵杨克服困难，进行斗争，如小松被迫害，小桐就带小楠、赵杨克服困难、斗争、革命。

① 这里，赵健民指自己参加革命三十六年。

小松、小桐、小楠、赵杨，你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小松、小桐都应精读几遍，并做出学习心得笔记来；小楠应把《毛主席语录》精读好，熟记下来，以便参加革命活用。

你们应听你母亲的话，体谅家中的困难，要勤俭节约，必要时要自谋生活。

你们应好好在主席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应互相尊重。

把你们的钢笔小楷字都要练写好，一定要练写好。

父意。

……

这是"文革"中千千万万个蒙难家庭之一的成员间的一封信，也是一个蒙难的中共高级干部家庭的成员间的一封信。这封信，虽然在语言上打上了不少时代的烙印，但却是研究那个特殊年代中人们的生存方式、精神世界、人际关系的一份真实而有价值的资料。

齐运岭与赵健民，经过两个月的接触、沟通，相互了解得更深了，齐运岭觉得赵健民不仅是一位好干部，而且人品高尚，很有骨气；赵健民认为齐运岭是一位质朴而正义的青年。当齐运岭看到赵健民因不给转信而急得团团转时，就主动地对赵健民说："您把信整理好，我给送去。"赵健民明白，这比偷着寄家信更为冒险，但出于无法，又看到齐运岭那诚心实意的态度，就同意了。3月23日晚上，齐运岭利用值班的机会进入赵健民室内。这时，赵健民已整理好了五封信，第一封是给毛泽东主席的，第二封是给周恩来总理的，第三封是给江青的，第四封是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五封是给国家第二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的。齐运岭严肃地接过信后，郑重地向赵健民提出，要结为师生关系，赵健民慨然答应。于是，齐运岭拜赵健民为老师，赵健民收齐运岭为学生。

第二天，3月24日，是星期日，齐运岭向班长请假外出得到批准后，怀揣着五封信就向城里赶。给毛主席的信向哪里送？齐运岭只知道毛主席住在中南海，从长安街的新华门可以进中南海。可是，到新华门一看，戒备森严，既进不去，也递不上信。他在门前徘徊了好一段时间后只好离开了。给周总理的信向哪里送？江青住在哪里？中央文革小组在哪里办公？齐运岭在城里转了起来。他转呀转呀，越转越着急，越着急就越觉得后面有人盯梢，又急又怕，心里就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齐运岭整整跑了一天，一封信也没有送出去。晚上，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愿动。第二天值班时，他将情况告诉了赵健民。赵健民嘱咐说，不要着急，下个星期日再去，把给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从邮局中寄走，给徐运北的信送到他家里。同时，给了齐运岭几元钱，要他中午买点饭吃。3月31日，又是一个星期日。这天，齐运岭忙活了好一阵子，才把信送了出去。

过了两天，监护管理人员突然闯进赵健民室内，不由分说地将纸和笔没收了。一瓶墨水放在不显眼的地方，被漏了下来。赵健民估计，这是送出的信引起的反映，显然，是不准许再写申诉信了。

4月4日这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齐运岭听说赵健民这批人近日要转走。听到这个消息后，齐运岭心中空荡荡的，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当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健民。

第二天，接赵健民的车子来了。当赵健民走出屋时，正好与齐运岭相遇，两双眼睛对视了片刻。这片刻，传递的是依恋的情感？还是鼓励的"语言"？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总之，这是人们之间一种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

第 十 章

交通干校，漫长的六百三十四天

转监——突如其来的搜查——齐运岭大祸临头——一份温情——十年后的平反——监护中的反思之一：党和国家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监护中的反思之二：中国急需“民主”与“法制”——监护中的反思之三：中国必须改善现行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把选举公仆的权利交给人民群众——挨打——石灰块写成的《一年有感》——祭母

吉普车将赵健民单独押送到了交通部干部学校——这个临时改为关押“犯人”的地方。先后转移到这里来的还有习仲勋、刘澜涛等人。看管者依旧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赵健民被关进了一个单室，标号为8号房。室内与外界的联系只是一扇每天只开一次的木板门。门上凿了一个洞，是供看管人员送饭和窥视用的。一天有一次放风，时间是十五分钟。为了不使“犯人”在放风时碰面，用席子隔成了许多块三四平方米的小小空间。赵健民每天在这块固定的小地盘中享受一下室外空气。

时光日复一日地流逝着，赵健民转移到交通干校已一个月了。一个月中，专案组既不询问也不接触。这时，赵健民再也没有齐运

岭这样一个人使他与外界沟通。封闭中的赵健民，真是度日如年。寂寞中，他思索着：我是清白的，他们查不出问题来；没有问题，他们就无法定罪；无法定罪，就要释放我。几个月后的事实，将要粉碎赵健民按照正常逻辑推断出来的结论。

5月上旬的一天，几名自称为专案组的军人突然提审赵健民。这突如其来的提审，刺激了赵健民长期压抑的思想感情。他观察着这几个军人的言谈举止，断定他们都是部队中的高级干部。赵健民迫切地要求他们把调查的真相谈一谈。但专案组人员根本不谈，只是反复追问，“你同什么人通过信？信是怎样送出去的？”赵健民立即意识到，通信的事被发觉了。他思量了一番，觉得隐瞒并无益处，就直率地回答：“给毛主席、党中央写过信，还同我妻子通过信。”“信是通过一位战士送出去的。”专案组人员穷追不舍：“来信在哪里？”赵健民坦然地回答：“没有了。”专案组人员怎么会相信呢？他们就动手搜查。搜查得分外仔细，连皮棉鞋里的鞋垫都撕开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好悻悻而去。时隔两天，专案组人员突然进行了第二次搜查。他们将屋内翻了个底朝天，惟恐漏掉一个可疑之处。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他们哪里晓得，赵健民具有丰富的狱中斗争经验，三十年代，他在国民党狱中担任过中共支部书记。赵健民在接到齐运岭转来的妻子的来信时，阅后就销毁了。

在赵健民遭到搜查稍后的一天，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省单县杨庄村的杨瑞波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她拆开一看，信纸上只有寥寥数语：“千万不要再来信，现在有人看管着我。”落款是齐运岭。信，是齐运岭托他最要好的战友偷着寄出的。这是杨瑞波接到齐运岭的最后一封信。从这以后，她就没有了赵健民的消息。杨瑞波警觉到，齐运岭出了事。

齐运岭确实出了事。5月2日晚饭后，连里的干部通知齐运岭到连部办公室去。当齐运岭一进门就被抓了起来，接着，被押送

到师部。齐运岭心中清楚，是因为替赵健民送过信。他感到分外痛苦。一位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突然失去了自由，感到痛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齐运岭在给笔者的信中谈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和思想：

> 在屋里关着不准出门，还得写检查，受警卫人员的气。吃饭是给多少吃多少，给的多吃不了，下次就不给吃了。警卫人员还骂人，有时不高兴，就要我面对着墙一站就是一天，饭送来了，都不让吃。有一次，送来的米饭和菜糊焦了，我吃不下，警卫人员就不满意，要我面对着墙站着，不许动一动。站久了不能一点不动，一动就挨打，连打带骂。当时我真想死，死了完了。可是我再一想，赵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他不是三反分子，我就能获得自由。这样，我思想上就有了挨打受骂的准备，但没想到那么长时间不解决。有时我想，坐牢，死，都可以，活受罪没法熬。于是，我天天要求处理，可师保卫科就是不处理。我也想到跑，但是又一想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想来想去没有好办法。同家中不许通信，父母几个月不见信又是什么滋味。又一想，反正这样了，也不管也不想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我搞死。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

齐运岭在关押中盼望着；
赵健民在监护中等候着；
杨瑞波在偏僻的小村中期待着。

这一天，1968年8月15日，终于来到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政治上宣判了赵健民的“死刑”。于是，就出现了本书开头的情景。

就在这一天，北京卫戍区某师保卫科的干事将一张《人民日报》摊在齐运岭的面前，用笔勾画出来的几行字立时映入了齐运岭的眼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企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乘胜前进的全国广大革命人民。”

少许，这个干事说：“你不要再幻想赵健民是好干部了。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三反分子。中央已经定了，报纸上也登了。”稍一停顿，又说：“你的处理通知也来了，开除军籍、团籍，遣送回原籍。”这时的齐运岭，犹如五雷轰顶。他在给笔者的信中写到：

> 一看报纸，我的心凉了。我想，我保的不对了，这怎么办啊！又一想，不管对还是不对，反正都一样了，这一生算是完了。开除军籍回家，我心中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没有坐牢。

回到家乡的齐运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受尽了人间的白眼。

> 到家后，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恋爱对象也吹了。特别是大队干部，对我压力最大，人家能说，我不能说；人家能做，我不能做。这几年，我受的苦受的罪太多了。

齐运岭至今还不知道，赵健民专案组曾策划要把他拉到云南去批斗。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搞成。若搞成，齐运岭将要承受更

严重的摧残。

来年，1969 年春，已回到老家山东省冠县的赵健民第二个儿子赵小桐得知齐运岭的情况后，立即赶到了砀山县，看望齐运岭。小桐看到齐运岭在困境中挣扎，回来后就同弟弟小楠商量，尽最大力量给以帮助。他们千方百计凑集了一百元钱，由小楠亲自送去。赵小楠骑着自行车，从鲁西北的冠县出发，渡过黄河，来到鲁西南单县外祖父家，再赶往安徽省砀山县。他整整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到了齐运岭家。下车时，腿都僵直了，几乎歪倒。当时，从冠县到砀山县，可以乘长途汽车。但小楠买不起车票。赵健民的工资已经停发了，杨瑞波每月几十元钱的工资很难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小桐、小楠的看望，使处于困境中的齐运岭十分感动，他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

> 他们来看我，我心中想，在家和部队受的苦再多也是甜的，因为他们还想着我，没有把我忘掉。不管如何，我认为做得对，就是赵是反革命，我对他是过得去的；如果不是反革命，证明我对了。

齐运岭嘱咐小楠，以后不要再来了。身遭厄运的齐运岭怕连累着小桐和小楠，他对邻居都谎称小桐、小楠是亲戚。

1978 年赵健民获得平反后，立即致信时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兼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秦基伟和北京卫戍区党委，要求为齐运岭平反。

> 秦政委基伟同志
> 北京卫戍区党委会：
>
> 我汇报一个事情，请考虑。1968 年 1 月 22 日晨，我

被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对我实行监护审查，把我关到北京市半壁店卫戍区部队营房中看管起来。我当即先后向毛主席、中央写了三封报告信，说明对我监护审查所指的事实理由是不合实际的，请求解除对我的监护审查。我的头两封报告信，看守的解放军同志给转上去了，但第三封报告信，因看到上面有我对康老的意见，不给转交了。经我一再要求，也不给我转。这时，看管我的一个解放军战士齐运岭问我说：“看你不像坏人，你怎么到这里边来了？”我说：“我就不是坏人，我相信一定会查清楚的。”他说：“你们是老革命，对党立过功的，查清了就出去了。旁人来了不几天，有的第二天就问了，你来了一个多月了，没有问，表明你没问题，过几天就出去了。”过了几天，战士齐运岭对我说：“我帮你把报告信送出去、寄出去。”在此情况下，我考虑，由于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我前两信也会压在专案人员那里不给上转(后来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就把三封信复写出来，让战士齐运岭有的给送出有的给寄出去了。大概在 1968 年 4 月份，我又转到另一地方关押了。

1975 年 9 月 30 日，我从云南监狱中放出来，听我家人说，战士齐运岭因给我送信寄信事，被开除军籍、团籍，押送回乡监督劳动。我今年 1 月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4 月经华主席、党中央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云南省委报中央批准的我的结论是：历史问题维持原结论，文化大革命中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我现在已到三机部工作三个多月了。

据上，我考虑战士齐运岭的问题，从形式上看他是违反了军纪，但从政治上从本质上看他是执行了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反对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因此，给他的开除军籍、团籍，回乡监督劳动的处分，应予平反，对他应予落实政策。

战士齐运岭，安徽省砀山县人，1968年1、2、3、4月在北京卫戍区部队，住半壁店。这是确凿的。他的部队番号可能是4716部队二分队。

以上意见不当之处，请指正。

赵健民

1978年7月11日

赵健民的信发出后不久，北京卫戍区某部派人来到砀山县，宣布为齐运岭平反。平反决定中将1968年8月开除军籍改为复员。齐运岭得到平反后，赵健民又致信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潘焱，要求为齐运岭在京安排工作。后来，齐运岭被安排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二五研究所。现在，齐运岭在砀山县水利局工作。

1978年4、5月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历经十年磨难的赵健民、齐运岭在山东省单县相逢了，这一对患难之交畅谈了很久很久。

事隔近三十年的今天，笔者在翻阅各种资料，书写这段历史时，一个谜团始终未能解开：齐运岭为赵健民秘密送信，只有四个人知道，这就是除齐运岭本人之外的赵健民，赵健民的妻子杨瑞波，第二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清华大学女学生周力群。那么这件事是怎样透露出去的呢？

《人民日报》8月15日社论，完全粉碎了赵健民的半年、至多七八个月就会获得自由的估计，也彻底毁灭了赵健民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会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正

确处理自己问题的信念。

民主何在？

法律何在？

党纪何在？

真理何在？

这一连串的问号，不能不使他更为冷静更为理智地进行思考。

8月15日以后，表面看更为深沉了的赵健民，内心中那匹思索的骏马，在从个人到全党、从历史到现实这一广阔的时空中驰骋着。

是三十年代初的九一八事变，促使怀着满腔热血要救国救民的年仅十九岁的赵健民毅然走上了寻找共产党的道路。1931年冬，他阅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大公报》记者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等介绍苏联情况的进步书籍。从书中看到了一个属于劳动人民的崭新的世界。1932年春，又阅读了李达的《现代社会学》。赵健民被这部书深深地吸引着，从书中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此，开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也在这时，赵健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创立根据地及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的消息。他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非常凑巧，赵健民从他一位同学手中看到了党的秘密刊物《前冲》。这份刊物是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中共党支部创办的。于是，他就报考了济南省立第一乡师，到那里寻找党。1932年11月，是赵健民政治生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1932年11月直至抗日战争初期，赵健民长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工作，其中有近三年的时间与党失去联系，独立坚持斗争，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度过的。这时期，他学习了部分马列主义著作，如《反杜林论》，但不了解中共高层内的斗争，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情况和观点，只是1935年在《社会新闻》上

看到，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抗战初期，由于忙于建立抗日武装，所以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学习一点理论。1940 年赵健民进入北方局党校后，才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了些书。就是在这一年，他又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41 年，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2 年，才读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这时起，赵健民从心里拥护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不过，他也感觉到党内存在着一种“左”的偏向，如山东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湖西区出现的错误的“肃托”，使一批优秀干部倒在自己同志的刀下；又如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了为数不少的乱打乱杀现象。但赵健民又认为，这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发生的，可以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赵健民最初认识“左”的偏向，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那时，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铁路工程局局长。

三反五反时，上级布置打“老虎”，并且分配了数字，分给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和铁路工程局各一千个“老虎”。如果打得多了，上级就高兴，如果打得少了，上级就批评。当时，赵健民感到很为难。铁路上的一个工务段，查出的贪污数额竟超过了全部投资数额。赵健民十分清楚：这是逼出来的，是假的；运动后期，自己还要去做善后处理。

1952 年底，赵健民调任国家铁道部副部长。1955 年初，又调到山东任书记处书记、省长。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全党和山东党组织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期间，赵健民经过认真的思索和调查研究，在不同场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赵健民认为，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成次要矛盾。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赵健民反对不切实际的求快求大、急躁冒进，

什么亩产万斤的县、专区等等。他说，人民会从经验出发认为办不到。他尖锐地指出，这样财力、物力担当不起，会出乱子。对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赵健民提出要切实整顿基层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但不久，他因为这种探索等原因，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57 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使赵健民看到，在党的领袖毛泽东身上出现了一种“左”的偏向。整风运动开始时，他真诚拥护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衷地赞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赞成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特别赞成毛泽东 4 月 30 日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畅谈中共整风问题时的讲话。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毛泽东肯定了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尤其是对高教部和教育部的批评意见。他说，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毛泽东再次表述了他的“内外夹攻”的思想，说要找出办法，党内外一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妥，在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5 月和 6 月初，自由批评的环境初步形成了。但是，毛泽东于 5 月 15 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毛泽东认为，极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党进攻；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 1% 到 10%；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

点。赵健民看了这篇文章，感到很不理解。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7 月 17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这时，赵健民与谭启龙到青岛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给了他们一份《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赵健民读了一遍，不禁暗暗吃惊，心想怎么全翻了个。他明显感觉到，文章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在参与领导山东省的反右运动中，赵健民尽力抵制“左”的错误。

1957 年山东省的整风反右运动，到年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由社会上整风反右运动转入以在党内和干部中抓右派分子为重点的整风补课运动。到 1958 年夏季，随着批判“反冒进”调子的升高、“大跃进”的升温，山东党内以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为基本内容的整风补课运动也趋向高潮。一向主张实事求是而又勇于探索、敢讲真话的赵健民，在这一运动中成为攻击的对象，被作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重点批判。这种批判，是急风暴雨式的，是黑白不明的。批判的重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冒进。批判的首要问题是为“向、王反党集团”翻案。1955 年赵健民接手负责“向明、王少庸反党集团”专案组后，强调实事求是地调查，要求“先定事实，再扣帽子”，不要“先扣帽子，再找事实”。就因为这样，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批判初期，赵健民遵照邓小平的忠告，为了保住党籍，作了适度的检查。后来，赵健民发现自己检查一次，批判就升级一次，于是，就申明事实，为自己辩护。最后的结局是，虽然保留了党籍，却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党委第二书记。赵健民这一遭贬就是三年。三年中，他聆听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一改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讲话。

目睹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恶果：粮食生产在 1959 年到 1961 年间连续跌入低谷，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挨饥受饿，据说仅山东省非正常死亡即达 150 万人，外流 300 万人。严酷的事实，使赵健民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

1962 年，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与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都在发展的一年。1、2 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七千多人，故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指出“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刘少奇在大会上还有一个讲话，即对报告作说明。这个说明，谈了一些重要看法。他说，对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他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这些看法，使赵健民颇为振奋，他感到，党中央在勇敢地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时隔半年后的 8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9 月 24 日至 27 日，又在北京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他还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春天对经济形势的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一些农村的“包产到户”做法和邓子恢、陈云等对这种做法的支持，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对自己历史

派生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民主”是“人民的权力”、“人民进行治理、统治”的意思，这个概念首先是指“政治制度”。恩格斯说：“首先无产阶级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也就是说，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必须靠一整套政治制度来保障。由此可以说，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就是人民根据预定的程序和“多数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事务作出决定和修正决定的过程。这个预定程序，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这个“多数原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多数原则”的核心是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即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多数原则”，也就谈不上“民主”。当然，诽谤、诬陷、煽动肇事等，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

造成权力集中，是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封建制度持续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制度非常完备，这在全世界都是很典型的。到了近代，伴随着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喊出和宣传了民主主义思想。但由于这个阶级的软弱等原因，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潮也没有在神州大地上扎下根，所以悠久的封建社会产生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都没有遭受到资本主义的冲毁。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传统思想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的结合，顽强地抵抗着民主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由于长期处于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之下，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清算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在 1949 年执政以来，由于对封建思想影响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又没有完成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以至到了“文革”，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泛滥成灾。

“文革”中鼓吹的“大民主”，其实是对“民主”的亵渎。其在上面，通过造神运动，将领袖人物尊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将领袖的话捧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用领袖一个人的思想来主宰亿万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其在下面，践踏一切法律，疯狂地实行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什么“民主”，更不是什么“大民主”，而是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结合的怪胎。这个怪胎，使诽谤、诬陷受不到惩罚，使假案、错案、冤案遍布国中，使各项建设事业遭到极严重的破坏。

与权力过分集中同时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法制建设薄弱，“人治”代替了“法治”。1912 年以前的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皇帝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全部集中于自己手中，而且不受限制。虽然国家也制定了法律，但这个法律是依据皇帝个人的意志而存在的。所以，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治”而非“法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颁布了《临时约法》。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中国近代的“法治”。但由于《临时约法》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又由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强大，所以《临时约法》成为一纸空文。这一史实说明，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要实行“法治”，决非易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 1954 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权威和尊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但是，此后围绕着实行“法治”经历了种种严峻的斗争。“法治”一步步被“人治”所代替，党纪代替国法，党委高于宪法，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见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情况发展到“文革”，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按期召开，宪法失去了权威和尊严，法律、法规遭到践踏，“法治”完全

被“人治”所替代。一部“文革”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废宪史”。“法治”的废弛，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好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使坏人任意横行。这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法制，无产阶级政权将等于零。

如何铲除眼前这些严重的弊端，赵健民认为，正确的办法就是改善现行的政治制度。列宁曾指出：“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改善现行的政治制度，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把选举公仆的权利交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为官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相当于政府各部的十个委员会和主要工作人员都由普选产生，向选民负责，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第二，取消高薪制，任何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列宁后来认为这两条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的质的转变，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我们党执政后，在实行民主选举方面存有不少问题。选举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们往往是上级提名单，要下级举手通过，或者是以“协商”的方法，迫使多数服从少数。在“文革”中，选举制度就名存而实亡了。

选举方法，应该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制和竞选制。现时有条件的，应该实行直接选举，暂时没有条件的，应该创造条件实行直接选举。《联共（布）党史》中曾写道：“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选举，自乡村和城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起至苏联最高苏维埃止的选举都是采用径由公民直接选举的办法来进行。”直接选举，一方面使“主人”能够真正挑选、监督、罢免自己的公仆，一方面使公仆对选民负责，而非对上级的某个人或少数人负责，从而

使“主人”成其为真正的“主人”。竞选制，并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我们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的竞选制。竞选制的实行，对于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公仆；对于国家，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

实行直接选举制和竞选制，可以先在党内逐步推行。例如，逐步分期地实行党的县、省、全国代表由党员直接选举制。又如，逐步分期分批地实行县、省、全国党代会代表和主席团及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等在原党委所提候选人名单之外，允许党员或代表增提名单，经过筛选后，以得票较多者交大会正式选举。这样过渡几年后，即实行在基层由党员在县以上由代表直接提候选人名单来进行选举。再如，逐步分期分批地实行竞选制。①

监护中，赵健民在求索着党和国家出现危机的缘由和克服危机的良策。

夏去秋来，秋去冬来，时间在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行着。尽管时光一日复一日地流逝，可赵健民的案子却一直被搁置，没有一丝变化。然而，交通干校的监护环境却在变，变得越来越恶劣。看守人员打人的事时有发生，而且越来越厉害。赵健民监护室的后面是一座专门关押女干部的楼。女干部挨打时的哭声和喊声，时不时地飘进赵健民的耳中，每一次哭喊声，就像一次强劲的冲击波，冲击着赵健民的心灵。一天，一阵凄厉的哭喊声传了进来：“打死我了！”这声音，似一把锋利的锥子，刺扎在赵健民的心上。这一整天，赵健民都感到，自己的心在滴着血。

不久，挨打的事降临到赵健民头上。有一天，赵健民像往常一

---

① 参阅赵健民1985年1月24日致中共中央的《关于改革党和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议》。

样,端着满满一脸盆水,精神专注地朝监护室走去。突然,背后遭到狠狠一击,他打了个趔趄,水泼湿了上衣前襟和裤子,脸盆扔出老远。赵健民回头一看,一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稚嫩的脸上滚动着一双凶狠的眼睛,嘴中连续地喊着:"我叫你不低头!"赵健民拾起脸盆,默默地回到屋里。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想,这就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结果吧,这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吧,多么可怕!过了几天,赵健民去打水,又碰上这个战士在院中巡逻。赵健民端着一盆水,故意高昂着头向前走。这时,只听见背后的脚步声迅速地接近自己。他把腰板挺得板直,将全身的气力都运在背上,只听见"砰"的一拳,紧接着就是"哎呀"一声。原来那只打来的手腕给崴了。赵健民回过头来,一只不停摇动的手,一副龇牙咧嘴的脸呈现在他面前。这个人性扭曲了的战士哪里晓得,眼前这位山东大汉少年时就练过武功,他的家乡冠县是中国查拳的发源地。

从赵健民监护那天起,地球绕着太阳又转了一圈,时间运行到1969年1月21日。一年了!一年中,不询问,不做结论,又不准赵健民个人表达意见。这是哪家的道理?

这一天放风时,赵健民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拣了几个石灰块带回室内。在室内地面上,他奋石疾书,草就诗一首①,取名《一年有感》。

一年有感

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

① 赵健民说,自己不会写诗。但他的这些诗充满着真情实感,从"诗言志"的角度看,也不失为诗。

一年时间久,调查会几遍。
基本没问我,无罪已明显。
无罪应释放,错案回头难。
拖延又拖延,一年尚不完。
分管此事者,应凭党性办。
如认我有罪,请即讲当面。
听听我意见,对照分析研。
本质易看出,结论不费难。
不要再拖延,再拖党性眠。
坚信太阳下,不会永含冤。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健民
1969年1月21日于北京监护所

赵健民,他要伸冤,他要呐喊,他把满腔情感都凝结在这二十二行字句之中。

赵健民写完后,又看了一遍,就告诉了看守人员。看守人员慌慌张张地抄写下来,说立即报送专案组。

2月15日,赵健民早早就起了床。一整天,他面向南久久地站立着,早饭没有吃,午饭动了一点点,晚饭也没吃多少。

这一天,是赵健民母亲的忌日。1967年2月15日,老人家辞别了人间。

赵健民同中华民国同龄,1912年当他来到人世间一百天时,父亲蒙难去世。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婴儿身上。

她爱子如命。有一次,年幼的赵健民正在堆沙子玩时,突然肚子痛。她吓得直哭,急忙请人给赵健民看病。当乡下郎中扎下针,

不久痛消了时，她破涕为笑，高兴得就像自己获得了新生。赵健民在县城上小学时，一次洗澡，将腿划破。她知道后，要赵健民回家治疗。赵健民说要坚持上学，她就搬到县城东关的娘家住，每顿饭都要把煮熟的鸡蛋送到学校，并且看着儿子吃完，才满意地离去。

她十分勤劳、节俭，又有见识。白天，冒着风雨、酷暑下田干活；晚上，披星戴月纺纱织布。在家中，既尽心竭力孝敬婆母，又一心一意培养儿子，惟独不顾自己，吃差的，穿破的，生活相当凄惨。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她依靠自己省吃俭用，纺织积蓄，以及几十棵枣树一年一年的收入，零星地一亩一亩地购置土地。这期间，她又因侍候同族的两家绝户而得到土地十几亩。从丈夫去世到1932年的二十年间，她把家中的土地由四亩发展到二十多亩，自己耕种不过来，就雇工耕种。

1932年，赵健民为了寻找共产党，以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在革命活动中，赵健民把自己的钱用来充当活动经费，花钱就多起来。本来，学校每月发给一个学生五元钱，除了吃饭还有余。一个学生一年的书籍讲义费只需要二三十元，但赵健民每年要花掉家里七八十元。当时，赵健民家中每年能够兑换成现金的只是四五亩花生，还卖不了一百元钱。赵健民的母亲已经从风言风语中听说儿子加入了赤色党，为穷人干好事。一次赵健民回家，母亲问他："怎么花这么多钱？"赵健民糊弄母亲说："买书、交朋友用了。"赵健民从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看出责备的表情，只是听到一句平淡的话："我一年的劳动全都给了你。"

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奋斗时，有多少个像赵母这样普通的母亲在默默地给予支持啊！

赵健民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不论是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和平执政的日子，眼前经常显现出母亲在月光下纺织、在骄阳下劳作的身影；耳中常常响起母亲那句平淡的话："我一年的劳动全都给了你。"

共产党执政了，儿子当了部长，母亲照旧生活在乡下，住土平房，不停地劳作。儿子当了省长，近七十岁的母亲还是住在乡里。赵健民为了尽孝心，有时把母亲接到城里，但她住几天后又坚持回到自己的土屋。她，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了不起的母亲。

1963年，赵健民把近于丧失劳动能力的母亲接到了昆明。老人家还是闲不住，每天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

1966年底，赵健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当赵健民被揪斗、游街和受伤住院时，全家对老人家封锁了消息。老人家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一天天看不到儿子回家，也觉察出有些不正常，她整日忧伤、发愁。当赵健民带着一双拐杖、一张牵引病床出院回到家中时，八十一岁的老人伤心地哭了起来。

1967年初，火烧省委、炮轰省委、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战火"正盛，赵健民家中一天也得不到安宁。造反派有时白天闯进家来，有时夜间来敲门，不开就爬墙跳进家来。杨瑞波没办法，一到晚上就把院子和屋内的电灯全关上。但这也无济于事，造反派竟从大门到楼上扯起一条电线，电线上安了许多灯泡，一到晚上，院内可算是灯火辉煌。而且，造反派住进了院内的几间平房。赵健民是频繁地接受批斗，有时正在家中吃饭，有时正在床上躺着，造反派冲进来，就被连拉带扯地弄走了。老人家看着这一切，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跟着八路军干了一辈子，落到了今天这么个下场！"忧伤，痛苦，使老人家本来就高的血压更高了。

1967年1月底一天的傍晚，杨瑞波刚下班回到家中，就听到厨房中"砰"的一声，赶忙跑过去一看，婆母倒在地下，身边一片盘子的碎片。她急忙喊孩子看着奶奶，自己飞快地跑到省委的医务室。医务室的倪大夫抱着血压计跑来，一量，血压高得测不出来。

倪大夫急忙联系汽车将老人家送到昆华医院。医院急诊室的大夫一检查，立即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倪大夫又给省委去电话，要求通知赵健民。经造反派同意，赵健民赶到了医院。赵健民请求医生让老人家住院治疗，但医生坚持回家由医务室治疗。无奈，赵健民租了一辆三轮车把母亲拉回家。三轮车在缓缓地走着，赵健民低头望着母亲那张痛苦的脸，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老人家刚回到家时，头脑还清醒，有时还能说几句话。不久，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时，医务室因造反分成两大派，对老人家的治疗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1967 年 2 月 15 日晚十时十五分，历经八十一个春秋的老人停止了呼吸。老人家虽然呼吸已经停止了，但她的一双眼睛还睁着。死不瞑目啊！保姆一边用手轻轻地将老人家的眼皮合上，一边说："您放心地走吧。"她能放心吗?！临终时没能看见惟一的儿子一面。

正在接受批斗的赵健民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即对造反派说："我母亲去世了，你们要让我回去看看。"经造反派允许，赵健民回到家中。他同妻子、孩子一起守护在母亲的身边。孩子们先后睡着了，赵健民与杨瑞波依在一起，默默的，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地走着，夜深了。这时，赵健民耳旁仿佛响起几十年前母亲那句平淡的话，"我一年的劳动全都给了你"。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了，泪水从双眼中涌出来。赵健民哭出了声！

第二天，身着一套普通衣服，盖着白色布单的老人家，静静地躺在一辆大卡车上，走了，不情愿地走了，带着满腹的疑虑、忧愁走了。

母亲走了整整两年了，可此时此刻，监护室中的赵健民仿佛觉得母亲又来到他身边，慈祥地看着他。他轻轻地安慰着老人家："放心吧，妈妈。儿子一定会记住您的话，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第 十 一 章

被捕，秦城监狱二十日

给毛泽东的报告信、《怒火鸣》、《进一步支援缅甸革命运动的建议》，三者化为碎片——《感事报康老、谢副总理》：直刺康生——夜入秦城——天上移监

监护人员将赵健民 1 月 21 日写的《一年有感》抄走后，再也没有反响。

1969 年 3 月初，专案组要赵健民对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写证明材料，给送来了笔和纸。赵健民抓紧时间写证明材料，乘机利用纸和笔于 3 月 12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信。信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被监护审查的人，时间已过去四百一十六天了，专案组基本上没有过问"。接着，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历史上被捕的问题，现在都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存在，一年之内完全可以查清。我同康老的谈话，当时有专人记录在案，拿出记录来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看清楚。因此，我请求，如果专案组认为我有错误和罪行，就告诉我，由我来答复；如果专案组拿不出我的错误和罪行的证据来，但又感到有疑问，就把疑问告诉我，由我来解释；如果专案组连疑问也提不出来，那就应放我出去。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接受审查。赵健民按照常规把什么情况

都设想出来了。但这封报告信能转到毛泽东手中吗？即使转到了，他又会按照这个设想办吗？

写完报告信，赵健民为了讽刺、挖苦康生，又写了一首诗《怒火鸣》。

一月廿一日，我作“有感”篇。
合理的要求，竟未得一言。
再告主案人，注意我意见。
监护审查我，已过四百天。
不谈又不处，不问又不断。
这是啥审查，水平低可怜。
不如县监委，不如县公安。
水平为何低，根源在错案。
今日为你计，要按正道办。
如认我有罪，请即摆当面。
我对你所摆，全面作答辩。
如有不同意，摆开彻底谈。
共同摆事实，共同把理辩。
不过三五日，可以结此案。
千万别再拖，再拖无可原。
你如强再拖，就是机会汉，
就是无理徒，不敢摆开谈，
就是渎职者，拖延害党员。
你如不回转，定要落深渊。
身在太阳下，有理许造反。
造反！为了捍卫《实践论》、
《矛盾论》的真理，坚决造

官僚主观主义者的反！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健民
1969年3月12日于北京监护所

赵健民这首诗，公开点明主案人康生搞了错案又不改正，拖延不审理；讽刺康生水平低得可怜，竟不如县级的监委、公安机关；强烈要求康生对自己的案子按正道办理；指出如果再一味地拖延，就是机会主义者，最后一定要落个坏下场。

为了气一气康生，赵健民还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进一步支援缅甸革命运动的建议》。赵健民要以《建议》书向康生表明：你虽然能把我关起来，但禁止不了我关心国际国内大事。

专案组人员将赵健民给毛泽东的信、《怒火鸣》以及《进一步支援缅甸革命运动的建议》收走。可是，二十天过去了，没有反响；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响。

反响终于来了。4月17日，监护所办公室的两个干部趾高气扬地来到了赵健民房间，当着赵健民的面，将赵健民给毛泽东的信等三份材料撕得粉碎。赵健民急切地说：“不要撕！要是错误的可留作罪证吗。”但他们根本不听，边撕边声明，是奉上级指示这样做的。最后，将碎片收起，扬长而去。显然，他们是在向赵健民展示专政的威力，展示康生的权威。

赵健民看着两个人一点一点地撕信和材料，一股热血直往脑门上冲，内心中愤怒地责问：

一个党员向党的中央主席反映情况，竟被撕毁，这视党章为何？视党纪又为何？

不过，赵健民透过他们把碎片收走这件事，也看到了专案组虚弱的一面。他决心再摸一把老虎的屁股。

4月21日，赵健民在院中拣了几个石灰块，回到室内，愤怒地

写下了《四一七有感》。

四一七有感

三月十二日，我写报告信。
时过一月多，今日撕碎片。
明目又张胆，使人发冲冠。
如此放肆为，法纪已荡然。
还有何话说，斗争去实践。
你是蒙山大，我是一鸡卵。
我要卵击石，击垮你蒙山。
相信真理胜，生死置等闲。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健民
1969年4月21日于北京监护所

赵健民写完后，立即告诉了看守人员。不一会儿，来人把《四一七有感》抄写走了。

时间又过了三个月。7月，专案组人员和从昆明来的人开始审问赵健民。但是，他们只是反复地问几次武斗的细节，简略地问历史问题，其他一概不问。赵健民一再要求将全部问题谈一谈，可专案组坚决不允许。赵健民十分清楚：他们手中没有材料，怎么摆开谈呢？！

不几天，审问终止。

8月份，随着热浪过去了。

9月份，又过去了。

10月份，伴着片片落叶消逝了。

11月份，也成为历史。

到了12月份，赵健民急了：关押审查几近二年，这样拖延不审理，太荒唐也太离奇。他决心直接挖苦康生。赵健民想，如果你康生有一点血性的话，就会指示专案组加速审理案件。当时，赵健民也想到，康生在4月份的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是大权在握，炙手可热，和他斗争，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再一想，康生对自己的诬陷，完全是有意识的，他决不会因为自己不斗争而善罢干休；必须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要写，没有了笔和纸，所幸赵健民从半壁店带来了半瓶墨水。他从纸篓上拆了一根竹棍，又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把布条缠在竹棍上，蘸着墨水在报纸上写起来。

感事报康老、谢副总理

诬被冤押近两年，调查研究几十遍①。
至今没有何结果，一拖再拖直拖延。
事实真相已暴露，我无罪行已明显。
康老应该说话了，不要一旁作无关。
有罪立即判我罪，无罪放我出牢监。
当初指罪何肯定，似有调查根据全。
而今这久无结果，出你意料不待言。
你应吸取此教训，忠于职守健老年！
我知我无任何罪，极盼专组摆开谈②。
曾提要求几十次，不敢摆谈为哪般？
专组定有个别人，主席指示不遵办。

① 意思是两年间调查研究可以进行几十遍，应该结案了。
② 专组系指专案组。

主席指示如遵办，问题真相数日见。
康老应开第一腔，系铃解铃你做全。
你应光明和磊落，实事求是结此案！
千万不要再拖延，再拖无理无脸谈。
过去拖延工作损，再拖工作损更严。
时间已拖二年久，我党哪有这拖案。
无有党性甚悲痛，我常泪洒牢房间。
时间任凭拖多久，历史事实不会变。
不同矛盾不同处，主席指示明高悬。
真假案犯混一起，同样相待理不端。
我请康老作明示，促使此案正确完。

党员赵健民

1969年12月12日

赵健民的这首诗够锋利的了。诗中直指康生，要求康生不要一拖再拖，应改正错误，表明态度，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结束这个案子；劝说康生忠于职守，才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暗喻他诬陷忠良，老而不得好死。

同时，赵健民又给专案组组长写了一封措词强烈、刺激的短信，目的是警告他，不要再撕毁上书。

这封短信名为《怒告违反毛泽东思想者》。信中说，“我请你准许我讲或者写，假如你再粗暴地不准我讲不准我写，并横蛮地拖延，那你就是一个无党性、丧良心、施阴谋、用拖延手段残害党员的反毛泽东思想者”；“你也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你真不知羞耻是何物”；“你不听良言所劝，你不会有好下场”！“对我这次的信你应答复，你若不答复就是不敢答复，那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你就再不要摆什么臭架子，装什么劣洋相了”。真是怒意充满了字里

行间。

12月14日上午，赵健民敲了敲门，门外看守人员从窥视孔中问：“做什么？”赵健民回答：“我有材料要上交。”不大一会儿，门开了，监护所办公室的人员和看守走了进来。一进门就问：“你有什么事？”“请你们把材料转交上去。”赵健民平静地说。“你怎么又乱写！”办公室人员显得十分不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怎么是乱写？”赵健民反问了一句。办公室人员无可奈何地拿着材料出了门。

这次反响是迅速的。不几天，专案组的人员来了。一进门就声色俱厉地说：“赵健民，你辱骂中央首长！”手中摇晃着那些材料。赵健民故作不懂地问：“我辱骂了哪位中央首长，请你们指出来。”这些人哪敢指名，只是指着材料说：“你在这里面提到了中央首长的名字，还提到了专案组。”赵健民接过他们的话说：“我不知道专案组是谁领导的。专案组拖了这么长时间不审理是没有道理的。”谈话在紧张的气氛中中断了。

12月30日下午，赵健民得到通知：整理一下东西，准备转移。稍许，进来了三名军人，其中一人问：“你是赵健民吗？”“是。”赵健民严肃地回答。“我宣布，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你。”怎么会惊动解放军呢？赵健民脑里闪出一个问号。他立即问：“我是第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你逮捕我，有开除党籍的决定吗？”这个人回答说：“我知道这个规定。我能逮捕您吗？”边说着边用手向天空指了指，暗示是上边的意思。赵健民明白了，说：“那好，执行吧。”立时，一副亮铮铮的手铐卡在了赵健民的手上，两名军人一左一右地架着就向外走。迈出屋门时，赵健民抬起头来环视了一下周围，只见整个天空阴沉沉的，他感到寒冷、沉闷、压抑。

赵健民被架上了车，看守人员把他随身使用的物品放在了车

后。汽车发动了。赵健民觉得车子从城里进入郊区。不久，视线被夜幕遮蔽，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车子发动机的声音。这时，赵健民反倒平静下来。遭受逮捕，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

车子终于停了。三名军人架着赵健民走进了一间屋。这几个人把一张折叠了几下的纸拿到赵健民面前，要他签字。赵健民一看，是一片空白纸，断然拒绝。其中一个人着急地问：“为什么不签字？”赵健民说：“你们玩什么把戏，地球打烂了也要我签字吗?!”三个人急忙商量了一下，又宣布一遍：“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你。”又把那张纸摊开放在赵健民面前。只见上面写着：

> 兹派张增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监护所逮捕赵健民

赵健民爽快地说：“你们是奉命行事，我签字。”接过笔来，写下了“赵健民”三个字。

这三名军人交了差，赵健民跟随着监狱看管人员出了屋，往前走。大约走了三四十米，来到了一幢大楼前。大铁门“哗”地打开了，进入到楼内的通道。走一会儿，通过一道铁门。又走一会儿，通过第二道门。再走一会儿，跨过第三道铁门，这时才看到囚室。

赵健民走进囚室，灯早已亮着。这间囚室，有 20 平方米左右。室中有一张床，床的底部是用水泥和砖砌成的，上部垫了一块薄木板。床上放着一个褥子一个被子，因有暖气，觉不出冷来。另外有一个卫生间，内有冲水马桶、洗脸盆、自来水管。室内空气比较新鲜。吃饭是一天三顿有人送。到时候，送饭人将两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从门下方的洞送进来。早饭是大米稀饭、咸菜、馒头，午饭

是馒头，炒菜，有时菜中还有肉，晚饭与午饭相差不多。在那个年代，应该说这个伙食标准还是不低的。中午这顿饭，赵健民能吃两个馒头。这里的监视相当严，不论是房间，还是卫生间，都设有窥视孔，一举一动都被监视。

赵健民初关进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只觉得警卫森严，管理正规。后来，他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得知，这就是著名的位于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赵健民日复一日地与寂寞为伴。他日思夜想，决心与康生斗争到底，坚信康生迟早要垮台，总有一天会与自己“交换场地”。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1970 年 1 月 19 日凌晨四点多钟，睡梦中的赵健民得到通知，立即整理好东西。不多久，送来了一碗热面条。赵健民边吃面条边寻思，大概又要转移地方了。吃完饭后，赵健民被反铐双手，架上汽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了。秦城监狱，十三道铁门，层层锁住，单身监禁，整整二十天！

汽车开进首都机场，停在一架伊尔 18 型飞机旁。赵健民立即意识到，这是回昆明。上了飞机，来到了飞机后面的特等舱，舱内有四五个人。不多时，飞机在轰鸣中开始升空，一会儿，就进入平稳的飞行。坐在飞机上的赵健民，感到分外难受，胳膊稍微一动，手铐就卡得手腕钻心般的痛。反铐双手，可以算得上是一种酷刑。赵健民对来接自己的云南省专案组组长赵维廉说：“请您们给我打开手铐。在地上您们怕我跑了，给戴反手铐，现在在飞机上我还能跑吗？”这位组长可能感到赵健民的要求太过分了，就不无讥讽地说：“对你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就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讲人道主义啊！”赵健民半似反驳半似教育地说。赵维廉厉声地吼道：“这是军管会的命令！”赵健民直视着他的脸面，沉默下来。飞机大约飞了一个小时左右，开始颠簸起来。赵健民望

着窗外,看着翻滚的云层,自言自语地说:"到秦岭上空了。""你说什么?"赵维廉立即追问。"我说飞到秦岭上空了。您们不是要把我押回昆明吗?""谁告诉你的?"赵维廉慌张地问。"我猜得出来。"赵健民微笑着回答。这四五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有吭声。

飞机开始降落了。赵维廉等人拿起赵健民的棕色围巾,缠在赵健民头上。怕不严实,又把棉大衣蒙在头上。赵健民说:"您们这是干什么?您们不是说我是走资派吗,走资派现在回来了,让群众看看,批判批判,有什么不好!""少费话!不许你乱说乱动。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是有病。"赵维廉威吓说。就这样,赵健民被架上汽车,离开了昆明机场。

第十二章

大迫害到来前的紧锣密鼓

康生说,赵健民"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谭甫仁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遭受诬陷,由赵健民进到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极"左"的估计:云南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康生要求云南:把里里外外搞清楚——林彪、黄永胜指示谭甫仁:到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划线站队"与"清理阶级队伍"的巧妙融合——大迫害锋芒所指:"炮派"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鲁瑞林在北京"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团中开创了大迫害的先例

监护审查赵健民,制造"滇西挺进纵队"假案,这两件事为全面迫害"炮派"观点的干部和群众打下了基础。

赵健民被关押后,虽然监护室内"风平浪静",但是室外的迫害却是风骤浪急。

1968年1月24日,在康生、谢富治关押赵健民的第三天,原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等六人，在黄兆其的怂恿下，将一份“赵健民材料”递送给中央文革小组。这份材料可称得上是一枚重磅炸弹。材料中称：赵健民是个叛变自首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打倒。

1968年2月13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开会人员时，康生煞有介事地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968年2月4日，中央为了解决云南问题，举办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学习班。学习班设在北京红山口的军队营房中，主持学习班的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谭甫仁。谭甫仁是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1968年5月19日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6月17日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进入5月以后，谭甫仁多次对黄兆其吹风，说“赵健民是个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5月19日，就在谭甫仁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的这一天，他在欢送学习班部分学员返回昆明时说：“你们在学习班始终掌握了斗争大方向，眼睛紧紧地盯着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陶铸、李井泉进行了大批判，对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进行了大批判，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回去后，你们要集中精力批判走资派贺龙、李井泉以及他们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把矛头对准他们，紧紧盯住他们不放，从组织上、政治上粉碎他们的阴谋，肃清他们的流毒。”

5月27日晚，学习班中“八派”和“炮派”的代表在西苑旅社签订大联合协议。签字时，在让不让张力雄签字的问题上，两派发生

了争执。事后，谭甫仁把黄兆其找去，边是安抚边是交底地说：“你放心，我谭甫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接着，又把“炮派”的负责人李毅叫去，当着黄兆其的面厉声斥责道：“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一百进不了省革委，你不要在那里搞。”6月26日，陈康、周兴奉命到学习班参加学习，他们各自去对立派的宿舍作检查，以缓解两派的矛盾。“八派”对陈康、张力雄开了两天的批斗会，又以“座谈”、“交谈”的名义，进行了十多次批判斗争，并要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陪斗，帮助陈康转变立场。这期间，谭甫仁在学习班讲话十多次，严厉批评陈康，表态支持周兴。谭甫仁未到任就明显地站到“八派”一方了。

有了支持，黄兆其更是肆无忌惮地诬陷赵健民。7月10日，黄兆其、刘殷农炮制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上送中央。这份报告中诬陷云南省轻工业厅厅长林亮等二十名省级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是“一小撮国民党残渣余孽”，要求中央进行追查。8月1日，“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联名向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递送了《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诬陷说：“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由以下四股反动势力组成，(一)叛徒：赵健民、林亮、郑刚、陈文其、张泽民、张子芳等；(二)特务及反、坏、右分子：林非、佟文祥、侯良辅、周超等；(三)阎红彦死党及走资派：刘明辉、高治国、赵增益、张曙光等；(四)历次政治运动下台干部：梁浩、南静之等，共计数十人。”

8月上旬，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夜，就要出任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公开诬陷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对赵健民的陷害在一步步升级，并且由对赵健民个人的陷害扩大到对云南一大批干部的陷害。下一步，就要扩大到对“炮派”

广大群众的陷害。

自上海“一月革命”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展开了夺权斗争。但是，夺权的进展并不顺利，许多地区争夺激烈，云南就是其中之一。1967年春，上海市和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这四省一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构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此后至1967年底，陆续又有北京市、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宣布：在新的一年中，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于是，各地加紧成立革命委员会。1月，江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2月，河北省、湖北省、广东省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3月，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刊登了毛泽东对革命委员会的赞扬。社论认为：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社论的发表，进一步树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威。进入1968年四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有：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徽省、陕西省、辽宁省、四川省。

中央于1968年2月在京举办的云南省学习班，最终目的是尽快建立新生政权——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这个有一千九百八十人参加的学习班上，主持学习班的谭甫仁和“八派”负责人黄兆其，千方百计制造两大舆论，一是云南阶级斗争复杂，敌人很多；二是在“文革”中，“八派”是正确的，“炮派”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引用几段反映谭甫仁观点的讲话。

“昆明形势现在是落后了，你们想一想这样下去行不行？昆明这个形势究竟谁高兴？我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高兴，走资派高兴，投敌变节分子高兴，除了这些人，还有谁高兴？”“地方两大派，军队两派，为什么分成两派？有鬼。我们军队是老红卫兵。你们说有没有坏人？有坏人。”(1968年2月4日在云南学习班开学时的讲话)

“你们云南是和平解放，面临着许多国外反动派，而且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你们云南过去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渣滓你们以为少吗？不少。”“你们一定要看到，有敌人，有坏人，有叛徒，有特务，有走资派，有反革命分子，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要破坏。”“人家北京已经清理阶级队伍了，我们还没有抓坏人。”(1968年6月5日在云南学习班上的讲话)

“云南是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不知道有多少，云南的地、富、反、坏、右没有改造好的多得很。”(1968年6月28日在云南学习班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讲，现在有些政治土匪，大联合以后要搞掉他。中央几个首长都讲了，阶级队伍一定要清理。”“要赶快清理阶级队伍，云南坏人不会少，现在都没有动。”(1968年8月6日在云南学习班上的讲话)

“‘炮派’在运动的中期、后期犯了许多错误，在云南搞武装夺权，煽动农民进城搞武斗，组织了‘滇西挺进纵队’，‘炮派’的领导权被叛徒赵健民操纵了。”“‘八派’自始至终坚持了斗争大方向，是真正的左派。”(在云南学习班上的多次讲话)

最能反映谭甫仁观点的，是云南学习班结束前一天的1968年8月8日他在学习班全体学员大会上的讲话。因为这个讲话重要，所以人们称之为“八八讲话”。“八八讲话”的核心内容是：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云南和全国一样，

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现在，全省范围内正在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流毒。总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

“云南今天以前的这个形势，的确搞得很复杂、很乱。当然，我们不怕乱。这种形势的造成，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挑起来的。云南的问题，我说乱得差不多了。有些人说，还要乱。我说，我们也不怕。如果这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在云南的那些走资派要乱，让他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怕不怕呢？不怕。因为有野战军在那个地方。

“一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另一条是违背主席的指示、违背中央的精神，在那里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这个问题，是在针锋相对地斗争的。按后一条做了的，方针就错了，一错百错。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错了，从上到下错了，这就把整个云南问题搞乱了。

“不要把坏人当做好人，也不要把好人当做坏人。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里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这里讲了几个人了，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谁是谁非，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谭甫仁的一系列讲话和“八八讲话”，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云南的阶级斗争复杂，阶级敌人很多，代表人物是阎红彦、赵健民；云南“文革”中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八派”是真正的左派，“炮派”的领导权被赵健民操纵了；要抓紧清理阶级队伍。这样，就把赵健民同“炮派”捆在一起，又把二者同阶级敌人联在一起，为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准备下了对象。

持续半年之久的云南学习班终于结出了果实。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以中发〔1968〕128号文件发出的《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毛泽东批示：照办。文件说：

> 中央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

中央这个安排，是力求平衡，军队中出的两名副主任是不同观点；两名干部代表观点也不同，周兴明确支持“八派”；四名群众组织的代表是两派平分秋色，各有两名。但这在组织上还是不平衡，因为第一把手谭甫仁、第二把手周兴均是支持“八派”的。这种似乎平衡的组织状况不久就被打破了。

>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胜利宣告了云南地区阶级敌人复辟活动和垂死挣扎的彻底破产。

中央高度地概括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伟大意义，然而，这是从错误的估计出发，经过错误的斗争，得出的错误结论。

中央希望，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做到：

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充分认识到云南地处祖国边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缅甸、印度和泰国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屏障，是援越抗美的前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国防。

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大造声势，坚决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迅速猛省过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中央指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做到的这第一至第四项工作，都是阶级斗争，而且措词强烈，什么"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确实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同时，指出云南阶级斗争的特点：极其尖锐复杂。这就为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确立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虽然也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敌人，但是，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是"左"的，清理中就不可能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然扩大化，也不可能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只会是狠，没有了稳和准。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的《批示》中，还要求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大力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

无疑，中央的这个批示，是新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纲领。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昆明正式成立。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当时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在第二十五位，为倒数第五位。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新政权，天真的人们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而富有政治经验的人们则预料到伴随而来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支持"八派"，反对"炮派"，谭甫仁在到云南之前就确定了这一方针。1968年5月，在有中央大员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碰头会上，康生等要求把云南的里里外外搞清楚。出席会议的谭甫仁立时心领神会。谭甫仁到云南赴任之前，亲自向林彪、总

参谋长黄永胜请求指示。林彪说："去（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黄永胜再三强调说："到云南要依靠一派，不依靠一派，连脚都站不住。""那些家伙搞邱会作同志，林副主席保了他，换了李作鹏同志到总后去搞'划线站队'，你看现在形势大好。"

"划线站队"，即"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这实在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高招。林彪接过毛泽东关于"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①的理论，提出了"划线站队"，从而坚持自奉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维护他们一派的私利。谭甫仁深刻领会了林彪、黄永胜的指示的实质，他要通过"划线站队"，支持他奉为正确的"八派"，打击他贬为错误的"炮派"，从而控制云南这块重要阵地。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社论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显然，"斗、批、改"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任务。"斗、批、改"的内容是什么呢？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一项主要内容。清理的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省革委"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云南全省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省革委主任将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结合在一起，以"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为纲"，以"大批判开路"，依靠一派，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炮派"群众进行大规模的迫害。

---

①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68年4月20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1968年8月21日，省革委主任主持召开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的决议。决议说，"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把云南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基地，干尽了反革命罪恶勾当"，号召"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隐蔽在各个角落里的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挖出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决议吹响了"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的号角！

1968年8月至12月间，谭甫仁、鲁瑞林、黄兆其等不遗余力地在全云南发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谭甫仁以党、政、军一把手的特殊身份，亲自到昆明、红河、大理地区以及昆明军区学习班等单位，进行"划线站队"的宣传、组织工作。他到处游说："'炮派'受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操纵，大方向错了"；"'炮派'把矛头指向部队，自毁长城，他们保也保错了，保了张力雄、朱家璧；打也打错了，打的是'鲁屠夫'，就是鲁副司令员"。"要坚决支持'八派'，对'八派'掌权的地区和单位，要坚决支持，对不是'八派'掌权的地区和单位，要为'八派'争权"。他并把自己的讲话印发各级组织，广造舆论。显而易见，谭甫仁要造成'八派'一派掌权的局面。12月19日，谭甫仁在下关地区三级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对敌人不能手软，要狠一点，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有一百，抓一百；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告诉你们，当群众起来后，也可能会搞一些好人，这没有关系，搞错了就改嘛，不要怕。"12月25日，他又在红河州说："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他抓敌人简直是

抓红了眼，竟不粗略地估计估计，全云南二千三百万人口，减去四分之一的少年和儿童，还有一千七百多万，难道这一千七百万人中能有一百万敌人吗?! 可他返回昆明后还得意洋洋地对黄兆其、刘殷农说："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谭甫仁还利用《云南日报》，掀起了一场诬陷赵健民和"炮派"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鼓吹"划线站队"的宣传高潮。9月2日、22日，11月18日、21日、30日，12月2日、14日、22日、25日，《云南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如《搞好斗批改，掀起革命生产高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敌人》、《彻底清算刘少奇的滔天罪行》、《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滔天罪行》、《打倒"二月逆流"急先锋赵健民》、《大叛徒赵健民是云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不准赵健民颠倒历史——彻底清算赵健民反军乱军的滔天罪行》、《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等。12月28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基础上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的社论。社论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省的革命大批判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向前发展着。许多单位在深入批判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及其在本单位代理人的同时，逐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深挖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阶级敌人，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好得很!"社论要求人们"要充分认识到，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严肃的、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向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发动进攻的一个重要战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号召人们"一定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发扬不怕疲劳、连续战斗的作风，坚决地、彻底地把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清出去"。社论批判了右倾思想："有的单位，存在着'求稳怕乱'的思想，清队工作迟迟展不开；有的单位，刚搞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差不多了'，而不去追挖追深，进一步刨根；有的单位，对于已经挖出来的敌人，也不去狠揭、狠批、狠斗，满足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从组织上打倒了事；还有的单位，对敌情估计不足，出了一点偏差，就大惊小怪，怕犯错误，就不敢再搞了，在对敌斗争上表现了心善手软，等等。"社论还要求"一定要狠抓防右反右"，"以反右为中心内容，摆敌情，谈思想，讲政策，充分认识敌情的严重性，树立彻底革命的思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不断反右的声浪中，将本来就是"左"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步步推向了极左的高峰。

谭甫仁一面宣传、组织清理阶级队伍，一面授意成立省革委"动态组"和"研究组"，收集、散发"炮派"的"罪行"材料。"动态组"的任务是：(一)通过各种渠道，掌握"炮派"进省革委班子的人员的动态，重点了解他们是如何分裂、反对省革委的；(二)准备材料，包括云南"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材料，为省革委即将召开的第七次全会，为分清云南的"大是大非"，为彻底揭发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反党集团作准备；(三)了解各大系统"炮派"头头的动向，包括对谭甫仁的"攻击"。"研究组"是原"八派"指挥部的研究组搬过来的，其任务是"整理昆明地区大型武斗事件材料"，并制造武斗的挑起者是"炮派"的"事实"。到1968年底，"研究组"整理、铅印了十多期"云南是非的大批判材料"，共约三四十万字。这些材料发至省里各大系统，供"划线站队"中用。

在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初，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先行一步，在全省起了示范作用。

196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会议历时五个多月，主要解决这两个系统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云南省有十四个厂矿企业参加，各单位的军代表、领导干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共三百三十人组成了代表团，鲁瑞林任团长。整个会议中，这位团长违背中央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

会议中，这位团长大讲"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在云南的表现。他一再讲"'炮派'后期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后台、黑手就是赵健民、陈康"；"'炮派'这个组织进了不少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时要一个不留地挖出来"；"'二月逆流'在云南的表现，就是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之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是一批特务，本来就是坏人。他们的基础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大肆制造舆论的同时，这位团长开展了"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亲自组织专案人员，给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扣上了"三反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大叛徒"、"反军乱军分子"、"反革命黑干将"的罪名，随意批斗。他限制人身自由，规定这些人不准外出，不准通电话，不准会客，不准给亲友写信，每天必须写检查、请罪、接受批斗。他组织进行残酷的武斗，使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跑，有的被逼疯逼病住进医院，还有的被逼身亡。这位团长亲自审定、签发的1968年11月1日第67期会议简报，诬陷二九八厂厂长阎书田"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推行反革命建厂路线，包庇重用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技术权威三十多人，忠实执行赵健民'反革命'计划，攻击解放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赤膊上阵参加武斗"。阎书田遭诬陷后，受到残酷批斗，后被押送回原单位，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被诬陷为武装队队长。在反复批斗的折磨

中，沐家云实在忍受不下去，在前门饭店跳楼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划线站队"运动中首批身亡者之一。沐家云死后，这位团长在大会上谎称："我请示了中央，沐家云有问题不交待，在毛主席身边对抗中央，跳楼自杀，他的火化费由他家负责，骨灰不准带回去。"这位团长还诬陷会泽铅锌矿党委书记杨耀东是"滇东北游击军"副司令，昆明冶炼厂厂长、全国劳动模范董福生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滇西挺进纵队"后勤部长。这二人遭受了非人的批斗和毒打，肋骨都断裂了。昆明钢铁公司党委书记朱奎等二十多人在会议中遭批斗后，又被五花大绑押回云南原单位继续批斗。押解途中，朱奎双手卡着手铐，到了昆明，全身浮肿。就这样，被投入监狱。二九八厂汽车驾驶员、"炮派"负责人、厂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委员刘家邦，被押回原单位后，遭枪杀。二九八厂党委书记肖子明等六人，被押回原单位后，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被打致残。

这位团长的行为不可能不遇到抵制，于是，他就搬"绊脚石"。云南省《冶金报》记者王原衡、东川矿务局干部谭伯信在前门饭店与出席会议的云南代表见了个面，就被这位团长说成是"场外指导"，当做"反革命分子"抓去而遭到严刑拷打，最后被武装押回原单位批斗。王原衡被迫害致死，而谭伯信则被打成重伤。参加会议的高堂文，是三五六厂工人、"炮派"负责人、革委会副主任，这位团长向省革委汇报说，高堂文"开黑会统一口径，压制揭发，是会议的'绊脚石'"，高堂文是"忠实执行赵健民反革命计划的黑爪牙，是一个罪证确凿的坏头头"，省革委即撤销了高堂文的职务。在会议期间的批斗会上，高堂文的下巴都被打掉了。后被押回原单位，在一次批斗中，被铁丝活活勒死。

在八一五会议期间，这位团长还制造了"会泽炸毁公路反革命事件"假案。后来，会泽铅锌矿在"划线站队"中，为追究事件的制造者，批斗、打伤打残一百多名干部和群众，矿政治部副主任李忠

考被活活打死。冶金系统的代表，会议中有三十五人遭到批斗，返回原单位后又有六十人被批斗、毒打，其中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

这位团长在“八一五”会议中进行的“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为迫害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炮派”群众，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第十三章

大迫害

云南省革委第七次全会，掀起了大迫害的狂潮——追查子虚乌有的“滇西挺进纵队”分子——“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假案——“文山州‘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政治冤案——“‘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反革命组织”政治冤案——“‘摧资兵团’反动组织”政治冤案——迫害重要干部的“云南省省级机关学习班”——迫害公、检、法干部的“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玉溪地区的“划线站队”——昆明市、保山和德宏地区、红河州、云南大学、昆明铁路局的“划线站队”——巧家县的“划线站队”——江川县“农革军”假案——新平县“特务组”假案——“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冤案

1968年12月31日晚，昆明军区大院谭甫仁的住所内，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和几位副主任们，正聚精会神地收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1969年元旦社论。社

论的标题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篇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收听完社论，他们立即决定，召开省革委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最高指示，划清云南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第二天，1969 年 1 月 1 日，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幕了。省革委主任自始至终坐镇指挥。第一副主任积极协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谭政委导演，我来执行"。会议从学习元旦社论开始，中心内容是划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会议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和"滇东北游击军"、"摧资兵团"、"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等云南"文革"重大事件的所谓材料，一件一件地进行揭发、批判。按照省革委主任的指示，开会的方法实行三结合，即会内与会外相结合，与会人员白天开会，晚上回原单位传达，联系单位实际开展斗争；揭发与批判相结合，揭批的重点是省革委副主任陈康如何插手"炮派"、指挥"炮派"，陈康与赵健民如何勾结起来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追查与深挖相结合，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组织力量进行追查，通过追查，把埋藏很深的敌人挖出来，把"炮派"的潜伏计划、抢枪计划挖出来。

会议自始至终把矛头对准了"炮派"群众组织，对准了不同观点的干部，包括省革委和昆明、云南省两级军区的负责人。第一副主任在会上公开宣布："'炮派'的指挥部、后勤部、宣传部、干部部等八大部门，是八大反动组织，要一一清查。"省革委主任、第一副主任多次讲话，引导、组织揭发陈康、赵健民，批判、斗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错队"的干部。

会议期间，心中早已有了底的黄兆其、刘殷农，首先将"站错队"的人拉出来游街示众。先例一开，昆明市很快就游街成风，形成了一派群众对另一派群众的专政。面对着这种局面，1 月 7 日，

省革委主任说："不要游街。"但时隔三天后的 1 月 10 日又说，"群众进行游街这个事，一天比一天多了，昨天是最高峰。对于群众这样的革命行动是压不住的"；游街这个事，"搞一下可以，群众有气嘛！但不能天天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这位云南省第一把手，这样指导运动，这样支持一派群众对另一派群众实行专政，真是云南人民的悲哀。

1 月 15 日，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会议的最后一天，北京"八一五"会议一结束就乘飞机赶回昆明的鲁瑞林，到会详细介绍了他搞"划线站队"的经验。这真是雪上加霜。第一副主任也讲了话，他说："云南为什么起起伏伏？两年来的反复就是阎红彦、赵红彦（指赵健民）、黑红彦（指陈康）这类人在里边作怪。""第一个时期，阎红彦搞'和平演变'；第二个时期，赵红彦搞武装夺权；第三个时期，黑红彦搞地下活动。在革委会成立以后，搞非法活动，是黑司令部。"

省革委主任对会议作了权威性的总结。"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赵健民、张力雄、林亮、侯良辅等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是伸进'炮派'这一群众组织里面的黑手，并一度控制了'炮派'的领导权，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他们"制造分裂，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广大的革命群众，实际上就是执行了国民党的特务计划"。"由于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操纵、利用，使'炮派'这个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后期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在省革委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谭甫仁等批判"黑红彦"陈康，使陈康在中共九大代表预选中落选。1 月 12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云南省革委会电，指出"云南省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党员干部和

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在中央的干预下，陈康最终当选为九大代表。

省革委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制造了数起全省性的冤案假案，将"炮派"群众组织推向了对立面。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云南大地掀起了"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残酷迫害持不同观点干部和群众的黑色浪潮。

云南的历史，中国的"文革"史，中国现代史，沉重地记录下这一幕幕悲剧。

"划线站队"的高潮，是从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分子和"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为开端的。

追查子虚乌有的"滇西挺进纵队"分子　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后，云南全省上上下下、军内军外，大查大揪"滇挺"分子。某部为了宣传"滇挺"的"罪行"，将制造的假案变成真的，举办了所谓"'滇挺'罪行展览"。这个展览，使用的图片都是假的，解说词中充斥着谣言。在介绍"滇挺"分子"罪行"时，说道："在大黑手赵健民之流一手操纵和指挥下，'滇西挺进纵队'攻占了下关，只杀得清白的苍山被鲜血浸透，碧绿的洱海被鲜血染红。寿康坡① 成了死人坡，西洱海成了血水河。""居住在这里的广大群众，也被逼得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有的被撵上海拔四千多米、白雪皑皑的苍山，有的被赶下茫茫三百多里、波浪滔滔的洱海，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数万下关人民处于灾难之中。"这样一个假展览，竟在全云南省的十三个专区、州、市，六十个县、区，三个农场，一个林业局中巡回展出，甚至送到了首都北京展出。

下关市、大理州，是云南省开展"划线站队"运动的重灾区。仅

① 应为豆糠坡。

下关市，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在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被非法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

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大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遭受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被诬陷为给"滇挺"出谋划策、对"滇挺"遥控的指挥者，而陈康是总司令。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熊奎成为坐镇昆明的司令，某军第四十二师副师长张廷治、大理军分区司令员支永胜成为下关的总指挥，大理地委副书记吉其祥成为国民党复仇军主帅，大理州副州长、老红军干部张茂林成为国民党复仇军副帅。

追查"滇挺"分子，迫害面波及到云南省直各机关和十三个专区、州、市，五十七个县、区，而遭受迫害尤甚的是工八团人员——这些所谓"滇挺"的中坚分子。他们有的被押送回原籍以后，"罪行材料"也随之转到当地，这样，他本人和家属继续遭受迫害。其中，有的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因背着"反革命"的罪名找不到对象，有的为逃避迫害长期流落他乡，有的被长期关押。与此案无关、在云南已工作一年多的工八团人员，也被强行辞退。这些应征支援边疆建设的优秀青年，在"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中，蒙受不白之冤长达十年之久。

"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假案　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曲靖、昭通、东川地区和昆明市北郊的二十多个县、市，在"文革"中群众组织也分裂为"八派"和"炮派"，而且双方矛盾尖锐，发生了多起武斗事件。

1968年4月，在剿灭"滇西挺进纵队"的鼓舞下，曲靖地区"八派"组织中有的人向中央报告："滇东北有个反革命组织在活动。"中央立即责成云南省军管会追查，省军管会又通知曲靖军分区追查。军分区支左办公室组成了由"八派"、"炮派"两派群众组织代

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前往罗平、师宗等县调查。但是，查来查去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组织。

但是，某些人并不死心，更是变本加厉地制造舆论。1968年6月7日，曲靖地区《东方欲晓战报》第37期转载了云南《八二三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消息。消息的标题是《“滇挺”孪生兄弟在行动》，内中称：

“炮派‘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和‘滇挺’是孪生兄弟，是陈康、张力雄、赵健民‘反革命叛徒集团’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三支别动队，于今年初同时行动，魔爪伸向了滇西、滇南、滇东北。”

1968年7月23日和8月25日，曲靖地区的“八派”群众组织，连续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和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报告：

“林山（原曲靖地委书记）、唐荣生、乔文锦（原曲靖军分区正、副政治委员）之流，在赵（健民）张（力雄）的支持下，疯狂地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计划’，策划组织了‘滇东北挺进纵队’。中央着手解决云南问题后，又组织了‘滇东北游击军’的反革命组织。”

经过广造舆论，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无论是在群众中还是在领导中，都在心中或深或浅地打上了烙印。1968年8月，省革委会成立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就根据捏造的材料，认定有个“滇东北游击军”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就在“炮派”组织中。

1968年11月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著名的《保卫长城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公开点了“东游”、“西挺”问题。这就向人们表明了云南省最高权力机关的态度。接着，报纸连篇登载了黄兆其、刘殷农和署名卫东兵、忠东的文章，反复造谣说“‘东游’、‘西

挺’是反革命武装夺权的步骤”。这时，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号召曲靖军分区指战员“彻底揭露和清查‘东游’问题”。12月25日，曲靖地区革委会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整个大会，无论是简报，还是个人发言，都在大造“滇东北游击军”的舆论。在大会决议中，公然称：“赵健民之流，在曲靖地区，忠实地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亲自组织了‘滇东北游击军’，南窜北游。”

1969年1月，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在省革委第七次全委扩大会上作了决定性的讲话：

“前一个时期是阎红彦搞和平演变，后一个时期是赵红彦（指赵健民）、黑红彦（指陈康）武装夺权，什么‘东游’、‘西挺’，他们规模很大，有规划，有纲领。”

这样，在“划线站队”中，就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在以曲靖为主的昭通、东川、昆明北郊等滇东北地区制造出一个假反革命组织“滇东北游击军”。

“滇东北游击军”制造出来后，就把一盆盆的脏水都泼在它身上。滇东北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都是“东游政治土匪”的罪行；“炮派”群众组织的活动，都是反革命活动；要支出的工资、未入库的税收款、生产资金，都是“东游”的活动经费；生产指挥部从广西购进的汽油，是“东游”的储备；一百零七万斤库存粮票是“东游”从粮食局抢来的；……“炮派”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已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了。

1969年上半年，在滇东北的二十多个县、市、区和一些省属单位，开展起以清查“东游”为主体的“划线站队”运动，称“东游”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土匪”。清查的范围，从省、地、县、公社、生产大队直至生产队。这时，有人把盘溪“划线站队”学习班中大搞刑讯逼供得来的材料，加工整理，上挂下联，炮制出“东游”问题调查材料第一至五集，上报下发，又有人编造了“东游”

高参联络图表一、二，这进一步把“东游”组织系统化、具体化。

在曲靖地区革委会召开的第三次全会上，自始至终是以追查“‘东游’反革命组织”为中心内容，并且采取严刑逼供与利诱相结合的方法。在这场血与泪的活剧中，最为“精彩”的要数诱供了。这天，“炮派”张某某等人被强迫交待“东游”的方针。张某某实在不知道这个方针。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方针。审问者就使用逼供的材料诱导说：“我提个醒吧！张力雄的十六字方针是‘重点保护，统一指挥，分片联防，机动支援’。你们按这个方针在曲靖地区是怎么办的？”就这样，编造出了所谓十六字方针：联合马龙，吃掉沾益，观望陆良，加强宣威。也就这样，在软硬两手交替使用下，有人反戈一击，和盘托出了“东游”的基本策略：

战略方法——突（突然袭击），快（快速进攻），猛（行动猛烈），短（时间短促）。

目标——拔掉沾益，打退宣威，稳定曲靖，连接以礼河，控制滇黔路，扼守嵩明。

方针——全面包围，突破一点，重点解决，力求全歼。

思想——统一指挥，分片联防，重点巩固，机动支援，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目的。

部署——稳住曲靖，打逼东川，拿下昭通，接应四川，消灭八匪，保卫滇东北。

1969年2月12日，实为“划线站队”运动前的热身活动的曲靖地区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了。会后，在全区迅速掀起了以追查“东游”为中心的“划线站队”的高潮。曲靖地革委效法“‘滇挺’罪行展览”，举办了“‘东游’罪行展览”。展览中，他们把军分区的枪支弹药、作战地图，当做“东游”的作战用品；把财贸部门的粮食、副食品、医药等作为“东游”抢劫的物资；将刚从银行提取的34万元现金作为“东游”的活动经费；强迫干部群众装扮成“东游土匪”，作持枪打枪、抢劫商店动作，拍成照片布展。在全曲靖地区的十三个县中，有十二个县又效法地革委，举办了所谓“‘东游’罪行展览”。

曲靖地区不仅举办“‘东游’罪行展览”，而且把所谓“罪行”编成了剧本进行演出。更有甚者，还把所谓“罪行”编入了小学教科书。他们要在孩子纯洁的心灵上烙上深深的印记，要把自己制造的假案当做真的留传在历史上。

曲靖地区在追查“东游”时，使用的刑罚五花八门，诸如：十指点灯，压杠子，老虎拔桩，多种样式的吊刑，形形色色的捆绑，花样翻新的毒打，统计起来有上百种。他们在折磨人们的躯体时，还挖空心思摧残人们的精神。比如强迫一批共产党员戴上国民党的帽徽、领章，扛着国民党的旗子，游街示众。一些青年时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怎能忍受这种污辱！死也不从，义愤填膺地说：“老子干革命的时候，都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低过头，今天让打国民党的旗游街，办不到！”

在被游街示众的人群中，有一个身影很惹人注目。只见他扛着印尼国旗，脚步蹒跚地行走在队伍中，坚毅的脸庞上两道浓眉紧锁着。他就是嵩明县医院医生、归国华侨、被诬为“东游”医务人员的赖洪辉。游街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一坐下来就再也忍不住地失声痛哭起来：“为什么回到祖国还有这样的事？！……”他怎么也想不通。是啊，身居国外就有着一身傲骨的赖洪辉医生，因为升五星红旗而不升印尼国旗，而被赶回祖国。如今在至亲至爱的祖国，又重演那一幕，怎能不让赖洪辉医生痛心疾首呢！

曲靖地区在追查“东游”中，除将陈康、张力雄、赵健民、丁荣昌、朱家璧诬陷为“黑后台”外，还将原地委七个常委中的六个诬陷为“幕后总指挥”、“黑高参”，将二十个部、委、办一级干部中的十四个诬陷为“骨干”，将三百三十七个地委机关干部中的三百个诬陷为“东游政治土匪”，将六个军分区领导干部中的四个诬陷为“幕后

指挥”，将全地区十三个县的三十九个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中的二十二个诬陷为“东游骨干分子”。一个曲靖汽车总站，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到站长、副站长，以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都被诬陷为“东游政治土匪”。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被审查的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文山州‘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政治冤案　1967年8月，在“文革”高潮中，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组成了一个名为“农民革命军”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比较庞大，约有十六七万人。

1968年3月15日，在文山州“支左”的负责人向中央报告，“农民革命军”是“官办组织”、“军事化组织”、“武斗主力”。“划线站队”开始后，州革委会主任公然把“农民革命军”宣布为“坏组织”、“反动组织”，诬陷“农民革命军”的头头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诬陷军分区、人民武装部、公检法机关为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黑部队”、“黑窝”，把全州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划为“站错队”。

1969年1月，滇南“支左”负责人到文山州的八个县作了九场报告，动员“划线站队”。他在群众大会上大讲要划清云南的红线、黑线。他说，“农革军”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力军”，是“受坏人操纵的坏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头头要“投案自首”。他宣布：“凡是军分区、军管会，人民武装部批准建立的革委会，都是赵健民在文山地区的代理机构，推行了武装夺权的一部分，要一律推倒重新建立。”他反复强调，文山地区的斗争实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他说，文山把崔正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度人（军分

区政治委员）揪出来，“红线、黑线就清了”。

他走到哪里，就煽动到哪里。1969年1月12日，在文山万人大会上，他号召：“今天会后要行动起来。群众注意，革委会注意，戴高帽子，‘坐喷气式’①，可以。打，可以。但不要把他们打死。”他颇为得意地说：“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纵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鲁瑞林）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

这个讲话之后，本已凶残的批斗风更为肆虐了。

1969年3月，州革委会主办了《文山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把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崔正三、张度人等的照片列为上下联系的黑线人物。同时，派出大批“工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群众专政小组”到工矿企业和农村“捅马蜂窝”。于是，从机关到基层，从城镇到乡村，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遭受着摧残、迫害。文山州辖八个县，从县委书记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全被打倒的有两个县，被打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六个县。共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九期。在“学习班”，私设公堂、监狱，审讯、关押干部、群众。其间，刑罚种类繁多。

“划线站队”，清查所谓“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使文山人民蒙受一场劫难。据统计，有六万二千五百六十八人被捆绑毒打，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受伤致残，五百三十四人被打死逼死。前后有一万九千多人被立案审查，七千六百六十四人被定为“九种人”，五千二

---

① 坐喷气式，即由两个强壮有力的人站在被批斗人的两旁，用手按住被批斗人的头和脖子，同时各向后使劲拉被斗人的双臂，再向高举，扭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种姿式，使人十分难以忍受。这是“文革”中批斗人时，采用的一种法西斯式的体罚形式。

百五十二人被判刑。其中，死刑二百六十八人(实际杀掉六人)，死缓刑一百二十四人，无期徒刑一百八十八人，有期徒刑一千六百人，监外执行三千零七十二人。

“‘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反革命组织”政治冤案　1967年初，云南省一部分中上层干部为了响应中央“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揭发省委执行“资反路线”等问题，经协商于1月5日成立了“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简称“干联站”。“干联站”成立初期，只吸收十三级以上干部参加，后来一般干部也参加进来，共有一百零七人，其中厅、局长以上的干部二十九人，科、处级干部六十五人，一般干部十三人，基本上是共产党员。

“干联站”成立不久，夺权风暴就席卷神州。在云南的夺权风暴中，“干联站”遭到黄兆其、刘殷农等的猛烈攻击。他们诬蔑“干联站”是一派的参谋部，“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破坏联合”，“为四清下台干部翻案”，“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不久后的3月10日，“干联站”响应中央关于各地群众组织归口大联合的号召，宣布解散。“干联站”前后存在六十五天。后来，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原来参加“干联站”的成员，又参加到新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中去。

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主要负责人等出于某种需要，把“摧资兵团”和各地另行成立的“干部联络站”与原来的“干联站”联系起来，说成是“‘干联站’的变种”。1968年12月2日，《云南日报》发表了署名原省委机关斗批改办公室卫东兵的文章《大叛徒赵健民是云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文章诬陷说：“那些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特务分子、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反动军官，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历次政治运动的下台干部和早已被革命人民揪出来的坏人，一个个从阴暗的角落里跳了出来，麇集在大叛徒赵健民的周围，把全部赌注押在赵健民的身上，组织所谓‘某某某干部联络站’，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从而，将“干联站”打成“反革命”组织。在“划线站队”高潮中，继续把这些群众组织诬陷为反革命，并对其中成员实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有的被刑讯逼供，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

“‘摧资兵团’反动组织”政治冤案　1967年8月，云南省一部分干部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人们称之为“摧资兵团”。参加这个组织的大多是省、市两级部分中上层干部和一些厂矿、学校、企业单位的支部书记、厂长、经理及地、州、市、县一些观点相同的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组织，当时在昆明有四千多人，后来发展为全省性的群众组织，约有万人以上。在1967年云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分别支持两大派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组织是支持“炮派”的干部中的群众性组织。

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主要负责人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于不同的场合，多次诽谤“摧资兵团”“反正不是好组织”。1968年11月21日，黄兆其、张浩雷、刘镜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正标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副标题为《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滔天罪行》的文章，诬陷说，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赵健民之流打着‘保护老干部’的幌子”，“拼凑摧资兵团”，“实际上，‘摧资兵团’是赵健民之流和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其四清下台干部的防空洞”。这样，将“摧资兵团”打成“反动”组织，公开地将炮口对准它。

“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摧资兵团”也同样遭受了厄运。“摧资兵团”的负责人被关押审查、刑讯逼供。广大成员也惨遭迫害。甚至于在日后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摧资兵团”也

被列为重点“清挖”对象。致使大批人员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

迫害重要干部的“云南省省级机关学习班” 在“划线站队”的急风暴雨来临之际，1968年11月24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根据省革委决定，开办省级机关学习班。学习班设在昆明北郊下马村一带，所以人们又称下马村学习班。举办这个学习班的目的，正像当时省革委政工组负责人所说的：“学习班是揭开全省阶级斗争盖子的集中地，任务就是搞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具体讲，就是要揭开盖子，揪出坏人，解放好人。学习班重点要放在领导干部身上，至少要把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斗倒一批，解放一批。云南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队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的。‘尖子货’都在这里，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要把它的来龙去脉的‘真相’搞清楚，划大线，找后台，把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为揭开全省阶级斗争盖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有两条线，一条是赵（赵健民）、林（林亮）、侯（侯良辅），另一条是有一个国民党地下组织。赵健民之流是如何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学习班要在现有基础上，抓死这个问题，拿出材料来。要在清队中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清理阶级队伍就不彻底，就不算搞清楚。”实际上，这个学习班是推行“划线站队”的“实验田”，是开展“划线站队”的“典型”。

1968年12月12日，学习班正式开学。这个以“重点放在领导干部身上”为宗旨的学习班，共有学员七百三十九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一百六十九人，处级干部二百五十三人，一般干部三百一十七人。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郭超、薛韬、吴作民，原副省长刘披云，原省革委常委、委员张恩璞、张兴华、李文进、刘鑫、吴生敏、鲁大洲、何正廷都在这里。很明显，这里集中了云南省的首脑人物。

学习班共有管理人员五百二十四人，其中，工宣队五百零二人，军代表二十二人。学习班的领导机构是领导小组，领导成员全部由“政治上过得硬”的人们担任。学习班下设办公室。学员按系统和单位共编为四个大队，十个连队，二十六个排，六十八个班。

1969年元旦，与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同时，学习班的“划线站队”运动开始了。运动之初，学习班领导小组就制定了一个标准：凡是支持谭甫仁、周兴的人，一律为“站合队”；凡是支持赵健民的，则为“站错队”。“站错队”者即为清理打击的对象。为了很快地把运动推向高潮，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经过精心策划，提出了以“八条线”、“十个点”作为穷追深挖的线索。“八条线”，即：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赵（健民）、林（亮）、侯（良辅）为代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郑伯克为代表的混进云南地下党的坏人；以朱家璧为代表的“边纵”里的坏人；以沈醉为代表的留下的国民党特务；以卢汉为代表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以梁浩为代表的大搞翻案活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下台干部；以王力为代表的苏修特务；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特务。“十个点”，即：“炮派”指挥机构和专案组；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反革命集团参谋班子和“夫人集团”①；“摧资兵团”和“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翠湖宾馆学习班；“大批判联络组”；专（区）县干部联络站；地下党专案；地下公检法；参事室；外事处、侨务处、交际处。

从1969年元旦至2月底，是学习班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搞清所谓“赵健民反革命武装夺权的真相、内幕、实质及策

① “夫人集团”，是云南省革委会专案组编造的“赵健民反革命集团地下王国组织系统”的组织之一。内分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地方走资派三个“夫人集团”。赵健民的夫人杨瑞波是地方走资派“夫人集团”之首。

划和组织指挥"等问题。"划线站队"之初，为了震慑不同观点的干部，学习班连续召开了几次武装批斗大会。每次都是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把"重点对象"押人会场，再进行轮番的批斗。人事局干部宋明生被怀疑是"特务"。一天夜里，学习班一伙人闯进宋明生房间，用绳子将宋捆住，然后用脚将宋踩在地上，进行审讯。审讯不得结果，又将宋拖入一片竹林中吊打，硬逼他交待"特务罪行"。

从3月1日起，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学习班按照"划大线、找后台"的原则，清理所谓赵健民之流反军乱军夺权的罪行。为了把斗争的气氛搞得浓浓的，学习班领导小组不断地反"右倾"，造声势。他们强调，要充分应用"四大"的形式，大会造声势，中会揭批，小会深挖，同时发动群众揭发，进行专案追查。他们还提出要始终突出一个"斗"字，一些人公然提出了一个"文＋武＝材料"的公式。

6月底7月初，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开始了深挖"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黑班底及其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的地下司令部"的第三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学习班留下了深挖对象七十一人，一般审查对象十人，其他的人都送到各个干校继续审查。

在"深挖"中，学习班领导小组认为，学习班这种形式很不适应斗争需要，提出"对外是学习班，对内是省革委的大专案组"，"指导思想应从办专案出发，因此，应从人头入手"。显然，把学习班改变为专案组，其目的是为了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击迫害干部。从10月开始，转入了对原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以上干部的专案审查。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集中营。

专案审查对象共有六十五人，还有二人作为审干对象。这六十七人中，有前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五人，部、厅(局)长四十一人。

专案审查开始不久，省革委政工组负责人即指示学习班："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云南特务组在哪里，要尽快拿出

材料来"。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挖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啊！为了炮制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学习班领导小组提出"搞专案决不能有右倾，否则非打败仗"，"具体办法，主要是靠斗争"。也就是要靠逼供信。

新的一轮迫害开始了。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孙雨亭，省委边委副书记王连芳，省轻工厅厅长林亮，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委监委专职常委贾敦芳，省委副秘书长王甸，省手管局局长孙振华，省卫生厅厅长曾育生，省文联副主席陆万美，省侨务处副处长黄可，副省长刘披云，省交通厅副厅长冯仪，省委宣传部副处长欧阳平关，云南中苏友协秘书长马仲民，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侯方岳，省农业厅厅长张振军，省重工厅副厅长张兴华等，这些人被完全剥夺了自由。不仅于此，审讯他们时，使用过的刑罚就达四十七种之多，单是跪这一种，就有跪碎玻璃、跪碎石子、跪铝开水壶、跪茶杯、跪凳子脚、跪方木等。

这里，有一份当时学习班的对敌斗争体会。透过这篇体会，人们可以看到迫害者是多么残酷，又是多么无耻。原文大致如下：对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某副秘书长，始终突出了一个斗字。当发现他坐卧不安，饭量减少，抽烟突增，半夜惊叫等异常现象时，就抓准时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指定他学习毛主席《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文章。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经过反复斗争，终于迫使其交待了三次叛变革命，积极为敌人效劳，发展特务组织等罪行，并揭发检举了特务分子和反动骨干一百三十六人。专案人员自以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里，也有一份被迫害者张振军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份揭发材料。他说："在学习班，他们把我当敌人一样整。有一次，我被他们轮番批斗了六天六夜，直到我实在不行了才算了。对我使用

的一种刑罚是跪凳子,同时在脖子上挂一桶水。一跪几小时,膝盖跪出血来,裤子上沾满了血,脱都脱不下来。还有一种是跪砖头,最多跪到五块,每次都跪得皮破流血。"

任澄寰,作为"专案审查对象",一直被逼交待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交待不出来,就被踢打。这些专案人员专门踢他的脊椎骨。在长期的折磨下,任澄寰的第五、六节脊椎间变窄,从而严重压迫了大脑神经和臂神经,造成经常性头晕,左臂神经炎和胃出血,左腿和右手不自主性的震颤。

侯良辅,这个重点人物,在学习班期间被监护审查。他说:监护所是最黑暗的地方,不准吃饱饭,不准挂蚊帐,不准晒太阳,不准洗澡,不准系裤带,不准睡觉时面朝里背朝外,不准抬头看外边,不准抓痒。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死死盯着,稍一动就遭训斥、罚站。1974 年 3 月 15 日,学习班专案组以捏造的事实,给侯良辅定下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并提议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判刑 20 年。侯良辅在后来长期的关押中,遭受了种种非人待遇,造成耳聋,心衰,睾丸萎缩,生殖器变形,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学习班还制造了"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冤案。

昆明市东郊,有一个大型粮库,储存着全市人民群众的用粮,这就是市粮食局第一直属库。1967 年 2 月,省、市军管会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对第一直属库实行了军管。当时,在全市群众组织分裂成两大派的情况下,这里基本上是"炮派"控制局面。后来,经"八派"策反,有部分人脱离"炮派",酝酿成立"八派"的下属组织。在黄兆其、刘殷农的策划下,定于 1967 年 11 月 22 日在第一直属库的院内召开成立大会。为了壮大声势,组织了外单位的"八派"前去祝贺。为了防止"炮派"冲击会场,做好了"武卫"的准备。11 月 22 日中午时分,黄兆其等带领一千多人的武斗队和"八派"群众,不顾军代表、守库部队的劝说、阻拦,强行冲人库内。他们一边

举行成立大会,一边在库内抓捉、殴打"炮派"群众,一派杀气腾腾。五十五岁的老工人侯安万被梭标活活地戳死。在这次成立大会召开前后,库内职工惶惶不安,纷纷离库躲避,仓库被迫关门停工。这就是"一一·二二"事件。

粮库被迫关门后的 11 月 24 日,早已被夺了权、靠边站的原省粮食厅厅长王玉如、副厅长胡毅,在强烈的责任心的驱使下,主动出来做工作,劝说职工返回粮库工作。第二天,当部分职工回库上班时,中途遭"八派"拦截,有三人被抓。开仓供粮的努力,被破坏了。27 日,昆明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仓库做工作,同时采取了保障库内职工人身安全、保护粮食安全的措施。这样,第一直属库才恢复了正常工作。

但是,学习班却颠倒黑白地对王玉如、胡毅和市粮食局党委书记杨建民等三十多人进行重点审查,逼迫他们承认是有意"关仓停粮",要"逼民造反"。逼迫的手段是残酷而多样的:铁钉钉,皮鞭抽,烟头烧,……有十七种。专案人员将被审查者打昏后,再拿着手指头在原来捏造好的材料上按手印。就这样,制造了所谓"'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一冤案,先后牵连军队和地方干部以及群众二百多人,其中,两名军代表被毒打致死;十一人伤残;王玉如遭三十多种刑罚折磨,胸、肝、背部受重伤致残;胡毅被打致残,被迫切除一个肾脏。

在学习班专案审查的几年中,共有六十余名省、厅、处级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三十七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分子,二十二人因此被开除党籍,三人被送农村监督劳动,十七人被非法监护,一人被拘留,一人被报公安部门逮捕。

粉碎"四人帮"后,学习班负责人李某某有如下交待:"学习班办专案组大搞逼供信,捆绑吊打等刑法多达几十种,对广大干部群

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学习班残害干部，一片白色恐怖，干了国民党想干没有干的事，真是和国民党的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将下马村学习班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迫害公、检、法干部的“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

在与“云南省省级机关学习班”开办的同时，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宜良县羊街某部驻地开办了“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

公安部、检察院、法院，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要害部门。从“文革”一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千方百计破坏公、检、法机构。1967年8月7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要求向下传达。随之，砸烂“公、检、法”的风潮遍及全国。在这场灾难中，全国公、检、法的干部和民警，受打击迫害的达三万四千四百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达一千一百多人，打伤致残的三千六百多人。

云南省的公、检、法队伍，也逃不脱这一厄运。

1968年6月6日，“八二三”派赴京代表团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关于公、检、法的干部暂不参加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公、检、法的干部和民警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

“我省公、检、法，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公、检、法”，十几年来“演变成以叛徒阎红彦为首的旧省委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中，又充当了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急先锋。这样的反动公、检、法，非彻底砸烂不可”！

《报告》还把原公、检、法的主要领导人，如原省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李握如，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张泽民，原省法院常务副院长曹理周，原省公安厅副厅长畅宏碧，原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劳改局局长阎罗，统统诬蔑为“镇压人民群众的刽子手”，“公开投靠大叛徒赵健民反革命特务集团”。

黄兆其公开煽动“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公、

检、法”。

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后，公、检、法系统开始了“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彻底砸烂公、检、法”的运动。

1968年9月5日，昆明军区对省公、检、法实行了第二次军管。军管会成立后，立即搜集“炮派”观点的群众组织“红公安”和“中上层干部联络组”，原公、检、法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为下一步“划线站队”、“砸烂公、检、法”准备“炮弹”。不久，又拟定了《关于公、检、法机关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和开展“划线站队”的初步计划。其中，对于运动的开展，提出了四步走：

第一，开展革命大批判（即“划线站队”）。大批判要上挂下联，上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赵健民，下批公、检、法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对于那些还没有确凿证据打倒，但也解放不了的人转入专案审查。

第二，清理阶级队伍。

第三，整党。

第四，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

按照这个初步计划，10月29日，省公、检、法军管会决定集中办学习班。对于这个学习班的性质，军管会副主任赵某某说得很清楚，“这次集中，不单是个集中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问题”。1968年11月18日学习班正式组成，学员编为四个连队；办事机构由政工、行政两个办公室组成，政工办公室负责运动，行政办公室负责后勤。而学习班的决策，则由军管会领导人作出。第二天，全体人员便集中到宜良县羊街某部驻地，投入到运动中。

11月下旬，学习班政工组制定出“划线站队”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受到广大干部的抵制。12月1日，王寿全等三十多人利用学习班放假的机会，在小马街聚会，互相交换了看法，共同分析了

情况，认为“八八”讲话① 是违背中央指示的，是错误的，决定要顶住压力，要对公安厅的大是大非问题展开辩论。很快，聚会的情况传到了学习班负责人的耳中，小马街聚会就被诬为破坏学习班的黑会。于是，各排连夜进行追查，批斗参加聚会的人。

12月6日，有人从昆明给刘选略等人带来一封信。信是阎罗写的。信中抨击了谭甫仁搞的“划线站队”。学习班领导抄去这封信，在随意删摘后，抛了出来，进行批判，诬蔑这是一封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黑信。于是，本没有参加小马街聚会的刘选略成了黑会的黑手，在昆明的阎罗成了黑会的后台。“划线站队”还未开始，就制造出一起冤案。

12月16日，军管会某副主任为开展“划线站队”作动员报告。报告的火药味极浓，“这是一场政治战线的大决战”，“要贯彻毛主席‘砸烂公、检、法’，‘公、检、法要彻底革命’的指示，彻底揭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伸向公、检、法的黑手，把钻进公、检、法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揪出来”，“彻底批判‘二月逆流’急先锋赵健民之流开动被他们篡夺了大权的旧公、检、法机器，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乱军夺权的罪行。彻底揭开省公、检、法的阶级斗争盖子”。迫害公、检、法干部和群众的运动，正式开始了。

学习班的“划线站队”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追查所谓赵健民之流如何利用“红公安”、“中联组”篡夺公、检、法大权，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后一阶段，主要是追查所谓赵健民之流如何开动公、检、法旧机器镇压群众。矛头所向，是“炮派”观点

① 1968年8月8日，谭甫仁在云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学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来搞“划线站队”，其指导思想等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出来的。

的干部和群众。

学习班“划线站队”第一刀的目标，是刘选略。刘选略由“尖刀班”负责看管、批斗。各种残酷的刑罚都使用上了，什么“五雷轰顶”，什么脱裤子打屁股，等等，不一而足。

一天晚上，“尖刀班”又将刘选略从梦乡中揪了起来，连拖带拉地弄到阴森森的屋子中，进行突击审查。他们用绳子把刘选略死死地反绑起来，然后吊在墙上的木桩上，再用一条绳子套住刘的脖子吊在墙上，脖子前面又挂上了板凳。刘选略当时就被勒昏过去。

下一个目标是阎罗。12月30日，阎罗被揪到了学习班。刚一下车，迎接他的就是一阵围攻、毒打，接着被拉到大会会场，接受批斗。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打“下马威”的把戏。斗争后交专案组重点审查。不久，重点审查对象就扩大到一百多名干部和群众。凡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者，都有专门的专案组、外调组、材料组。专案组对重点审查对象实行二十四小时看守，采用各种方法进行诱供、骗供、逼供。

1969年1月下旬，学习班将公安厅“九一”事件作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重点追查。1967年9月1日，公安厅机关大院遭打、砸、抢，三处第五科的保险柜被砸，柜内钢印不见了。这就是“九一”事件。可是，后来在书架上找到了这枚钢印，钢印上积满了灰尘。

学习班围绕着钢印一事大做文章，炮制出一个“盗窃钢印，伪造护照，阴谋叛国外逃”假案。然后，依据这个假案，进行逼供。专案人员对李某某白天黑夜连续批斗，不让休息，逼得李某某精神行将崩溃，不得不招认“与杨守岭、王寿全撬了保险柜”。事后，李某某推翻口供。推翻口供，招来了新的批斗。李某某忍受不了刑罚，又招供了。批斗，招供，翻供，又批斗，又招供，又翻供，如此反复，十多次。专案人员拿着逼供出的假材料，对杨守岭采取车轮战，捆

绑吊打，烧眼皮，挂石头，强迫杨承认。后又追逼王寿全，王坚决否认这一强加的“罪行”，受到极其野蛮的酷刑折磨。

军管会某副主任等在追查“盗窃钢印，伪造护照，阴谋叛国外逃”案的同时，又武断地确立了“火烧建设公寓”专案。1967年9月3日夜间三时，毗邻公安厅的建设公寓五层楼西面的一间房内突然起火成灾。军管会负责人就认定是社会上的“炮派”群众组织和公安干部有组织、有预谋干的，把“火烧建设公寓”立案追查，对公安厅“炮派”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审查。审查中，一日三班，轮流批斗，一连七天七夜不准休息，并伴以严酷的刑罚。被审查的人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难以承受这样的摧残，只得承认是有目的地策划点燃了建设公寓。学习班又制造了一起冤案。

虽然冤假案迭起，但军管会负责人仍嫌不够，还一股劲地反右倾。某副主任说：“当前学习班的运动主要是右倾，求稳怕乱。有人说如果是好人，搞错了怎么办？谭政委① 讲，搞了好人，最后给他赔礼道歉。像医生开刀一样，不能说治好病而又不伤点好肉。要发动群众搞几次大检举、大揭发。揭出一个问题就斗他，大会小会斗，要拼命追根。”不分好坏，穷追猛打。刑讯逼供更加升级，运动越发残酷了。

“九一”事件中，法院的枪被抢。学习班上，就将这一罪责安在法院干部、四连二排学员李永康身上，编造说：“李永康内外勾结，把一百多支手枪送给‘炮派’。”李永康不承认，就严刑相逼。李实在忍受不下去，就想了结自己的生命。2月9日，他托人给妻子捎去一封遗书。这位捎信人一看是遗书，立即交给二排排长，要求领导人采取防范措施，救李永康一命。实际上，这时四连领导人已经

---

① 即谭甫仁。

调查清楚，李永康与抢枪问题无关。但是，这个排长竟不顾事实，仍然主持会议对李永康进行批斗，要通过李永康来“扩大线索”。2月13日晚，再次对李永康进行批斗。李永康遭受毒打时的呼喊声，不时地从屋内传出。黑夜中，这声音显得越发凄厉！14日凌晨，李永康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纵身跳入井中。李永康带着满腔哀怨从这口井中“走了”。一口井，能够装得下他的冤屈吗？

在刑讯逼供中冤假案接连而起的形势下，军管会负责人决定再将运动向前推进一步。经过精心策划，2月7日至9日召开了全学习班人员参加的“愤怒批斗阎罗制造‘八三一’①、‘九一’反革命事件罪行大会”。会场设在礼堂里，礼堂内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人员，礼堂两侧各坐一个连的全副武装的人员，台上幕后架着机枪，一片杀气腾腾。一声令下，阎罗、刘选略、王寿全等六十九名干部、群众被扭送到台上。刹那间，六十九个人挂着黑牌跪满了整个台子。大会服务组执行主席按“问题”顺序指定“揭发检举人”按事先刑讯逼供出来的并经修改审查的稿子，上台揭发阎罗等人的“罪行”。凡是在揭发中被点到名的干部、群众，也被拉到台上陪斗。就这样，他们把“八三一”、“九一”事件定为“在赵健民、阎罗的指使和策划下，‘红公安’勾结‘炮派’蓄意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把“建设公寓”起火说成是“‘红公安’头头胡丕振、王寿全带领‘炮派’人员打燃烧弹引起火”，企图诱杀“八派”人员，诬陷“以王寿全为首策划盗窃钢印、制造出国护照”，并把公安厅“中联组”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2月9日，军管会主任武某在大会上挥着强有力的胳膊说，

---

① 1967年8月31日，在两派武斗中，云南省物资局一派组织攻打紧靠物资局的云南省博物馆，此为“八三一”事件。

“云南公、检、法机关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掌权”，“公、检、法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与军内坏人有勾结，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副主任赵某某声嘶力竭地喊：“不要认为大是大非都搞清楚了，还有‘中联组’、‘情报网’、‘审讯团’、‘滇挺’问题，这样的大会还是要开的。”会后，以追查“审讯团”为目的，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审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在追逼“审讯团”时，使用了五花八门的刑罚。被审查的人，有的眼睛被打伤，有的耳朵被打聋，有的肋骨被打断，有的腰被打坏，有的牙被打掉，杨有光戴着十几公斤重的脚镣达半月之久。

3月15日至16日，学习班又召开了“愤怒声讨‘审讯团’的滔天罪行大会”。会场的各道门都站着荷枪实弹的人员，礼堂背后的山头上有机枪，真是如临“大敌”。七十多名干部、群众被押到台上交待参与“审讯团”活动的“罪行”，六名事先安排的控诉人员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进行“控诉”。凡是在控诉中被提到名字的干部、群众，都被当场揪出来罚跪，一时间台上台下跪了近一百人，不少人惨遭毒打。就这样，制造了一个“审讯团”冤案。这个案子涉及各单位二百多人，仅公、检、法干部就有七十名。这些干部、群众被打成赵(健民)、林(亮)、侯(良辅)反革命审讯团的骨干或成员。原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老红军陈恩普被定为“反革命审讯团黑主帅”、“现行反革命分子”；原劳改局局长阎罗、原一处处长杨征年、原八处干部杨有光等被分别定为“总参谋”、“现行反革命”、“现行犯罪分子”，后来受到逮捕、判刑，关押长达四五年之久；原省第二监狱监狱长梁曰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杀人凶手”，监禁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至今连尸骨都找不见。省革委副主任刘明辉也受到牵连，被打成“反革命审讯团”的“总顾问”。

“三一五”大会后，学习班又大张旗鼓地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地下公、检、法”。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浪接着一浪涌来，公

检、法系统的干部、民警，继续遭受迫害。

1969年12月28日，省革委人保组向省革委递交了《关于省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结束后对原省公、检、法机关干部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将所有人员区分不同类型分别处理。1970年四五月间，参加学习班的干部、群众，或“插队落户”，或下放到工厂，各自离开了羊街——这个一生一世也忘不掉的地方。

这个长达一年半的学习班，对云南省公、检、法干部和群众的迫害令人怵目惊心：五百二十八人被划为“站错队”；三百多人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二百一十九人受毒打、批斗；一百五十人被重点审查；六十四人被以敌我矛盾审查；六十多人被打伤致残；九人被逼疯；八人被迫自杀(其中死亡三人)。整党后期，二十五人被定为敌我矛盾而清除出党；二十一人被开除党籍；二十四人被留党察看；十八人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或延长预备期；四人被认定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接受长期审查；二十五人被做各种政治结论；五人被认定犯有严重错误；十人受团纪或行政处分。而杨征年、杨有光、张群则锒铛入狱。

玉溪地区的“划线站队” 位于昆明南部的“云烟”之乡玉溪地区，其“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首先从军分区和地委、专署机关开始。革委会“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凡是拥护时任地委书记、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宋某某的，被划为“站合队”，凡是反对宋某某的，被划为“站错队”。这样，军分区和各县人民武装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被划为“站错队”。同时，在地委、专署直属机关制造了“以叛徒刘世杰为首的刘、周、鲜、尚反革命宗派集团”和“普、王反革命集团”政治假案。

所谓“刘、周、鲜、尚反革命宗派集团”，其中的刘世杰，是前任地委书记，后任省水利厅长；周是周祝三，前任地委副书记，后任省统计局长；鲜是鲜富文，前任地委副书记，后任省参事室主任；尚是

尚汇三，前任地委书记，后任省粮食厅长。所谓“普、王反革命集团”，普即普朝柱，任地委委员、专署财办副主任；王即王连增，任专署专员。他们上挂下联，向上，挂到“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向下，联到所谓“站错队”的广大干部、群众，于是，制造了一系列冤假案。

他们把刘世杰、尚汇三、周祝三、鲜富文从省级机关揪回玉溪批斗达两年。1968年12月中旬，在地区召开的党代会上，将刘世杰、鲜富文打得死去活来。他们又把普朝柱、王连增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一次批斗，普、王一出门，就分别被三个彪形大汉架上“喷气式”，一人揪住头发使劲往上提，游过大街。到西车站时，七八个人一拥而上，抬起普、王，像甩粮包一样甩上大卡车，然后由十几个穿翻毛皮鞋的凶手扭住他俩的双手往肋骨猛踢一阵，普当时被踢休克倒在车厢里。到了批斗地点，将普、王推下汽车，罚站在汽车房里先“吃一顿打子面”（用竹棍抽打）。十多个打手每人一捆京竹棍，轮流抽打，边打边骂，打手们还说：“这叫做伤皮不伤骨。”批斗会上，规定了下跪姿式：手举高，头低到胸部，两腿跪直，臀部不准沾着脚后跟。跪得稍有不合格或支持不住，就遭竹棍抽打。一跪就是三个多小时。一次农林系统批斗普朝柱、王连增和物资局长周汉湘，大开打戒。周汉湘被打得声声惨叫，肝脏都被踢破，会后扶墙三步一歇勉强回到家里。可是，晚上又被拉去批斗毒打。当晚周被拖回家时就含冤死去了。

1968年12月29日，为了在玉溪地区掀起“划线站队”的高潮，他们召开了大型批斗会，有线广播拉到地区所辖各县城。批斗会上，四百多名“站错队”的干部、群众挂着黑牌子，跪满了台上台下。凶残的打手、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见了挂黑牌子的就打，会场上一片惨叫声。

“划线站队”中，全玉溪地区制造出数十起冤假错案。冤假错

案中被诬陷者和“站错队”的干部群众，遭到了法西斯式残酷的迫害。他们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黑司令”、“黑高参”、“黑笔杆”、“黑干将”、“大黑手”、“黑爪牙”、“反红急先锋”、“反军乱军分子”、“坏头头”、“赵氏小爬虫”等等各种政治帽子，被施加捆、绑、吊、打等等暴行。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揪斗干部、群众二万七千九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七百多人，打死逼死一千零八十九人。

昆明市、保山和德宏地区、红河州、云南大学、昆明铁路局的“划线站队”

作为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昆明市，在“划线站队”中，共株连迫害工人、农民、居民、知识分子和学生五十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一千七百零三件，迫害死亡一千四百八十六人。运动中，使用的刑罚达一百多种。位于云南省西端的保山、德宏地区，在追查“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涉及、株连到五十多万人。其中，惨遭捆绑吊打的有二万二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二千多人，被打死逼死的有七百多人，被列为专案审查的有一万多人。在红河州，据1969年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报告》称，从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底，全州所属的十三个县、市，十二个州属单位，含有二十二个单位的云锡公司，掀起了划清两条路线斗争大是大非的高潮。这期间，共批斗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四人，占全州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属敌我矛盾性质的二万三千八百零四人，即所谓叛徒四百三十九人、特务九百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百六十二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二万零七十四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千九百七十五人。到9月底，全州批斗人数上升到六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云南大学，这所云南省的最高学府，当时在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八百七十六人中，就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被诬陷为追随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先后被关押审查的有一百六十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四十二人，被迫自杀身亡的有三人。昆明

铁路局,"划线站队"中疯狂地揪"赵健民之流",先后揪斗干部群众一万五千七百人,打伤致残一千二百三十人,另有一百七十七人死于非命、二人失踪。使用的刑罚有四十八种之多。

巧家县的"划线站队"　位于云南省北部、与四川省紧紧相连的巧家县,在"文革"初期,有四十多个群众组织,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分化成两大派,一派名为"红旗漫卷",属"八派"观点;一派名为"六二九",属"炮派"观点。由于观点上的分歧,两派之间的摩擦日益激化,以致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1968年初,巧家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赵某某与"红派"的几个头头开会决定:造舆论,宣布对立派为非法组织,采取斗、挤、压、争的策略,搞垮"六二九"派,达到"红派"一派掌权的目的。并决定在方法上,先抓地富反坏分子,取得口供,然后干掉几个地富反坏分子,以起震慑作用。3月,赵某某派人到贵州学习省革委主任李再含镇压"四一一"派群众组织达到一派掌权的经验。贵州经验在巧家县立时起了作用。"红派"头头开会提出:按贵州的办法,把它(指"六二九"派)砸了算毬,把几个头头干了(杀的意思),下面的跳不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们露骨地说:"目前全国各地都很乱,就是乱在一个'权'字,这场斗争你不干他,你就干你,外地干了不少了。关键是要见行动,不要拖。"会后,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打死人是群众的事,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鼓动杀人,消灭对立派。

1968年5月23日,"红派"从农村调集三千三百五十人进县城,实施砸烂"六二九"派计划。各路人马在进军途中枪杀对立派五人。这时,正在召开的县"贫总"常委扩大会、县武装部政工会作出两个决定:(一)用各区武装部的枪武装"红派";(二)把对立派跳得凶的干掉几个。全县性的杀人从此展开。在大寨区,枪杀十四人。在蒙姑区,从5月25日到6月12日,杀死六人,自6月12日到24日,又杀死打死三十五人。杀人的恶浪,直至6月20日才被昭通军分区制止。

这一时期,全县无辜被杀害二百七十七人,其中机关干部、教师、学生、贫下中农二百二十四人;地富反坏分子五十三人。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吃人肉事件。

1968年6月10日,巧家县"新店区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判农民周明太死刑。周明太立即被处死。这时,凶手杨国有等把周的心脏挖出示众,凶手彭其德把周的脑袋砍开,取走脑髓,并割去周的舌头,凶手许大发割去周的生殖器和睾丸,凶手彦家申将生殖器煮着吃了。真是凶残之极。

1968年6月14日,复员军人丁万开被阶级报复分子李正权煽动群众批斗。李正权的父亲被政府镇压,本人又犯有贪污和强奸妇女罪。批斗中,李正权指使人用绳子套上丁的脖子往外拖。这时,丁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死了就死了,有什么了不起"。丁的呼喊,招来了更加残酷的毒打。毒打中,丁倒在地上滚来滚去,直到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第二天,丁万开被放在胸部的土手雷炸得粉碎。凶手王会祥、刘启富等割下丁万开的腿肉三块约三斤,拿到生产队炒着吃了。真是灭绝人性。

1968年10月31日,巧家县革委会成立。在四十一名县革委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红派"的人,而公社、大队一级革委会,则清一色的是"红派"掌权。这势必引起"六二九"派群众组织的不满。12月,在"划线站队"运动中巧家县召开了党代会。会上,声讨根本不存在的"滇东北游击军",把矛头指向"六二九"派群众组织。这时,县人民武装部以武装民兵为名,把枪发给了"红派",又抓了"六二九"派的人。面对咄咄逼人的局势,被五六月杀人吓怕了的"六二九"派大批群众逃到四川省的宁南等地避难,一部分人到昆明,向省革委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巧家县问题。

巧家县革委会迎风而上，于1968年12月25日发布第一号布告，1969年1月22日又发出“紧急呼吁”，宣布外流四川和到昆明的“六二九”派人员“是地地道道反革命行动”。呼吁这些人“迅速脱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之流的控制，返回县、区、社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外逃的坏人要及早回来，交待罪行，才有出路，否则加重罪行，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法网。何去何从，由你选择”。“到四川的干部，限半个月内返回原单位，到时不回者，作自动离职处理”。

省革委主任对昭通地区的巧家县和昭通、盐津、永善县到昆明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不是化解矛盾，做工作，而是集中一千多人办学习班。1969年1月17日，他到学习班讲话，说到昆明反映情况是“反革命行动”，“是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经过长期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是一批反革命在那里挑动的”。“你们那里八种人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窝，要像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地挖。我看你们这个会就搞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你们要发动群众，把幕后操纵者揪出来。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把那些坏人揪出来”。在他的支持下，学习班抓了巧家县二十二个“坏人”。

1969年1月22日，巧家县革委会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接着就抓人。2月4日，把在昆明定的二十二名“坏人”押回批斗，并关进监狱。5日、6日两天，巧家县城掀起捆绑吊打人高潮，恐怖气氛笼罩着县城。又一批所谓“站错队”的干部、群众被迫逃到四川。这时逃离人数已达三万二千五百多人。

1969年1月底，巧家县革委召开第二次全会，会议的目的是“分清巧家的大是大非”，动员“划线站队”。会议仿效省革委的办

法，立出所谓若干事件进行追查。追查中，施以各种刑罚计八十多种。全县前后批斗干部、群众达二千四百三十八人；诬陷扣上的政治帽子有“民政党”、“大同党”、“青年党”、“中华民主社会自由党”、“中社党”、“无底党”、“中劳党黄河局”、“白洋会”、“革命党”、“黑杀团”、“社会动力党”、“齐心会”、“救民党”、“忠孝党”等；定案八百七十七件计一千六百八十七人，打死逼死七十五人，打伤致残二万一千五百一十九人，开除公职五百一十人。另外，还有数万人被扣工资、工分、口粮，六千四百多人被抄家劫财。

江川县“农革军”假案　1969年1月，江川县革委会紧跟省革委会的部署，掀起“划线站队”的高潮。他们在江川中学举办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县公、检、法机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二十六人学习班，制造了“滇挺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简称江川县“农革军”）假案。

“文革”中，江川县根本没有“农革军”这一组织。假案的制造者们，一是采取捕风捉影的手法，指鹿为马；二是刑讯逼供，从而制造出这一政治陷害的假案。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云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明、玉溪军分区司令员彭合朋等是江川县“农革军”的策划者。说“李明早在1967年以前就两次到江川县，在江城、左卫一带视察、布置。当赵健民派出‘滇挺’时，彭合朋于1968年1月3日来江川，4日大量发枪，配合‘滇挺’行动”。6月，“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秦自奇、玉溪军分区政委徐树栋亲自在军分区密谋，并派人到昆明联系，加紧组织‘农革军’”。“农革军”“由秦自奇、徐树栋任军长和政委，下设作战部、参谋部、宣传部、后勤部；辖四个师，下辖团、营、连”。“农革军”“以‘联防’为名展开活动”。可事实是，李明作为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成员，于1967年3月和5月两次到江川县检查小春长势和大春备耕工作，曾到过前卫、龙街、江城等地。所谓组织“农革军”、

发枪，纯属无中生有，是通过刑讯逼供强加给秦自奇的。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农革军”是肖英华、张树枝等八人于1968 年 8 月在唐磨兜具体组织的。事实是，肖英华、张树枝等八人到唐磨兜，恰逢梨子成熟，家在唐磨兜的张树枝请大家吃梨子。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农革军”有武器。说“陶家珍从玉溪拉来一车枪支”；“普洪祥、周发荣用三车菜油从昆明换来了两车武器，共四千条步枪、五百挺机枪”。事实是，县百货公司拉来两车肥皂和灯泡，陶家珍是随车的人。而菜油，是按计划上调的。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农革军”“专门绘制了滇南主要路线图等作战要图，撤退方向一直标到老挝半沙里”。事实是，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水利工程队 1966 年规划江川水利工程时用的江川县地图和云南省交通图，说成是“农革军”的作战地图；将一个人笔记本内的没有标出指向老挝半沙里的箭头的滇南方向草图，假造说“撤退方向一直标到老挝半沙里”。

假案的制造者们，编造“农革军”的纲领是“胜利武装抢权，败则逃往国外”，“农革军”的编制为一个军、四个师、十四个团、六十四个营。事实是，纲领，纯系子虚乌有；编制，是从“文革”前全县六十四个生产大队设六十四个民兵营移植过来的。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说，“农革军”外撤时，要带走五十万斤粮票和二十万元现金、硬币、白银。事实是 1967 年 10 月，全省武斗升级、社会一片混乱时，为确保粮票安全，粮食局领导召集两派群众商量，一致同意把存放的一百二十万斤粮票送到专区粮食局保存。同时，县银行的张芝富、李兴亮、彭家荣出于保护国家财产，向县人民武装部“支左”办公室要求派部队保护库房或增发枪支保卫库房。

假案的制造者们，诬陷说“农革军”用电台对外秘密通讯，控制使用价值 3 万元药品。事实是，既无电台，又无三万元的药品。为

迫电台，他们逼死邮电局的孙繁清，打残何金武。而当时江川医院的全部药品价值，还不到二万元。

假案的制造者们，蓄意把“江川农革军”假案与“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挺进纵队”、“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政治冤案挂在一起。他们说“‘滇南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的组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赵健民之流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赵健民之流所组织的三大政治土匪武装之一的滇南挺进纵队的一个支队；是赵健民之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乱我边疆，毁我长城，破坏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假案制造者们，在百般诬陷的同时，又大搞刑讯逼供。有的人熬不住，只好承认他们编造的口供。有的人受不了，只得吞下大头针、钢笔尖，了结生命。

假案的制造者们，通过卑劣的手段，制造出“农革军”后，又伪造证据，上报下发，蛊惑人心。他们把人民武装部第五十分队看管犯人的枪支拍照后，诬为“农革军”的武器；把《云南交通示意图》拍照后诬为“逃往外国的‘军事作战图’”；把用硬纸板做成的用墨涂黑的假望远镜拍照后，诬为“农革军”使用的“军事望远镜”；把国库的二十万元人民币和五十万斤粮票拍照后诬为“农革军”逃跑用的粮票和经费；把邮电局的业务电台和明码、密码表拍照后诬为“农革军”使用的电台。

就这样，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组织严密，后勤上供应保证，上下串通一气，左右秘密联系，阴谋胜则武装夺权，败则撤往国外，已发展到十万多人的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炮制出来了。

在这个假案中，原江川县委中的十一名常委有六人被打成“反革命”，县委副书记被打残，五人被打伤；县级四名公、检、法负责人，十二个公社、镇的公安特派员全部被打成“反革命”；全县十二

个公社、镇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六十四个民兵营营长全部被打成“农革军”的“副军长”、“师长”、“团长”、“营长”；全县被打死逼死二十三人，其中共产党员六人，共青团员一人；被吓病死四人；被吓精神失常三人；被打伤二百五十七人、打残一百一十七人；被揪斗三万二千零三人；被划为“农革军分子”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人；被划为“农革军骨干分子”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七百五十七人，省管干部五人，地区管干部五十七人，县管干部一百一十二人，军队干部十九人。还牵连了大量的亲属。

新平县“特务组”假案　1969 年 1 月在云南城乡掀起的“划线站队”高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新平县。省里捏造了一个“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政治陷害案，新平县一批别有用心的人就抓住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华定周曾当过朱家璧警卫员这一线索，诋毁华定周是朱家璧安排的特务，制造了“新平特务组”假案。

1967 年初，在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新平县人民武装部接到上级命令，担负新平县的“三支两军”任务。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武装部成立了五人支农领导小组，部长兼党委书记华定周担任组长。这期间，新平县戛洒区的造反派头头李绍智等人与原区委书记徐宗胜策划，全面夺了戛洒区党政财文大权，砸了戛洒区公所的牌子。李绍智在夺权大会上宣布“以后不要党的区委会管，由我们造反派来领导”。于是，全区各公社干部都靠边站，春耕栽种陷于瘫痪。2 月 26 日，支农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县“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誓师大会。华定周代表县支农领导小组在大会上宣布：“戛洒区的 2 月夺权是非法的，不予承认。”华定周对戛洒区夺权的否定，使李绍智、徐宗胜怀恨在心。他们与县造反派头头杜福星、商海元合谋，制造舆论，攻击华定周“以生产压革命”，“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

1967 年夏，以杜福星、商海元为首的造反派，以给华定周送大字报为名，冲击县人民武装部，砸了武装部的牌子，围斗了华定周，蓄意要在新平县揪出“军内一小撮”，声讨“带枪的刘、邓路线”。经过策划，他们将道听途说的情况，编造出所谓《北京来电》的大字报，四处张贴。大字报煞有介事地写道：“朱家璧是特务，在国共合作时混入抗大，毕业后在龙云手下当了师长，抗战胜利后，代表国民党到缅甸接受日本投降。新平的华定周当时任朱家璧的警卫营长。”紧接着又编造了第二份《北京来电》，进一步诬陷说“新平的华定周在给朱家璧当警卫营长期间，经朱家璧介绍，参加了特务组织，是英国特务”。一时间，在不明真相的人和被造反造晕了头脑的人们眼中，华定周成了“特嫌”。造反派的阴谋逐渐得逞。

1968 年 5 月 7 日，经省、地两级军管会批准，新平县成立了革委会。造反派头头杜福星、商海元、徐宗胜等人没有进入县革委会。于是他们就迁怒于华定周，决心搞垮县革委，打倒华定周。

1968 年七八月间，以商海元为首组织了二十三人的华定周专案调查组，调查所谓华定周“特务历史”问题。他们在昆明了解到：1945 年前后，华定周当过朱家璧的警卫员，并且跟随朱家璧。就将这些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作了汇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想彻底打倒华定周，单凭他们这些县、区的造反派是不够的，还必须取得省里造反派的支持。他们不仅向黄、刘等人汇报了情况，并且通过黄、刘摘抄了朱家璧的所谓“罪行材料”。造反派们就此编造了华定周是朱家璧安插在新平县的“历史特务”。就连 1968 年 3 月前后，朱家璧两次到新平县的漠沙等地检查工作，也被编造成“蓄意来新平的哀牢山看准备上山打游击的地形，布置华定周执行赵、张、朱的云南国民党特务组计划”。

在杜福星、商海元的操纵下，一份《华定周、毕成、叶定忠为首的“新平特务组”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调查报告》出笼了。

毕成是县武装部副政治委员，叶定忠是县武装部秘书。这份充满着谎言的报告分别上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云南省军管会、云南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和昆明“八二三”派大联合指挥部。报告要求彻底查处新平县“特务组”。

这份报告终于发生了效应。1968 年 11 月 30 日，新平县两派代表在昆明报批调整县革委会时，专区革委会主任的秘书告诉新平县造反派说：“华定周是特务，在北京被逮捕了。”得到这个消息的造反派如获至宝，当即编造出《特好消息》：“据可靠消息，北京来电，大黑手、大坏蛋、大特务华定周在北京被依法逮捕。大快人心。组织内部，要做好活动，大造声势”，通过电话传回新平。当晚，这一派就敲锣打鼓，放鞭炮，举行示威游行。有人还扎了华定周的草人，逼着华的家属拿出华定周的一套军装穿在草人身上，然后抬着草人游街。第二天，即 12 月 1 日上午，杜福星在县城主持召开了“送瘟神大会”。会上，对华定周进行了严词厉语的声讨，并烧了华定周的模拟草人像。这次会议，为在新平抓“特务组”大造了舆论。

由省、地区革委会调整后的新平县革委会，造反派头头杜福星、商海元担任副主任。他们一朝权在手，就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迫害。

1968 年 12 月 8 日，调整后的县革委会召开了“新平县革委会调整充实庆祝大会”。杜福星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新平县革委会的调整、充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大黑手、大坏蛋、大特务华定周之流浴血奋战的结果……华定周之流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庆祝大会的宣传提纲中也写道：“华定周之流凭借他们腰杆粗、后台硬，在新平放肆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进行了武装抢权……”，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华定周这个角色，我们一直抓住华定周不放，宁可掉脑袋也不能让华定周之流在烟雾中溜掉”。

1968 年 12 月 10 日至 26 日，县革委召开了“县、区、社党员代表大会”。杜福星、商海元等一伙造反派，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控制了党员代表大会的局面。为了给“新平特务组”定案，大会印发的第三号简报中明确写道：“罪魁祸首华定周是大特务、大内奸朱家璧一手培植起来的心腹，已经紧跟朱家璧二十五年了。朱家璧当国民党特务团长的时候，华定周就是朱家璧的通讯员，后被朱家璧提升为特务排长、特务连长……1946 年华定周又紧跟朱家璧流窜越南、老挝、缅甸等地。1959 年朱家璧把华定周安插在新平，窃取了武装部长要职。”第四号简报中则写道：“到会代表深刻地揭发了华、张、何（华定周、张天德、何国运）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县人民武装部组训科长、县革委副主任李某某在党代会上竟厚颜无耻地诬陷说：“大特务华定周顽固执行黑上司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的特务计划，以武装部为黑司令部，在民兵这条线上，从去年 2 月 22 日起，在全县一百一十八个公社开始了反革命武装联防组织。”因为他的这一诽谤，在县党代会期间就开始斗争、批判各区武装部长。

1969 年 1 月 8 日，县革委会又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誓师大会”，杜福星代表县革委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宣称：“新平县是三个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土改镇反不彻底，文化大革命不彻底。新平县的敌情十分严重，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敌情观念，头脑清醒，把隐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对狗特务华定周等分子，这些新生长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新平有以狗特务华定周为首的特务组，不单华定周是特务，还有何国运（公安局长），李明章（县长），军内有毕成（县人民武装部副政治委员）、叶定忠（县人民武装部秘书）、刘通怀（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何国运是什么公安局长，是华定周安插在县公安局的特务组成员”。会后，杜福星的这个讲话录音于 1969 年 2 月 8

日以新革政(69)3号文件下发。从此，“新平特务组”就制造成功，并在全县公开化了。

全县在追查“新平特务组”中，施行了残酷的迫害手段，出现了惨无人道的“斗尸”、“剖尸”、“拖尸”事件。

1969年1月7日，新平县革委会召开“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誓师大会”的前一天，县革委召集各系统、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研究大会要揪斗的人员。县手工业管理局确定要揪斗杨荣芳等八人。杨荣芳的“罪名”有三，一是哥哥在台湾，而且来过信；二是1962年和1963年以集体名义当铁匠，贩卖半开得利千元；三是“文革”中与华定周关系密切。第二天，杨荣芳惨遭毒打，最后因伤重而卧床不起。就是这样，还被押到“划线站队”学习班接受批斗。

1969年3月6日，新平县革委召开了“狠反右倾，鼓干劲，向阶级敌人刮起二十四级台风誓师大会”。会场上一片杀气腾腾。杜福星在发言中诬陷杨荣芳说：“杨荣芳是狗特务华定周在新平武装抢权的黑干将，与华定周关系密切，至今不交待与华定周的特务关系。什么叫政策，就是把大小华定周分子抓光就是政策。”由于杜福星的挑唆，杨荣芳当场遭到一顿毒打。

第二天，爬不起来的杨荣芳被逼着去上班。中午，又被批斗。批斗中，被五花大绑地捆着，遭受着一遍又一遍的毒打。最后，休克在批斗场上。当亲属把杨荣芳背回家时，杨已经奄奄一息。亲属别无办法，只好苦苦哀求送医院治疗。几经曲折，最后送到了一所小医院。值班大夫看到病人是“特务”杨荣芳时，害怕受牵连，只是开了一点止痛药。当夜幕降临时，昏迷了几个小时的杨荣芳慢慢地睁开双眼，看看围在床前的亲人，又费力地把头扭向窗外，张了张嘴。亲属们立即将耳朵紧贴上去，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但他却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谁也不知道他最后想说什么！

但是，杜福星们连死了的杨荣芳也不放过，他们给杨荣芳按上

了“服毒自杀”的罪名。杜福星说：“像杨荣芳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走死路？因为他的问题大，就用死来对抗群众。这样的人死了也不能让他舒服，还要斗他的尸。”3月9日，杨荣芳已装棺待葬，但杜福星却指使人把尸棺抬到操场上，亲自主持了“斗尸”大会。

在追查“特务组”中，所谓主要“特务”的亲属统统受到株连。杜福星们制造了以华定周夫人为首的“夫人集团”，迫害这些“特务”们的夫人。县人民武装部副政治委员、“特务”毕成的夫人——县医院工作人员覃淑贞受到残酷迫害。

他们强加给覃淑贞三条罪名：(一)隐瞒自己的出身，将地主小姐说成是丫头；(二)是特嫌分子；(三)丈夫毕成是定了性的特务。

1969年3月8日，在杜福星的授意下，县医院革委会将覃淑贞揪出来进行批斗。批斗后，又责令覃写出书面检查。3月10日晚，正在家中边缝“站错队”人带的白袖套，边琢磨如何写检查的覃淑贞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一开门，杜福星等四个人就冲了进来。他们翻箱倒柜，逼着覃淑贞交出发报机。原来这天晚上，县革委的一个打字员向杜福星报告说，听到覃淑贞正在家中发报。杜福星等搜不到发报机，就强迫覃淑贞抱着收音机到县革委。在县革委，他们一边审讯覃淑贞，一边检查收音机，看有没有发报装置。折腾了半天，杜福星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3月12日下午，新平县革委会召开了“狠反右倾，鼓干劲，向阶级敌人刮二十四级台风誓师大会”。会上，杜福星对医院革委会负责人张某某说：“你们医院的覃淑贞，前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在她的宿舍里拍电报与敌特联系。在离她家十多公尺远的地方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当我们去叫她的门时，她隔了好一阵才来开门，不知她在里面干些什么？只见她慌里慌张的，桌子上放着一部收音机和发报用的电池。电池是新的，是新平地区半年多以来市场上从未出售过的。我叫电讯局的人把收音机抬去检查，没有发现什

么,赔还给她了。”“你马上派人把覃淑贞监视看管起来,不准她与外界的任何人接触。先叫覃写着交待,待誓师大会结束,就组织群众斗争。一定要覃把发报机交出来。采取什么行动都可以。”

誓师大会后,县医院里一场围剿特务覃淑贞的斗争开始了。在一片“打倒覃淑贞”、“让特务交出发报机”等的呼喊声中,覃淑贞被架着“喷气式”进了会场,跪在会场中央。

张某某问:“前天晚上你干什么了?”

“缝白袖套”。

“不老实!”张某某话音刚落,几个打手狠狠地把巴掌甩在了覃的脸上,一股鲜血立即从她的嘴角和鼻子流出。

看着默不作声、却满脸倔强的覃淑贞,张某某恶狠狠地喊道:“拿椽子来,压腿!”

一根椽子压在贾淑贞的小腿上,六个女人轮换地站在椽子上。一阵怵人的惨叫之后,覃淑贞昏迷过去。这时,两个女人上前将覃的衣服脱光,搜遍了覃全身,也一无所获。一个打手看着覃淑贞的手表说:“发报机会不会藏在手表里?”于是,他们把手表打开,可什么也没有找到。

恼羞成怒的张某某等人用凉水把覃淑贞泼醒,用绳子捆起来,又连连追问,覃淑贞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发报机。”于是,他们就用一根椽子从捆绑覃的绳子中穿过,然后抬着椽子把覃淑贞吊起来。张某某抱来一捆沙灰条,打手们轮流地抽打。张某某打断了好几根沙灰条,累得满头大汗。覃淑贞被打得多次昏过去。一个打手指着昏迷的覃淑贞说:“这个特务多老练,打都不叫,一定是受过特殊训练。”打手们还绞尽脑汁,变着花样来折磨覃淑贞。他们用几根沙灰条一起抽打,这样一抽下去,就会同时出现几条血痕,而且他们专门抽打皮嫩的地方,如背部和腿肚。

酷刑折磨一直持续到翌日夜间一点多钟,张某某们才将覃淑

贞放躺在长椅上。慢慢醒来的覃淑贞,浑身的灼痛使她难以忍受。她感到绝望了。也许是想到自己两个尚未懂事的孩子,想到被关押起来的丈夫,一种强烈的求生愿望油然而生。她艰难地哀求道:“给我点水喝,救救我……给……给我……点水喝……救……救……”在长时间的哀求下,看守人才让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阿托品。

1969年3月13日凌晨五点四十五分,覃淑贞带着满身的伤痕,离开了人间。不知道她的灵魂是升入了天堂还是堕入了地狱。像覃淑贞这样的好人死后都应该上天堂,可是,她死后所遭受的种种迫害,是绝对不会在天堂中发生的。

3月13日早上六点,覃淑贞的死以“服毒自杀”而定了案。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杜福星指示医院张某某说:“你们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不高,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人死了也就算了,这么大一场运动,死个把人不要紧,运动还是继续深入吗。问题是你们把线索搞断了,发报机没有找到。今天就解剖尸体,看看发报机是不是从嘴里吃下肚子里去了。要找出发报机来!”

解剖从上午九点钟开始。按杜福星的指示,首先掀开口腔,但无异常发现。又将手指插入阴道摸,仍然没发现发报机。接着,将腹部直线切开13厘米左右。切开腹腔后,首先是检查胃。胃切开了,只见胃中有少量食物残渣,但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杜福星却指着韭菜残渣说:“那是不是录音带?”其次是检查回肠。纵形剪开后,未发现任何异物。再就是检查脾脏、大肠和膀胱,也未发现异物。最后是检查心、肺、食道,还是无异常发现。杜福星失望了,但又不死心,他命令将所有器官各切一块,留作病理检查。一切完工后,关胸缝合。

就这样,覃淑贞死后的尸体又惨遭杜福星们的凌辱。

1969年3月11日，杜福星以县革委会副主任名义，向戛洒区的帮派头目郭某某指示说：“现在，新平县城已经发现了特务组织的活动，我们亲自发现他们向敌特发报。你们戛洒也有，你们要从思想上狠反右倾，好好追查。”郭某某及时地将杜福星的指示向帮派骨干传达，并无中生有地说：“新平城已经发现电台，抓到了特务，我们戛洒也有，据掌握的情况，特务的编号已经从零号编到13号。”随即，郭某某等人决定，一边召开揭发斗争大会，一边组织“骨干积极分子”进行小分队活动，深追深挖。

就这样，区委副书记张正荣、副区长杨家发、区委办公室主任李正昌、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杨元良，都被定为“华定周分子”，分别被严刑拷打，强迫交待莫须有的“特务代号”、“特务活动计划”、“电台”等等。

3月13日，郭某某等主持了对杨家发的单独批斗，逼迫杨家发承认自己是“土匪”、“特务”以及“罪行”、“活动”等等。他们先把杨家发捆起来，强迫他跪在区委会楼上，然后进行一阵又一阵的毒打。杨家发那惨叫声，听得人们一阵阵心悸。这时，最先造反夺权的原区委书记徐宗胜向郭某某递上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对杨家发这样的阶级敌人绝不能手软。”打手们看了纸条，更加残酷地迫害杨家发。他们强迫杨家发两手高举跪在条凳上。浑身伤痕的杨家发跪着跪着昏迷过去，从条凳上摔倒到地板上。待杨家发苏醒后，郭某某们才让他“滚蛋”。已无行走能力的杨家发只能一点点地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向前爬。当他爬到二楼的楼梯口时，被气势汹汹的打手一脚踢下楼梯，当场不省人事。这一脚，是导致杨家发死亡的致命一击。杨家发就是这样躺在楼下的地面上，数小时后才被人们搀扶回宿舍。

3月14日早晨，郭某某发现杨家发“失踪”了，就派人寻找。第二天，在江面发现了杨家发的尸体。

找到杨家发的尸体后，徐宗胜等人立即策划商量，贴出了《杨家发畏罪自杀》的大字报。当把杨家发的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尸体已经浮肿。这时，有几个“站错队”的人提议：“叫医生来检查。”郭某某立即拒绝：“跳水死的，不要检查。”一个“站错队”的人又提出：“到哪里抬棺材埋人？”郭某某恶狠狠地说：“大土匪、大特务是畏罪自杀，要什么棺材！赏他一根草绳拖去喂野狗。”一个“站错队”的人苦苦哀求说：“不给棺材，给一块木板抬着。”郭某某开口大骂：“你们这些杂种！不给！”几个“站错队”的人只好找来竹杠、木杠，又被郭某某强迫扔掉。就这样，郭某某等逼迫几个“站错队”的人用绳子套在杨家发的脖子上，将杨家发的尸体，从戛洒江边的鹅卵石滩拖过江心又拖到江东山脚处。整个路约有一公里多，到了目的地后，杨家发的头部、背部血肉模糊，尸体早已被拖烂了。

“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冤案　1968年1月16日十八点四十五分，由昆明开出的202次旅客列车行至东郊金马村车站。由于上下车旅客十分拥挤，列车无法打开车门。车下部分旅客见不开门，就打破窗门挤进车厢。于是，旅客之间发生严重纠纷，互相厮打，致使列车无法开出。在混乱中，不知何人开枪，引起乱枪齐发。住在车站附近的“炮派”群众组织“东线指挥部”负责人李长年等，前往车站协助维持秩序。事情过后，发现乘坐在第六车厢的军人家属、孕妇李云素中弹身亡，小女孩李念华头部负伤。这一事件引起省军管会小石坝监督片军代表付某某的注意，遂派人调查。调查人谎报：“不是两派武斗，是工总司的人开枪打死一名列车上的旅客。”付即将调查人的报告上报省军管会和昆明警备区。同时，车站值班员杨志启、徐有清和列车长夏水长向铁路局调度室反映了情况。17日，警备区指派付某某陪同省公检法军管会、铁路局军代表、护路部队某副团长去察看现场。他们到现场察看了列车上的弹迹，询问了现场目睹者数人，一位医生对尸体进行

了检验。17 日晚，在北京开会的昆明、云南省两级军区干部接到这次事件的电报后进行了讨论，并拟出电话稿，于当日二十三时三十七分向昆明传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昆明东郊发生的 202 次旅客列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对‘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将两次破坏列车的头头交出来……”同时，电话内容被编写成《北京重要来电》，在全省广为传播。

1968 年 3 月中旬，昆明警备区指示付某某：“周明忠、李文忠在东郊干了很多坏事，扰乱社会治安，把这两人抓起来，不要宣布逮捕，押在部队，要他们交待罪行，交公安机关处理。”付即照办。4 月 5 日，付亲笔写了《周明忠、李文忠犯罪事实报告》，要求将周、李逮捕法办。这时，鲁瑞林指示省政法办公室主任：“周明忠、李文忠等五人，是袭击 202 次列车的策划者、指挥者，是凶手，把人接过来。这是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是反革命案件。公安厅的人跑光了，由市公安局办。”4 月 17 日，周明忠、李文忠等人被押回公安局关押。1968 年 10 月中旬，省公检法军管会专案组和铁路局专案组对 202 次旅客列车事件和十八号机车(2504 次列车)事件进行调查。调查中，省公检法军管会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这个案子是云南省和中央定的重大‘反革命’案件，要认真调查处理。”经过半个月的调查，专案组将情况向省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武某等汇报。武某听后很不满意，认为定性不高。于是，专案组又派人调查了二十多天，第二次向武某等汇报。武某听了汇报后说：“可以定为有组织地袭击 202 次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按照武某定的调子，形成了《袭击 202 次旅客列车和伏击 2504 次列车反革命事件调查报告》，认定这两件事，“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袭击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1968 年 12 月 4 日，铁路局运输处革命领导小组罗列整理了四十八条材料，指控李长年“亲自预谋、亲自指挥袭击 202 次旅客列车，是罪魁祸首”；“动用长短枪、装

甲车，向手无寸铁的旅客开枪射击。为逃避罪责，威胁列车员，持枪强迫国防军和司机开车”。1969 年 2 月 11 日，省公检法军管会保卫办公室向武某要求：“拘留袭击 202 次旅客列车主要头头六人。”2 月 14 日、15 日，将李长年、李家寿、周明忠、孙智鹏逮捕，把李海清交群众专政。

1969 年 3 月，铁路局专案组根据省公检法军管会的指示，举办了学习班，形成了《综合报告》。这份报告，歪曲事实，认定“袭击 202 次旅客列车，是一次政治反革命事件；是大叛徒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有计划、有目的的袭击活动；是破坏交通，向中央施加压力，达到武装夺权”。9 月 8 日，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关于对 202 次旅客列车重大反革命事件处理报告》中，“提请对李长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周明忠判处死缓刑，对李海清判处无期徒刑，对孙智鹏判处二十年徒刑，对李家寿判处十五年徒刑”。当日云南省革委会讨论通过这份报告，决定判处“现行反革命首犯”李长年死刑立即执行。但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时未被批准。

1970 年 6 月下旬，省公检法军管会通知铁路局整理 202 次旅客列车事件《综合材料》。整理出来的《综合材料》认定“李长年是此案的幕后操纵和现场指挥者，孙智鹏是现场指挥者，谢光亮是射击十八号机车的首犯，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海清判处死缓刑”。铁路局党的核心小组一致通过，然后上报省公检法军管会。但省革委会一位负责人看后很不满意，没有签字而退回。7 月 6 日，铁路局又把《综合材料》标题改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集团”，提请“对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犯李长年、周明忠，同案犯谢光亮，主犯孙智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李家寿死缓刑，判处李海清无期徒刑”，上报省革委会。

1970 年 7 月 8 日，铁路局的报告获得批准。

8月20日，拓东体育场上，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李长年不服，当场喊冤，被刺刀捅穿嘴巴。在押赴刑场途中，李长年含冤死去。

“袭击202次旅客列车”冤案，造成李长年、周明忠、孙智鹏、谢光亮被枪毙，李家寿被判死缓刑投入劳改，李海清被关死狱中。在追查中，还打死一人，株连一百多人，造成自杀一人。同时，受害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妻子被迫离婚、改嫁，有的子女被迫改名换姓，脱离父子关系。

被枪毙的四人简况如下：

李长年，中共党员，时年33岁。1954年参加工作，在铁路局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出席局、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任宜良车务段车队长、党支部书记时，车队被评为先进集体。1964年3月调任昆明铁路局政治部组织部干事。

孙智鹏，时年45岁。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转业到昆明铁路局汽车队，任技术员。

谢光亮，时年30岁。195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复员到昆明铁路局，当驾驶员。

周明忠，时年40岁。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复员到昆明铁路局，当工人。

第十四章

建立“政治边防”中的大迫害

“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又出“左”招：建立“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黄永胜传达林彪的指示：要搞政治边防——建立“政治边防”：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人成为“敌人”——进行“二次土改”：七千六百零五户贫下中农升为地主、富农，三万零六百二十户遭抄家

云南省为祖国西南边疆省份，西邻缅甸，南接老挝、越南，国境线长达四千零六十一公里。云南省又为多民族省份，省内共有二十五个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边防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就成为重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党和政府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了社会改革，对社会发展水平和汉族相同的民族地区，使其与汉族地区同时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边疆处于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的民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对奴隶主和封建领主实行赎买政策，解放了奴隶和农奴，然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或多或少保留着原始公社制而阶级

分化不明显或不严重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在国家帮助下，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正确，所以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云南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日益增强。

“文革”初期，在夺权、动乱最严重的时刻，1967 年 3 月 1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昆明军区：为了稳定边疆，加强对敌斗争，更好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同意对云南省边疆的丽江、保山、临沧、思茅、红河、文山六个专区(州)实行军事管制。3 月 18 日，昆明军区党委决定边疆第一线县的“文化大革命”改为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为了切实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1967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指示云南省军管会，向全省广大群众重申上述命令。

1968 年 8 月，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省革委主任以阶级斗争为纲，既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党和政府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和工作，又否定了 1967 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中，鼓吹在广大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搞“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1968 年 11 月 29 日，省革委主任在全省党代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云南地处边疆，又是最后解放，加上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所推行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特务、内奸、国民党残渣余孽、坏人不少，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在这前后，他到处游说，批判“边疆特殊论”和“民族落后论”，推行所谓“政治边防”、“二次土改”：

“要搞政治边防，而你们那里是礼貌边防、修正主义边防、和平过渡的边防。什么和平过渡，过渡就过渡到资本主义。这是刘(少

奇)、阎(红彦)搞的那一套。就是不发动群众，不搞阶级斗争。怕跑人，坏人跑了就算了。边疆光搞提高文化，搞生产。离开政治斗争、离开阶级斗争去搞文化、搞生产，哪能行？”

“云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区是和平协商土改，还有九十万人是直接过渡区，没有划分阶级成分。为了搞清边疆阶级阵线，有必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成分的问题。划分标准基本上按照内地土改的规定。”

“农村问题，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边疆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你们一个就是办学习班，把清理坏人和地富一起结合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叫他们去搞。要分土地就分土地，要分浮财就分浮财，怕什么。你们先搞一个试点。只要揭开一个，其他就会跟着来。只要群众发动起来，该分土地就分土地，该分粮食就分粮食。要办政治边防，就是要搞阶级斗争。”

在不是处在边疆的大理地区，省革委主任信口开河：“大理这个地区处在边疆，几百里的边境线，又是和平解放，再加上阎红彦、赵健民之流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搞什么‘边疆特殊化’，搞这一套，所以阶级斗争就更复杂了。敌人以派进来、拉出去的方法，在我们这个地区设钉子，设据点，特务据点也在这里设，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在云南留下很多，有国民党蒋介石的，也有龙云、卢汉的，复杂得很，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总之坏人不少。所以希望你们回去要消灭敌人，要打仗嘛。”“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抓，除此以外，都最好来个群众专政。这些事情，就是不要扭送到革委会来，就由你们大队、小队批了以后，斗了以后，斗臭以后，揪出来以后，分别监督他们劳动。”“那些地、富、反、坏、右，解放前、解放后，现在生活都好，就是因为还没有把他们浮财搞光，没有把他们搞掉。我说你们就是要挖掉他，挖他的底子。你们回去好好查一查，就是把这些家伙集中起来，监督他劳动。好的房

子叫他腾出来，让他住草房去。你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你们给他们记工分，我才不给他们记工分呢！我一天要你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我可以派人监督你，你给我劳动去，反正饿不死你就行了。”

在小小的河口县，省革委主任鼓动说：“你们这里有没有土司、头人？（众人答：没有土司，有目老头人，现州里还养一个，县上没有。）对这些人，文化大革命中，你们搞了没有？（众人答：正面教育，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搞这些人，你们究竟是造谁的反？”“瑶山区要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成立了公社还是假的。公社的黑人，你们把他集中起来，一个一个地审嘛！黑人，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坏蛋，不是坏蛋的可能性小。”

云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则鼓吹要进行第二次革命。“云南能否巩固发展，就是要看对敌斗争怎样。一方面，云南是西南最后解放的，反革命、残渣余孽、蒋介石反革命王朝，还有龙云、卢汉等反动势力，这些家伙都跑到这里来了。一方面又是和平解放，这个地方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历来是不彻底的。就是一搞的时候，就怕引起土司、头人的不满，不得了！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指导思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就是搞阶级调和，不敢触动反动头人。”“我们就是要搞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要解决这个问题。”

1969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将省革委主任等召集到北京，研究、部署“政治边防”问题。黄永胜等在听取汇报后说：“林副主席讲了多少次，要搞政治边防”，“要发动群众抓阶级斗争，把坏人抓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组织民兵。”他还说：“政治边防，就是毛泽东思想光芒普照的边防，无产阶级专政的边防，军民联防人民战争的边防，支援东南亚各国人民斗争的边防。”不久后的3月21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了《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报告》要求“加强政治边防，狠抓对敌斗争”。

为了贯彻《报告》的精神，3月17日至4月3日，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建设政治边防会议”。4月8日，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革委会联合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会议中，就几个具体的政策问题提出了意见：（一）对封建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原有的生活补贴一律取消。这些人在省、专、县集中的，要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然后和清理出来的其他坏人一起遣送内地劳动改造。（二）关于划阶级成分问题。1956年边疆民主革命时，有一百五十九万人口的和平协商土改区，由上面派去的工作组内定了阶级成分；还有九十万人口的直接过渡区，没有划阶级成分。为了搞清边疆阶级阵线，有必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分成分问题。在划分阶级中，地、富所有的大牲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对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包括反动土司、头人），在斗争中应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

全省政治边防会议后，即派出了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人，组成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五支宣传队，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代替原有的各类组织和当地民族干部行使各项职权，大搞“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改”。

搞“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改”的主要方式，是将所谓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据统计，共举办学习班二十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五期，参加学习班的达二百三十七万二千六百五十二人次。一个德宏州，就调集上万人组成了宣传队，进驻临近中缅边境的盈江、陇川、瑞丽三个县。

在边疆地区搞“政治边防”，就是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这其中，对爱国进步人士、统战对象等强加各种罪名，进行政治迫害。通过一年的斗争，获得了“搞清了政治阵线”、“全面揭开了边疆地区的政治斗争盖子”的所谓“胜

利”。据不完全统计，揪出了“九种人”① 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人，拔掉了“定时炸弹”七百多个，揪出“反动”土司、头人八千一百一十五个。这些所谓的“敌人”，有的被管制劳动，有的被剥夺公民权利，关了起来。陇川县对这些人规定了五个不准，即不准结婚，不准烧干柴，不准住瓦房，不准每人每顿饭超过二两，不准养猪鸡。在迫害的狂潮中，德宏州有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一人被迫逃到缅甸，红河州沿边境一线的苗族、瑶族、苦聪族有二百五十户、一千三百一十一人被迫逃到越南。就这样，建立起了“政治边防”。

在进行所谓“第二次土改”中，重新划分了阶级成分。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进行了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 1950 年到 1953 年春，党和政府又在新解放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土改。在土改中，划分了阶级成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是什么呢？1947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工委在《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划分阶级应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如再提出其他标准都是错误的。追历史只能追到当地新政权建立以前三年、五年，而不能追到太远或追几代。”1948 年 1 月 12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也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惟一标准。……农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

① 九种人，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租)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惟一标准。”

云南的“第二次土改”，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却是对“文革”的态度和在“文革”中的表现。再具体一点，就是“站合队”还是“站错队”。陇川县革委会提出：“划分阶级成分，看解放前、后三年，特别要看‘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年。”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一些“站错队”的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被划为“地主、富农阶级”，而一些“站合队”的地主、富农改为劳动阶级。保山地区施甸县为了将“站错队”的人划为地主、富农，实行专政，不惜一切手段，在追历史中竟提出了“三年不行看十年，十年不行看三代。黄土要挖三尺深，清理阶级队伍要翻三代，三代没有问题也要划。”施甸县城关镇党支部书记杨汝南被定为“站错队”，在查了他家三代都是雇农后，还是把他升为“破落地主”。

文山州在重划阶级成分中，采用各种手段，给“站错队”的人戴上“地主、富农”帽子。一是横加罪名。西畴县莲花塘公社小锡板大队提出：“现在不搞‘三忠于’活动的就是不忠于毛主席，不忠的统统划为地主。”者项生产队连续三天划不出阶级成分，就横加“不忠于”的罪名，将 1949 年前讨饭的贫农龚开华、龚开堂划为“中地主”。二是诬蔑陷害。富宁县木央公社木央大队的一位生产队长，因“站错队”，被诬蔑为“富农”，并被诬蔑打死人而进了监狱。“站错队”的人被划为“地主”、“富农”，财产就要被没收，还要搬家。麻栗坡县南温公社城子大队贫农王开成，因“站错队”被划为“富农”，最后三间瓦房被没收，多次被逼搬家。王开成不肯搬走，竟遭到毒打。与此相反，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因“站合队”而改变了阶级成分。麻栗坡县麻栗坡公社牛滚大队地主李廷荣，因“站合队”、揪斗干部有“功”，被降为中农。在这种黑白颠倒的情况下，一些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就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富宁县城关公

社城关大队富农子女罗某某兄弟二人，将曾揭发过他们犯罪活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盘金贵划为“富农”，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并毒打成重伤而导致死亡。盘金贵，瑶族人，劳动模范，曾到北京参加观礼。

在重划阶级成分的同时，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站错队”者和升为“地主”、“富农”的干部、群众进行抄家、罚款。当时提出的口号极富煽动性：“土改夹生”，“社教走过场”、“民主革命不彻底”，现在要对他们“挖地三尺，扫地出门”，“海底捞针，杂草里面捉大鱼”。有的地方又搞扩大化，即使是贫下中农，只要谁家的房子新、东西多、生活过得好些，就要被划为地主、富农，进行抄家。当时的原则是“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光，组织上搞垮”。巍山县庙街公社新华大队新庄生产队中农刘文杰，被宣布为“漏划富农”后，即被查抄了全部财产，封了房子。同时对刘文杰捆绑吊打。最后，刘文杰被逼无奈，上吊而死。大理州宾川县平川公社逐级成立“没收财物小组”，对“地主”、“富农”逐户翻箱倒柜，查抄财物，洗劫一空，对超过中等生活水平的户也查抄财产，连产妇吃的鸡蛋也被查抄没收。社员杨淑昌，双目失明，生活困难，其小孩读书住校有床被子，星期天孩子将被子带回家用，也被强行没收。当杨淑昌紧拉着被子不放，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时，被踢倒在地。保山地区有些县抄家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纠集一伙人，举着红旗，抬着毛泽东像，扛着毛泽东语录牌，来到被抄户，首先勒令被抄户的全家人跪在门外，然后进去一伙人，除破旧东西外，将全部财物抄走。二是把被抄户全家人赶出家门或带到别处，然后一伙人涌入家中，翻箱倒柜，抢劫一空。

“二次土改”搞乱了阶级成分，破坏了社会经济。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定为贫下中农而被升为地主、富农成分的有七千六百零五户。陇川县在几天内就乱升划阶级成分二千一百四十六户，把三

百五十七户贫下中农划为地主、富农，把一百八十八个贫下中农和五十五个地主、富农子女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把二十五户地主、富农分子降为劳动人民。施甸县把“站错队”的九百零三户贫下中农升划为地主、富农，其中，基层干部、党团员三百三十五户，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富宁县把四百余名贫下中农升划为地主、富农。据上述地、州、市不完全统计，在重划阶级成分的同时，共抄家三万零六百二十户，抄家财物估计价值一千多万元。所抄财物包括木材、牲畜、农具、铜炮枪、火枪、佩刀、黄金、白银、衣物、铺盖、粮食、食品、缝纫机、收音机、单车、手表、存款存折、房屋、装饰品等几百个品种，甚至连鞋袜、杯盘、碗筷、食盐、水果糖等也没收。经过“二次土改”，群众的生产热情急剧下降。他们说：“粮食多了要拿走，收入多了要没收，住房好了要充公，生活好了要当地、富。”“不要存钱，有点吃点，吃光用光，生活富裕了要遭殃。”施甸县仁和公社热水塘大队第八生产队，原来人均口粮五百八十斤，日工分值一元二角，重划阶级成分后，人均口粮下降到三百斤，日工分值下降到三角多一点。“二次土改”，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1971 年 7 月，周恩来收到了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德生转来的一份关于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重划阶级成分时产生的副作用。23 日，周恩来就此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我们“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提出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①。

①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第 470 页。

第十五章

云南特监中的抗争

从北京回昆明——云南省第三监狱，非人的折磨——上血书——惨无人性的审讯——斗争：第一次绝食——转入云南省第二监狱——斗争：第二次绝食——再上血书——斗争：第三次绝食——一千二百七十页、十八万言：巨篇申诉书

1970年1月19日，押着赵健民的汽车从昆明飞机场驶出，又在市区转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三点钟，方开进了位于昆明西南四五十公里的云南省第三监狱。

赵健民被关进了三监东北角单独建造的一个大院落里。院里都是单间，共有四十多个。赵健民走进屋就问："你们把我关到三监了？"专案组组长赵维廉十分惊异，慌忙追问："你怎么知道？""我是管工交的。曾来这里看过，准备把三监改成拖拉机厂。"赵健民当时可曾想到，三监没能变成拖拉机厂却成了关押自己的牢狱?!

第三监狱看管制度之严厉，大大超出了一般监狱，以至后来赵健民称之为特监。这里，车从正门进来，要从暗门出去。四十多个房间的院落，只关着赵健民一个人。一扇铁门隔开的里外间，赵健民被关在里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放在外屋。十多个平方米的里

屋，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没有书，没有笔，没有报，只有堆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堆稻草，上面放着一床被褥，一只便桶放在另一个角落里。一日三餐都是从门上的一个洞子递进屋。喝水，需要报告，允许后也从洞子递进屋。每天早晨出屋涮一次便桶。看守人员天天都往水泥地面上泼水，水流到稻草上，稻草发潮发霉，躺在上面浑身难受。赵健民面对这难以忍受的环境，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看管制度，给一张床。从进到三监到当年8月23日，他前后要求了十八次。只是几个月后才送来了一张破床，其他毫无改变。

看管赵健民的人大都是持"八派"观点的。有两名军代表，两三名第三监狱的人，其余都是"八派"的积极分子。这些人是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和刻骨的"阶级仇恨"看管赵健民的。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同赵谈话。

自1月19日关进三监后，再没有人来找赵健民，既没有人审讯，也不见人要材料。时间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地消逝着。整天整夜，赵健民只身面对着四壁，听不到人声，也听不到狗叫，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一个人，哪怕是最喜欢沉默的人，最厌烦交往的人，也难以忍受这种长期与世隔绝的死一般的境地。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啊！在四周，没有人脸，没有声响，除了自己没有活物，好像世界上的生命都已死绝，什么也不存在似的。赵健民常常久久地站立在窗户前，一扇玻璃上涂满了黑油漆的窗户前，希望能从这里听到一点动静，看到一点景物。可怜，玻璃被油漆蒙蔽着，面前黑糊糊的一片，不能给赵健民任何一点信息。

在难挨的孤寂中，赵健民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衰弱，生命之光一天比一天黯淡。一天早晨，他出屋去涮便桶，当看到看守人员时，努力着想同看守说几句话。然而，看守那木然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一双嘴唇紧闭着。赵健民连这一点交流的机会也没有找到，他失望吼了一声："你是个哑巴吗?!"得来的是几声呵斥。

但是，赵健民是理智的、坚强的。他没有发疯，没有流泪，也没有狂歌当哭。他只有一个顽强的信念：我是正义的，我要斗争下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七个月，但还是没有人问。赵健民想，再也不能过着这死一般的日子了，必须采取行动。

1970 年 8 月 23 日，赵健民从墙上发现了一颗铁钉。他用力将钉子拔下，准备用钉子作笔，用手纸当稿纸，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抗议。可是，没有墨水。怎么办？赵健民想起了京剧中的咬破手指书写血书的情节。他用牙使力地咬破中指，可是一次只能挤出一点血，根本不够用。于是，又用钉子刺扎手心，想用手心的血来写。但手心破口处只冒出几滴血珠，还是没法写。赵健民突然想起，鼻子破了会出许多血，就用拳头打破自己的鼻子。血，立即流了出来。他一手用刷牙缸接着流出来的鲜血，一手拿缠有布条的铁钉蘸着鲜血写着：

> 云南省革委谭主任，周、陈、鲁、刘、黄、李、徐、段副主任：①
>
> 我回昆明已近八个月没人问，请告我：(一)我究竟有什么错误罪行？(二)请准我写一报告。(三)请准我把家里马列书拿来学。(四)请准我同家人见面。(五)请把看守制度按北京原则改一改。这种意见我口头已提过十八次了。
>
> 赵健民
>
> 70 年 8 月 23 日

---

① 谭，即谭甫仁；周，即周兴；陈，即陈康；鲁，即鲁瑞林；刘，即刘明辉；黄，即黄兆其；李，即李毅；徐，即徐学惠；段，即段宝珍。

血书写好后，赵健民交给了看守。过了约三个小时，一阵摩托车声传进了赵健民耳中，他知道血书送了上去。摩托车声消失后，周围又是一片寂静。寂寞中，赵健民在等待着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反响。

血书，终于促成专案组的“光临”。

9 月 3 日，专案组组长赵维廉、副组长任某等来到第三监狱。看守人员刚将赵健民带进办公室，赵维廉就给赵健民一个下马威。赵维廉指着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的照片一本正经地对赵健民说：

“我们是代表毛主席来的。”

“周总理才能代表毛主席。”赵健民不慌不忙地说，紧接着问了一句：

“是不是毛主席委托你们代表他？”

赵维廉立时满脸涨得通红，厉声地喊：

“不老实！不老实！”

第一个回合，赵维廉失败了。

“我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要求讲清楚。”赵健民想尽快进入正题，借这个机会将被捕的问题、“文革”中的问题一件一件地讲清楚。

“那你讲吧。”赵维廉不情愿地说。

实际上，专案组根本不情愿让赵健民讲。在赵健民讲述的过程中，赵维廉命令看守将赵健民双手背到身后，戴上了背手铐。赵健民十分气愤，强忍着疼痛，坚持申辩。这时，赵维廉打了个手势，示意看守将手铐弄紧。一时间，手铐卡到了骨头，疼痛钻心。赵健民满头大汗，立即停止讲话，以示抗议。

一天审讯下来，看守押着赵健民回到了牢房。一进房门，就开始了惨无人性的折磨。他们将手铐一打到底，钢刃卡到了骨头。

然后，一边一人，将赵健民拥过来推过去。赵健民的两只胳膊痛得似如刀割。他用尽全身的气力大声抗议着：

“你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我是中共党员!”

“还没有开除我的党籍!”

审讯中，任某作记录。他不是当场将原始记录让赵健民签字，而是回去把原始记录另编一套，其中加上许多伏笔、暗语，再让赵健民签字。赵健民看透了他们整人的鬼把戏，拒绝签字。气急败坏的任某辩解说：“上面规定记录整理以后再签字。”赵健民坚决地表示：“我只在原始记录上签字。修改了的记录我不签。”

这样的审讯持续到9月7日，前后共五天。

9月15日，赵健民用铁钉在墙壁上刻诗一首，记录了这次法西斯式的审讯。

九月初审讯有感

报云南省革委谭主任，周、陈、鲁、刘、黄、李、徐、段副主任。抄报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①：

审讯不准我申辩，只问片面严上严。
说明事实也不准，压制禁讲不全面。
钢铐紧箍血骨肉，道道血沟不堪言。
运用骗术摸题目，知题更怕我摆谈。
明告拟题不准讲，禁人申诉法难言。
笔录有些系编造，摧残威压难改变。
种种做法真荒唐，主席思想不沾边。

① 林副主席，即林彪；周总理，即周恩来；康老，即康生。

我本党的忠良者，历史事实尽证鉴。
光天化日遭此遇，事属个别非自然。
唯物辩证得正结，形而上学案错偏。
我争真理信心大，主因太阳明高悬。
一靠钢铁事实在，二靠两论① 武器坚。
关键依法准申诉，禁我申诉欠全面。
时间快到三年了，接受教训速转变。

遥望北京呼主席，指人了解请莫缓。
我案将近三年久，拖延难决因主观。
事实如让我摆出，人证物证昆明全。
唯物辩证符合否，任人分析任评判。
时间不过三五日，统一认识不费难。
党的工作不再损，亲痛仇快可立变。

赵健民

1970年9月15日于昆明荒郊特监中

审讯过后，在专案组的指使下，看守们对赵健民的迫害更为严重了。

审讯后的四十多天里，看守给赵健民整整戴了三十四天的背手铐，一双手，都变成了黑紫色。整夜间，看守把赵健民牢房内的电灯开着。100瓦的灯泡射出的刺眼的光亮，吸引来一二百只蚊子集聚到房内，咬得赵健民通宵不能入睡，身上布满了一片接一片的红疙瘩。赵健民要求把外屋的电灯也打开，以分散一些蚊子，看

① 指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

守就是不答应。看守还对赵健民采用断水的办法。一次，连续四天不给水喝，也不给汤喝。任赵健民怎样要求，就是不给。渴得实在不行了的赵健民，只好在夜间趁看守不注意时喝几口便桶里的尿水混合物。看守又从吃饭上打主意。每顿饭只给一两米饭，离吃饱相差太远。开始，赵健民要求多给一点，让吃饱，看守答应下一顿饭多给，但就是不兑现。赵健民明白了，这是在有意识地折磨自己。面对着残酷的迫害，赵健民不得已采取了惟一的斗争方式——绝食。一次，看守递进饭来，赵健民一看又是一点点米饭，即宣布："你们不让我吃饱，我不吃了。"绝食斗争进行了两天后，一个身穿毛料中山服的干部来到牢房，对着赵健民作了保证："我保证让你吃饱饭。"赵健民这时才开始进食。此后，迫害稍微有些收敛。

赵健民后来回忆说，在第三监狱这段时间，是遭受专案组迫害最厉害的一段时间。

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展的清查① 运动中，专案组组长赵维廉到北京，当面向赵健民检讨错误，同时要求赵健民对他的提升给予帮助。这时赵健民已调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赵健民严肃地问他："当时你叫人给我戴背手铐，并来回拥我，后又叫人给我戴了三十四天背手铐，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作为吗？你还讲一点人道主义吗？"赵维廉离京后，赵健民给昆明军区党委并赵维廉本人一信，信中要求赵维廉"有问题承认问题"，至于"提拔一事"，赵健民说，"我提不出任何意见"。

1971年3月，赵健民被转押到位于昆明市北郊林家园的省第二监狱。这是一个大监狱，能够制造吉普车。赵健民被关进经过改造了的"犯人禁闭室"——惩罚犯人越轨的地方。

① 指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犯人禁闭室"是个独立的院落，面西背东。西面是院子，有十多个平方米，院周围是高约七米的围墙。东面是房子，房子被从中间隔开，南面一间住着看守人员，北面一间关着赵健民。关赵健民的这间牢房，约有七个平方米；靠北墙，砌着一个有三块砖高的床，床上铺着木板，放着被褥，另有一个存放日用品的纸箱和一个带盖的便桶；西墙上装着一扇大铁门，整日严严实实地关着；南墙上开了一个一块砖大小的窥视孔，供看守人员使用；东面整个是墙。四周的墙，都是用木刨花板和木刨花做成的，撞上去，软软的。显而易见，是防止赵健民撞墙自杀。赵健民摸了摸、看了看后心想：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房顶上有一出气孔。因为屋里没有窗户，大门又是紧闭的，所以，虽有出气孔，也形不成空气对流，在屋里觉得闷得慌。经赵健民强烈要求，监狱管理人员在铁门上开了一扇小窗，空气可以流通了。

这里，每顿饭都由看守送，也能够吃饱。便桶由赵健民自己倒。这里有书读——一套《毛泽东选集》，有报纸看——一份《人民日报》，不过，是早上送来，晚上再收回去。总之，二监比三监的环境、管理制度要稍好一点。

有了《人民日报》，赵健民感到宽慰一些，他每天研读不止。过了些日子，载有国际时事的副刊突然不见了。赵健民问看守，看守支支吾吾地说："没送来。"可是，一连数天都没有副刊。赵健民明白，是给砍了。为了争取阅读副刊的权利，赵健民开始绝食。这是第二次绝食。为了迫使赵健民进食，专案组又给赵健民戴上了背手铐。但无济于事。这时，一个人劝说赵健民："为了一张副刊，值得绝食吗？"赵健民回答："我不了解国际时事不行！"硬的，也铐了；软的，也诱导了，赵健民仍坚持绝食。不久，手铐给取下了，副刊也送来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转眼，时光推移到1971年11月。自上年8月23日上血书提出五项请求，9月初审讯，至今已十四个月了。十四个月中，既没有满足请求，也没有再讯问。这样下去不行，赵健民决定再上血书。

11月26日，赵健民搞破鼻腔，把滴滴鲜血盛在刷牙缸中，用一根缠着布条的竹棒当笔，开始写第二次血书①。

为四请求再上血书②

云南省委、省革委，并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

我被关押已四年，四年中始终没人告诉我，我究竟有何罪行。我虽声明无罪过百次，但始终不准我写一诉状呈上边。这做法在新中国未闻未见。我大呼我无罪，要写诉状见青天。……

血书写到这里，被看守发现。看守一面喝令停写，一面按电铃叫人。一会儿，跑来几个人，将刷牙缸中的血倒掉，强迫赵健民到院中的自来水管处洗脸。血书写不成了，赵健民就采用绝食的办法进行抗争。

1971年11月26日下午，赵健民开始了第三次绝食。27日、28日两天，专案组人员、看守人员轮流劝说赵健民进食，有的人端着碗，边吃边劝，赵健民坚决拒绝。28日晚十一时多，一个身穿军装的负责人走进牢房，云南省民委的副主任木恺做记录。这个负责

① 血书写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扉页上。

② 四请求，即请准给笔、纸，给中央、省革委写报告；请准把家中的马列书、历史书拿来阅；请准与家人见面；请准将看守制度照北京的改一改。这四请求同1970年8月23日的血书中的后四条相同。

人一开始严厉地说：

"赵健民，你这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语调平和下来，"你不是要求我们告诉你是什么问题吗？可以告诉你。"

"我要文字的。"赵健民说。

"可以。"

"你不是要给中央、省委写交待材料吗？给你纸，给你笔。"

"你家里的马列的书也可以给你。"

"同家人见面问题，暂不谈。"

"旧社会的牢狱还准许犯人每星期同家人见两次面。我被关押近四年之久，不让见家人一面，还有人道主义可言吗?"赵健民顽强地坚持这一条。

"那我们考虑一下吧。"负责人应付了一句，接着说，"我们答应了你的要求，该吃饭了吧?"

"可以。"赵健民回答。

片刻，看守端来了一碗面条。这样，赵健民结束了长达两天半的第三次绝食。

四天后的12月3日，专案组派人送来了笔和纸。这是四年来第一次准许写申诉材料。摆正纸，提起笔，赵健民的感情就像打开闸门的波涛，奔腾而出。每日，赵健民都伏案疾书。书写中，因担心专案组中途有变，一点也不敢怠慢。写了"文革"部分，又写历史上被捕问题。写了历史上被捕问题，又写1967年3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康生谈话问题。最后，将1969年1月20日后在狱中写的诗词和血书也凭记忆写了下来。赵健民将材料全部编上页码。赵健民写一天，专案组就把材料收走，最后一统计，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多张，达十八万言。一位专案组人员指着诗词和血书说："你还写这个，这不是惹祸吗?"赵健民理解他的好意，意味深长地说："想到哪就写到哪。"

这里，笔者将赵健民的十八万言申诉书的开头部分抄录如下。

云南省委、省革委，并报敬爱的毛主席、中央，并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

现报上四年以来第一次准我写的交待材料，请阅，请指正。

四年中，《毛泽东选集》四卷我通读了十遍，其中的重点著作我读了十几、二十遍；五篇哲学著作①，其中有的百分之八十多、有的百分之九十、有的百分之九十五我可以熟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我可以背熟百分之八十五，所有不背的百分之几都是属于举例的段落。此外，老三篇、诗词②，在去年上半年我就背熟了。关于活用③ 的问题，在我写的第一次交待材料里就有所运用，不恰当之处亦请指正。

我提三个请求：(一)请准我把家里的马列主义书和历史书拿来学。(二)请准我同家里的人见面。(三)请按北京专政机关的办法改一改现有看守制度。此三个请求请考虑同意。

敬礼

赵健民

接下来，赵健民写、抄了三首诗，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期望。

---

① 指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

② 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和诗词。

③ 当时提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

四年第一次准写交待材料有感

四年第一次，准写材料篇。
材料一报上，真相见青天。
同意我所报，误会冰释然。
如有疑问处，摆开彻底谈。
过去做法改，准我畅所言。
事实是基础，两论剑开山。
不过三几日，尽释各疑团。
由我青天鉴，明察正处断。
亲痛仇快事，即可化灰烟。

有感书曹植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据记载，当年曹丕欲杀曹植，下令曹植五步之内作出诗章。曹植五步诗出，引起曹丕骨肉之情，使曹丕黯然泪下。书曹植诗，只是取其某种意义上的一点有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其他皆无所取，更不能把一千七百年前的时代、人物、事件同我们今天相比，那样做和了解都是荒谬的。

书曹植诗有感

同志本同志，兄弟本兄弟。
专政对象错，自家害自己。

时间已四载，不明无道理。
豆萁应熄火，不要把豆欺。
兄弟关墙内，御侮团一起。
孺牛仍孺牛，尽瘁死后已。

再往下，赵健民有针对性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三段语录，当时称为“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以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赵健民的十八万言申诉书的结束语部分，辩理有力，字字句句透出一股忠贞、刚毅之气。

根本问题还是要看，我究竟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边境的文化大革命搞乱”，在历史上“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叛徒”，在1967年3月1日同康老的谈话是“反中央反毛主席的”，还是不是这样，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和斗争的”，在历史被捕问题上“是一个政治坚定的，能以生命作条件捍卫党的利益的，在同敌人斗争中增加了党的荣誉、扩大了党的影响的，是一个李玉和式的共产党员”，在1967年3月1日同康老的谈话“是爱护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利益的，是出于责任心向中央反映意见的”。以上，当然是两种相反的本质。是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是前者，我说那自1968年1月21日监护审查以来我所作反映意见、要求的七件活动都是反革命的行为。这是我说的，我这个话是算数的。在北京，我也向专案组讲过。如果不是前者而是后者，那自1968年1月21日监护审查以来我所作反映意见、要求的七件活动都是革命的行为。从根本上讲，是后者是不需要辩论的。

最后，赵健民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我所写的材料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主要的就是一百多件事实，再就是对事实所作的分析。历史上被捕的问题，我列举了十几件关键性的现在都有人证物证可查的事实。另提出，1968年3月31日我报中央、中央文革的信，是我历史上被捕问题全面的全过程的情况。那里边是由一系列的事实组成的。……关于1967年3月1日同康老谈话问题，我把那次谈话的内容回忆写出

来了。其主要内容、精神，我保证是不会错的。另外，那次谈话，当时有人记录。记录是可靠的。对那次谈话，我也进行了分析。

以上三大问题，我列举的事实，是否是客观的全面的全过程的具有内部联系的事实，分析以及分析所用的法则是否对，请审查指正。必要时，我还可以再作第二次检查交待。……

（二）时间已经四年之久了，我想专案组对我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全面的全过程的具有内部联系的并作了科学分析的调查报告或调查报告材料。因此，我请求可否将该调查报告或调查报告材料给我看一看，以便我进行检讨或作某些说明。

（三）对于我这次所写的交待材料，领导上、组织上如认为需要的话，可以公布，以便让广大革命群众评论、批判。……另外，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日记，都可以全文公布。

（四）我请求云南有关领导同意我另外的三件请求，这三件请求是：

1.准把我家里的马列主义书和历史书拿来学习。

2.准我同家里的人见面。

3.按北京专政机关的办法，改一改看守制度（把一些完全不需要的改一改）。

对于这三件请求，根据主席有关指示——把专政对象改造成新人，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专政与改造相结合，根据我的问题的情况——四年来未定案，我请求同意。

赵健民

1972年1月14日

申诉书后附了一个请求从家里取书的目录：

1.列宁选集；
2.列宁哲学笔记；
3.列宁主义问题；
4.苏联共产党历史；
5.政治经济学；
6.五大名著；
7.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8.哲学词典；
9.经济学词典；
10.史记；
11.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
12.世界通史讲义；
13.苏联通史；
14.中国地图；
15.世界地图；
16.历史地图；
17.范文澜历史著作各种本。

读者今天看了这个书目，不知有何感想？

十八万言的申诉书送走了，赵健民似乎感到轻松了些。然而，斗争还未有穷期。

第十六章

青史不容污

历史的追忆——远离故乡，寻找中国共产党——《乡村教育与中华民族解放》的演说与加入共青团——中共山东党组织遭受特大破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独立组成中共济南市委和山东省工委——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中共北方局——新省委的组织部长——起草《为抗日救国，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宣言》——危险时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被捕——酷刑面前，坚强不屈——攻心面前，义正辞严——死神面前，舌战韩复榘——狱中党支部书记——公正的历史结论——无耻的陷害

1972年上半年，专案组接连询问赵健民几个月。询问的中心问题是历史上被捕一事。他们一心要把赵健民打成叛徒。赵健民摆出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证明自己不但不是叛徒，而是以年轻的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

在约半年的时间里，赵健民时常抚摸着左腿膝盖上的伤疤，陷入历史回忆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强烈地刺激了追求光明、进步的十九岁的赵健民。他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认定了国民党背叛了三民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但是，他这时还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个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党。他把希望寄托在对国民党的改造上。

为了寻找改造国民党的道路，1931年秋，赵健民离开了故乡山东省冠县，考入设在临清县的六县联立简易师范。入校不久，学校举办了学生自由演讲会。赵健民在会上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演说。这是他一生中的首次讲演。在演说中，他历数了国民党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丑行；指出必须清洗党内腐败分子，改组国民党，使之真正实行三民主义；号召大家都来尽责任改造这个党，因为顾名思义，国民党即国民的党。

1931年冬、1932年春，赵健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找共产党，1932年暑期，他中断了在临清师范的学业，以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当时的录取率还不到百分之八。

省立第一乡师，创办于1929年8月，1934年1月改称为山东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简称济南乡师。济南乡师学制四年，培养的目标是农村小学教师。该校首任校长鞠思敏，是一位负有盛名的教育家。他思想开放，治学民主，同情革命，爱护学生。在鞠校长和一些进步教师的倡导下，济南乡师形成了爱国、民主、团结、进步的良好校风。乡师校园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建校三个月后，中共济南乡师支部就诞生了。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乡师党支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带领学生、群众开展校内校外斗争。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济南学生赴南京请愿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支部书记潘复生任请愿团总指挥。在斗争中，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被捕，但斗争的波澜从未平息。乡师

党支部富有战斗力，所以被誉为“白区里的一所红色学校”。赵健民进入乡师，犹如鱼之得水。

到济南不久的一天中午，赵健民正在经二路一家饭店吃饭，忽听街上人声嘈杂。出来一看，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执法队用卡车押解“犯人”前往刑场。只见卡车上的人气宇轩昂，一脸正气，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赵健民的心被震撼了。他认为这个硬汉子准是共产党。赵健民还不时地在街头、路上看到“打倒蒋介石！”“工人联合起来！”的标语。他知道这是共产党撒的。在乡师，赵健民经常听到共产党领导山东各地农民举行暴动的消息，常常看到有些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他坚信，共产党就在身边。可谁是共产党呢？赵健民在焦急地寻找着。

不久，乡师组织了一次演讲竞赛会，规定每班推选一名学生参加。赵健民所在的四级二班一致推选赵健民。讲演会上，赵健民作了题为《乡村教育与中华民族解放》的讲演。他的讲演内容密切联系实际，从国际形势到民族危机，从民族危机到唤醒民众，深受大家欢迎。讲演结束，赵健民被评为第一名，并得到了五元钱的奖金。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讲演引起了党组织对赵健民的注意。

讲演会后，乡师党支部即派二级学生、共产党员姚仲明去做赵健民的工作，以尽快吸收赵健民入党。姚仲明与赵健民同为鲁西人，一谈就谈得来，而两人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社会问题。当谈到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时，姚仲明告诉赵健民，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当谈到中国的出路时，姚仲明告诉赵健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赵健民表示要参加共产党时，姚仲明答应帮他寻找。1932年11月，是赵健民政治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一天，姚仲明告诉赵健民，要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解释说，二十四岁以上可参加共产党，二十四岁以下参加共青团。几天后，在学校东面的农家菜园子里，团济南市委负责人宋天民同赵健民进

行了谈话，给赵健民详细地讲了参加党、团组织的基本要求，最后庄严地宣布，吸收赵健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赵健民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3年，是中共山东党组织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年。2月下旬，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导致省委、团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二十九位重要干部被捕，济宁、泰安、青州等地党组织也相继遭破坏。济南乡师党支部同时遭到破坏，三名共产党员被捕。不久，原省委秘书长张北华自动组织起临时省委，团省特委也组织起来，革命斗争又复苏了。四月的一天，团省特委组织部长宋天民带领赵健民向团省特委书记宋澄汇报了乡师支部的工作情况。5月初，宋天民指定赵健民担任乡师党支部书记兼济南北区巡视员，负责乡师、鲁丰纱厂等处党的工作。正当赵健民开展工作之际，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在宋鸣时的带领下，敌人破坏了临时省委、团省特委及山东各地党组织，逮捕党、团员三百多人。此后，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陷入了严重困难的境地。

在敌人的大破坏中，济南市的中共党组织幸存下来的只有济南乡师和新城兵工厂两个支部，而且失掉了与上级党组织的一切联系。形容他们是汪洋大海中的两叶孤舟并不过分。此时，济南乡师支部和支部书记赵健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济南乡师党支部积极工作的党员只剩下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四五个人。年轻的共产党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积极而稳妥地独立展开党的工作。危难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了。

他们首先恢复、发展党团组织。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乡师支部决定，在乡师校内及所联系的党组织中，凡继续革命的党、团员，一律合编为一个支部；在发展党、团员中，要确保质量，要执行

慎重、稳妥的方针。从1933年下半年到1935年底，乡师支部在校内共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这些党员个个都发挥了骨干作用。随着校内党组织的逐步巩固和发展，乡师党支部在济南全市展开恢复、发展党、团组织的工作。在同新城兵工厂党支部取得联系后，乡师的党员利用各种关系到全市各中等学校联络进步学生，逐步发展党、团组织。这期间，赵健民先后发展省立高中学生徐运北、林浩，惠商职业学校学生孙洪，省立一师学生刘清禄入党，同时恢复了育英中学学生李秀海的党的组织关系。在发展党、团员中，赵健民牢牢地把握着这样几个条件：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党、团工作，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保守党的秘密，不发生横的联系；执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按时交纳党、团费。所以，党、团员的素质较高。随着各学校党、团员数量的增多，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到1934年春，济南全市已有九个党支部，八十多名党、团员。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加强统一领导，赵健民建议成立中共济南市委。是年5月，中共济南市委成立，赵健民任书记，陈太平（工人）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市委成立后，全市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赵健民也更为忙碌了，他匆匆往返于各个支部之间，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将革命作为自己惟一的职业。

赵健民等在恢复、发展济南市党组织的过程中，还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赵健民依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甚至步行，到鲁西，去鲁北，赴鲁中，跑鲁南，下胶东，冒着严寒酷暑，风尘仆仆，日夜奔波，开展党的工作。据粗略统计，共约行程一万七千八百里。他回原籍冠县发展了冯干才、沙延孝、钱洪勋等入党，分别建立了寿张省立第八乡师和冠县党组织。他通过徐运北的介绍到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发展了王晋亭等入党，重建了三师党支部。他还为阳谷县党员申云浦恢复了组织关系；去肥城发展王西城等数人入党；与莱芜、新泰、金乡的党组织和党员建立了联系。1935年春节，赵健民主持召开了鲁西地区党员代表会议，组建了中共鲁西特委，推举徐运北为书记。鲁西特委隶属于济南市委。经过各地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到1935年底，济南市已有党员一百多人，鲁西有党员二百多人，莱芜有党员一百多人，加上博兴、平原、肥城、金乡等地，全省已有党、团员五百多人（不包括鲁南、冀鲁边、青岛、胶东的党员）。各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急需一个更高一级的组织来统一领导。1935年冬，赵健民第二次去莱芜，与莱芜县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商定，以济南和莱芜党组织为主体组建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运部长，于福臻、陈太平任委员。因刘仲莹不适合在济南工作，由赵健民代理书记。中共山东省工委的建立，标志着1933年被敌严重破坏的山东党组织恢复了元气。

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以赵健民为首的乡师党支部发动群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作用不大的冒险活动，如飞行集会之类，而是采用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在斗争中，他们逐渐摸索出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打击了敌人，唤起了民众，又积蓄了力量。当时，赵健民等尽管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但在实践中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

1934年底，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当局决定对全省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实行会考。实行会考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禁锢学生的思想，迫使学生埋头读书，无暇过问政治。这必然引起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的不满。寒假期间，乡师党支部决定发动全省师范学校的学生反会考。1935年初新学期开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乡师毕业班的学生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会考。这时非毕业班的学

生也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党支部即通过学生自治会会长张万涛，以乡师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向全省师范学生自治会发出了统一组织反会考的倡议书。倡议书一发出，赵健民迅速派人到全省各地师范学校进行串联，他自己先后去莱阳、兖州、邹县、曲阜。一场反会考斗争在全省各师范学校掀起来了。

反会考斗争触动了省政府，省教育厅急电各师范学校提前放暑假，并强令非毕业班学生离校，毕业班学生留校参加会考。同时，散布舆论，诬蔑反会考的毕业生学习不好、害怕会考。显然，教育厅的阴谋是瓦解反会考的力量，给反会考的毕业生施加压力。接着，济南乡师学校当局开除了八名反会考的学生。在高压面前，有的学生愤怒了，表示要针锋相对，把反会考斗争进行到底；有的学生动摇了，急于回家。乡师党支部立即分析了形势，认为硬干下去，不利于团结广大同学，还可能暴露党的组织，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遂决定停止反会考，号召毕业生认真复习功课，以优异的成绩戳破当局的诬蔑。同时，通告全省各师范学校，不进行全省统一行动，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斗争。这次反会考斗争，既打击了国民党省教育当局，又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同情，还保存了党组织及积极分子，是一次成功的斗争。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日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济南乡师党支部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济南市委印制了《为抗日救国告山东同胞书》，在市区和郊区广为散发，并组织一百多名进步学生参加乡村讲演团，到农村进行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当毕业生要进行实习教学时，党组织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校周围农村办起了成人夜校，一面教农民识字，一面进行抗日宣传。赵健民除了组织这些活动外，还与其他人到济南天桥、杆石桥一带秘密组织了“洋车夫兄弟会”，通过这个组织在洋车工人中进行爱国教育，宣传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而开展阶级教育，使“洋车夫兄弟会”成为党领导的一支工人力量。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济南乡师党支部从《新亚日报》编辑李竹如那里得到了《告全体同胞书》后，就像黑暗中见到了灯塔。赵健民立即组织学习，领会中央的精神，同时决定以济南市委的名义翻印，在市区内和郊区张贴、散发。宣传《告全体同胞书》的重大意义，使许多苦闷的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知道了共产党的主张，知道了中共济南市委在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看到了光明，充满了希望。

1935 年 9 月 18 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四周年国耻纪念日。济南乡师党支部决定在这一天举办全校性纪念活动，扩大抗日宣传。学校当局遵照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严禁集会纪念九一八的指令，把学校礼堂上了锁，防止学生集会。愤怒的学生砸开礼堂大门，一拥而进。正要开会时，校长急忙上前阻止，责问学生：

“韩主席有令不准集会，你们为什么违抗？”

在几位党员学生的带领下，同学们纷纷质问校长：

“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甘心情愿当亡国奴？”

“我们为了表示不忘铁蹄下呻吟的三千万东北同胞，为了不当亡国奴，集会纪念九一八，有什么不对？”

“你是中国人，又身为校长，为什么不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

在一片质问声中，校长无言以对，悄悄地离开了礼堂。

不久后的 12 月 9 日，北京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消息传到济南后，中共济南市委决定，立即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声援。12 月 17 日，全市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总罢课。正当市委全力准备全市性游行示威时，韩复榘派军队包围了各学校，限制学生外出，同时命令各学校提前放假，学生限期离校。根据陡然变化了的形势，市委决定不强行组

织示威游行，号召学生利用寒假到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把火种撒遍全省。广大学生离校回乡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工作。

赵健民等在独立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斗争时，一刻也没有间歇地去寻找党中央、北方局，以早日取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自1933年下半年到1935年底，济南乡师党支部、济南市委、山东省工委多次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仅赵健民自己就先后两次到泰安、一次去濮县寻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关系，一次去莱阳寻找胶东党组织。1935年冬的一天，中共濮县党组织来信告诉赵健民，河北省委的一位负责人已到濮县，可派人联系。赵健民接到信后，兴奋得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骑上自行车，迎着刺骨的寒风上了路。赵健民整整蹬了一天的自行车，行程三百六十里，黄昏时宿在寿张县。次日清晨，又赶了一百多里路，来到濮县古云集，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当天晚上，赵健民见到了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直鲁豫特委书记黎玉。在昏暗的油灯下，赵健民向黎玉详细地讲述了自1933年遭敌人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斗争以及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情况，并连夜起草了一份山东党组织的工作报告，请黎玉转交北方局。黎玉扼要地介绍了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嘱咐赵健民要巩固山东各地党的组织，等待北方局的指示。

赵健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兴奋之余，日夜企盼着中共北方局的指示。

1936年3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地处国防前线的华北的抗日斗争的领导，派刘少奇到天津任党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一到任，就领导北方局进行了大量工作。他发表文章，阐明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并通过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切实纠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他加强了各地党的组织建设，4月下旬，派黎

玉以北方局代表、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到济南，恢复山东省委的工作。

4月底，黎玉从河北省磁县到达济南。他按预定的联络地点，找到了在全福庄小学任教的姚仲明，通过姚仲明，与赵健民取得了联系。当赵健民见到黎玉时，内心的兴奋难以抑制。黎玉在听取了赵健民和济南市各个党支部及外地党的情况汇报后，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决定重组中共山东省委。5月1日，新的山东省委① 在济南建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会议决定建立省委机关，调寿张乡师团员刘懿祥负责印刷工作，调济南惠商职业学校党员孙洪、濮县徐庄党员徐宾作交通员。会议上，黎玉充分肯定了以赵健民为首的济南乡师党支部和济南市委在恢复、发展山东各地党组织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了重建山东省委的意义。经过讨论，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展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壮大抗日救国运动的力量；接受过去省委遭受大破坏的教训，积极、谨慎地恢复那些与党失掉联系的县委、支部和党员的组织关系；反对关门主义，注意发展新党员；巩固党组织和进步团体，防止敌人破坏。

省委成立后，按照确定的任务，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为中心，渐次展开了工作。

同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后，中央和北方局的重要文件就陆续传到山东。赵健民三年没有看到中央文件了，当接到中央文件时，真是喜出望外。他夜以继日地阅读，然后，在全面理解中央的方

① 又称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

针、政策、路线的基础上，联系三年来的工作，清理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对赵健民教育最深的是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刘少奇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省委成立不久，决定根据中央精神和山东的实际情况发表一个《宣言》，以扩大党的影响，推动党的工作。《宣言》由赵健民起草、黎玉定稿，题目是《为抗日救国，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宣言》。《宣言》在历数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华的事实后，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完全的日本的殖民地。……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各族同胞，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我全体同胞切不要存在任何幻想。……炎黄子孙岂容倭寇任意奴役，神州大地哪容异族铁蹄践踏。《宣言》又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但不抵抗，反而“围剿”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反动行径，并辛辣地讽刺道，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使“百年来为民族独立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于地下不得瞑目”，让“为中国独立平等而奋斗终身的孙中山先生斥为叛逆不道”。同时指出，“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国民党三思而醒悟。《宣言》还号召山东省的三千八百万同胞和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的广大将士，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督促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救国的一切准备。《宣言》在最后宣告了中共山东省委的八点主张：

(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二)各党各派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立即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击日寇的一切准备工作。

(三)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四)实行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欢迎三路军将士恢复二六年① 北伐时提倡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的精神，英勇地加入抗日联合战线。

(六)打倒汉奸、亲日派、卖国贼！

(七)各党各派抗日人民战线万岁！

(八)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万岁！

《宣言》散发后，在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各阶层人士反映，山东省委的八点主张，深得一切具有爱国之心的人们的欢迎。

1936 年 7 月初，姚仲明被敌人逮捕。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黎玉和赵健民转移到肥城县。他们在肥城住了一个多月，于 8 月下旬返回济南。9 月 19 日中午十二点多钟，赵健民正在聚精会神看文件，省委交通员孙洪满头大汗地闯进屋内，慌慌张张地说：“刘懿祥、徐宾被捕了。”赵健民一听，马上说：“孙洪同志，黎玉同志下午很可能去刘懿祥的印刷室，咱们有责任保卫他的安全。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截住黎玉同志，绝对不能让他去印刷室。”于是二人立即赶到擀面巷，赵健民在南口，孙洪在北口。这时，已有三个特务在擀面巷省委印刷室附近游动。赵健民、孙洪一直等到傍晚七点多钟，也不见黎玉来，就估计黎玉不会来了，即去黎玉的住处。进门一看，黎玉在屋，二人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们将刘懿祥、徐宾被捕的情况告诉了黎玉，黎玉听后认为情况严重，必须迅速转移。接着，黎玉、赵健民研究了应变措施。

当晚，为了使徐庄党组织免受破坏，赵健民电话告知党员郭崇豪：“徐宾病了。”并要郭立即转告徐庄。为了保障寿张乡师党组织

① 指公元 1926 年。

的安全，赵健民起草了秘语电报："寿张民生饭庄王福昌，祥病无大防，特电知。"电报稿拟在记事本上。因为晚上电报局已关门，赵健民第二天将电报发出。几天里，赵健民忙碌着采取应变行动。

9月27日早七时，按事先约定，赵健民与省立一师党支部书记刘清禄见面。赵从刘那里取回了中央文件《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①，同时交谈了工作。刘清禄问：

"党有什么新指示？"

赵健民告诉他：

"基本的形势还是瓦窑堡会议《决议》上讲的。但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广泛了，包括蒋介石也在争取之列。"

"这可能吗？"刘问。

"日本要灭亡中国，是既定目标。不管方式、方法怎样变化，军事上的进攻，政治上的欺诈，或者时间上时而急、时而缓，他们的目的是不会变的。蒋介石如置国家危亡而不顾，不仅全国人民要反对他，就是他的部下，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也会有人要反对他，甚至较多的人反对他。在这种形势之下，蒋介石可能走向抗日的道路。但这只是可能。这种可能，现在还没有争取到。今天，我们还要严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尽量采取合法的方法开展工作、掩护组织。这是非常必要的。"赵健民详细地回答。

快八时了，刘清禄回学校上课；赵健民向住处返回，他准备当天去鲁西。

当赵健民来到铜元局街上时，迎面突然闯过一个人来，抓住赵说："可找到你了，你跟我走。"赵健民一看，并不认识这个人，有些惊讶地说："你认错人了吧？"这个人一面紧紧抓住赵健民，一面说："我没有认错，你是赵健民，是卖假票子的！"赵极力分辩说："你胡说八道！我哪是卖假票子的。"这个人立即从他褂子兜里掏出一沓票子，高举起晃动着说："看吧，这就是他卖的假票子！"立时，过路的人呼啦啦地围上来，赵健民走也走不脱。赵马上意识到，自己被敌人逮捕了。这时，一个警察路过，这个人立即向警察出示证件。警察一看，即抓住赵健民的左上臂，这个人抓住赵健民的右上臂，架着就走。

路上，赵健民不时地看着抓自己的这个人，努力回忆着在哪里见过他。这个人见赵健民看自己，不无得意地说："看什么？我是方春荣。你不是前年去莱芜给我们作过指示吗？"赵健民明白了，这个人是莱芜党组织的叛徒，现在成了国民党特务。

行走中，赵健民想起，自己长衫的兜里还有瓦窑堡会议决议，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就趁特务方春荣和警察不注意，用右手猛然从衣兜里掏出《决议》，填在嘴里吃起来。方春荣一看，动手从赵健民的嘴里挖文件。赵健民就奋力挣扎，咬特务的手。方春荣的努力失败了。围观的群众看着，有的说："真是个卖假票子的。看！他把假票子吃了。"也有的议论说："二十几岁的学生，怎么会是卖假票子的？又是抓共产党吧！"

不长时间，来到小西门外警察所。方春荣用一条绳子将赵健民的两个上臂捆起来，让警察看着，自己进里屋打电话。这时，赵健民又想起平原县党组织用暗语写的一封汇报信还在内衣的兜里。决不能让敌人得到。他试了试，虽然两个上臂捆着，但下臂和手还能动，就轻轻地将信掏出，在大褂底下迅速地撕着。警察发现赵健民手在动，一边喊："你干什么！"一边掀起赵腿上的大褂，这时信已被撕得粉碎。方春荣听到喊声，跑出来将碎纸片全部收起，并将赵健民全身搜了个遍，小记事本、钢笔、零用钱都搜去了。

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派出所，特务们将赵健民押上汽车，直抵省政府内军法处特务队。到了特务队，当即受到刑讯。

① 又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赵健民，告诉我们，共产党中央来的人在哪里？北方局来的人在哪里？"特务厉声地问道。

"什么中央来的人、北方局来的人，不知道。"赵健民斩钉截铁地回答。

问不出来，特务们就动刑。先是将长衫扒掉，用竹鞭浑身抽打。这竹鞭是用三根竹子拧成的，打下去就是一条血痕。一阵猛抽，赵健民的背部、两肋都溃烂了。接着是压杠子。压一次，赵健民昏迷过去，特务们就用凉水浇醒。醒后再压，一连数次。这样将赵健民折磨得奄奄一息。

特务继续追问：

"乡师、兵工厂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员？"

"不知道。"赵健民还是那几个字。

特务们急了，将赵健民仰身捆在长凳上，向鼻子里灌凉水。赵健民被一连灌昏了几次。

之后，特务拿着赵健民的小记事本，追问说：

"你这'寿张民生饭庄王福昌，祥病无大妨，特电知'中的'祥'是什么人？"

赵健民回答："我的同学。"

"祥的全名是什么？"特务继续追问。

"周宝祥。"赵健民急中生智地编造了一个名字。

"周宝祥在哪里住？"特务紧追不舍。

"南上山街32号。"赵健民又编造了一个假地址。

特务立即开汽车直扑南上山街32号。

一会儿，特务返回来说：

"南上山街32号根本没有姓周的。他骗我们。"

气急败坏的特务立即对赵健民施以重刑，六个人踩在杠子上压，赵很快昏迷过去了。特务用凉水将赵再次浇醒，继续盘问：

"你住在哪里？"

"住在高升栈。"赵健民回答。

特务又乘车去查。不长时间特务就回来了，说："赵健民根本没住在那里。"

气愤之极的特务又往赵健民的鼻子里灌了一壶凉水。

随后，特务拿出一张纸来。他们把赵健民撕碎的信粘在纸上，竟粘得一字不差。特务指着纸问：

"这个敬秋是干什么的？姓什么？"

赵健民回答："他叫张敬秋，是莱芜口镇小学教员。"赵健民又编了个谎。

时间已是下午五时多了。赵健民被折磨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特务们也疲惫不堪。看着实在从赵健民嘴中掏不出什么东西，特务只好用人力车将赵健民送到军法处拘留所。

拘留所是一个大间屋，里面关着四五十个犯人。看守把门一开，喊了句："来了个共产党！"犯人立即站了起来，纷纷说："难友来了，欢迎！欢迎！"有的不无钦佩地说："政治犯，为国家的事打官司，好样的！"赵健民艰难地扶着墙说道："兄弟为了抗日救国的事遭人诬陷打了官司，刚到这里来，还不知道这里面的规矩，请各位多多帮助。"犯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坐下，坐下再说！"

赵健民刚坐下，就有四个人靠拢上来。这四个人问赵叫什么名字，赵告诉他们："赵健民。"他们说："听到过你的名字。你这一被捕损失可太大了。"他们又问："你怎么被捕的？"赵健民回答："被莱芜的叛徒方春荣逮捕的。"他们一听立即说："我们也是被方春荣和叛徒刘伯戈逮捕的。"接着，他们介绍说，他们四个人都是莱芜的共产党员，并各自说了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人叫于秉琛。几个人仔细地察看了赵健民背和腿上的伤，又找来一个有经验的老犯人帮着看。这个老犯人确实有眼力，看后说："伤得很重，但不会残废。"

四个人又忙着找来了土制的药——酒拌艾叶，给赵健民服用。赵健民感到一股热流从心中涌出。当夜，赵健民的背部、腿部疼得厉害，难以入睡。于秉琛告诉他，过两天就会轻一些。

从于秉琛那里，赵健民知道可以设法把信送出去。为了保护党组织，他强忍着疼痛给黎玉写了一封信。

语兄①：

我被莱芜一个见过面的熟人叛卖，被特务队逮捕。指证我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要我说出上下左右的关系。他们的这一些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对我施行了各种酷刑。他们这一切，对一个有坚定信念、早已立下"舍生取义"决心的人来说，都是徒劳的。不管前面有什么惊涛骇浪等待着我，我已下定决心："宁为玉碎，决不瓦全"。海可枯，石可烂，浩然正气之节不可变。请放心！愚弟粉身碎骨，决不连累朋友！

弟　赵健民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于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

29日，特务给赵健民戴上脚镣，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赵健民明白，自己被敌人定为重犯。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赵健民听到看管人员在屋外喊："赵健民，有人来看你。"即从门上的四方孔向外一看，见一位二十五六岁的身着黑制服、头戴礼帽的青年男子站在那里。这位风度不凡的男子把一包点心、十元钱从四方孔里递给赵健民。赵健民警惕地

① 当时，黎玉化名冯寄语。

说："我不认识你！不能收你的钱和东西。"边说边往外推。这位男子话外有音地说："点心你吃，钱你用，不要你还啊！"赵健民依然坚持说："我不要。"站在旁边的看管人看到这种情况，起了疑心，问这位男子："你不认识他，怎么来看他呢？"这位男子马上对着赵健民说："唉！你不要误会。你认识张老太太吗？是张老太太叫我来看你的。"赵健民立刻明白了，他是党组织派来的人，忙说："认识，认识，谢谢你来看我。"并把钱和点心收下。这位男子告诉赵健民："张老太太，冯先生，对你打官司的事都很关心，大家正想办法营救你，你放心吧！"赵健民听后激动地说：

"谢谢朋友们对我的关心。请告诉大家，我走这条路，早就考虑到有今天了。官司刚开始，我决心'宁为玉碎，决不瓦全'。不管前面凶险多大，我都会泰然处之的。请大家一百个放心。对于经营的事业，请大家好自为之。"

这位男子关心地问："你需要什么？"赵健民想了想说："如有可能，给一床被吧。""好，一定想法给你送来。"

要分别了，赵健民问："您贵姓？"这位男子爽朗地回答："我是武中奇呀！听说过吗？"赵健民马上想起了黎玉常说的"武氏兄弟"，忙说："听说过，听说过，多谢你来看我。"

他，就是当今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

武中奇走后，赵健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自己被捕的第四天，党组织就派人来了。这种无比的关怀，使赵健民浑身充满了力量。

过了两三天，特务们对赵健民进行了第二次审讯。赵健民进门一看，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负责主审的特务，大叛徒宋鸣时坐在旁边的躺椅上，门口两边站列着七八个打手，方春荣也在其中。赵健民刚一坐下，主审的特务就开了腔："赵健民，咱们谈谈形势。"特务们接受上一次的教训，改用攻心战。

这个特务从共产党创造苏区，谈到长征只剩下几千人，滔滔不

绝。最后断言，红军不久就会被全部消灭。然后，对赵健民说：“你不是要抗日救国吗？那就不要跟共产党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有跟蒋委员长走，才能抗日救国。”说到这里，特务停了停瞅瞅赵健民，又提高嗓门接着说：“想走蒋委员长那条路不难，只要把你知道的共产党的关系说出来就行。”

赵健民轻蔑地回敬道：“你这是胡说八道。你们国民党不是说红军长征要遭石达开的下场吗？现在怎么样，不是胜利到达了陕北吗?！你们国民党说红军不久就会被消灭，可红军东征途中不是歼灭了企图阻拦的阎锡山的七个团吗?！”“你们说抗日救国要走蒋介石的路，这真是笑话！谁不知道蒋介石在日军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接着，赵健民从 1931 年谈到 1936 年，历数了蒋介石的不抵抗的事实。最后义正辞严地说：“蒋介石应该改弦更张，走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路。”

这时，早已恼怒了的大叛徒宋鸣时猛力一拍桌子，吼道：“赵健民！你要做共产党的烈士吗？好！我成全你。”主审的特务也火了，指着赵健民说：“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捕共队。你不要再顽固了。”“你胆子不小，敢要捕共队。你上次说张敬秋是莱芜口镇小学教员，我们派人去找，根本没有这么个人。”赵健民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那你们跑冤枉腿了。”宋鸣时跳了起来，喊着：“赵健民！你别想赖过去，我有办法在你断绝呼吸之前把所有的关系交出来。你的鼻子想喝辣椒水，有的是！”赵健民威武地回答：“宋鸣时，你这一套能吓唬得了出卖灵魂的人，可吓唬不了一个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不要说是什么辣椒水，就是钢水我也想尝尝。”“给我拉出去！”宋鸣时挥着胳膊喊叫着。立时，几个特务架起了赵健民。“让他考虑考虑。”主审的特务摆了摆手，然后转过身来对赵健民说：“赵健民，你再考虑考虑，不然真要做烈士了。”就这样，第二次审讯收了场。

当特务把赵健民押回拘留所监房时，武中奇正挟着一床被子等在那里。“过堂了?”武中奇关切地问。“特务又要了些恐吓的小把戏。”赵健民轻松地说。这时，看管人员说：“到我办公室里谈吧。”武中奇说：“好。”二人就进了办公室。门一关，赵健民问武中奇：“你认识这个人?”武中奇回答：“认识。这次来还送了他两幅字。”于是，二人交谈起来。赵健民一再表示，要按照“一人不怕死，万将无敌”的格言行事。交谈中，武中奇一再用手捏被角，示意内中有东西。武中奇走后，赵健民回到监房将被角撕开，一看，是黎玉的亲笔信。

民弟：

你的被捕，使大家感到震惊，是工作的一大损失。你能在被捕受酷刑的第二天就送出信来，使我们知道你被捕，并决心不连累任何朋友，这又使我们十分赞佩。

现在是国难当头，亡国的大祸，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受奴役的惨局，迫在眉睫，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华儿女，都应当立即抛弃前嫌，停止敌对行动，一致对外。在当前民族危机万分严重的形势下，这一主张，就是过去与我作对的最大的当权者及其部下的大部或全部都是可能赞同的，至于地方的当权者随着形势的发展，赞同的可能性当更大。这一点，吾弟要十分注意，要利用一切场合，阐明我们的主张。这不但对周围能产生有利影响，而且能一定程度地打动有关领导，也可能对吾弟的官司有利。切切，切切！

在外边的朋友，正尽一切可能，托请一切关系，对你进行营救。

顺致

愚兄　阎子岳

10月×日

赵健民仔细地琢磨着信中的含意，决心利用一切场合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0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亲自审讯赵健民。同时被审讯的有四十多个人。韩复榘审讯，不按法律条文，完全按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观念、喜怒哀乐。他还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不看案卷，只听军法官念案情，念得轻，判得就轻；念得重，判得就重；念到应枪毙，韩的右手就从胸脯向前一摆，说声“毙”，拉出去就毙了。

这天下午三时，赵健民和部分犯人被押进省政府。韩是数案一起审。开始是三人贪污案，接着是鲁北某县八个民团团丁通匪案。当念完案情时，韩复榘正眼看了八个人一遍，右手自胸前向外一摆说：“毙！”八个人就被拉走了。再接着是寿张县的乡、村长互相打官司。军法官介绍案情：“×××人告乡长，利用村民的钱财，打拼锅（吃酒席），并从中贪污。经查，没有实据证明乡长贪污，乡长本人也不承认。”韩复榘说：“你们乡长有公事聚会，可以炒鸡子、烙饼，怎么打拼锅多花乡民的钱呢？”长着两撇胡子的乡长申辩说：“回主席，打拼锅，是开会决定的。告我的人，他们也参加吃了，没有多花钱，更没有贪污，有账可查。”韩复榘听了后说：“你这个老头还不错吗，不要打官司了，我给你们五块钱，拿去吃顿饭讲和。回去吧。”韩复榘又了结一案。

接着提上来的是一个拄着双拐缺一条腿的残废人。军法官介绍案情：“这个人叫×××，在西北军×军当过连长，贩卖白面（毒品）七元，经查属实。”韩复榘看了残废人一眼，把右手向外一摆说：“毙。”残废人一听，破口大骂：“韩复榘，我操你八辈祖宗！老子在西北军……”两个执法队员立即架起残废人往外拖，另外两个执法队员拿着军棍狠狠地打。挨了骂的韩复榘，面色铁青。大堂内，气氛紧张得就要爆炸了。

就在这时，军法官喊：“赵健民！”赵健民没等执法队员上来架，就走到了韩复榘的桌前。军法官开始念案情：“赵健民，济南北园省立乡师学生，是山东共产党的首要分子。特务队逮捕他后，他坚决不吐露共产党的真情。他曾去莱芜进行共产党的活动。……”军法官历数了赵健民的“罪行”后说：“特务队宋队长呈请主席枪毙他。”这时，两个执法队员立即抓住赵健民的双臂，准备向外拉。赵健民镇静地看着韩复榘，韩复榘立睖着眼瞪着赵健民。片刻，韩复榘发话：“你是个学生，不好好读书，参加共产党想干什么？”

赵健民胸有成竹地说：“我参加共产党是为了发动民众抗日。主席您看，日本人要灭亡我全中国，民国二十年，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二十二年，又占领热河和河北省长城要塞；同年十一月，以冀东防共自治的名义，控制了冀东二十几县；二十四年，又组成伪蒙政府，占领察哈尔北面大部和绥远北面一部；现在，日本人又积极推行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五省‘自治’。四亿五千万同胞被奴役的大祸就要临头。”赵健民越说越激动，“山东地处沿海，一旦日军大举入侵，必定遭到蹂躏。你作为山东的军政领导人，不但不应压制我们抗日，而且应该支持我们的抗日救国活动。”

瞬息间，韩复榘的身体微微一颤，很快语调平静地说：“年轻人，你向我做起宣传来了。”“我问你，去莱芜干什么？莱芜是山区，你是不是去闹暴动啊？闹暴动，我可不答应。”

“我去莱芜是进行抗日宣传，准备将来日军侵占山东时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至于暴动，我们已经停止了。现在，我们把中国的一切军队都看成是抗日力量的一部分。打内战，不论谁胜谁负，都是

国防力量的损失。"赵健民真是在做宣传了。

这时，站在旁边的军法处处长史荆洲说："这个人坚决得很，特务队抓他的时候，他把共产党的文件都吃了。"这一说，使本已缓和下来的气氛又紧张起来。韩复榘立睃着眼瞅着赵健民。赵健民平静地看着韩复榘，等待着韩复榘一摆手，为国家为民众而就义。自被捕之日起，赵健民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

不一会儿，韩复榘说："送法院，送法院。"就这样，赵健民被关进了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

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是一个两层的方楼。每层楼内有一个十字形的通道，监房都在通道的两边。平常，两个看守坐在十字路口处，隔两三个小时巡察一趟，这样看管犯人。给犯人打饭打水，带犯人上厕所，都由轻罪犯担当。关政治犯的监房，是铁栅栏门，政治犯相互之间可以交谈。赵健民被关在一个单间里。

姚仲明、徐宾、刘懿祥也关在这里。赵健民向大家介绍了外面的形势、中央的方针政策。大家给赵健民讲了看守所的情况。姚仲明提出，要赵健民留在看守所，不要去反省院，并谈了斗争的方法。他说：现时对共产党政治犯，都是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判五年徒刑。如果承认加入了共产党，判刑后就要去反省院服刑。在反省院，按监规半年才能同外面的人见一次面，而在高等法院看守所，每星期可以同外面的人见两次面。所以，不论是从斗争方面考虑，还是从其他方面考虑，以留在看守所为好。你是被叛徒指证而承认是共产党员的，现在可以向检察长提出申诉，说原来承认是共产党员，那是被刑讯逼出来的，并要他验伤。只承认是抗日救国会的成员。这样还是要判刑的。判刑后可以不服判，上诉南京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批下来，至少要八个月，多的达一年。这就可以在看守所多呆些时间，以观形势的变化。赵健民接受姚仲明的意见，向检察长提出申诉，法庭还是判决"以危害民国为目的，

而组织团体，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赵健民即提出上诉，这样一直待到1937年10月被释放。

在高等法院看守所的一年里，黎玉经常派人前来看望，提供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和生活用品，前后有几十人次。

1936年12月下旬，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邹县党员冯起等人被捕关进了看守所，这时，看守所的共产党员达十五六人。为了加强学习和斗争，大家商定成立了党支部，赵健民被推选为书记，理琪任组织委员，姚仲明任宣传委员。

学习马列主义书籍，讨论时事政治，是看守所内共产党员的主要工作。这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西安事变，捉蒋又放蒋；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1937年夏，日军飞机飞抵济南上空疯狂扫射。清脆的高射机枪声传到监房中，赵健民等共产党员再也坐不住了。抗日的烈火在青年人胸中燃烧。大家推举理琪执笔，向南京最高法院请愿，出狱抗日。理琪用古文体书写的请愿书，抒发了这一群年轻共产党人的纯真的爱国之志。

在卢沟桥事变后举国抗日的高潮中，赵健民代表党支部向看守所当局提出捐款支援抗日将士。这一举动，虽出于民族大义，但看守所当局也不敢应允。于是，全体共产党员进行了绝食。绝食斗争，迫使看守所当局答应了赵健民等的要求。

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加强了对韩复榘的统战工作。7月，派红军将领张经武到济南。8月，派张友渔到山东。张经武、张友渔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配合下，多次同韩复榘会谈，终于使韩复榘同意释放政治犯。

1937年10月，山东省高等法院以停止羁押(即找保释放)的名义，将赵健民等人释放出狱。获得了自由的赵健民，立即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

自1933年7月至1937年10月这一时期，在山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上级失去联系的严峻关头，赵健民挺身而出，不怕牺牲，顽强战斗，努力工作，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中，赵健民威武不屈，英勇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对于赵健民这一段历史，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57年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关于赵健民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赵健民同志，又名吴培强，山东省冠县人。1932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现任山东省委书记兼省长。

一、1933年春夏之际，在赵健民同志担任济南市省立乡村师范支委、支书期间，山东省委连遭两次破坏，因此，济南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在此困难条件下，赵健民同志恢复和发展了济南等地党的组织，并组成我党济南市委和山东省工委。到1935年赵健民同志找到直南特委，经直南特委把这一情况转报北方局，1936年四五月间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到济南找到赵健民同志，济南党组织才正式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二、1936年9月赵健民同志在担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期间，到济南检查工作时，因遇到叛徒而被捕。先后押于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在被捕后经过七次审讯，虽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赵健民同志始终没有供出任何关系。最

后韩复榘亲自审讯，决定送反省院"感化"，并且由伪山东高等法院以"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的罪名，判了徒刑五年。赵健民同志为了不去反省院，以不服判决为理由提起上诉，故一直羁押在法院看守所而未去反省院。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才经法院通知，于1937年10月找保出狱。出狱后当即找到黎玉、林浩同志。

上述问题经调查证实与赵健民同志本人交待的情况是一致的。

据此，我们认为：赵健民同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57年10月28日

就是这样一段光荣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忠贞的共产党人，康生等人及其领导的专案组煞费苦心要给他抹黑，要把他打成叛徒。

1971年、1972年这两年前后，专案组奔波于北京、济南、赵健民的家乡山东省冠县等地，行程数万里，耗费巨资，煞费苦心地搜集、调查关于赵健民叛变的材料和证据。仅在冠县，专案人员就住了两年多。他们调查材料的手段是恶劣的，有时近于卑鄙。为了迫使姚仲明证明赵健民是叛徒，专案人员前后找姚仲明二十多次，每次都是逼供式的。一次，专案组的两个人要姚仲明写关于赵健民的证明材料。姚仲明一连写了几天。当专案人员看完材料后，感到不合口味，强迫姚仲明撕了重写。面对着高压，姚仲明怒发冲冠，严厉地申辩："我疯了吗?! 我写了几天的材料为什么要撕?!

实事求是的材料为什么要撕?!我不撕!”两个专案人不由分说地夺去材料,当场撕得粉碎。姚仲明看着两个不可一世的专案人员心中暗说:没关系,底稿藏在地毯下呢!你们再来要,我还是照抄一遍。

调查来调查去,专案组颠倒黑白地给赵健民罗列了几条“叛变”的证据。

其一,供出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周宝祥。

周宝祥本来是一个假名,是赵健民编造出来骗敌人的,当时狡诈的特务也知道是赵健民耍他们的。可是,专案人员使用高压手段,迫使一个老同志证明周宝祥是省委书记黎玉的化名。专案人员又风尘仆仆地从湖南赶到北京,找到了黎玉。黎玉说:“我当时的化名是阎子岳、冯寄语,根本没有叫过周宝祥。”黎玉的否定,给专案人员浇了一盆冷水。但他们怎肯罢休?于是,专案人员在北京又调查了省委三人成员之一的林浩,林浩断然否定说:“当时,我们的党员中根本没有这个名字。”粉碎“四人帮”后,那个在高压下讲假话的老同志,怀着内疚的心情对冠县县委党史办的工作人员说:“要好好写写健民同志。解放前,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坚贞不屈。‘文革’中,又坐牢八年,同康生、‘四人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是冠县人民的骄傲啊!”

其二,供出了寿张乡师党支部书记王福昌。

王福昌,是因为他在接到“寿张民生饭庄王福昌,祥病无大妨,特电知”的电报后,没有及时躲避而被捕的。被捕后也被关在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他在看守所中对有的党员讲,敌人从未问过他任支部书记的事情。寿张乡师的党组织是赵健民发展起来的。自1934年至1936年4月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赵健民先后去过四次,同那里的十多个党、团员都熟悉。赵被捕后,这里的党组织和党、团员并没有遭受不测。

其三,供出了莱芜县委负责人刘盛玉。

在审讯赵健民时,莱芜党组织的叛徒方春荣证明,赵到过莱芜“刘盛玉、刘嘉典(刘莱夫)家”。赵健民知道方春荣了解自己的情况而未加否认。但没有否认怎么能等同“供出了莱芜县委负责人刘盛玉”呢!

其四,供出了共产党员刘嘉典(刘莱夫)。

审讯赵健民时,特务一再追问赵的入党介绍人是谁。赵健民鉴于方春荣一再说自己到莱芜刘嘉典家,方春荣又极为熟悉刘嘉典的情况(方春荣介绍刘嘉典入党),就要弄特务说:“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刘嘉典。”当时,赵健民没有说出自己真正的入党介绍人,如果说出,就是一种叛变行为。也没有说出一个特务不了解的共产党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如果说了,也是一种叛变行为。编造一个特务极为了解的共产党员作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怎么能是出卖这个共产党员呢!

1935年10月,中共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县委委员周茂森及党员方春荣等叛变,出卖了莱芜党组织。在刘、周的带领下,国民党的捕共队逮捕了六名共产党员。11月,在北平(现北京)读书的刘伯戈的内弟李光荣也叛了党,他从北平跑到济南,与方春荣一起对莱芜党组织进行了第二次大破坏。当刘伯戈、周茂森及方春荣叛变时,莱芜县委负责人刘盛玉考虑到叛徒熟悉赵健民和正在济南省立乡师读书的共产党员刘嘉典的情况,立即派人到济南告知赵、刘二人,要他们迅速隐蔽。叛徒是了解赵健民的,不然刘盛玉是不必通知赵隐蔽的。至于刘嘉典,叛徒则更为了解内情了。

其五,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的证明。

这份针对赵健民的上诉的“驳回意见书”,并不是专案组的新发现。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审查赵

健民历史问题时就掌握了这份“意见书”，当时就指出“意见书是一份事实有真有假，可以作种种解释的敌伪档案材料”。这样一份敌伪档案材料能作为依据吗?!

假的就是假的。污蔑，栽脏，陷害，终究掩盖不了用生命书写的史实。

第十七章

家庭，在风雨中飘摇

杨瑞波失去自由——与孤独、寂寞相伴的二十余天——难以承受的劳动改造和审讯——三次惨不忍睹的批斗——三次毫无人性的游街——下马村学习班：历尽了肉体与精神折磨——破碎的家庭：遭受“囚禁”的赵小松，回到千里之外老家的赵小桐，玩了个花招才回到老家的赵小楠——贫困与迫害交加之下的日子——在侮辱与打骂中求生的小赵杨——杨瑞波病倒了又站起来——好人马正弟——“不斗争是不行啊!”

世上的事情竟这么巧。1968年8月15日，杨瑞波在回昆明的列车上，得知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赵健民被最高司令部宣判“政治死刑”的信息。这就是本书开头的第一章。

8月16日下午二点多钟，杨瑞波带着小女儿赵杨，趔趔趄趄地回到家中。一年多不见的家，已面目全非。有的房间住进了造反派，闲着的房间也是乱七八糟。但杨瑞波已顾不上这些了。由于过度的疲劳、严厉的打击而疲惫不堪的她，拖着沉重的身躯倒在

床上。

杨瑞波的返回，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好心人要杨瑞波的三儿子赵小楠转告妈妈，尽快找个地方躲一躲。已无安身之处的杨瑞波怀着感激的心情摇了摇头。她知道，自己在眼前的处境下，已没有了主动权，只能准备迎接残酷的迫害。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杨瑞波感到浑身酸痛，脑子昏昏沉沉的。这是一个不安的夏夜。床上的杨瑞波，时而在梦乡里，时而在现实中，眼前一会儿呈现出清晰的图像，一会儿又变成一片空白。上午九点左右，一辆吉普车疯狂地驶进院内。车一停，跳下来三个男女。他(她)们气势汹汹，大声吼叫着：“杨瑞波，带上被子、牙具，跟我们走！”“快！快点！”催促声中的杨瑞波，一时不知东西放在哪里。不到五岁的赵杨，被吓得爬上床，抓起被子蒙在头上，边哭边喊：“妈妈，不要走啊！”“我要妈妈！……”女儿的哭喊，撕裂了杨瑞波的心肺，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床，紧紧地搂着女儿，将脸贴在赵杨那满面泪水的小脸上，哄着孩子：“好孩子，不要怕。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在家要听奶奶(照看赵杨的保姆)的话。”“勇敢些，好孩子，勇敢些。……”孩子哭得更伤心了，泪水，似泉水一般地涌出。杨瑞波尽管一再克制，但泪水还是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母女二人的泪水，交融在一起。三个男女强行把母女分开，拉着杨瑞波上了汽车。车开出了很远，杨瑞波还依稀听见女儿的哭喊声。她不知自己还能不能再看到年幼的女儿。生离死别啊！

吉普车开进了昆湖针织厂。这个厂离杨瑞波所在单位——昆明冶金机械厂约一公里。三个男女将杨瑞波押进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平房。杨瑞波一进屋，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大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杨瑞波必须老实交待罪行！”“杨瑞波不投降，就叫她灭亡！”负责看管杨瑞波的是冶金机械厂两个“八派”的女将，一个是描图员，一个是财务科干部。昆明的5月至11月，蚊子很多，没有

蚊帐，很难入睡。杨瑞波一再要求把家中的蚊帐取来，她们就是不答应。一整间屋就关着杨瑞波一个人，所有的蚊子都集中叮咬她，她实在无法入睡，只好或坐着或站着或来回走动。有时瞌睡得实在熬不住，只有倒下，于是蚊子就一哄而上。不几天，杨瑞波浑身上下青一片、红一片。

也许是从昆湖针织厂到冶金机械厂来往不方便，约在昆湖针织厂待了一个星期，杨瑞波又被秘密地押到冶金机械厂的一个实验室内。实验室是一个套间，杨瑞波被关在近六平方米的里间，两个看管人员住在外间。这里看管很严，饭是送进来吃；大、小便都在屋内，只是到夜深人静时，才被看押着出去倒马桶。杨瑞波实际上处在与外人隔绝的境地。“文革”时期的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监狱”。

一天，一位站对了队的女工杨某来看杨瑞波，杨瑞波感到十分吃惊。这位女工看着杨瑞波那吃惊的样子，自我解释说，过去挨整时，杨瑞波替她说过公道话。“公道自在人心”，此话不假。杨瑞波望着她那坦诚的表情，一面表示感谢，一面请她帮忙办两件事，一件是把家中的蚊帐拿来，一件是把女儿赵杨带来看看。这位女工当即表示，拿蚊帐没问题，带孩子来有困难，尽力去办。听了她的答复，杨瑞波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天，这位女工就把蚊帐拿来了。她告诉杨瑞波，同孩子见面的事，自己正在想办法。

没过几天，一日，杨瑞波正在烦躁地踱着脚步，门突然打开了。她抬头一看，女工一手牵着小赵杨，一手提着些吃的东西，匆匆进了屋。杨瑞波没来得及说句感谢的话，就一把搂过来女儿，眼泪扑簌簌地顺着双颊直淌。站在一旁的女工望着这个场面，泪水禁不住地涌出了眼圈。她边擦泪边劝说：“别难过，别让她们听见。我是趁她们有事，拿来钥匙才开门进来的。”小赵杨强忍着泪水，望着泪流满面的妈妈，一面用小手轻轻地擦着妈妈脸上的泪，一面用稚

气的语调安慰说："妈妈，别哭了，我听话。"看着懂事多了的女儿，杨瑞波那日夜牵挂的心情平静多了。在女工一再催促下，杨瑞波依依不舍地放开了女儿的小手。小赵杨边走边回头看看妈妈……母女相会，虽然短暂，但太珍贵了。杨瑞波终生感谢这位姓杨的女工。在人们危难之时敢于伸出帮助之手的人，是高尚的。

杨瑞波已经被关押二十多天了。二十多天中，既没人找她谈话，也没有人来审问，相伴的只有孤独和寂寞。她在一秒一分地熬着，愈来愈感到难以承受。失去自由，是多么可怕啊！审问的日子终于盼来了。一天，杨瑞波被叫到看管人员住的外间屋，接受一位省革委派来的姓孙的人的审问。第一次审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结束时，姓孙的人要求杨瑞波把所说的再写出来。这样的审问前后进行了三四次。据杨瑞波后来回忆说，这位姓孙的在审问时，没有训斥，没有施加压力，也没有逼供。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审问过后三五天，厂革委会的头头找杨瑞波谈话，要求杨接受"革命派"的监督，接受劳动改造。这样，杨瑞波白天在车间拉铁渣、洗毛巾，晚上睡在清一色的铁杆"八派"人员的集体宿舍内，出车间要请假，不准出厂门。住在这样的集体宿舍内也有好处，杨瑞波可以听到她们议论的各种消息。为此，杨暗暗庆幸。可是，只住了两天，革委会又通知杨住到一个停用的澡堂子里。搬到澡堂子不几天，厂革委会通知杨瑞波，与厂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分子编为一个组，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杨瑞波知道，自己的问题又升了级，成为专政对象。这个组共有八个人，其他七个人都是在"文革"之前戴上帽子的老专政对象了，被称为"死老虎"，而杨瑞波则是更危险的，是"活老虎"。"活老虎"自然要比"死老虎"接受更严厉的管制。"死老虎"可以请假回家，甚至在家过夜，而"活老虎"是绝对享受不到这个权利。

杨瑞波成为专政对象之后，迫害也加重了。在车间的劳动，繁重得实在让人难以承担。这个车间，有三百多人，是全厂最大的。车间面积很大，分车、铣、刨、钻、油漆、总装等六个部分。杨瑞波等三个人负责全车间的运铁渣、打扫卫生。实际上，大量工作都落在杨瑞波一个人身上。因为另外的两个人，一个是一位老工人的傻儿子，被照顾进厂的，基本上不干活；另一个是女的，因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受株连安排在这里的，但她是"八派"的人，干多干少没有人问。除了运铁渣、打扫卫生以外，杨瑞波还要负责打扫车间两侧的两个女厕所。一天又一天，杨瑞波艰难地拉着铁渣。汗水，浸透了衣服，日子长了，汗中的盐分，在衣服上积成了一个又一个白圈。有时实在拉不动，停下来喘口气，但还不能时间长了。下班后，"革命派"进行政治学习，杨瑞波要继续劳动。"革命派"学完后，杨瑞波才能回到住处，等着纠察队带着去食堂领饭。晚上，被专政的八人小组进行学习。除此之外，杨瑞波还要不间断地接受审问。一次，赵健民专案组的一个人像凶神似的审问杨瑞波，强迫交待与赵健民有关的一切问题，与赵健民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杨瑞波个人的一切问题。这个人临走时又扔下一句话："不老老实实交待，考虑考虑你个人的下场，考虑考虑你全家的下场。"三天的交待，杨瑞波边写，泪水边滴在稿纸上。她面前不时地浮现出三个没成年的儿子和一个不到五岁的女儿的身影。然而，她是清醒的、坚强的。一个信念在始终支配着她的思想：白的，终究是白的，抹是抹不黑的。要顶住，决不屈服，决不胡写！

昆明冶金机械厂是"八派"的大本营之一，是响当当的造反单位。"文革"初期的 1966 年 11 月 23 日，厂里的造反派就冲进省委大院，揪斗阎红彦、赵健民。全厂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是站对了队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站错了队。所以，这里的"划线站队"于 1968 年 11 月先全省而开始。

11月初，杨瑞波又从停用的澡堂子搬到了食堂旁边的一个小木板房子。这座房子，是挨着墙用木板钉成的，一面是砖墙，三面是木板，房顶也是木板的，只不过为防雨而加了一层油毡纸。晚上，寒风从木板缝中嗖嗖地钻进房内，杨瑞波被冻得直哆嗦。从一阵比一阵紧的寒风中，杨瑞波预感到，更严酷的迫害就要来临。

恐怖气息越来越浓了。厂内的广播喇叭中，整天播放着清理阶级队伍、"划线站队"的指示和消息，而且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12月上旬的一天，被专政的八人小组一夜增加到三十多人，杨瑞波的小木板房也多了一个女工，还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据说她是因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被关进来的。这是一位说话直爽的女人。她住进木板房，不仅使杨瑞波多了一个伙伴，而且还带来了不少消息。特别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生命，给杨瑞波带来了不少的快慰。

不久，男的专政对象搬进了又阴暗又潮湿的防空洞。隔几天，杨瑞波等女的专政对象也搬进了防空洞。为了防止得风湿性关节炎，杨瑞波趁看管人员不注意时多拿了一些稻草，铺了一个厚厚的地铺。这时，站错队的人都要戴一个白袖套，白袖套上写着这个人的主要"罪行"和姓名。按规定，白袖套只能戴在右胳膊上，因为站错队的人都属于右派。杨瑞波的白袖套上写着："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臭老婆杨瑞波"。这一时期，批判斗争会越来越多，斗争也越来越厉害。无论批斗谁，无论批斗会规模大小，"海报"①上总有杨瑞波的名字，总要杨瑞波陪斗。有那么几次批斗，对杨瑞波来说是终生难忘。

一天夜晚，正在梦乡中的杨瑞波，突然被疯狂的吼声惊醒："杨

① "文革"时期的"海报"，似如今天张贴的广告，上面写着召开批斗会的时间、地点和批斗对象的名字，意在告诉人们去参加。

瑞波，起来！去迎接你们的猪老爷。"接着，就被拉到工厂大门口，被按着跪在了地上。杨瑞波趁人不注意，偷偷环视一下左右，看到跪在一起的还有厂党委副书记武国治、六七个"炮派"的"坏头头"。一会儿，一辆大卡车驶进了厂门，车上是五花大绑的厂"炮派"头头朱方顺。朱方顺被揪到礼堂的台上，杨瑞波等人被揪到台下，架着"喷气式"。批斗会开始了。"八派"的人对着朱方顺，一边打一边问。朱方顺被打的惨叫声，一阵阵地刺着杨瑞波的心。这时，一个"八派"的头头故意问："朱方顺，是谁说军代表有派性？"有气无力的朱方顺低声答道："杨瑞波。"话音未落，一个人冲上来，朝杨瑞波脖颈就是一掌。杨瑞波顿觉头晕耳鸣，差一点栽倒。接着，又冲上一个人，举起手朝杨瑞波的头狠狠地打来。不知是哪位有良知的人，用胳膊挡住了这一巴掌。谢天谢地，如果这一巴掌打在头上，杨瑞波不死也要脱层皮。在这全会场的人对杨瑞波"盛怒"之时，一个"八派"头头声嘶力竭地喊道："把杨瑞波揪上台好不好？""好！""八派"的群众齐声高喊。立时，杨瑞波被揪到台上。站到台上一角的杨瑞波暗暗叫苦："这次打不死也要残废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批斗会突然停止了。朱方顺、武国治、杨瑞波等人架着"喷气式"来到礼堂门外。这时，"八派"的头头说："你们都滚吧！""朱方顺，你回家！"朱方顺气喘吁吁地回答说："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就把我关起来吧。"声音虽然很低，但杨瑞波听得清清楚楚。她一下子想到自己的家、自己那四个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昆明冶金机械厂又一次召开批斗大会。这次批斗会，是让所谓站错队的"炮派"的群众杀回马枪，揭发自己的负责人。被批斗的有厂"炮派"负责人和杨瑞波。会前，"八派"说，给犯错误的"炮派"群众一个改正错误、亮相的机会。"炮派"部分群众为了免遭迫害，早日获得解放，站到"革命派"——"八派"一边，不得不在会上对自己一派的负责人和杨瑞波表示痛恨和决裂。批

斗中，主持会议者追问杨瑞波没有交待的一件事说：“你他妈的，人家不揭发，你一个字不说；人家揭发了，你才承认。看来，不教训教训你不行。”另一个主持会议的“八派”头头骂着骂着就冲过来，朝着杨瑞波的胸口就是一拳。

杨瑞波眼看着一拳打来，心想，这一拳可要致命，就将身体一斜，减轻了拳头的打击力。就是这样，杨瑞波的右胸还是被打得由青变紫几个月。

这一拳刚打过，就有人高喊：“把杨瑞波拉出来示众！”一个“炮派”的老工人立即朝杨瑞波冲过来，用一只手死死抓住头发，用另一只手狠狠扭住胳膊，将杨瑞波推到礼堂外面，边推边吼：“杨瑞波，你不揭发不交待，就叫你灭亡！”当老工人粗壮的大手松开后，杨瑞波用手理了理蓬散的头发，被抓下的头发散落了一手，又散落了一身。

这个老工人为表示转变了立场，确实下了狠心。愚昧啊，可悲啊。

这时，“八派”的一个工人纠察队队员将杨瑞波拖到贴有毛泽东照片的墙前，命令杨瑞波跪下，向伟大领袖请罪，并且告诫说“不经许可，不许站起来”。跪着的杨瑞波，不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肉体上，都感觉到简直支持不下去，要倒下了。但她还是顽强地支持着、熬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一小时一小时地消逝了，而杨瑞波仍木然地跪着。人世间，心地善良的人总是有的。一位“八派”的工人纠察队员不忍心看着杨瑞波遭受这非人的折磨，大胆地走到杨瑞波跟前，高声地弦外有音地喊着：

“杨瑞波，你给毛主席他老人家请过罪了吗？”

“请过了。”听出话中含意的杨瑞波急忙回答。

“那就起来吧。”

杨瑞波试着站了几站，都没有站起来，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扶着墙站立起来。站起来后，双腿像筛糠似的直哆嗦。一个“八派”的女骨干望着这一情景，兴高采烈地说：“‘炮派’觉悟的人整起杨瑞波来比我们还狠。”“哈哈……”一阵笑声飘荡在上空。

可怜的同胞啊！

“滇西挺进纵队”假案被捏造出来后，就在全省举办其所谓罪行展览。昆明冶金机械厂是“八派”的根据地之一，所以展室一度设在厂里。每天，群众参观、声讨时，都要把杨瑞波拉出来示众。布展者以大量捏造的材料激发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愤怒，所以，声讨“滇西挺进纵队”、声讨“黑后台赵健民”的声势特别激烈，气氛十分压抑。作为“赵健民的臭老婆”，杨瑞波被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一次，外单位的群众来厂观看展览，厂里的“八派”头头将杨瑞波从车间里拉出来，逼着她站在一人多高的台子上示众。口号声、辱骂声、声讨声，一浪一浪地涌向杨瑞波。开始，杨瑞波满腔愤怒，感到周身就像一团火似的在燃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经渐渐地麻木了。直到参观结束后，才让杨瑞波下了台子。杨瑞波刚走下台，一个外单位的女人就从人群中冲过来，挥起胳膊，对着杨的后脑勺就是“叭、叭”两巴掌。一时间，杨瑞波感到天晕地旋，不知所措。

“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作为第一等惩罚的游街，日盛一日，杨瑞波前后被游街三次。运动刚开始，厂里“八派”头头就把杨瑞波一个人拉出来游街。杨瑞波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臭老婆杨瑞波”。可能是因为只一个人，加之事前宣传不够，所以这次游街的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围观的群众也不算多。第二次，是把杨瑞波拉到人口密集的宿舍区——工人新村游街。杨瑞波胸前挂着牌子，一手提着锣，一手拿着锣槌。在逼迫之下，她敲几下锣，说一句：“我是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臭老婆杨瑞波。”这样，转了几个圈子。

最残酷的规模最大的是第三次，这是昆明冶金系统组织的一

次大型游街。

昆明冶金机械厂和冶金厅的“八派”头头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特制了许多高帽子、黑牌子和枪支、电台模型。高帽子是用铁丝编制的，可紧紧地卡着人的头，外面糊上纸。黑牌子是用铁板做的，重者达几十公斤，用细铁丝作吊绳，挂在脖子上很快就勒进肉里。高帽子、黑牌子上写着：“赵氏小爬虫”、“滇挺分子”、“国民党兵”、“反革命分子”等字样。还用钢管焊成各种枪支武器，每件都很重；用木箱做成电台，箱内装上五六个数公斤重的铁球，电台的耳机竟是用齿轮焊制的。被游街的人的脸上用水彩涂抹成各种各样的丑态。杨瑞波等人属于“黑手”人物，双手都被用墨汁染成黑色。

这天下午一点多钟，冶金机械厂的游街队伍浩浩荡荡开出大门，向冶金厅进发。队伍前面一辆大卡车上是杨瑞波。她站在车厢前面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上，身后是一块一尺多宽、六尺多高的木板。身体自上而下，被绳子紧紧地捆在木板上，只有脖子和头可以动。两只染黑了的手向前伸着，以便让围观的群众看清楚。享受这种待遇的还有党委副书记武国治。游街对象后面是“站错队”的人，再后面是一千多个“革命群众”。

从冶金机械厂到冶金厅有五六公里的路程。一路上，口号声、高音喇叭中的声讨声时起时伏。沿途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街道两旁还跪着陪斗者。走着走着，一名跪着的小女孩映入杨瑞波的眼帘。她十岁左右，身前的大牌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突然，她抬起头来，用眼睛瞄了杨瑞波一下。这眼光，是恐惧，是疑惑，是迷惘，……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总之，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眼光。这眼光，深深地印在杨瑞波的脑海中，不管岁月怎样流逝，从来都没有模糊过。

到冶金厅会合后，开始了正式的游街。三百多个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的游街对象，接受着数以万计的人们的围观。队伍从

一条街来到另一条街，时间从一个小时变成两个小时。游着游着，革命群众的口号声改变了内容。由声讨、辱骂游街对象变成了鼓励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的，他们太累了！这次游街，前后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1969年初春的一天，昆明冶金机械厂几个“八派”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不由分说地将杨瑞波推上了一辆大卡车。之后，车朝昆明北部驶去。原来，这是奉上级指示，将杨瑞波押送到设在下马村的云南省省级机关学习班。到了下马村，杨瑞波被单独编为一个组。一位工厂的副科级干部进入了省级机关干部的行列，且单独关押，可见对杨瑞波的“重视”了。

一天吃完晚饭，五六个人开始对杨瑞波批斗。首先，要杨瑞波站在毛泽东像前，给老人家请罪。接着，要杨瑞波自报姓名。之后，审问开始了。

“杨瑞波，1968 年 1 月你去北京时，林亮给你口授的‘滇挺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你怎样给赵健民转达的？”

“‘滇挺’是怎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组织。”杨瑞波说的是心里话。

“老实交待！那么林亮给你说了些什么？”

“林亮要我代问赵健民好，并说，云南两大派的矛盾很难解决。”

进行审问的五六个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没有得到。于是，就一会儿命令杨瑞波低头弯腰站着，一会儿命令杨瑞波跪着，并且，时而打骂，时而交待政策，软硬兼施。就这样，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他们还是没有从杨瑞波嘴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围绕“滇挺”问题，对杨瑞波审问了整整一个多星期。方法是车轮战。杨瑞波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在毛泽东像前请罪。请罪完

毕，在监视之下吃饭。吃完饭就参加批斗会，一直被批斗到中午。吃过午饭，继续接受批斗。晚饭后，接着被批斗，直到午夜十二时。批斗中，有时低头弯腰站着，有时跪着，从不允许坐一坐，哪怕是一会儿。夜间十二时后，批斗的人休息去了，留下杨瑞波写“交待材料”，一个人在旁边监视。这时，给杨瑞波一个小板凳。杨瑞波坐着小凳，将纸放在双腿上，苦苦地思索着，直至凌晨三四点钟。批斗者是轮流休息，而杨瑞波一天要接受十六七个小时的批斗，所以，常常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期间，学习班的负责人将小赵杨接到学习班，企图让女儿“感化”妈妈，攻下杨瑞波这座“碉堡”。小赵杨来到学习班的当天晚上，学习班负责人通知杨瑞波和女儿去看有关“滇挺”的话剧。礼堂里坐满了站对队的“八派”和站错队的“炮派”。幕布一拉开，舞台上就出现了丑化赵健民的剧情：赵健民一手举着鲜血淋淋的大刀，一手提着手枪，带着一群“滇挺”分子，疯狂地屠杀着“革命派”。愤恨，恼怒，一齐涌上杨瑞波的心头，但她既无法抗议，又不能落泪，只有默默地强忍着。她担心小女儿经不起这强烈的刺激，可赵杨将脸朝着杨瑞波，一双大眼睛在不停地滚动。她是在用眼睛安慰自己的妈妈。磨难中的孩子早成熟啊！

在“滇挺”问题上追逼不出需要的东西，学习班负责人又围绕着“通信”问题对杨瑞波展开了第二轮攻势。他们抓住赵健民通过齐运岭与杨瑞波的通信大做文章。

“你同赵健民通了几封信？”

“大概是六七封吧。记不清楚了。”

“赵健民在信上都写些什么？”

“就是说他不是叛徒，也没有支持打砸抢，再就是鼓励孩子努力学习，鼓励我好好工作。”

“你说的都是实情吗？”

“没有假。”

“信在哪里？”

“烧了。”

“你哪个孩子知道通信的事？”

杨瑞波一听，不由地心中一颤。她立即意识到：他们要逼孩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杨瑞波冲口而出：

“没烧！记起了，没烧！”

“信在哪里？！”

“在我娘家，山东老家。”

这可害苦了杨瑞波的父亲。学习班立即派人赶到山东，追逼老人家。信，确实是在杨瑞波的娘家。杨瑞波临回昆明时，将所有的信都密封在一个大玻璃瓶子中，又将瓶子埋在地里。只有她和她父亲知道。

信，很快取回来了。一帮秀才研究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一句能置赵健民于死地的话，最后，抓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八个字，上纲上线。学习班负责人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进行批判：“赵健民在信中恶毒攻击党中央。他明目张胆地攻击党中央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就是说，党中央偏听了我们革命派的话，是黑暗的党。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决不答应！打倒赵健民！”虚张声势的批判，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虚弱，他们不敢将赵健民的信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众。

学习班负责人从杨瑞波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就通知冶金机械厂将杨瑞波接回去。

回到厂里第一天，杨瑞波被锁在防空洞里。防空洞中只她一人。夜幕降临，洞中漆黑一团。洞上面是一片坟墓，夜风一吹，风声、树叶声、杂草声混在一起，令人倍感恐怖。这一夜，杨瑞波是一刻也没有睡着。

1969年岁末，失去自由一年又四个月的杨瑞波接到通知，可

以回家住了，但是，还有约法三章：继续接受审查；不准串联；有事及时汇报。就是这点有限的自由，也使杨瑞波激动不已。她兴冲冲地拉着装着被褥的小铁车，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还没进屋，就高声唤着女儿的名字。小赵杨冲出屋门，扑进了妈妈的怀中。母女二人团圆了！但这时，杨瑞波的三个儿子却天各一方。

1969年底，老大赵小松正在云南省施甸县。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赵小松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年年底，被以"保皇派"的罪名抓到云南省第二监狱看守所，一关就是三个月。1968年初赵健民在北京被关起来后，险恶的形势使他无法待在昆明，在一位好心的同学的帮助下，步行一千多华里，来到了这位同学的家乡鹤庆县，躲避了二十多天。后来，便由昆明转回山东省单县姥姥家。1968年夏天，赵小松返回昆明。刚回昆明，就被所在学校的人发现，报告给军代表。军代表将赵小松从家中带到学校，关了起来，责令交待问题，直到1969年夏。这一年中，赵小松尝遍了批斗、游街的滋味。一次在昆明师范学院的批斗会上，赵小松胸前戴着黑牌子，在主席台的一角一跪就是几个小时。一次游街，赵小松被逼抬着七八十斤重的铁板制作的机枪，游了大半天。有时，赵小松还要被逼着交待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一次，一个自称省公安厅的人强令赵小松交出隐藏的其父亲赵健民的东西；交待去滇东北的问题。赵小松心里明白，这是政治迫害。因为自己从没有替父亲藏过一件东西，更没有去过滇东北。任凭怎样威胁、引诱，赵小松始终没有屈从。

1969年夏天，赵小松所在学校的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所有同学都安排到靠近中缅边界的瑞丽，而惟独不许赵小松去。不言而喻，是害怕赵小松叛逃出国。赵小松向军代表提出回老家山东，被断然拒绝。学校强行将赵小松的户口、粮食关系迁到了保山地区施甸县的甸头大队。从这里，向西是怒江，向东是澜沧江。而当时

规定，不论是过怒江还是过澜沧江都要持通行证。赵小松被紧紧地扣在了这块狭小的山地里。赵小松所在的公社，是清一色的"八派"观点；所在的大队，只有他一个插队知识青年。

插队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赵小松住在一栋小破楼的楼上，楼下是生产队的办公室、保管室。每天，他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回来，自己一个人做饭，劳累、孤独，紧紧缠绕着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赵小松同社员一样，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赤脚上山。开始，双脚鲜血淋淋，后来，也就适应了。杨瑞波听到儿子赤脚上山的消息，心痛得难以忍受。无奈没有钱买鞋，只能熬夜做了一双布鞋给儿子寄去。赵小松捧着妈妈一针一线做成的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但他不得不写信告诉妈妈：请不要再做鞋，这样的鞋底，在这里顶多穿一天就烂了。赵小松要自己砍柴起炊。一次，他爬上大树砍树枝，一不小心砍在手指上，鲜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淌。他心想，爬上树不容易，就一边滴着血一边继续砍。砍完柴，又背下山来，当赶到卫生所包扎时，因失血过多而晕了过去。赵小松还学着养猪。临近春节时，社员们帮他杀了猪，他将一半寄给城里的妈妈和妹妹。

在施甸，赵小松不仅要经受生活上的艰辛，还要饱受政治上的迫害。一次，在赵小松住的楼下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赵小松遂成为怀疑对象。恰在这时，赵小松驾驶着拖拉机出了一个事故。办案人员以要他写事故检查为名，来核对笔迹。赵小松知道自己被怀疑，也知道写检查是为了核对笔迹，但他既不紧张，也不害怕，因为他坚信：白的，毕竟是白的。

最令赵小松难以忍受的是，一不能回昆明探亲，二不能回城当工人。赵小松虽然在施甸县甸头大队劳动，但县知识青年办公室管不了他的事，他属省管知识青年。所以，三年中没能回昆明探一次亲。1972年初，杨瑞波患急性肝炎病情严重时，去电报要儿子

回昆明一趟。赵小松拿着电报跑了几趟县知识青年办公室，也没有得到批准。父亲被关押，母亲又病重，作为长子，不能见母亲一面，难受得他坐立不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1971年开始，国家按计划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大量招收工人。从这时起，招工成为城市回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当时的规定，招工要由群众评议推荐，经领导审核批准，择优录用，杜绝"走后门"。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走后门"泛滥成灾。以至后来中央也以"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为理由，认可了"走后门"。赵小松眼看着同学们一批又一批地返回了昆明，就是没有自己，急得团团转。他接二连三地写信央求妈妈托人帮帮忙。杨瑞波理解儿子的心情，东一头西一头地托人，但是，不知跑了多少腿也无济于事。后来，施甸县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给杨瑞波交了底："不是赵小松表现不好，也不是我们没推荐，而是招工单位一看是赵健民的儿子就不敢接收了。"杨瑞波实在没办法了，就请求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将赵小松转到老家山东省冠县。请求被批准。1972年夏天，施甸县知识青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护送赵小松到昆明，又转到了山东。赵小松，离开了整整生活了三年的施甸。转到山东不久，"赵健民专案组"传讯了杨瑞波。他们严厉追问："你通过谁的后门把赵小松转走的？"杨瑞波斩钉截铁地回答："后门没有给我开。是组织同意转走的，不信，你们可以调查吗。"户口、粮食关系、人，都已到了数千里之遥的山东冠县，专案组只能逞逞威风而已。

1969年底，老二赵小桐已在老家山东省冠县。1968年，赵小桐受父亲的株连，在学校被关进学习班三个月。上山下乡运动刚开始，他就申请回老家山东。谢天谢地，没有遇到什么阻拦。

1969年底，老三赵小楠也已在老家山东省冠县。"文革"开始时，赵小楠刚升入初中。他性格较内向，胆量大，脾气倔。因受父

亲的株连，一个小小的初中生也免不了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斗，坐喷气式。赵小楠为了不让别人揪头发，索性把头发剃光，戴上了帽子。有一次批斗，一个学生为了揪头发打掉了他的帽子，于是，亮亮的光头呈现在老师、同学面前，顿时，台上台下一片哄堂大笑。这个学生见没有头发可揪，就扯着耳朵将赵小楠拉上了台。一位十四五岁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在长期遭受批斗、侮辱的环境下，反抗、沮丧等情绪逐渐积满了胸膛，心情难以平复。一天中午，赵小楠同一位要好的同学喝了点酒。酒虽不多，但由于心情不佳，有些醉意。下午，又开批判会，赵小楠迟到了。他摇摇晃晃地进了会场，找了个地方，顺势坐下。这时，台上的发言人正声色俱厉地批判赵健民。听着诬蔑父亲的胡言乱语，赵小楠面露愠色，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发言人，愤怒之情一触即发。恰巧，一个"八派"的同学发现了赵小楠的表情，当即质问："你要干什么?!"赵小楠霍地站了起来。一位好心的同学马上走过来，边拉住赵小楠边好言劝说对方，"他喝醉了。你闻闻，还有酒味。别在意，别在意"。这样，赵小楠才免遭一场祸害。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赵小楠向校方申请回山东冠县老家，但遭到拒绝。怎么办？被逼无奈，赵小楠请一位平时关系好的"八派"的同学写了个假证明信，又瞅管公章的人不注意，自己偷着盖上公章。凭着这封证明信，他立即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回了老家。校方发现时，一切都办妥了，无奈，只好责令赵小楠写个检讨书了事。

杨瑞波获得自由后，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手头拮据。全家五口人（不包括赵健民）靠着她每月六十二元的工资维持生活。为了摆脱困境，替保姆另找了一户人家。在那个时代，再也找不到别的门路，只能靠自己省吃俭用。1970年春节快到了，杨瑞波要给远在外地的儿子寄点钱，但算来算去，只能给在老家的两个儿子寄

去七元钱，硬是凑不齐十元。后来谈起这件事，三儿子赵小楠说："妈妈给我们寄了七元钱，我们都不好意思去邮局取。"杨瑞波意味深长地说："那也是一分一厘凑的。"除了为贫困而操劳，杨瑞波还要应付时不时飞来的灾难。1970年七八月间，一个负责省级机关事务的"八派"观点工作人员突然来到杨瑞波住处，通知她搬家。他振振有词的说："你不是我们单位的人，无权住在这里。马上搬走！"杨瑞波一怔，立即反问道："赵健民是哪个单位的？"来人一时语塞。杨瑞波接着说："住在哪里都可以，有个住处就行。但同我单位联系房子的事应由你们出面。"来人勉强答应下来。不几天，冶金机械厂通知杨瑞波搬家。新住处在工人新村，是一层楼的一间阴面房。因为常年不见阳光，又是一层，加上墙外有一条阴沟，所以房间十分潮湿。这一搬家，来了困难。那个时代，高级干部个人没有家具，杨瑞波只有几个盛衣服、被子的箱子以及零星的炊具。可是总不能睡在湿地上。杨瑞波要求厂方帮助解决，厂方表示无能为力。杨瑞波说："那就只有请你们与省里商量一下，借他们的吧。"几经商量，由厂方出据借条，借给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一个三抽屉桌。家，终于安定下来了。为了解决潮湿问题，杨瑞波向人讨了一点生石灰块放在床下。生石灰一吸水，"啪啪……"地响个不停，大量热气散发出来，热得让人没法待。这些困难，杨瑞波总能硬着头皮应付，而让她既气愤又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小赵杨常常受到侮辱和欺负。

1970年春节一过，六岁半的小赵杨踏进了学校的门槛。上学，对于一位聪明、好学、上进的小女孩，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啊！然而，小赵杨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学习的乐趣，而得到的是更多的侮辱和打骂。许多孩子拿着青面獠牙的赵健民的漫画像，逼迫赵杨看。赵杨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抗议："我爸爸不是这样！"这发自孩子心底的声音，虽微弱却有力。有一次，一个长赵杨几岁的男孩子朝着

赵杨耍威风。他对着赵杨的小脸就是一拳，边打嘴里边骂着："打你这个赵健民的黑崽子！"赵杨的一只眼睛和半个脸青肿起来。傍晚，杨瑞波下班回来后，看到小女儿那青肿的脸，急忙问："怎么搞的？"小赵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轻描淡写地回答："不小心碰了一下。"杨瑞波看出不像是碰的，就一再追问。孩子哭了，她哽咽地诉说："一个男孩子打的。打完后，他威胁我说，不准找他的爸爸、妈妈，要是找了，他要把我弄到阴沟里淹死。"说到这里，小赵杨抱着杨瑞波的腿央求说："妈妈，不要找他家长，千万不要找他家长。"听到这里，杨瑞波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事后，杨瑞波找到了这个小男孩的家长，十分客气地请他们管一管孩子。这一对父母只是十分冷淡地应付了几句。唉，这是孩子的过错？这是家长的过错？是，也不全是。更多的是当时社会的过错。

杨瑞波举家迁到工人新村后，小赵杨一再缠着妈妈，要求把自己从原来的西坝小学转到厂子弟小学。杨瑞波理解孩子的心情——改换一下恶劣的环境。可是，那个年代，到处都一样。她心中叹道："多么幼稚的孩子啊！"最终还是为孩子转了学。子弟小学，也不是赵杨的理想之地。几天后，每当早晨母女二人向学校走去时，一群孩子就齐声高喊："打倒赵健民的臭老婆杨瑞波！打倒赵健民的黑崽子赵杨！"一阵阵的呼喊声，像锥子似的直刺母女俩的心。一颗成熟的心和一颗幼稚的心，同时在滴着鲜血。一天中午，赵杨放学回家后，脸色灰暗，一双大眼睛呆呆地瞪着远处。吃饭时，她一手端着碗米饭，一手用筷子机械地把米粒拨到嘴中，但是，米粒没有咽下，又掉回碗里。杨瑞波看着孩子那难受的样子，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小赵杨放声哭着，声音颤抖地问：

"妈妈，我有什么罪？"

"今天班里许多同学都指着我的头喊：'打倒赵健民的黑崽子！'"

“我怎么办？妈妈。”

杨瑞波一边用自己也讲不清楚的“道理”安慰孩子，一边答应找班主任老师谈一谈。

这位班主任极富同情心，她热情地接待了杨瑞波，过后又对全班同学进行了教育：“赵杨爸爸有问题是他个人的事，不能株连到赵杨。如果我们哪一个同学的家长出了问题，株连到你，你愿意吗？今后不准欺负赵杨同学。”班主任的话是管用的，从此赵杨的环境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工人新村，小赵杨还时不时地受到欺负。一次发高烧，一个人留在家里休息。一群孩子先是扔石子砸窗户玻璃，打破玻璃后又向屋内扔泥巴。小赵杨吓得躲在床角里，不敢出门。直到杨瑞波下班后，这群孩子才一哄而散。凡发生类似的事情，杨瑞波只能费尽口舌安慰孩子。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杨瑞波能代替孩子们承受委屈，她情愿替四个孩子承受一切人间不平。

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终于将杨瑞波压倒了。1972年1月，她患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谢天谢地厂方没有阻拦。可是，杨瑞波舍不得将八岁多的女儿扔在家中，就向车间负责人要求，允许在施甸县插队的长子赵小松回来照顾一下。车间请示厂方，厂方请示冶金厅，冶金厅又请示省革委，最后回答：“不行！”迫不得已，杨瑞波放弃住院，在家治疗。在家医治，每天打针成了头痛的事。恰巧，杨瑞波的邻居马正弟是厂卫生所的护士。这位回族女医务人员，为人正直，有着高尚的医德。是她，每天给杨瑞波打针。不久，赵杨跟着马正弟学会了打针，连杨瑞波自己也掌握了打针的技巧。

患病的杨瑞波急需增加营养。可是，每月六十二元钱的工资，仅够糊口，哪谈得上购买营养品。当时的副食品是定量供应，每月赵杨凭票证买回鸡蛋后，总是要妈妈多吃几个，补养补养。杨瑞波

深知成长中的孩子更需要营养。所以，母女二人便常为一个鸡蛋而让来让去。有一次，剩下一个煮鸡蛋，赵杨递给妈妈说：“您有病，快吃了吧。”杨瑞波推向赵杨说：“你小，正是长筋骨的时候，应补养补养。”一个鸡蛋让来让去，谁也没有吃，一直放了两三天。最后，小赵杨拿起鸡蛋对妈妈说：“叫您吃，您不吃，我饿得很，就吃了吧。”说完，扒开蛋壳，几口吃了下去。杨瑞波望着女儿狼吞虎咽的样子，心头泛起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一次，刚发下工资，赵杨听说患肝炎病的人吃刀鱼好，就约邻居的一位女孩一起去买刀鱼。星期日凌晨四时，两个人就去排队，直到下午二时才回来。一进门，赵杨就高举着篮子高兴地喊：“妈妈，我给您买回刀鱼了。”进门后又兴冲冲地给杨瑞波讲买鱼的事：赵杨和小朋友排了大半天才轮到。卖鱼时本来是大小搭配的，可售货员见赵杨是小孩，就只卖给她小的，不给大的。赵杨高声抗议，小朋友也尽力帮腔，但售货员根本不理睬。直到后面的大人也出面打抱不平，售货员才给了几条大一点的鱼。说到这里，赵杨仰脸问妈妈：“您说公平不公平？我们不斗争就白白吃亏了。”杨瑞波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啊，看来不斗争是不行啊！”

第十八章

穿透乌云的一线阳光

寻找赵健民的下落——难以统计次数的上访——阳光微露——五年来的第一次见面——"离婚吧。如果我能活着出去，咱们再复婚。"思考了许久的这句话，赵健民始终未能说出口——周恩来指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陈锡联打招呼：不解决"划线站队"的问题，你们的工作就被动——周兴要了个两面手法——第一次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夭折了

1969年底，杨瑞波获得部分自由后，就开始打听丈夫的下落，考虑信访问题。

当时，关于赵健民的传说很多，有的说押在北京，有的说关在昆明。一次，有人告诉杨瑞波，说赵健民关在昆明军区第九号楼。听这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杨瑞波就信以为真。每逢星期天，她领着赵杨，到军区大院东墙外的河堤上。站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九号楼的第二层。母女二人久久地凝视着小楼的阳台，多么希望能够看见赵健民的身影出现在阳台上啊！然而，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还有一次，一个人告诉杨瑞波，说赵健民关在大观楼南边的

余家花园。杨瑞波和女儿拿着几束鲜花，匆匆忙忙地赶到余家花园，怯生生地敲着紧闭的大门。大门张开了一道缝隙，两位警卫战士探出头问："有什么事？"杨瑞波照早已编好的话说："听说这里边要买花，我们是卖花的。"边说边从门缝中向院内张望。"这里不买花。"随着"呯"的一声门响，母女二人的心一下子凉到底。

1970年八九月间，杨瑞波开始写人民来信，进行信访。发信的范围很广，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到中央文革小组每个成员。发信的数量不断增加，由每月一封到每月数封。信的内容前后有所变化。起初，主要内容是，申诉赵健民不是叛徒，要求速作结论，要求给四个孩子发生活费。后来，接受一位友好同志的建议，改为要求将赵健民释放回家，一边治病一边接受审查。信，一封又一封地寄去，可每一封都是石沉大海。

1972年上半年，杨瑞波决定让老二赵小桐去北京上访。儿子进京后，终于获得一个可靠信息："爸爸已于1970年1月18日回到昆明"。得到这一信息后，杨瑞波立刻赶到省革委信访处，要求与赵健民见面。信访处的接待人员恶狠狠地说："赵健民不在昆明，在北京。"杨瑞波争辩道："在昆明。"这个接待人员严厉地追问："谁告诉你的？"杨瑞波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央信访办告诉我们的。""你是共产党员，说话要负责任。你写个证明。"接待人员递给杨瑞波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纸，又说了一句："赵健民是叛徒、特务，你要同他划清界限。"杨瑞波接过笔、纸，不假思索地写了几行字："我与赵健民的一切错误划清界限。我是他的妻子，按照党的政策，我要求与赵健民见面，包括我的子女。"从这以后，杨瑞波一星期去信访处两三次，不管接待人员态度如何粗暴，她就是一个劲地磨。信访处的接待人员终于烦了。一天，当杨瑞波又来到信访处时，一个接待人员告诉说："以后不要再找我们了。去崇仁街找'赵健民专案组'。"听了这句话，杨瑞波没顾得上回家就直奔崇仁街。

“赵健民专案组”确实住在这里。每一次去,杨瑞波都重复着相同的内容:(一)要求与赵健民见面;(二)尽快给赵健民作出结论;(三)给四个孩子发生活费。然而每次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复。后来,杨瑞波回忆说,她把专案组办公室的地面都磨光了。

杨瑞波得知赵健民的确实情况,是通过一位叫罗华新的人。罗华新,省水利局汽车司机,“八派”成员,在云南第三监狱看管过赵健民。罗品德、作风正派。他与省供电局副局长、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丁诗纯关系甚好,经常听丁介绍赵健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很受影响。通过朋友介绍,罗华新认识了赵小桐。他告诉小桐,赵健民关在三监,并详细描写了赵的生活习惯。杨瑞波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这是多么珍贵的讯息啊!

就在杨瑞波不断上访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1971年9月13日,载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里的“接班人”,“最最高举”、“最最紧跟”的“副统帅”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区。

林彪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在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健康力量,在极为特殊而复杂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抓住这一历史转机,纠正“左”的错误。中国的上空,一时间透出了一丝光明。

林彪事件发生后,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某些事情。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这实质上是为“二月逆流”平反。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0日,毛泽东参加了追

悼会。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又讲,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还讲,邓小平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少参加某人的追悼会。毛泽东参加了在“文革”中屡遭批判的陈毅的追悼会,又讲了那么多重要的话,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

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起草并经他审批的。社论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重申“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篇社论,产生了重大反响。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批判林彪,并作了当时情况下必须作的检查。8月14日,毛泽东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周恩来根据这个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经过积极努力,才作出了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使邓小平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72年10月20日,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刘建章1926年入党,今年六十二岁,不知何故于1968年2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五年。1972年6月8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

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抓住机会，大力进行保护老干部的工作。他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法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控诉。

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指示，很快传到了昆明。杨瑞波得知后，更加积极地到“赵健民专案组”上访。

1973 年 2 月 3 日是春节。春节前的一天上午，“赵健民专案组”的两名人员来到杨瑞波家，对杨说：“你不是要见赵健民吗？不行。可以写信，但只能谈家务，不能涉及社会和案件。要写就马上写，我们带走转给他。”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杨瑞波高兴得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她回到里屋，稍加思索，提笔疾书。

健民：

您好！

我和四个孩子的情况是：我仍在工厂工作，女儿在厂子弟小学读书，三个儿子均在老家冠县务农，一切都很好，不用挂念。

请你保重身体。

瑞波

信写好后，找了个信封，杨瑞波拿着笔，看着信封，犹豫片刻，然后写上了“赵健民收”四个字。虽然她和赵健民比同志还亲，但没有写上“同志”二字。因为在当时，这会给自己给家庭招来新的祸害。专案组的两个人接过信后就离开了。临出门时留下一句

话：“你下午不要出去，我们可能有事找你。”

这一句话，惹得杨瑞波、赵杨母女二人一个劲地琢磨：是给送回信，还是让见面？不管怎样，她们从心里预感到，一定会有好消息！母女二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连中午饭也没吃好。

在第二监狱，这天下午，专案组的木恺来到赵健民的牢房。他比较和缓地问：“赵健民，你说你是不是叛徒？”“不是。”赵健民语气坚定地说。木恺又问：“你说你在‘文革’中有没有重大错误？”“没有。”赵健民仍然语气坚定地说。“有缺点吗？”“缺点是有的。”谈话之后，木恺拿出一封信递给赵健民，并要赵健民换一下衣服，准备同家属见面。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突然。赵健民一目十行地看了家书，然后揣进怀中。这是自关押在交通部干部学校以来收到的第一封家信，真是抵万金啊。他又匆忙地换了一身毛料衣服，跟木恺上了吉普车，向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开去。

这天下午一点半左右，两名专案组人员又来到杨瑞波家。一进门就命令式地宣布：“同意你与赵健民见面的要求，但必须遵守三点：第一，不准谈论社会上的事和谈及赵健民案件的事；第二，不准哭；第三，不准询问与赵健民案件有关的情况，如果违反上面三点，立即终止会见。”尽管两名专案人员态度蛮横、语气强硬，但杨瑞波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就要见到离别五年的丈夫，赵杨就要见到五年没见面的爸爸了。

杨瑞波用手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些糖块、点心，和女儿跟着专案组人员出了家门。两名专案人员故意走在前面，杨瑞波母女也不愿意离他们太近，于是，前后保持着四五十米的距离前进，一直走到省工会大门口才停了下来。专案人员要杨瑞波在这里等着。母女俩在大门口踱过来又踱过去，一秒一分钟地熬着，真是度分如日啊。杨瑞波边踱着步，边猜想着丈夫变成了什么样子，第一

次见面是什么样的场面，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准备着见面时说的话。小赵杨既激动，又紧张，反复地背着妈妈教给自己的见到爸爸时说的话。好不容易熬到近下午五点，才在专案人员带领下上了车。车，在省委党校一座普通楼房的门口停了下来。

杨瑞波和赵杨紧跟着专案人员，穿过走廊，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前。此时此刻，杨瑞波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跳出来似的。门开了，杨瑞波一眼就看到坐在桌子一侧的丈夫。她真想冲过去，抱着丈夫大哭一场。但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拉着女儿跟着专案人员走进了屋内。

赵健民一见妻子和女儿，立即站了起来。隔着桌子，赵健民两道温存的目光望着憔悴的妻子；杨瑞波一双饱含复杂情感的眼睛看着刚毅的丈夫，好大一会儿，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也许，他们早已把准备好的最真挚的语言忘却了。也许，一切语言在这个时刻都是多余的了。

还是赵健民首先打破了沉寂的气氛。他轻轻地抚摸着走到跟前的女儿的头，深情地说：“赵杨长这么高了，如果在街上碰着，我都认不出来。”赵杨把自己幼稚的小手放在爸爸手中，妈妈教给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三颗激动的心，渐渐地平息下来。他们使用着平淡的语言，相互询问着渴望已久的家庭、生活、身体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四名专案人员挥着笔，有话必录。望着妻子那坚定的表情，听着妻子那忠贞的话语，赵健民埋在心里的一句话几次冲到嘴边而又咽了下去。为了让妻子和孩子免遭一些株连，少受一点磨难，他想告诉妻子：“离婚吧。如果我能活着出去，咱们再复婚。”但他始终说不出口。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人端来三碗面条，要赵健民一家三口人吃。三个人，你劝我，我劝你，结果谁也没吃一口。这时，专案人员宣布会见结束。在赵杨“爸爸，再见”的悲哀的告别声中，母女二人离开了这个终生难忘的房间。回到家，杨瑞波顾不上吃饭，就给三个儿子写信，告知这一特大喜讯。第二天，她又通过各种方式，将见面的情况告知了一些友好同志。

1973年的春节，不论是狱中的赵健民，还是狱外的杨瑞波和孩子们，似乎是五年来第一次感觉到一点春天的气息。三个儿子写信告诉妈妈，听到爸爸的消息，高兴得做了点下酒菜，整整喝了一个晚上，三个人都醉了。

为了能同赵健民多见几面，杨瑞波绞尽脑汁想出了办法：让孩子轮流申请见爸爸。1973年3月，经批准，老三赵小楠去探视爸爸。临出门时，他对杨瑞波说：“妈妈，买点下酒菜回来庆贺庆贺。”几个小时后，赵小楠回来了，杨瑞波一边急切地询问丈夫的情况，一边催着儿子喝酒。赵小楠愤慨地说：“还喝什么酒！看着爸爸被整成那个样子，当时难过得我借故去厕所偷偷地流泪。”6月，老二赵小桐申请探视，迟迟得不到批准。经过一再催问，才获同意。见面中，当赵小桐告诉赵健民，老家的人都很关心他，询问他的情况时，被专案人员当即禁止。杨瑞波和孩子们同赵健民见面的机会非常难得，可是每一次见面都要受到种种限制，无法交谈心里话。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不失去这个机会，只能忍气吞声。9月初，老大赵小松又得到了探视爸爸的机会。他骑着自行车，车后驮着《资治通鉴》等书籍，气喘吁吁地来到了省委党校。见面时，赵小松故意用力地握了握赵健民的手。他想测试一下，看看爸爸是否经受得了，受刑重不重。

这年的9月11日是中秋节。为了让狱中的丈夫吃上月饼，杨瑞波带着女儿排了整整半天队，买了盒上等的火腿月饼。可是，怎么送进去呢？杨瑞波一再申请探视，始终没被批准。因为再也没有儿子见爸爸那样“正当的理由”了。一盒月饼，看了又看，放了又放，直到1974年1月春节前夕，才获得见面的机会。见面时，杨瑞

波把一针一针织成的毛衣，从北京买来的高级糖块，一盒上好的火腿月饼递给了丈夫。赵健民是穿着暖暖的毛衣，吃着甜甜的糖块和香香的月饼，在一片亲情中度过 1974 年春节的。赵健民出狱后对妻子说：“你给送去的糖块和月饼，我节省着吃，吃了整整有半年。”

林彪事件后，云南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自“划线站队”运动开始，大批遭受迫害、摧残的干部和群众，不断冲破重重阻力，采用信访和上访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其中大量的是揭发谭甫仁、鲁瑞林等人的问题。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中央逐渐了解了云南的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四个月后的 1972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情况。会议认为云南和新疆、江西、贵州等地的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1972 年 7 月 5 日，周恩来在上海送走了班达拉奈克夫人后，于次日飞抵昆明，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就有关越美巴黎会谈问题交换意见。在昆明期间，周恩来明确地指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周兴：“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但是，周兴迟迟不动。

周兴是 1970 年 12 月 17 日谭甫仁死亡后担任云南省党、政一把手的。

谭甫仁是被刺身亡。197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四时，谭甫仁在住宅——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第 32 号院被枪击身亡，同时遇害的还有夫人王里岩。这一事件的破案工作历时八年之久。据谭甫仁的秘书王克学在《纵横》总第 80 期上撰文说，凶手是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

1972 年夏季，中央将鲁瑞林和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云南省

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成泽民调离云南。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一见到出席大会的周兴就问，云南的“划线站队”纠正了没有，并严肃地说：“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陈锡联也给周兴打招呼：“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告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这是谭甫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

周兴再也不能拖延了。他回到昆明后，两次召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黎韦到他家，要求黎韦带头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黎韦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但要求周兴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和陈锡联打招呼的意见，并讲明黎韦的任务。可是，周兴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显然，黎韦的要求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而周兴的拒绝是没有道理的。

从 1973 年 10 月到 1974 年 2 月，黎韦在昆明市逐步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但好景不长。从 1974 年 1 月开始，中国大地上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随着运动的不断展开，云南的帮派活动日益猖獗。黄兆其、刘殷农批判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黎韦是“昆明市复辟回潮的总代表”。在帮派势力的压力之下，周兴断然否定他指示黎韦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甚至说黎韦是背着省委搞的。

第一次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就这样夭折了。

第十九章

栽赃、陷害的《审查结论》

"批林批孔"运动骤起，形势发生逆转——三上血书——陷赵健民于死地的《审查结论》——无中生有的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囹圄中嘱妻子儿女：学习，学习，再学习——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赵健民与家人的会面被终止了。他感觉到形势正在逆转。

面对着专案组久拖不作结论的局面，1974年2月5日，赵健民提出了迅速结案的四条要求。然而，要求提出之后没有一点反响。6月10日，赵健民决定以血抗议。这天下午，趁看守人员打盹的机会，他刺破自己的鼻腔，用刷牙缸接着如注的鲜血。然后，用一根木棒缠上布条，蘸着鲜血在报纸上写下了两张大字血书。血书中，强烈要求实事求是地迅速作出结论，要求得到向组织申诉的权利。

这一次有了反响，专案组通知赵健民，可以给组织写申诉材料。6月20日，赵健民分别给康生和中共云南省委写信，要求依照法律和党章，尽快作出正确的结论。在信中，赵健民愤怒地质问

道："难道还要去海格特公墓请马克思给我作结论吗？！"

赵健民估计错了。当时的云南省委已经给他作出了"反革命"的结论，并于1974年5月26日以云发〔1974〕第83号文件上报中央。

这份上报中央的《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采用了"文革"中所惯用的诬蔑、栽赃、黑白颠倒、无限上纲等卑劣的手法，列举出赵健民四个方面的"反革命罪行"。

第一，"1936年在济南被捕叛变"。文件中使用的材料，全都是虚假的。

第二，"积极追随刘少奇、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件中罗列了几条事实：

> 1956年后，赵健民就大肆宣扬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现在农村情况也好，城市情况也好，都有了变化，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

> 1962年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后，赵健民还攻击说："光讲阶级斗争，生产搞不好，也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

>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赵健民积极配合，他在济南钢铁厂以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为名，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

> 1962年2月，赵健民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支持刘少奇的反党黑报告，配合刘少奇攻击党的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胡说山东一年半“荒地五六千万亩”，“死人六十五万”，“人吃人的事件几十起”，“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发现，而是不敢讲，谁敢讲呀！说了就给你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他还诬蔑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摧残党的战斗力”。

……

第三，“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文件中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健民就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把文化大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脱离实际’，‘打击面太宽’”。文件中使用造反派捏造的材料，诬蔑赵健民“把矛头指向军管”，“妄图实现反革命武装夺权”，遥控指挥滇西挺进纵队破坏边疆革命和生产。

第四，“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文件中，诬陷手段之卑鄙无耻，令人吃惊，将赵健民请齐运岭送信说成是“用钱收买警卫战士替他传递反动信件”；将赵健民在狱中写的诗说成是“反革命诗句”，“恶毒攻击、辱骂中央首长”；将赵健民的三次绝食说成是“毫无悔改之意”，“犯下新的反革命罪行”。

文件的最后部分，给赵健民定性为“罪大恶极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中央“撤销赵健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依法严惩”。

文件的炮制者们，是决心要把赵健民送上断头台。

这份文件在给赵健民网罗罪名时，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不再称赵健民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二是不再提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不再称赵健民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是因为毛泽东已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反。而不提赵健民执行“国民

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根本原因是造反派、专案组几年来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有搜寻到一点证据。

最早提到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并将特务组与赵健民联系到一起的是康生。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赵健民说：“我看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适应他们的计划。”康生在这里使用了“适应”二字，而没有用“执行”。“适应”与“执行”，含意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提到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是谭甫仁，而通过宣传工具公开提到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是黄兆其等人。黄兆其、张浩雷、刘镜三人在1968年11月21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赵健民“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阳奉阴违，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罪恶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

而制造“证据”的是专案组。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前提是要有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了造出这个特务组，1969年11月27日，专案组报请省革委负责人批准，将昆明市的华亭寺、太华寺、筇竹寺、曹西寺、庙高寺、胜阳寺等寺庙的六十四位和尚、尼姑、居士及还俗人员，集中到华亭寺办学习班，追查特务。在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审查中，使用了捆、绑、吊、打、罚跪、挂黑牌、关押等刑罚，先后将空尘、纯志、德乘等逼迫上吊或投水而死。最后，编造说，华亭寺是特务活动基地，这个基地和缅甸美蒋特务机关有联系，而赵健民与华亭寺的和尚“诡密来往”。这样，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罪名就成立了。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复查，六十四位和尚、尼姑、居士及还俗人员中，没有一人与特务沾边。

数年后，笔者来到华亭寺，当看见天王宝殿的对联后，不禁想

起了当年的学习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上联是:尘世不相关几阅桑田几沧海

下联是:胸中何所有半是青松半是云

横批是:海不扬波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不想扬波的大海,也要扬波啊!

对于这个假案,还是黄兆其说得最明白。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7月11日,黄兆其交待说: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有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省革委成立以后,在第七次全会上和第七次全会以后,也没有挖出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我在参加省革委办公会议和省委常委工作期间,也没有听到过有确凿证据说明存在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因此,我认识到,"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是强加给赵健民和"炮派"组织的诬蔑不实之词。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是"划线站队"中制造的最严重的假案。

1974年,虽然形势逆转,但还允许赵健民与家人通信。只是专案组转信时间的长短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

这年7月15日,杨瑞波在不准探视而又挂心丈夫的情形下,给赵健民寄去一信。

健民:

你好!

你6月20日的来信,组织上于7月9日转给了我。请放心。

从信中知道你的身体、精神、学习都好,我和孩子都

感到很大的安慰。只要你的身体好,精神好,学习好,我和孩子就放心了。

孩子们每次来信,都很关心你的身体和精神。希望你千万坚持锻炼身体,保持精神愉快,努力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

下面谈一下我和小孩的情况。

我的工作单位和住宿均同前。我的身体、精神也是好的。有时我也会难过,但马上就控制住了,又愉快起来。现在,我也学会了料理家庭、照顾自己,所以请你不要挂念家庭,不要挂念我和孩子们。

赵杨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今年下半年就要升中学了。她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上,但珠算较差。她还是懂事的,在家里帮助我做饭、洗衣服,但比较爱玩。

万楠① 仍在济南上学,成绩中上。他现在除坚持学好各门功课外,还在自学英语。他的身体更是体强力壮。万松、万桐仍在原处。总之,他们三个人各方面都很好,都是体强力壮。他们各方面都已成熟,都会照料自己。他们之间也是团结的,能够互相帮助。他们三个也很体谅我,所以都听我的话。

关于三个孩子改名的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孩子也没有意见。赵杨看你给她哥哥改名,自己也要求改名字。我和赵杨的意见是改叫赵万杉,你意如何?

我见你写的信中有个别的错别字,希望你多练练字。

你需要什么东西,请通过组织上给我要,千万不要考虑我的困难。

---

① 在这之前,赵健民给三个儿子改名为赵万松、赵万桐、赵万楠。

万桐给你的信，我已收到转给你。万松、万楠的信，我还未收到，等收到后即交给组织，请组织上帮助转给你。

愿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瑞波

1974年7月15日

这封信交给专案组一个多月，没有回音。杨瑞波只得给丈夫再写一封。

健民：

你好！

7月15日给你的信，我想早已收到。现把万松、万楠的信给你转去。万松因跟厂里的同志出差，不在家，没能及时看到我的信，所以没有及时给你写信。万楠给你的信，我早已收到，因为等万松的信，所以今天才转给你。

上次和你见面时，听你说，你那件棉衣太瘦了，不合身。希你请组织把棉衣转给我，我给你改做一下。

另外，你的中式皮大衣，因几年未晒，有点掉绒。是否给你改个皮褥子，或改一件你需要的衣服，望来信谈一下你的意见。你不管需要什么东西，请一定向组织上提出来，转告我。

健民，我们已有七个多月没有见面了，望你千万锻炼身体，保持愉快的精神。

下次再谈吧。

祝你身体健康！

瑞波

1974年8月24日

杨瑞波8月24日写给赵健民的信，在专案组手里整整旅行了十天。赵健民接信后，立即给妻子和子女写了回信。

瑞波，并松、桐、楠、杉：

你7月15日信及万桐、万杉的来信，前已收到。你8月24日信及万松、万楠的来信，今日收到。从信中了解你们一些情况，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身体是好的，每日运动在一个半小时以上（早、午、下午三次）。我现在正复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其中多数的观点，我还联系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中有关观点，反复读。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三个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党的民主”和“学习”两节等，我每月背诵一次。对此，我已坚持几年了。在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方面，我现在是越学越愿学，学习的兴趣大得很。在学习中，联系我过去工作的经验，用学的理论原则去思考，使之带上条理性、综合性。因为在学习中，进一步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世界，看待中国，看待我自己，所以我对一切都是乐观的，精神是愉快的。一切请勿念。

关于你与万松、万桐、万楠的学习，我认为主要的是把《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学好，要精通，要做到能运用自如。要先把五篇哲学著作学精通，学得能结合实际运用

自如，运用得恰当，运用得正确。

万松、万桐、万楠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对主席著作的学习，以及结合工作对有关业务的学习（如万松、万桐学习农业的若干门），要做长期打算。要有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计划。有计划，有毅力，没有什么东西是学不到的。努力学，学好，是社会主义的需要，党和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万松、万桐再来信，告诉我梁堂生产队的玉米、小麦、谷子、棉花、红薯、高粱、花生等的亩产量，以及平均几亩地有一口猪，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等。

万松、万桐，一定要成为生产队的劳动积极分子、热情分子。万楠在学校，一定要成为学习的积极分子。万杉一定要成为小学、初中的学习积极分子。你妈妈一定要成为工厂的劳动、学习积极分子。我在我的情况下，一定要成为学习积极分子。在学习方面，我严格、高标准要求自己。

在学习问题上，还有重要的是学习实际经验。如万松、万桐向老农学习，万楠向老工人学习等。

祝瑞波工作好、学习好、生活好、身体好，祝松、桐、楠、杉劳动好、学习好、身体好。

健民

1974年9月4日于昆明

毛泽东和“四人帮”对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并不一致。毛泽东的意图是，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扼制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以维护和继续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四人帮”则企图借批林批孔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逆

流”、“复辟资本主义”，影射、攻击坚持纠正“左”的错误的周恩来和在落实政策中重新工作的一批老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之下，批林批孔运动引发了新的动乱。这时，尽管毛泽东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他并不希望发生动乱，所以对“四人帮”的有些做法提出了批评。1974年7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批评，就是较严厉的一次。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警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当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和警告，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对工作方法、作风上的一些缺点的批评。虽然如此，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批评一传到社会上，就使人们感觉到，中国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杨瑞波似乎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她决定亲自到北京上访。

第二十章

历尽磨难的上访

不远数千里赴京上访——姚仲明出上策——屠荣举倾力相助——姬玉兰探索走王海容这条线——还是李同、朱礼泉，将情况直送邓小平——重于千金的一百五十元

1974年10月的一天，杨瑞波携女儿赵杨，不远数千里，从昆明来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找个地方落脚，是第一位的。母女二人到了赵健民的在京的堂侄女家住了下来。这户人家经济上不宽裕。杨瑞波知道，一下子增添两口人，会给户主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就按日交给伙食费和粮票。

这时，在京能帮助杨瑞波分析分析形势、出出主意的，只有姚仲明和赵健民的原秘书屠荣举了。

姚仲明，时任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他是1966年由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回国后担任这个闲职的。杨瑞波到京后，经常到他家，商量上访问题，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杨瑞波刚到北京时，有人给出了个主意，要她母女二人到中央信访站，在那里吃，在那里住，在那里闹，不解决问题不走。杨瑞波觉得这个办法不妥，但又觉得应该到信访站去看一看。

这天一早，母女二人来到了信访站所在地陶然亭，一看吃了一惊。信访站周围的大街小巷，挤满了上访的人。其中，有的搭起棚子安营扎寨，有的在露天地上昏昏而睡，有的在支锅煮饭，有的在打扑克，还有的围在一起说笑咒骂，宛若一个大逃难所。母女二人走进大厅，大小便的臭味立即扑鼻而来。低头一看，满地都是大小便。大厅的一面墙上，设了许多信访窗口，据说一省一个。这些信访窗口，就像火车站、汽车站的售票口一样。杨瑞波一看，这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就拉着女儿直接到了姚仲明家。

杨瑞波向姚仲明详细说明了情况，问应该怎么办。姚仲明沉思了片刻，谈了自己的意见："不可采取那种办法。您的身份与普通上访的人不一样，搞得不好，还可能给您扣上个政治帽子。如果那样，就更不利于解决问题了。再说，您们母女要遭多大罪啊！如果您们病了，怎么办？我看，上策是通过健民的老战友，将申诉信递给中央领导人。"谈到这里，姚仲明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杨瑞波体谅姚仲明的难处，觉得这个建议可行。

她又匆匆地来到屠荣举家，同屠商量，通过什么途径把申诉信呈递给中央领导人。

屠荣举与赵健民之间有一段很不寻常的交往。

屠荣举生于1925年，比赵健民小13岁。他的原籍是江苏省常州市，因祖父携家眷从政于湖北，所以他出生在武汉。他的叔叔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为推翻帝制而捐躯。1938年，年仅13岁、刚入初中二年级的屠荣举，为了抗日，同姐姐和部分同学到了西安，准备去延安。当时的延安，代表着光明和进步，对年轻的屠荣举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多次的机会，都由于姐姐的拦阻而未能成行。姐姐认为他年岁太小，不能自理。1939年，屠荣举冲破阻力，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同一批流亡在西安的学生，越过黄河到了华北抗日前线。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八路军冀鲁豫

军区第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工作，1946 年又调到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这时，赵健民任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二人就有了工作上的接触。随着接触的增多，双方渐渐地熟悉起来。1950 年 2 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的赵健民，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住在重庆。恰在这时，屠荣举在北京治完病去五兵团驻地贵阳途经重庆。他听说赵健民在重庆，就前去探望。刚到任的赵健民，正缺少人手，即极力挽留屠荣举在部里工作。屠应允后，赵亲自联系给屠办理了转业调动手续。这样，屠荣举就成为交通部的教育科长。

1951 年初，为了加快修建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赵健民兼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党委书记。为了加强西南铁路工程局，赵健民从交通部抽调一批干部到铁路工程局工作，屠荣举被调到铁路工程局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局团委宣传部长。

1951 年底，全党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接着，又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了"五反"斗争。"三反"运动开始后，西南铁路工程局党委决定向所属的九个工程段派出工作组，协助开展运动。屠荣举被派到驻简阳的第八工程段，任党支部书记。运动中，有一个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据屠荣举回忆，在"打老虎"中出现了"左"的偏差。当时，"上级机关一天早、中、晚三次催要打'老虎'战报，例如，打了多少'老虎'，贪污多少，收缴赃款赃物有多少，等等。没有数字可报，领导机关就批评为'严重右倾'，甚至指责'手中不干净'，勒令限期纠正，逾期将予以处分。""结果，各种形式的逼供，各种体罚、肉刑，越演越烈。"屠荣举不是个草莽之夫，不会随波逐流，在运动中没有搞过逼供。但在上级压力之下，显得有些急躁，作为领导人也没有严禁过

火行为。一天，第八工程段的"打虎队"批斗"老虎"嫌疑人赵家业。赵在解放以前是个小工程承包商，解放以后参加工作，为测量工。批斗中，有人用麻绳沾着水抽打，进行逼供。当时，赵家业受伤，但没有死。到第二天晚上，赵心力衰竭，经医生抢救无效而死亡。从病历上看，赵家业有冠心病史。但他的死，与抽打有直接的关系。

对抽打逼供赵家业，屠荣举虽然事前一无所知，但对赵的死亡，应该负领导责任。这次事故发生不久，上级指示纠正过火行为。西南铁路工程局在讨论"赵家业死亡"问题时，赵健民为了狠刹过火风，主张给屠荣举以开除党籍处分。当时，尽管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等不同意处分得这么严重，但最终也没能否定赵健民的意见。后来，当处分报告报送到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批时，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从错误性质看，属于工作中的错误；从整个西南地区的这类案子的处理相比，开除党籍的处分过于重了，即建议铁路工程局党委重新审议。可是，在赵健民的坚持下，结果，还是给屠荣举以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工资由 13 级降为 20 级的处分。

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负过三次伤、立过功、得过荣誉证书的人，第一次受到严厉的处分。按常理，屠、赵之间会因此而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可是，屠荣举了解赵健民，知道他是一位善良正直、心胸开阔、不计私人恩怨的人，在处理自己的问题上，完全是出于公心，出于党性，所以没有因受处分而产生怨恨之心。

"三反"运动过后，赵健民也认识到对屠荣举的处分失当，但木已成舟，只能留待以后寻机纠正。

1952 年 7 月 1 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年底，赵健民调任国家铁道部副部长。当时的铁道部长是滕代远。赵健民进京时，调屠荣举作自己的秘书。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了解屠的情况，便于纠正对屠的不当处分。在铁道部，经过赵健民的努力，1953 年撤

销了对屠荣举的行政处分，工资由20级上调至15级；1954年又批准屠荣举重新入党，党龄从这时算起。这样，屠荣举的工资比原来还低两级，党龄也被割断了。屠荣举是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直到粉碎"四人帮"、赵健民调到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后，经赵健民向铁道部反映，才撤销了对屠荣举的开除党籍处分，党龄从1941年算起。

1955年2月，中央决定调赵健民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屠荣举随赵到了山东。1958年，在"反右补课"中，赵健民被戴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帽子，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批判。作为赵健民的秘书，自然免不了遭受厄运。在多次批判会上，有些人剑拔弩张地逼迫屠荣举揭发赵健民的反党活动。也有一些"好心人"，劝说屠荣举反戈一击。屠荣举心里明白，赵健民根本不存在所谓"三顶帽子"中的问题，但是自己不批判不发言是过不了关的。于是，屠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问题上。有一天，赵对屠说："今天省政府的批判会，只有你的发言没掺假，没捏造，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屠荣举听后，心中泛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在批判最激烈的时刻，屠荣举担心的是赵健民经受不住冤枉的考验。屠从个人的经历中体验到：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冤屈，冤屈，能把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荣誉断送掉；冤屈，能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推向绝路。赵健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虽然坐过敌人的监狱，但在党内是一帆风顺的，担任省长时才43岁。经得起敌人摧残的人，就一定能经得起党内的冤枉吗？屠荣举没有把握。看一看现实吧！昔日，赵健民住宅门前，人来车往，络绎不断；遭受批判后，先是门可罗雀，接着是撤走传达、警卫人员和炊事员、汽车司机，就连去参加中央全会时都没有人服务。屠荣举知道赵健民保留着一支小手枪。这是一位军人的心爱之物。他担心赵在想不开时用枪自杀，就几次向赵索枪，但都没有要出来。放心不下的屠荣举，一再嘱咐杨瑞波，"千万要注意赵省长的异常举动"。有时，屠直接劝说赵健民："千万不能走绝路，否则，将来没有人替你说清楚，谁来为你平反？！"后来，当赵健民被调到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时，屠荣举就决定回铁道部工作。

冲破了种种拦阻，屠荣举才回到了北京。到铁道部上班后，他心中仍忿忿不平。1960年春，屠荣举给彭真写了一封信，要求彭真本人或指派专人听取他对赵健民在山东被错误批判的情况反映。当时，彭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没过几天，彭真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约屠面谈。屠荣举向这人谈了足足一个小时。谈话结束时，这位工作人员要求屠写一份详细材料呈送彭真。屠回来后立即照办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屠荣举被以种种"罪名"关押了三个月。其中的一个罪名是，为走资派、大叛徒赵健民翻案。因为云南的"八派"找到了当年屠荣举写给彭真的那份材料。解除关押后，屠荣举到了铁道部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忆起这段时间的遭遇，屠荣举感慨地说："我是人未亡，家已破。六口之家，分散在四个地方。"直到1972年，屠才回到北京，在家中等待安排工作。

屠荣举听杨瑞波谈了姚仲明的意见后，认为可取，答应立即联系。通过多种渠道，屠荣举得知赵健民的老战友杨勇住在京西宾馆。杨勇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屠荣举的帮助下，杨瑞波见到了杨勇。杨勇关切地询问了赵健民的情况，答应帮助转信。杨瑞波一时欣喜异常。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信没有转成。杨勇处不通，屠荣举又帮助杨瑞波见到了赵健民的同乡、战友，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运北。总之，屠荣举把赵健民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要，他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地四处联络。

托不到人转信，杨瑞波是寝食不安。这一天，她冒昧地来到赵健民小时候的武术老师姬安镇之女姬玉兰家。第一次见面，姬玉兰就分外热情。她介绍说，她的一位朋友叫王雪明，是王海容的弟弟王启华的朋友，可请王雪明帮忙，通过王海容，将申诉信转给毛泽东。那时候，王海容是中国经常能见到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姬玉兰、王雪明二人经过好一段时间的奔走，才将信转到了王启华手中。至于王海容帮没帮忙，就不得而知了。为了感谢王雪明的真诚帮助，杨瑞波在离京前想请她吃顿饭。姬玉兰知道后，坦诚地对杨瑞波说：“你和雪明都来我家，咱们一起吃顿便饭。你千万不要拿礼物，你哪有钱呀！”说完后又加了一句，“你如果带东西来，我就给你扔出去。”吃饭那天，杨瑞波母女二人空手而去。姬玉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又替杨瑞波给王雪明的小孩买了件时髦的玩具。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逢着难处的杨瑞波，一头头地到处托人。在北京期间，她还见到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的秘书，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等人，但是，信始终没能转上去。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杨瑞波给赵健民的同学、战友刘莱夫的夫人李同去了一封短函，请求帮助。“文化大革命”前，刘莱夫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这时，患脑血栓病正住院治疗。李同接到信后，立即赶到杨瑞波的住处。

李同，是一位解放前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女性。她，1925 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孔德小学读书，1944 年由北平女子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48 年加入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1950 年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1952 年，与刘莱夫结为夫妻。1974 年，在北京宣武医院任儿科主任。

对赵健民，李同并不怎么熟悉。她是从丈夫口中了解赵健民

的为人的。她说：“莱夫多次和我讲赵健民同志的感人事迹，说健民同志是他一生中最佩服的人。健民同志党性强，受到大家的爱戴和信任。健民同志被捕后，被他领导的人不跑。因为这些人相信他绝对不会叛变。健民同志被捕后，在生死关头向韩复榘义正辞严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健民同志对日英勇作战，群众称他是‘赵子龙’。我问健民家乡冠县的一位干部，知不知道赵健民，这位干部回答说，赵健民就是我们家乡的‘李向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 1967 年，莱夫被斗，健民同志劝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还谈了否定之否定规律。1976 年后的实践证明，健民同志是我们全家人心目中的实实在在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李同听了杨瑞波谈的情况后说：“莱夫生活不能自理，见了老同志就哭。你不要去看他了，因为他见了你，会为健民同志伤心大哭的。我认识莱夫的一位战友，叫朱礼泉，是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请他帮忙，将信转给邓小平同志。我把朱礼泉同志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们约个时间见见面。”杨瑞波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李同临走时，给杨瑞波留下了五十元钱。五十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够杨瑞波母女二人生活两个月的。

杨瑞波经过几次努力，终于同朱礼泉联系上了。11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杨见到了朱。朱礼泉热情地接待杨瑞波。他看了申诉信后，认为写得还好。当杨瑞波提出将信留下，请他转呈时，朱礼泉礼貌地告诉杨：“您贴上四分钱的邮票，把信寄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如果由我带去，别人会说是走后门。我们通过正门办。”杨瑞波不无担心地问：“这样一封普通的信，您会看到吗？”朱礼泉立即打消了杨瑞波的疑问：“我会看到的。因为健民同志不是一般干部，不管是谁接到信，都要送我过目。我收到后，立即亲自送给邓小平同志的秘书。”朱礼泉并告诉杨瑞波，三天后电话联系。

三天后，杨瑞波怀着急切的心情给朱礼泉去电话。电话中传

托不到人转信，杨瑞波是寝食不安。这一天，她冒昧地来到赵健民小时候的武术老师姬安镇之女姬玉兰家。第一次见面，姬玉兰就分外热情。她介绍说，她的一位朋友叫王雪明，是王海容的弟弟王启华的朋友，可请王雪明帮忙，通过王海容，将申诉信转给毛泽东。那时候，王海容是中国经常能见到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姬玉兰、王雪明二人经过好一段时间的奔走，才将信转到了王启华手中。至于王海容帮没帮忙，就不得而知了。为了感谢王雪明的真诚帮助，杨瑞波在离京前想请她吃顿饭。姬玉兰知道后，坦诚地对杨瑞波说："你和雪明都来我家，咱们一起吃顿便饭。你千万不要拿礼物，你哪有钱呀！"说完后又加了一句，"你如果带东西来，我就给你扔出去。"吃饭那天，杨瑞波母女二人空手而去。姬玉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又替杨瑞波给王雪明的小孩买了件时髦的玩具。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逢着难处的杨瑞波，一头头地到处托人。在北京期间，她还见到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的秘书，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万里等人，但是，信始终没能转上去。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杨瑞波给赵健民的同学、战友刘莱夫的夫人李同去了一封短函，请求帮助。"文化大革命"前，刘莱夫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这时，患脑血栓病正住院治疗。李同接到信后，立即赶到杨瑞波的住处。

李同，是一位解放前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女性。她，1925 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孔德小学读书，1944 年由北平女子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48 年加入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1950 年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1952 年，与刘莱夫结为夫妻。1974 年，在北京宣武医院任儿科主任。

对赵健民，李同并不怎么熟悉。她是从丈夫口中了解赵健民

的为人的。她说："莱夫多次和我讲赵健民同志的感人事迹，说健民同志是他一生中最佩服的人。健民同志党性强，受到大家的爱戴和信任。健民同志被捕后，被他领导的人不跑。因为这些人相信他绝对不会叛变。健民同志被捕后，在生死关头向韩复榘义正辞严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健民同志对日英勇作战，群众称他是'赵子龙'。我问健民家乡冠县的一位干部，知不知道赵健民，这位干部回答说，赵健民就是我们家乡的'李向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 1967 年，莱夫被斗，健民同志劝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还谈了否定之否定规律。1976 年后的实践证明，健民同志是我们全家人心目中的实实在在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李同听了杨瑞波谈的情况后说："莱夫生活不能自理，见了老同志就哭。你不要去看他了，因为他见了你，会为健民同志伤心大哭的。我认识莱夫的一位战友，叫朱礼泉，是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请他帮忙，将信转给邓小平同志。我把朱礼泉同志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们约个时间见见面。"杨瑞波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李同临走时，给杨瑞波留下了五十元钱。五十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够杨瑞波母女二人生活两个月的。

杨瑞波经过几次努力，终于同朱礼泉联系上了。11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杨见到了朱。朱礼泉热情地接待杨瑞波。他看了申诉信后，认为写得还好。当杨瑞波提出将信留下，请他转呈时，朱礼泉礼貌地告诉杨："您贴上四分钱的邮票，把信寄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如果由我带去，别人会说是走后门。我们通过正门办。"杨瑞波不无担心地问："这样一封普通的信，您会看到吗？"朱礼泉立即打消了杨瑞波的疑问："我会看到的。因为健民同志不是一般干部，不管是谁接到信，都要送我过目。我收到后，立即亲自送给邓小平同志的秘书。"朱礼泉并告诉杨瑞波，三天后电话联系。

三天后，杨瑞波怀着急切的心情给朱礼泉去电话。电话中传

来了好消息："信收到了。接到信后，我立即安排打字，又把原信附在打字信后，亲自送给了邓小平同志的秘书。您放心，邓小平同志一定能够看到。至于小平同志如何批示，就不知道了。"

信，终于呈上了。

中央，终于知道了赵健民的情况。

杨瑞波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心底里升起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快感。后来她回忆说："健民的出狱，李同、朱礼泉同志是有功的。"

不久后的12月，刘莱夫去世了。他和李同相伴走过了二十二年的人生路程。刘莱夫去世后，李同教育三个子女相继成人。长子于北京电视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又去日本进行短期学习；女儿和次子在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均获得博士学位。李同的女儿刘小元是邓质方的妻子。现今离休的李同，是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正在把自己的余热献给祖国的儿童。

杨瑞波母女在京城奔波了四十多天，能够做到的都尽力去做了，况且，手头已经拮据，不允许她们再留在北京。要返回昆明，已经没有路费。心烦意乱的杨瑞波，想不到向谁借钱合适。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去求屠荣举夫妇帮助。一天下午，杨瑞波来到屠荣举家。见面后，杨瑞波不知怎么，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这时，送煤工人送来了煤。杨瑞波就插上手，一边帮助搬煤，一边闲聊。搬完煤，时针快指向五点了。北京的冬天，这个时刻，夜幕开始降落。看看钟表，杨瑞波涨红着脸对屠荣举提出借钱的事。屠笑了笑，问需要多少。杨回答说，需要一百元。屠告诉杨，第二天听电话。

第二天，屠荣举将一百五十元钱亲自送到杨瑞波手中。当杨瑞波接钱时，激动得手直抖，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出来。谁知道，这一百五十元钱是屠荣举借来的。屠荣举后来回忆说："杨瑞

波和女儿回昆明，向我借钱。虽然我及时帮助她们解决了路费，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在她们困难的时刻，在她们需要经济支援的时刻，我却力不从心。她们哪里知道，路费是我借来的。'文革'中，我家负债五百多元。"

有了路费，杨瑞波即携女儿离京回昆明。

这是她"文革"中第二次离京。

如果说1968年1月第一次离京时，迎接她的是暴风雪，那么这次离京，迎接她的将是春的气息。

第二十一章

乍暖又寒

197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邓小平的声音:赵健民同志的身体怎样?——解除专案审查,发给生活费——丁诗纯的象牙筷子——结束二千八百零九个昼夜的关押——又起一片乌云——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再次受挫

1975年,春天来得特别早。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月13日至17日,在四届人大上,任命邓小平为排名在第一位的国务院副总理。会后,分工邓小平主管外事工作,并在周恩来治病期间,代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这样,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重新主政的邓小平,雷厉风行地进行各项整顿工作,同极"左"思潮展开了斗争。

4月底,根据毛泽东的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指

示,经过周恩来、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被审查的人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性质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还不能作出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就在中央这个决定下发前后,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电话询问云南省委:"赵健民同志的身体怎样?"

这个电话立即在云南引起了波动。周兴无可奈何地说:"《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上报中央一年了,也没有批。现在又问身体情况,看来不行了。进行复查吧。"于是,五月的一天,专案组通知赵健民:"你的问题,今后由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负责。"赵健民意识到,这表明不再把自己作为敌我矛盾对待。

又过了两个多月,7月26日,复查组负责人告诉赵健民,省委决定从7月份起每月发给生活费,并询问赵健民想买点什么。赵健民告诉这位负责人,他每月留下50元零用,其余的转给家中,希望给买几斤牛肉和鸡蛋。这位负责人很不自然地说:"牛肉和鸡蛋是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我没有票啊。报纸上不是说物资供应丰富吗?"赵健民以为他在欺骗自己,就反问了一句。这位负责人什么也没有说。

八年的磨难,使杨瑞波又患了一场大病。5月中旬,胃突然出血,住进了厂卫生所。十余天中,杨瑞波由于胃出血不停,不能进食,只能吃一点稀饭、藕粉等流食,所以身体极度虚弱,面无血色,行走困难。这时,她的思想压力越来越重,似乎感到生命到了尽头。如果自己走了,孩子谁来管?狱中的丈夫怎么办?她越想越

悲哀。一天，杨瑞波将厂政工科长请来，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转告上级，批准与赵健民见一面；第二，请厂里借给一点钱。第二天，省革委的一个女工作人员同杨瑞波进行了面谈，又同医生和厂负责人谈了话。此后，两项要求都没有回音。杨瑞波的病情不断加重，在马正弟等人的帮助下，6月3日住进了医院。一个星期后又回家治疗。

直到8月初，才批准杨瑞波去探视赵健民。丁诗纯得知杨瑞波要同赵健民见面，就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一双象牙筷子交给杨说：“他们将健民同志打成叛徒，没有一点材料。要提防他们狗急跳墙，在饭中下毒。听说用象牙筷子吃饭，若饭中有毒筷子即变黑。您把这双筷子给健民同志用，以防不测。”杨瑞波激动地接过筷子。她接受的不仅仅是一双珍贵的象牙筷子，而且是不知比象牙筷子要贵重多少倍的信任和友谊。

见面的时刻到了。杨瑞波一进门，赵健民就发现妻子面黄肌瘦、精神不振，立即关心地问：“你生病了吗？”杨瑞波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竟放声大哭。积满心中的委屈、悲伤，像喷泉似地喷射出来。赵健民忙掏出手帕递给妻子，强制将涌到眼眶的泪水向心里流。

7、8、9三个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整顿工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时，赵健民的处境也越来越好。9月中旬的一天，复查组负责人将上一年5月上报中央的《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送给赵健民看。赵健民看了这份不同自己见面的诬陷材料后义愤填膺，立即不分昼夜地连续写出三四万字的反驳材料。

9月20日，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经批准，赵健民和妻子、女儿以及不到两岁的小孙女在第二监狱中过节。杨瑞波带来了月饼、水果，还有一只清炖鸡。一家三代坐在一起，看着象征团圆的月饼，一种难以言状的气氛弥漫了屋子。还是杨瑞波首先说

了话：“咱们不能等到月亮出来再吃，就提前过节吧。”边说着边把月饼和水果分给丈夫和女儿。天真的小孙女也急得伸着双小手要。当杨瑞波把一块月饼塞到她手里时，高兴得她咿咿呀呀地直叫。孙女的天真无邪，给六十三岁的赵健民带来了欣慰和快乐。会面时间就要过了。临走时，杨瑞波举起孙女的小手高声地说：“跟爷爷再见，跟爷爷再见。告诉爷爷，过几天来接爷爷回家。”

接赵健民回家，这既是杨瑞波对丈夫的安慰，也是杨瑞波对自己的安慰，她并没有什么根据。

事真凑巧，9月26日，复查组通知杨瑞波：“过几天赵健民就回家了，你们搬到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大院的一座楼里住。”同时给杨瑞波提出了三条要求：（一）如果赵健民外出，必须有人陪着；（二）不准赵健民接待外来人；（三）不准赵健民给外人写信。又是一个约法三章！杨瑞波想，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就要团圆了。在工人和邻居们的帮助下，杨瑞波搬进了楼下的一个套间房中。这座小楼，住着六七户人家。

9月30日上午十时，在杨瑞波、赵杨三个多小时焦急的等待中，一辆吉普车缓缓地开到了楼前。车停了，赵健民走下吉普车。

被关押了二千八百零九个昼夜的赵健民，终于获得了自由！不，是部分自由。

一个被支解得四分五裂的家庭，终于获得了团圆！不，是部分团圆。

要置赵健民于死地的人失败了！不，还没有完全失败。

不久的11月，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平地而起。这场运动，给赵健民问题的彻底解决蒙上了阴影。这场运动，也使云南一度好转的形势又恶化起来。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再次出现动乱。在重新垒起的山头中，按势力排，最大的有三家，一

是"齐向阳"，二是"大批判"，三是"反潮流"。前二家是原来的"八派"，最后一家是原来的"炮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刘殷农为头头。他们二人是所谓"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克己复礼"，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他们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即"打蔡、马、雷、董战役"，"打王必成战役"，"打陈康战役"。①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头头。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谁复辟？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既得利益者"、"新走资派"，主要是原"八派"的头头黄兆其、刘殷农以及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等人。

"反潮流"，这一派的头面人物是李毅、方向东。作为原"炮派"负责人的李、方二人，在"划线站队"中饱尝了残酷斗争之苦。所以，"批林批孔"一开始，这一派就提出了"批判谭甫仁，批判'划线

① 蔡，即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即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即雷远高，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委常委；董，即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省委委员；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等三大口号。他们多次组织人赴京上访，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反映情况。

三个山头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是，"批判谭甫仁，批判'划线站队'"与"批王批陈"之争。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为了解决云南问题，将三个山头的六个头头调到北京，限令他们在2月11日春节之前"倒旗脱勾削山头"。接着，召集云南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等三十二人到北京，举行两个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派性，统一认识，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会议自2月17日开到4月19日，最后形成云发〔1975〕26号文件。为顺利贯彻26号文件，会后，中央对干部进行了调动，将部分在地方上任职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将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调离云南。同时，将三个山头的头头组织到北京、包头、昔阳县去参观、学习、劳动。

从初夏开始，云南全省贯彻、执行26号文件，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然而，突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断了贯彻26号文件的进程。1976年1月，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炮制了《云南问题宣言》等大字报，攻击云南贯彻26号文件出现的好的形势是"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纲领的恐怖气氛"，诬陷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同时提出"要把省委坚决打倒"。第二次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受到挫折。

第二十二章

正义的裁判

"四五"运动带来了希望——粉碎"四人帮"后云南的巨变——一天三个文件，三起冤假案获得平反——1978年9月8日：云南历史上有意义的一天——二百五十万人的平反大会——第111号文件中了"妖"——历史，还赵健民以清白、光荣——历史，将制造冤假错案的罪人押上审判台——审查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三百六十七人、立案审查十七万五千九百七十四人、打逼死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九人的罕见冤案，给世人留下了什么？

赵健民出狱之后，才知道了"划线站队"的情况。当他得知数以万计的人被迫害致死时，不禁失声痛哭。1975年11月以后，面对着愈来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赵健民感到茫茫然。他不时地在内心发问："这些数以万计的冤魂，何时才能伸冤？"

人民群众给了赵健民一个明确的回答。1976年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四五"运动，使赵健民看到了全国人心的向背，看到了人民

群众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希望。

1976年10月8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的历史，开始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三个月，中共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集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到京开会。会议进行了五天，结束时十八人联名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回顾了自上次北京会议以来一年多中的情况，检查了云南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过程，澄清了云南的是非问题。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4号文件批复了报告，在批复中要求"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认真贯彻执行"，"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排除干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同时，中央免去了贾启允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一切职务(贾是1975年10月周兴去世后接替周兴职务的)，任命安平生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丕显为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为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2月10日，云南省委召开了有五十万党员参加的广播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4号文件和新组成的省委名单。与此同时的2月6日至13日，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了地、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八百多人。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4号文件和有关指示精神。16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云南大有希望》。是的，广大云南群众终于看到了希望。

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通道。

1977年3月，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恢复了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大无畏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实事求是的作风，冲破种种阻力，为重大冤假错案平反。1978年6月间，办公室向省

委上报了关于《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两大冤案和《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的复查报告。1978年7月14日，云南省委以云发〔1978〕94号、95号、96号等三个文件，为这三起冤假案平反。18日，省委又召开了有二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为这三起冤假案公开平反。

平反工作势如破竹。

1978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以联发〔1978〕9号文件，发出了《关于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通知》中说：

> 经党中央批准，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公开平反。现将平反结论下发，望认真传达，贯彻执行，并做好善后工作。

平反结论中说：

> ……把山东支边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诬蔑为"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进行了血腥镇压。省革委成立后，又在"划线站队"中，同另一假案"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挂勾，大肆扩散，疯狂迫害党内外、军内外大批革命干部、群众和指战员。
>
> ……
>
> 江青等人指使云南代理人，当工八团离开下关返回昆明于1968年1月27日途经一平浪时，进行武装镇压，制造了惨痛的流血事件。十六天后，2月13日，江青等人捏造工八团为"反革命匪帮"。江青等人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又说："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平浪。"……此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又把这一假案扩大化，在"划线站队"中，把陈康、赵健民、张力雄等同志诬为"滇挺的密谋策划者和遥控指挥者"。……对干部、群众、战士搞法西斯刑讯逼供，……造成极其严重后果。
>
> ……对在这一政治假案中受迫害和死亡人员予以平反、昭雪；对在一平浪流血事件中无辜死亡、伤残的人员，按因公死伤的待遇进行抚恤，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同是1978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以〔1978〕123号文件，发出了《关于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通知》中说：

> 经党中央批准，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大假案公开平反。现将平反结论下发，望认真传达，贯彻执行，并做好善后工作。

平反结论不长，笔者照录如下：

> 叛徒江青等人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推行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反革命路线，制造了一个所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
> 1968年1、2月份，叛徒江青等人在京接见云南代表和审问赵健民同志时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

党”;“你(指赵健民)是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再看看你的一切行动,你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曾把这两个讲话印发我省各级组织,并利用为其把持的《云南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大量印制传单广为传播。他们还把云南的一切重大冤假案都和所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挂起勾来,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后果十分严重。

经查实,赵健民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特务”,现已平反恢复工作。所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完全是叛徒江青等人一手制造的重大政治假案。对赵健民同志及因支持他站出来工作而受到牵连的革命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并按省委云发〔1977〕57号、58号文件精神做好善后工作。

显然,平反结论中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如只点了江青的名,而没有点康生的名;又如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可以理解,因为历史还没有推进到这一步。

在发出上述两个文件的同一天,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了为这两大假案平反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二百五十万人之多。

张铚秀代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在大会上宣布为“滇挺”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两大政治假案平反。他说:

所谓“滇西挺进纵队”,没有这个组织,纯属政治假案。林彪反党集团代理人炮制的文件中所说工役制工程

第八团离开昆明的时间、所经路线和沿途情况,均与事实不符。所说枪杀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一事,发生在1968年1月3日,工八团部分人员当时尚在昆明,与工八团毫不相干。工八团部分人员于1968年1月10日自昆明出发去下关,是为了接回住在那里的工役制部队六百多人回昆明,等待退役回山东。叛徒江青在工八团被武装镇压后的第十六天,即1968年2月13日把工八团宣布为“反革命匪帮”,这是对工八团的诬蔑和陷害,应予平反昭雪。

所谓“云南特务组计划”,经过查证,没有任何根据,纯属政治假案。这一假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根据江青等人的讲话制造出来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代理人积极追随林彪死党,在全省范围内大搞“划线站队”的产物。江青等人把赵健民同志宣布为“叛徒”,并说他“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当时的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和“四人帮”的余党把支持过赵健民同志的干部、群众统统扣上“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帽子摧残迫害,这是江青等人对赵健民同志和云南广大干部、群众的诬蔑和陷害,应予统统推倒。①

大会上,安平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他说:

我省的“划线站队”,就是林彪同“四人帮”合伙干的。林彪垮台之后,“四人帮”又充当了林彪路线的庇护者和

① 《云南日报》,1978年9月10日第一版。

继承人，不仅不准批判“划线站队”，而且继续用这根大棒打人，变本加厉地摧残迫害广大革命干部。事实证明，“四人帮”在我省拼凑的资产阶级帮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靠“划线站队”起家的。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进行批判，才能彻底清算他们合伙干的“划线站队”的滔天罪行；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云南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能彻底揭露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小撮余党的罪行；才能彻底摧毁在“划线站队”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才能彻底澄清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白之冤，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①

9月10日的《云南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大篇幅地报道了大会的实况，同时，发表了《欢呼沉冤昭雪　发展大好形势》的社论。社论中说：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的代理人和“四人帮”的余党为了篡党夺权，在我省蓄意制造了大量的假案、冤案，当时的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党内、军内和群众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②

① 《云南日报》，1978年9月10日第三版。
② 《云南日报》，1978年9月10日第一版。

这次大会，彻底打开了云南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此后，平反工作在全省迅速地全面展开。

还在1978年8月4日，云南省委就以云发〔1978〕111号文件通知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为赵健民平反。文件下发之前，省委征求了赵健民的意见，赵看后表示同意。不久，赵健民调到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赵健民得知云南有人篡改了第111号文件。他立即要求同在会议上的安平生调查纠正。安平生听后吃了一惊，一查，果然被改动了。于是，云南省委撤销了原通知，经过重新修改，仍以第111号文件下发。读者了解了这个细节，就容易理解第111号文件的内容了。

通　知

各地、州、市、县委，省属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

经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我省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和“滇挺”政治大假案，已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在全省公开平反。而这两个政治大假案，均是江青等人对赵健民同志栽赃陷害，强加罪名而造成的，为此，省委对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了相应的修改。现将修改后的省委《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意见的报告》及两个附件（附件一：赵健民同志对《审查结论意见》的意见；附件二：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关于赵健民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重新印发给你们，请传达到县以上机关干部。

省委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原发的通知（云发〔1978〕

111号文）予以撤销。

中共云南省委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

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

中共中央：

省委常委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会议讨论，同意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意见的报告》，撤回省委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给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党组字〔1974〕83号）。

当否，请批示。

中共云南省委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意见的报告

省　委：

赵健民同志，男，一九一二年生，山东省冠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加入共青团。历任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十七军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山东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系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行政六级。

赵健民同志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对其进行审查，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八日移交我省继续审查。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省委曾以〔1974〕83号文件向中央报送了审查报告。一九七五年八月以后，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现将复查后

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九三六年九月，赵健民同志在任我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时，被伪三路军军法处特务队逮捕。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被伪山东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已进犯山东，我党派代表和伪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伪山东高等法院让赵健民提前取保出狱。赵健民同志的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监委曾于一九五七年作过审查结论。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反复查证，这段历史是清楚的，未发现新的问题。我们意见，应维持一九五七年的结论（附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赵健民同志被林彪、“四人帮”诬蔑陷害，投进监狱关押审查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我省的帮派势力利用他们篡夺的舆论工具——报纸、文件、刊物、传单、话剧、小学课本等，对赵健民同志进行了极其恶毒的造谣和诬蔑，并对赵健民同志实行法西斯专政，使赵健民同志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折磨。他们还以对赵健民同志的造谣诬蔑为借口，对我省的数以万计的干部、党员、群众进行无限迫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林彪、“四人帮”对赵健民同志的关押审查，完全是他们为了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制造的一个假案。他们强加于赵健民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通通推倒，给予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当否，请批示。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赵健民同志对《审查结论意见》的意见。

附件二：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关于赵健民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附件一：

赵健民同志对《审查结论意见》的意见

我同意此结论意见。

赵　健　民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二（前已引述，略）。

历史，终于还赵健民以清白、光荣！终于使与赵健民相联系的一万五千余起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终于使一万七千多个冤魂得以伸冤！

历史，也将制造冤假错案的罪人推上了审判台。

康生，虽于 1975 年 12 月 16 日病死，但逃不脱历史的审判。在他死后三年的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对他进行审查。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明，康生在“文革”中犯下了严重罪行。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悼词》。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

谢富治，虽早在 1972 年 3 月 26 日就病故，但同样逃脱不了历

史的审判。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他进行审查。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明，谢富治在“文革”中犯下了严重罪行。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悼词》。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同案犯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1982 年 4 月 18 日至 29 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判。直接参加旁听审判的有一万七千多人次。在十九次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宣读和出示各种证据三百五十一件，十四名主要证人和受害人出庭作证。4 月 29 日，法庭公开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宣判后，四人不服，先后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6 月和 9 月，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下面，是关于他们四人的刑事判决书。

黄兆其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 18 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学强，检察员张甸侯。

被告人黄兆其，男，现年 39 岁，浙江省上虞县人。原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辩护人：刘章达、黄晨曦，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 1982 年 4 月 9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兆其在云南为首，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黄兆其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在云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黄兆其等人的犯罪活动，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黄兆其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黄兆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1967年7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反动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5月29日晚举行军事政变。1968年1月，黄兆其主持编造诬陷“报告”，捏造事实说：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

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结党营私，搞资产阶级反动同盟。在“报告”中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是“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下党托派”，致使这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在云南成立了“打赵作战部”，诬陷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同年12月4日，黄兆其主持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会上他诬陷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40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60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打倒赵健民。

1968年，黄兆其主持写了“干部情况汇报”，将一些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批厅、局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敌特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提出必须打倒。同年6月21日，黄兆其指使安炬祥、胡文龙写了《紧急报告》，诬陷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厅局的领导干部张曙光、侯良辅、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等，要求“立即逮捕”，使侯良辅、林亮冤狱多年。同年11月21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组织政治土匪，东窜西挺，执行美蒋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此期间，黄兆其还诬陷“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等群众组织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15000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1380000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70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1976年4月上旬，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诬陷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转报王洪文。同年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安机关将其主犯依法拘捕后，黄兆其不仅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还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被告人黄兆其为首组成"8人核心"和"6人核心"的班子领导、指挥同伙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974年和1976年，黄兆其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5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一些领导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1976年4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等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同年9月16日，黄兆其修改了涂晓雷、林敬荣写的"改组省委"的夺权方案，支持他们交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此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反动文章，大量印发、张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等领导是省委内的"复辟势力"。煽动揪"复辟势力"和"还乡团"，提出"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黄兆其、刘殷农还与军队的某些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打所谓"三个战役"，在全省和军内掀起打王必成和陈康高潮，层层揪"复辟势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徐宝兴等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阴谋分裂和搞垮省委。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朱克家策划，通过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会议期间，黄兆其通过同伙组织500余人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亲自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等人组织"告状团"、"上访团"冲击地书会议。黄兆其还主持拟了发给中央的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诬陷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领导运动，提出改组省委，企图篡夺省委领导权。

1976年黄兆其为首，伙同刘殷农等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的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案犯，黄兆其还主持、煽动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强行释放了13名在押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全省共放出在押犯123人，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

被告人黄兆其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1976年10月12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0月13日、16日，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策动武装叛乱，学习蔡锷武装起义。确定：由黄兆其、涂晓

雷负责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的基地；由刘殷农、徐宝兴分头给省市和各地州的同伙"打招呼"，做好准备；还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356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同时由刘殷农要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消息，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煤管局、356厂的张贤忠、金奕旦、刘志宏等人"打招呼"，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的同伙派人到昆明听取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回去准备响应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后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6次庭审调查和辩论，3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人黄兆其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兆其亦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

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2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张开文

人民陪审员 张顺安

人民陪审员 陈绍康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 杨建萍

刘殷农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19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熊世华、付远兴。

被告人：刘殷农，男，42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辩护人：杨维新、郜金波，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

年4月18日至4月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审问了被告人;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刘殷农伙同黄兆其、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及广大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拘禁后,又积极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被告人刘殷农及其同伙在云南的犯罪活动,前后达10年之久,使我省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刘殷农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刘殷农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积极与其同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

1968年12月14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赵健民是“大叛徒”、“老反革命”,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先后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还有省委书记刘明辉、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治国、省委常委赵增益等领导干部。特别在康生公开点名

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的冤案后,刘殷农及其同伙,更是紧密配合,大揪所谓“赵健民之流”,罗织各种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473人,被打伤致残的有9661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1967年12月30日,刘殷农就曾指使陈天寿等人非法拘禁无辜群众袁宝华,致使袁被刑讯逼供而死。

1976年4月,刘殷农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布置王海全等人搜集材料,并由马首良等人写成“报告”,经刘交涂晓雷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是此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年5月,当王永昆一伙公开诬陷已故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拘捕时,刘殷农为了包庇其同伙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诬陷周总理的罪行,指使王云仙等人制造伪证,叫安朗起草《报告》,诬陷王必成等是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的“后台”,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

被告人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阴谋颠覆政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殷农即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的方针,在昆明提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为了夺权,1974年,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组成“8人领导核心”,共谋制定了“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省

委常务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同时，还向江青、王洪文直接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搞“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煽动打倒王必成、陈康等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加快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又组成“6人领导核心”，积极配合行动。2月，刘殷农发出“战书”，公开向省委“宣战”。3月，又与黄兆其共同策划破坏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提出“省委班子是不行的”，“一定要调整、改组”。在会上，刘殷农发言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梯也尔式的人物”，煽动100多人发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和“改组省委”；并亲自带领其同伙冲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立即发出此一电报。6月，刘殷农及其同伙操纵、控制昆明市党干会，要求“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市促省”，加紧“夺权”。刘殷农在总结其夺权“经验”时，诽谤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要用“暴力”来对付。仅在昆明市的党干会会议期间，就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被诬陷为“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不少人当场就被抓打围斗，遭到残酷迫害。

与此同时，刘殷农还与黄兆其等人煽动群众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逼迫释放在押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等人，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刘殷农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殷农的这一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

使人民民主专政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11日，刘殷农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仍不甘心。10月12日，急忙要吴福全去上海窥测动向，13日及16日与黄兆其等人频繁开会，策动武装叛乱。共谋“上海不干，我们在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在此期间，刘殷农部署了其同伙在昆明一些单位和厂矿，“控制民兵”，准备“搞武装斗争”，并向文山、楚雄等地的任怀灿、马昭等“打招呼”，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并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罪恶计划未能实现，刘殷农又与黄兆其变换手法，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准备“第二套班子”，妄图作最后挣扎。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113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刘殷农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规定，应按现在实施的《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刘殷农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

罪表现。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2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李绍华

人民陪审员　王鹏程

人民陪审员　刘　洁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　周素蓉

涂晓雷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判字第21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鑫、王瑞启。

被告人：涂晓雷，男，现年34岁，贵州省开阳县人。原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辩护人：杨富春、马军，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28日对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被告人涂晓雷在云南参与黄兆其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案犯，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划武装叛乱。被告涂晓雷等人的犯罪活动，长达10年之久，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被告人涂晓雷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1967年6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写了《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反动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反动文章在昆明等地广为散发、张贴，起对于搞乱部队，使大批军队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

大的煽动作用。1968年11月21日，在黄兆其的授意下涂晓雷参与编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领导干部和群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这篇文章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对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起了极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1974年6月至11月，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反动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并诬陷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煽动打倒省委领导干部。1976年1月至7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撰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反动文章广为散发，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一批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975年12月至1976年9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

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诬陷邓小平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

1976年3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利用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涂晓雷在会外写了《谁是刽子手》等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积极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在会内夺省委的权。同时在参与修改黄兆其等人诬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不能平民愤的电报稿时，涂晓雷亲笔加上“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打倒邓小平。

1976年4月，按照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策划，涂晓雷与沈炳章化名王正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昆明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领受了“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做够”的旨意。涂晓雷回到昆明，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传达，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周总理了，共谋策划：王永昆他们要公开打倒周总理，先让他们打，看看他们打的情况再决定行动。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被公安机关拘捕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案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进而又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1976年9月3日，涂晓雷与邓跃泽联名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改组云南省委。9月中旬，涂晓雷又与

林敬荣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夺权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9月29日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1976年10月12日，涂晓雷得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10月13日晚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提出：要“搞武装斗争”；密谋策动驻军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进行叛乱；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356厂的民兵武装弹药；以昆明、楚雄等地作为武装叛乱的基地；给同伙“打招呼”，作好武装叛乱的准备。10月14日，涂晓雷参与驻昆部队的许梅康等人的密谋会议，分析了军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并安排了黄兆其与驻军某副司令员会面的时间、地点；同时，涂晓雷还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速返昆明。10月16日涂晓雷将上述情况汇报给黄兆其、刘殷农，再次研究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实现。事后，被告涂晓雷又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转变手法，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材料，确定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本庭经过5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63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

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涂晓雷基本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的第2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尤凤瑞

人民陪审员　浦士厚

人民陪审员　何兆兴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　蔡 斌

胡延观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昆刑字第20号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藻、李保全。

被告人：胡延观，男，汉族，48岁，四川省蓬溪县人，

原任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逮捕前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辩护人：杜大林、杨树林，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人胡延观，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4月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胡延观凭借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与黄兆其等共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政军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被告胡延观的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胡延观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68年12月14日，胡延观与刘殷农等人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变分子”，“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组织了一套“叛徒、特务、内奸”的“黑班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1976年3月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利用他主持编写《简报》的机会，诬陷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诽谤省委刘明辉等领导人“搞阴谋诡计”，组织“超级省委”；同时又将省委讨论赵健

民“问题”及向中央所作有关干部情况等机密材料，蓄意泄露扩散；诽谤省委1975年研究赵健民等冤案是“翻案”。同年4月，胡延观在一次省级机关大会上发言，诬陷省委大批领导干部是“复辟”、“翻案”、“算账”的“老家伙”。胡的这一反革命发言稿，由其同伙徐宝兴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起了反革命宣传煽动作用。1976年5月18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在昆明街头公开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此一反革命活动后，与黄兆其共谋开脱徐、胡二人罪责；5月19日，又在其家中积极与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密谋策划，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示意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之后，又将其诬陷内容告诉林敬荣，由林报告给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5月24日，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

被告人胡延观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政府，利用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提供给黄兆其等人。1976年2月至3月，胡延观将省委领导干部对待所谓“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密告黄兆其，阴谋分裂、搞垮省委。1976年4月底，在“理论讨论会”前，向林敬荣出谋献策，利用“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同年6月，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林敬荣，嫁祸省委，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转报姚文元及迟群，妄图改组云南省委。尤其严重的是，1976年6月下旬，胡延观竟把毛主席病重

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刘殷农得知此一重要机密后，于7月至8月多次开会策划，抓紧时机，要"解决一些组织问题"，进一步加快他们的夺权行动。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58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胡延观所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就按现行《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胡延观，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2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2年4月29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蔡国栋

人民陪审员　曾有琥

人民陪审员　徐抗美

1982年5月3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　记　员　梁美玲

至此，**"赵健民冤案"的处理划上了句号。然而，划上句号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终结。因为这场审查一百三十八万七千三百六十七人，立案审查十七万五千九百七十四人，打死逼死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九人的历史上罕见的冤案，留给了世人太多太多的思考。**

第二十三章

劫难过后

上万春城人民自发为赵健民送行——率先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关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腐败——被迫害者与迫害者一次面对面的反思——恪守人生格言：舍生取义

1978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中央任命赵健民为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是吕东。赵健民一家没有通知任何人，迅速地打点行装，准备赴京。

起程之日，当赵健民一家来到火车站时，车站的贵宾楼外面、站台上，已聚集了上万名男女老幼。人民群众自发地给这位铁骨铮铮、舍生取义的共产党人送行。“公道自在人心”啊！赵健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高喊着：“谢谢云南人民！”在一片真挚的告别声中，火车徐徐地开动了。火车经成昆铁路到达成都。在这里，赵健民一家转乘飞机抵京。在成都逗留期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给历尽磨难的赵健民以极大的慰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以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被载入党的历史。赵健民出席了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邓

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发表的公报，使赵健民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已走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八十年代之初，改革的春风从经济领域吹到了政治领域。198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要求老同志从第一线上退下来，当好年轻人的参谋。面对着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赵健民毅然决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时，部长吕东已调离第三机械工业部，赵健民正主持部里全面工作，按惯例，由他接任部长是顺理成章的。但他认为，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让一大批可以挑重担的年富力强的人接替像自己一样的老同志的事业，此事刻不容缓。赵健民向记者介绍说，第三机械工业部有正副部长十八人，领导着二十几个局，是十羊九牧；部里每年发文二千多份，怎么得了；会议无休无止，议而不决；……这一切迫切需要改变。他引用史书上的话说：“‘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现在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精兵简政是绝对不行的。”1981年7月，赵健民向中共中央呈上了辞退报告。年底，中央任命莫文祥为部长，赵健民为顾问组组长。

赵健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而率先退居二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1982年2月17日、4月7日分别以《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面前》、《一位共产党员的经历和胸怀》为题，作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在中共十二大上，赵健民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退出第一线的赵健民，在承担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之余，集中精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思考治党治国的良策。

1985年元月，赵健民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呈送了《关于

改革党和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议》。在《建议》中，他尖锐地指出，“应当承认，这几年我们在改革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方面，还是有曲折的。回想当《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制定出并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时，全党绝大多数党员是为之欢欣鼓舞的。大家认为，有了差额选举，再不会出现上级拟定一个名单让代表划圈的形式主义的选举了。有了差额选举，党员代表就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或者不大好的候选人以差额选举的方法选掉。可是，在差额选举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实行的情况下，十二大又提出了不要差额选举的预选办法”。“这种不让代表提名的预选制，实际上是否定了《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中所规定的差额选举制。我认为这是对差额选举制的一个倒退”。他批评反对差额选举的意见是“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痛，是置党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是置我党掌握政权以后的惨重教训于不顾”。他呼吁“把选举公仆的权利完全交给党员，交给人民群众或者他们的代表”，建议在全国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制和竞选制。《建议》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胡耀邦亲自批示给胡启立，要求认真研究。

约半年后的8月，赵健民又向中央递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在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建议。他在建议中直率地指出，“中央对党员干部对党员对人民的理论教育抓得都是不够的”，如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中，“只重文凭、学历”，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强调或强调得很不够”。又指出，“中央比较重视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相比之下重视不够”。他说，“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必须重视社会科学，必须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建议中央改变这种状况，“加强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不无忧心忡忡地向中央进言，“当前的现实是，党

内不正之风未得到根本性的克服”，“不正之风是到处可以听得见、看得到，而主要表现在党的干部身上”，“现在的党风确实值得我们忧虑”。他认为，“加强思想教育是解决我们党风进一步好转的治本工作”。他指出，“对于少数腐化变质分子必须从严惩处，清除出党”，“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我们党战争年代在群众中形成的良好形象是很难恢复过来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事变，在中国，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世界，出现了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剧变。1989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和行动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1990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决定》，这两个《决定》要求全党发扬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廉政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进行斗争。

赵健民认真学习了这些通知和决定，就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期间的1991年11月27日，赵健民在顾问委员会上就“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问题发表了讲话。

赵健民说，“东欧、苏联都变了，出乎意料，我想不到”，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能够成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联系我们党的情况指出，“胡耀邦同志曾讲三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没实现；赵紫阳同志搞的廉政建设座谈纪要，没解决问题。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做到不出大的失误，下力量解决党风好转、廉政建设和反

对腐败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赵健民发出呼吁，“必须认识到当前党和国家的腐败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它已经败坏了我们党的名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发展下去的危险性，“腐败问题是我党和国家的心腹之患，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也免不了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道路，在反‘和平演变’上打败仗”。赵健民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反腐败必须抓落实。他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决定》，国务院 1990 年 12 号文关于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都是很好的文件，也登了报纸，就是没有下气力贯彻下去，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见大效”。他提出了反对腐败的四点具体措施：第一，中央要认识到当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要紧紧抓住不放，不能讲一讲就完了，大案要案要一抓到底，要支持有关部门碰硬；第二，要发动群众，以整风精神解决腐败问题；第三，要解决好党的领导体制中的某些问题，要进一步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而不是陷入具体事务中；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克服腐败现象。

赵健民最后指出，“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讲，‘只要我们党自己不腐败，自己不蜕变，谁也演变不了我们’，这个讲话正确地阐述了反对‘和平演变’和反对腐败的关系，是至理名言”！

讲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刘澜涛听后，当场就说：“健民同志，讲得好！”并告诉工作人员，整理上报。事后，汪道涵遇见赵健民拉着手说：“您发表了一个很好的讲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听说这个讲话，立即要去了讲话稿，他连看数遍后在上面写道：很好。

1996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学术讨论会，纪念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赵健民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发言。会后，《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全文刊登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赵健民在回顾了八大的历史功绩之后，指出八大有三条经验教训特别值得借鉴，这就是，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第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加强党的建设。在讲到最后一条时，赵健民说：“党的建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党的建设搞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搞好。应当看到，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极大地危害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八大反复强调党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腐败，那就要丧失民心，导致亡党。腐败不除掉，说代表人民是自欺欺人。反腐倡廉，是一项综合工程，要从多方面努力。但加强群众监督，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

发言的结尾，充分地表达了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心声：“在纪念八大召开四十周年之际，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依靠工人、农民，广大人民，清除一切大小上下的贪污腐败分子，做到一切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综观赵健民自 1981 年退出第一线以来的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注的主要是三个问题：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腐败。而这三个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是，“文革”结束十余年后赵健民与黄兆其的一次会面。

1989 年 4 月中旬，赵健民因公到贵阳市。一天晚上八时左右，赵健民与黄兆其在贵阳市宾馆相见。当黄兆其跟着公安厅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会客室门口时，一眼认出了站在那里的赵健民，立即快步走上前去，拉着赵健民的手，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音调说：“赵

书记，您的身体好吗？”“好。您还好吗？”赵健民礼貌地问。“好。”黄兆其回答着，二人进入了会客室，直接谈起“文革”的情况。交谈中，黄兆其告诉赵健民，“您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当时，我们‘八派’的几个负责人可以随时去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主要是向康生汇报”。

会见结束时，黄兆其不无愧意地说：“我不知道‘划线站队’中死了那么多人。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赵健民以浓厚的历史感，意味深长地说：“‘文革’，是全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云南是重灾区。您，我，都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吸取教训。”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被迫害者与一个迫害者的反思。

愿更多的“文革”的亲历者进行这种反思。若如此，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日月如梭，1997年6月24日，赵健民已满85周岁。耄耋之年的赵健民，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他，依然密切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依然恪守着这样的人生格言：

生亦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后　记

通常，人们把历史比喻为一面镜子。而要充分发挥镜子的作用，就需要历史工作者不断地擦拭它，并把它送到老百姓的手中。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但愿也是绝后的。早在80年代上半期，作者就想写一部以“赵健民冤案”为内容的通俗史书，来透视这场灾难，给普通群众以启示。从那时到今天，春华秋实，暑往寒来，十几年过去了。这十几年中，我们收集资料、研究思考、书写成稿、反复修改，现在终于要出版了。

这本书从策划到出版，得到了许多尊敬的老领导、专家学者、同学同事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我们全党德高望重的薄一波老题写了书名，昆明军区原司令员张铚秀将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老撰写了序言，著名书法家武仲奇老书写了赵健民座右铭。在此，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应该提及的是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李春林先生，这是一位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丰富的学识、极强的责任心的编辑。他为本书的出版耗费了大量心血。

我们深知自己水平有限，所以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以真诚的指教。

作者

1998年10月

责任编辑:李春林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罗世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丁龙嘉　听雨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ISBN 7-01-002834-6

Ⅰ.康…
Ⅱ.①丁…②听…
Ⅲ.①赵健民-生平事迹
②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史料
③康生(1898-1975)-生平事迹
Ⅳ.D652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KANG SHENG YU "ZHAO JIANMIN YUANAN"

丁龙嘉　听雨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275千字　印数:1-10,100册

ISBN 7-01-002834-6/K·587　定价:20.00元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



赵健民(左二)与夫人杨瑞波(左三)同作者之一丁龙嘉(左一)的合影



一个历尽磨难的家庭。这是赵健民(左五)与夫人杨瑞波(左四)同部分家人的近照